

袁木文集

第四卷

中国言实出版社



袁 木 文 集

第 四 卷

中国言实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木文集/袁木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9

ISBN 7-80128-187-X

I. 袁…

II. 袁…

III. 政论—中国—文集

IV. D6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8586 号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

电话：64924761 64924716

网址：<http://www.zgys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艺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2 印张 2730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400.00 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这部《袁木文集》，汇集了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者在1981—1998年期间所写文章和所作报告的主要部分。

文集分8卷，共191篇，约270万字，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

从内容和形式看，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重大决策评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者曾参与过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讨论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决策和文件形成后，作者又曾应邀向若干地方、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做过多次学习辅导报告，解释和评介决策的历史背景、基本精神和指导意义。文集中的这类文字，大都是在这样的报告基础上经过修改和补充而形成的。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历史依据以及理论的和实践的轨迹。

二、热点问题答问。这部分主要是作者担任国务院发言人期间，围绕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政府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特别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对中外记者提

F1/00/32

问的回答，以及同各界人士的对话。其中尤以 1989 年那场政治风波期间的答问和对话，当时曾在国内外产生相当广泛的重要影响。

三、调查研究报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后，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作者结合本职工作，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写了一批调研报告。其中主要是在国内的调查，也有在国外的考察。在众多调研报告中，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是一个重点。

四、论文和专著。主要是作者关于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以及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方面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这是一部可称之为全景式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程的，兼有理论性、实践性和史料性的文集。文集涵盖的面比较广。其中，涉及到国内和国际形势，但以国内形势为主；涉及到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但以国内政策为主；涉及到国内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但以经济领域为主；有在某种程度上偏重于理论思考的，但重点是对各种实际问题的探索。

在上述四类文稿中，作者均努力贯彻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力求从两者的结合上说明问题。这是作者的本职工作所要求的，也是作者始终坚持的写作态度和写作风格。

文集不可避免地留有深深的时间痕迹。这次结集出版，作者做过某些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但基本的观点、材料和论

述，均保留原著的面貌未变。

文集中的各类文稿，主要是其中的调查研究报告，曾与作者志同道合的一些同志分别参加，有的共同调查，有的执笔写过报告初稿。文集的出版得到信都北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风帆集团的大力支持。本社受作者委托，特向这些同志和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对这部文集，作者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9年9月



目 录

- 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30
(1988年3月)
- 中共十三大的理论和实践 31—42
(1988年4月)
- 历史性飞跃的新起点 43—45
(1988年4月)
- 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前进 46—54
(1988年5月)
- 从物价问题和价格改革谈起
——兼论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方针 55—88
(1988年10月)
-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治理整顿问题 89—117
(1988年12月)
- 就我国经济问题与在京外国专家的对话 118—127
(1988年12月)

- 关于当前经济宣传的若干意见
——在全国宣传部长和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
会议上的讲话 128—138
(1989年1月)
- 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几个问题 139—175
(1989年1月)
- 关于1988年经济情况和1989年经济工作的通报
和答记者问 176—186
(1989年1月)
- 总结经验 坚持改革 187—196
(1989年1月)
- 一心一意治理整顿 197—239
(1989年3月)
- 关于治理整顿的情况通报和答记者问 240—251
(1989年3月)
- 关键时刻的正确抉择
——读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札记 252—263
(1989年4月)
-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基本认识 264—273
(1989年4月)
- 同首都高等院校学生的对话 274—283
(1989年4月)
- 就北京学潮和动乱问题答记者问 284—293
(1989年5月)

-
-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反自由化等问题答记者问 294—297
(1989年5月)
- 关于首都反革命暴乱的真相 298—310
(1989年6月)
- 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问 311—318
(1989年6月)
- 关于1989年上半年经济情况和我国对内对外
政策问题答记者问 319—327
(1989年7月)
- 答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问 328—332
(1989年8月)
- 关于提高客运票价的广播电视讲话和答记者问 333—340
(1989年9月)
- 怎样认识动乱暴乱?
——答青年朋友问 341—351
(1989年9月)
- 关于动乱和暴乱的反思 352—378
(1989年9月)
- 答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问 379—388
(1989年9月)
- 答日本共同社记者问 389—393
(1989年10月)
- 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宣言 394—402
(1989年10月)

-
- 正确认识形势和把握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 …… 403—413
(1989年11月)
- 关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问题
——答《瞭望》周刊记者问 …… 414—426
(1989年11月)
- 当前经济形势和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决策 …… 427—451
(1989年12月)
- 同北大学生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 …… 452—458
(1989年12月)
- 同《经济参考》报编辑记者的座谈对话 …… 459—471
(1989年12月)

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988年3月)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顺应当代中国和现时代的深刻变化，勇于探索和创新，争取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新的大发展，是促进和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胜利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性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一个新的 更大发展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把坚持和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能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前进，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贯强调的一条要重要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本身决不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更新的科学。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列宁，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革命的导师，从来都说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不是可以照抄照搬的教义，不是可以按图

索骥的施工图纸，而只是可以运用它来思考和观察问题的科学的世界观，是可以用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行动指南。谁如果头足倒置，想问题只从现成的原则出发，从某些空想出发，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面临的时代和历史条件，特别是如果不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那就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就根本不配称做马克思主义者。

回顾我们国家的历史，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使我们的事业遭受巨大挫折的，使我们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主要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使中国革命遭受那么严重的挫折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神圣化。那个时候，在我们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主要负责人，想什么问题，干什么事情，都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搬几句话来图解中国的现实，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都当成是不可移易的绝对真理；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只知道照抄照搬，生搬硬套，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种思想路线下所产生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后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一定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我们国家的基本情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经过20来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正确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性质和革命的前途与转变，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这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总的道路，是中

国革命的基本特色。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正确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如何对待各种各样阶级力量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地开展统一战线和正确地开展武装斗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如果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个别论断，这些问题一个也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左”的以至极左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不仅没有得到发挥，而且走了很大的弯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来年中长期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状态，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强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一定要按照本国的国情办事，要走自己的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恢复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如果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的话，到今天已经有 130 多年过去了。在这个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无数次的经济危机，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还发生过一系列对世界面貌和人类命运发展有着重大而深刻影响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当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没有也不可能都预见到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它揭示了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规律。这个伟大的学说，在过去 130 多年的时间中，始终指导和影响着无产阶级和劳动

人民的革命斗争，现在世界上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按照这个学说行动。这个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130多年来以至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很多巨大变化，往往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许多现成的具体结论所解释不了的。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今日世界的种种变化。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仍然是指导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原理。这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认识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它对当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就难以解释，它就会停滞，就会僵化，也就会失去其伟大的生命力了。因此，能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推向前进，这个历史的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到当代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了。

那么，在现时代，在当今的世界上，究竟发生了哪些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巨大变化呢？

首先，世界新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迅猛发展，这带来了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当年没有也不可能预见的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当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的外壳已经容纳不了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因而他们预计社会主义革命将很快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由于技术革命的发展而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革命并没有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很快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这种技术革命，大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从18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初，由

于纺织机械和蒸汽机的发明而导致产业革命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开始，由于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发明而引起的电力革命时期。第三个时期，大体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各种新兴技术和高技术的发生和发展，从而带来的信息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各种现代知识急剧积累和增长，各种新技术广泛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以空前的飞快的速度在世界上扩散着，使整个世界进入新的技术革命时期。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影响到了世界各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管理方式，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影响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影响到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看法等等；由此，也必然要影响到怎样来看待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乃至其发展前景。第三次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的展开，不能不影响到人们要多方面地考虑当今世界的新形势。现在，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比如原子能和核技术，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激光技术，海洋工程，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新材料新能源等等的巨大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人们在几十年前根本无法预料的巨大变化，具有极其广泛和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由于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外壳下面，资本主义世界在保持其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仍然包容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们即资产阶级，就有可能采取更多缓和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措施。对这种情况，人们常常讲的一种通俗说法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出了更加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整个社会财富创造得更多了，蛋糕做得更大了，因此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从这个大蛋糕中，切出相对来说比之过去较大的一块来，用以调和它们同无产阶级之间

的矛盾，调和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冲突。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化这种趋向，已经和正在发生一些新变化。毫无疑问，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家手里的财富越积累越多，越来越集中，但是广大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未越来越趋向于绝对贫困，而是相对来说也逐步有所提高；特别是其中的“白领工人”，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正越来越趋向于中产阶级。列宁当年曾说过，资产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无产阶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这是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兆。现在，这种前兆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尚未出现，甚至还看不到出现这种前兆的迹象。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条件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财富更多了，资产阶级就采取了许多调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几乎都实行了许多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都是这样。总之，一个是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再也不采取或主要不采取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期那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了，这就使得当今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了许多不同于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重大变化。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出的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规律仍然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也将最终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必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并没有改变，但是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情况的确发生了与过去有很大不同的新变化。因此，整个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将如何发展，其规律、道路和形式将是怎样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新特征应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才能对它们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和说明，拘泥于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现成结论是不行的。

第二，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后崛起。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苏联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中国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有一些国家，也说他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世界上是孤立的。二次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到了列宁时代，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发展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但当时还只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进一步传播，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由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到了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现在全世界共有 200 多个共产党或者说工人阶级的政党，其中一部分已成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掌政权的党。苏联党已有 70 年的执政经验，我国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党已有近 40 年或 40 多年的执政经验。在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在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向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很不一样的一个重大情况是，社会主义并没有首先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现在崛起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原来生产力中等发达、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像我们中国更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样，在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当中，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

建筑，如何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如何指导意识形态的工作等等这些方面，都遇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许多新情况。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曾经强调指出过，在俄国，按照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按照实践经验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的这个思想是非常正确和非常重要的。一个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那就肯定解决不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种种复杂问题。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实践相结合，不能解决实践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指导人们实践的科学了，也就失去它的意义，失去它的活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面临着一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的严重情况。正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推进全面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得出新结论，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恢复和焕发了新的青春活力，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总的理论宝库做出了新的贡献。总之，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发展需要，也才能引导我们的社会主义

实践不断前进。^①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还出现了一大批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下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些国家挣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枷锁，争得了自己国家的政治独立乃至经济独立。它们在实现民族独立后，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目前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的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宣称搞的是民族民主主义，也有的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不论属于哪种情况，它们都脱离了原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对这样一大批国家的现状如何解释，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关系如何解释，南北、南南关系应该怎样看待，国际间政治和经济的新关系新秩序应该是怎样的，这些国家总的或各自的发展前景将是怎样的等等这类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有的结论所难以解释的。总之，第三世界的现实状况、发展前景和实践经验，也都是原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而也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才能对它们做出正确的科学的理论说明。

第四，从本世纪50年代后期或者说6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提出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思路，但当时并未认真地和正确地实行，或者说由于党在总的路线方面“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重新

^① 本文完成写作和发表后，世界上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演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的历史现象，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但这并不影响本文当时的论点。故未作改动，仍保持原样。

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我们才坚决地正确地提出并坚持实行了全面改革。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并实行改革比我们要早一些。现在，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包括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内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都或先或后，或深或浅，提出了要对自己国家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各方面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改革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实践证明，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管理体制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程度不等的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没有能够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那样，一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就可以使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人民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很快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这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以都提出改革问题的总的历史背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无疑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国家的改革也是这样。但是，这种理论的指导，必须是能够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而不能是僵化的理论指导。现在，我国在改革第一线进行工作的广大干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理论的指导。目前有不少工厂自费举办理论学习班，邀请理论专家进行咨询，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改革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发展，伟大的实践呼唤着伟大的理论。

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生活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改变。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某种僵化的不变的社会，也不能把完善社会主义的复杂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去凑合和迁就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的思想概念和公式。这也就

是说，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要做种种复杂的实际工作，来使得社会主义不断完善。这种实际工作是否正确，不能用现成的概念、公式和理论来检验，而要用实际生活来检验，不能拿现实去凑合理论，也就是说不能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现成论断来裁判生活。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曾经强调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任何思想、观念和理论是否正确，不能用思想、观念和理论本身去检验它，而只能用社会实践去检验它。要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实际条件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它们，要认真学习列宁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态度。大家都知道，列宁是敢于冲破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的典范。当年他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冲破马克思主义原有结论的胜利。他当年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运用这个基本原理，深刻分析当时俄国的现实情况，得出了俄国尽管还落后，但它是整个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这个论断，改变了原来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首先将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且将在几个这样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实践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他领导俄国的党和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开始他也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制度一旦确立，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后，商品货币关系就要逐步消亡的设想，来进行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但他搞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很快就发现这样做行不通，于是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明确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是等价交换的商品交换关系，农民除了向国家交粮食税之外，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都可以

进入市场交易，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之间以及他们内部之间的经济关系也都应该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很快促进了苏维埃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斯大林后来过早地改变了新经济政策的方向，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引向了长期僵化的模式。所以，要把社会主义的改革顺利地推向前进，都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都要求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至于在实践中是否能够真正地坚持这样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总之，以上情况告诉我们，现在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一个新的大发展，这决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主观愿望，而是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到许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各国正在掀起改革浪潮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大发展，就不可能适应这种形势。充分认识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改革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前个时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其说不一，各执一词。有的同志说，首先应当强调坚持，否则也就谈不上发展。有的同志又说，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但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能够适应当前形势变化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否则这种坚持就会导致思想僵化。我的看法是，在中国要不断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绝对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要牢记，否则就谈不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决不能放弃，决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今天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认清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一个新的大发展是现时代的大趋势，我们一切

工作的根本立足点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或者说让活生生的现实去适应现成的结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现实问题都想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现成公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应该是辩证的统一，而不应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我国，它们应该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这种统一。能不能牢固确立并始终坚持这样的指导思想，关系极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全部实践，归根到底就是牢固确立并始终坚持了这样的指导思想，不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教条化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东西，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

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正在经历着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的根本标志 就是开始找到或逐步形成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在我国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1940年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作的发表为标志，表明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分析我国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任务以及革命的前途和转变，终于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次历史性飞跃的真理性，已经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实践所完全证明。这次历史性飞跃，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推进全面改革，正在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同前一次飞跃一样，它也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在这当中，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引导着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又不断创造出大量丰富的经验，从而启迪了我国领导人的智慧，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新的正确理论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既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启迪、丰富和发展人们的正确认识源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经过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经过对国内外形势的认真研究和深刻分析，并根据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丰富经验，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和理论命题，并围绕这个历史任务和理论命题发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取得了相当可观的重大的理论认识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总体上说，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一系列基本的方针政策，已经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和我国绝大多数人民所接受，成为他们行动的指针，它已经在当代中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是中国一切希望之所在。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历史命题，经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党的十三大报告把我们党丰富和发展了一系列最重要的科学理论观点，概括出了十二条。这些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因此，不断加深认识和自觉掌握这些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报告中讲到的第一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第二条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这两条的中心是解决一个思想路线的问题，也是我们能不能正确地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能不能正确地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推向前进的根本认识前提。如果不坚持这样的惟一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彻底划清界限，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任何思想、理论、路线、政策和方法，都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它们都不可能自己来检验自己的正确与否，只能用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来检验。违反了这个原理，就必然要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泥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建设和改革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从根本上说，都是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分不开的。

报告中的第三条讲的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的根本立足点，也是十三大报告的立论基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充分认识和科学分析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样才能站稳脚跟，脚踏实地，同带有空想成分的社会主义从思想上划清界限。紧接着，报告中的第四条讲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一位的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始终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应该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应该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应该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但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应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离开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其他基本特征就难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力不发展，空谈其他一切，只能是有害无益。在确立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应该采取什么的经济形式，这是过去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经过认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我们党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观点。这就是报告中讲的第五条。这种理论观点的确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它既同脱离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带有某种空想成分的产品经济模式划清了界限，又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模式划清了界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商品

经济是建立在资本家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可以在计划指导下发展的，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干预逐步加强，计划调节手段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但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仍然是基本上或主要由市场自发调节的经济。

报告中第六条讲的是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用精练的理论性语言对改革和开放在社会主义社会所占的历史地位和所起的历史性作用的科学概括。明确这样的理论观点，对于进一步消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残余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在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破坏社会主义的极少数敌对分子，当然还要依法惩处，以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也就不能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只有通过改革，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许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部分，使这些部分和环节逐步得到克服，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逐步发展和完善，整个社会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充满生机，获得促进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我国的和世界各国的实践还告诉我们，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实行闭关自守，不可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更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你想要现代化吗，你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你不想现代化吗，你就实行闭关自守。所以说，实行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要逐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

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报告中第七条概括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相应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应地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种建设要同物质文明的建设相配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的发扬，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的事业，如果不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将是一句空话。就“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物质文明建设为它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它又给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所谓思想保证，就是在政治上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走错方向；所谓智力支持，就是能够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素质。

立足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报告中第八条所讲的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结合、缺一不可的理论论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密切关联、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不可分割的关系。确立这个观念非常重要，这样才能正确地既防“左”又防右，保证我们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健康的轨道前进。

报告中接着讲到的第九至十二条，讲到了和平统一祖国、党风建设、党际关系以及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的按“一国两制”原则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这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已经证明了这个伟大创造的重要历史意义；台湾问题的进一步解决，祖国的最终统一，必将继续证明这个伟大创造的重大意义。关于党风建设，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必须依靠党自身的改革和制度建设，逐步加强党风建设，使得我们的党能够经受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能够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规律，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建设事业。关于我们党如何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党与党之间，不论大小，不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不论是历史长的还是历史短的，都没有高低上下之分，应该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任何的党以老子党自居，反对党与党之间要有什么核心，反对任何形式的指挥棒。我们党的这种主张，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赞赏。关于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和平，希望发展。和平的问题，关键是东西关系，主要是美苏关系。目前，世界局势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趋势，但离开真正的缓和还很远。不过，从世界的全局来看，人民要求与维护和平的力量正在日益超过战争的力量。战争的威胁虽然还存在，但避免战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还看不出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危险。过去讲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打世界大战，现在破除了战争完全不可避免论，这是个很大的思想解放。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南北贫富悬殊，是历史造成的。有相当大一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许多发达国家从各方面压榨它们，因此要实

行南北对话，推动南南合作，解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这是许多国家共同的愿望，特别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情况下求得独立发展的国家，强烈要求解决这个问题。服务于和平与发展两大目标，我们调整了外交格局，坚持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推进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上受到了世界各国普遍的欢迎和赞赏。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它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已经由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它的真理性；它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产生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其真理性也已经从十年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并将为今后的实践继续证明。当然，这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尚未完成，还正在实践当中。充分认识我们已经取得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地检验它们，印证它们，丰富和发展它们，使得我们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更加成熟，更趋完善，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根本问题。

三、坚持生产力标准，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

我们要适应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一个新的大发展这个现时代的大趋势，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从思想上划清一个根本的界限，这就是：我们要搞的只能是科学的

社会主义，而决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要划清这个界限，结合我国历史的和当前的实际，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判断一切是非功过，判断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这个观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贯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标准的重要发展。人类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这三大实践。在这三大实践中，归根到底，决定一切的生产实践是人类的实践。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但已经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进行生产实践，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已成为全社会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而进行科学实践最终也是为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看问题想事情，看干部工作好坏和功过是非，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对一个人来说，看他的所作所为，首先要看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一个党来说，看它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归根到底也要看它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过去，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把这样的观点牢固地树立起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使我们走了弯路，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忽视生产力标准，以为在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化程度很低的基础上也能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认识

不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必须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认识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必然会陷入严重的主观随意性，必然要犯超越阶段的空想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长时期中，我们过去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产生的一系列“左”的错误，其中一个总的病根也就在这里。由此而产生的许多问题，大体上有以下的几种表现：

第一，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空想在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就能够建立起完备的、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甚至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实际可能，企图过早地增加许多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因素。这也要实行供给制，那也要实行供给制，这也要公费，那也要公费，结果是严重脱离了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带来了许多弊端。举例来说，城市职工住房长期由国家统一分配，收取的低房租连支付房屋的维修管理费都远远不够，不仅严重窒息了建筑业的自我发展活力，而且助长了住房分配中的不正之风。再比如，公费医疗制度的实行，吃药治病不花钱，给国家造成的浪费相当严重，也腐蚀了一些人。类似这样的存在着严重弊端的制度，现在都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第二，不顾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凭空地频繁地变动生产关系，人为地提高公有化程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越大越公越纯越好，盲目地错误地提倡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调穷过渡，越过渡越穷，结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很大的挫折，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

第三，由于没有明确地树立起坚持生产力标准的观点，因而严重地忽视了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同发达国家之

间的差距。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由于对这一点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主观主义地幻想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不切实际地提出一些空想口号，结果做不到，反而使人们陷于失望，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

第四，由于脱离生产力标准，对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吸收现代文明成果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以为单凭政治鼓动和道德说教就能够把生产力奇迹般地搞上去，这也是我们过去常犯的毛病。生产力的发展，当然需要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不吸收世界的先进技术，不吸收现代先进的管理制度、管理经验和办法，只是靠政治鼓动，靠大搞群众运动，靠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以为这样就可以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吃的苦头已经够多的了。

第五，由于脱离生产力的标准，往往导致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恰当地提出一些口号，把少数先进分子可以达到和应该达到的思想道德境界作为对全社会成员的普遍要求。这样做的结果，就很容易离开现实的经济文化条件，企求依靠过火的政治批判来提高社会意识的纯洁度，以为这样就能够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实践的结果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相反地往往造成很大的危害，挫伤许多人们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地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总之，过去的种种事实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如果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言不及义，就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只能陷入种种主观主义的空

想。离开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谈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想搞什么样的政策就搞什么样的政策，发展下去，就会在缺乏物质基础的情况下认为也可以实行超阶段的共产主义政策，那就会陷入极大的空想。既然离开生产力标准，抽象地谈论生产关系，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那么一切现行的政策就失去了依据，就必然会陷入主观主义的随心所欲。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种种脱离实际的“左”的错误。所以，第一我们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是第一个根本；第二我们一定要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这是第二个根本；第三我们一定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社会主义时期一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基本标准，这是第三个根本。这一个根本任务，一个根本特征，一个基本标准，这三个“根本”必须牢牢记住，才能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也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真正地落到实处。

四、进一步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 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念， 坚定不移地提倡解放思想和勇于创新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宾时曾经指出，十三大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因而它必将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从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就是十三大基本精神的精辟概括。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所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仍然是我们

的基本口号”。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建设方针和改革部署的提出和推行，一切成就的取得，归根结底，都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展望今后，无论建设的发展，还是改革的推进，都必须继续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破除“左”倾僵化思想的束缚，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一切错误观念。

众所周知，党的十三大报告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的概括，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的论述，都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创见。尽管如此，报告仍然特别着重地强调指出，我们已经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决不是封闭的、凝固的、定型的模式，而是需要继续丰富和发展的。报告中讲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发扬探索、创新精神的意义很有帮助。这段话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我们既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也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和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振奋起全民族探索创新的勇气，是我们

的理论和事业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

报告中这段极为重要的话以不可辩驳的逻辑，深刻论述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探索创新的重要意义。我们一定要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振奋起全民族的探索创新精神，坚决打破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等等僵化的思想禁锢。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包括思想上文化上的先进成果，也包括适应组织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一形式和手段，我们都要考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不能加以借鉴和采用。我们不能首先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考虑问题，而是应该倒过来，首先考虑在现实的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才能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就是我们必须和应该采取的，就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社会主义所允许的。相反，如果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管你用多么美妙的马克思主义的言辞装饰起来，这对我们都是有害而无益的，这个观念必牢牢树立起来。这样，我们大胆地解放思想和探索创新，才能解放和创新到正道上，也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在这里，必须强调两条：第一，决不照抄书本，要勇敢地探索。所谓决不照抄书本，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内。第二，决不照搬外国。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许多先进的对我们有用的形式和手段，应当拿来为我所用，但运用时也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决不可照搬，当然更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搬过来。学习借鉴和为我所用，同照抄照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的正确做法和有益经验，我们也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因为各国的具体情况很不

一样。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敢地探索创新，可能有这样几件事一定要认真地做起来。

第一，必须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基本国情，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不但全国要这样做，各个地区也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国家大，发展很不平衡，适合全国一般情况的未必就完全适合各个地方。总之，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充分认识自己的现状。

第二，必须对我们国家几千年来的文明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去芜取精，去伪存真，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and 优秀文化。对我们民族的东西，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现在有这样一种思想，好像我们过去所有的文化全部都是封建文化，全是糟粕，毫无可用之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举一个例子，同志们可能感到吃惊，日本人把我们的《孙子兵法》用来进行对外贸易战，他们的企业管理也引用了孙子兵法里头的一些道理。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有很多有用的东西，难道我们自己就不能在这方面多做点文章吗？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一切都无用，相反地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这种态度和观点是十分有害的。

第三，我们还要系统地有分析地对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最新的文化成果进行研究。大体上说就是这三个方面。

这样，第一立足于本国现实的最深厚的土壤，第二继承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时我们又借鉴整个世界的先进文化的成果，并且着力于现实的当前的实践，我们就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解放和探索创新获得正确的丰富的认识成果和实践成果。

五、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进一步增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全党的思想团结，首先要对我们党当前这方面的状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对此做了两点基本的估计。

首先，是关于多数和少数的问题。报告充分肯定了我们党的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赞成改革开放的，固守僵化思想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有，但都是极少数。这个估计必须牢牢地确立下来，因为它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不然就会搅乱我们的自己的阵脚，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关于什么是立场问题，什么是认识问题的看法。报告中强调，在我们党内在一些问题上产生的不同看法或意见分歧，绝大多数不是什么立场问题，而只是思想上、认识上的不同。这种看法不一致，还经常随着情况的变化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经常变化着。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换一种情况，他的看法又可能是不正确的。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对的，对那个问题就可能又有不正确的看法。这个人可能有这方面的片面性，那个人也可能有那方面的片面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进一步清除过去所谓“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样一种观点，它长期以来曾经对我们的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我并不是说这种观点在有的时候没有它一定的道理，譬如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在我们的社会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

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基本上尚未解决的时候，一句话，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还没有消灭之前，这种说法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有一些道理，可以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会反映为党内矛盾。即使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也不能绝对化地认为党内一切斗争和思想分歧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再来讲这种观点甚至强调这种观点就是非常有害的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之所以发生，坚持这种有害观点并走向极端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那个时候，对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估计过了头，并且反复强调要从党内寻找代表人物，寻找代理人，把他们打成所谓的“走资派”，打成所谓的党内的资产阶级，给我们的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样的历史教训无论如何再也不能重复了。我们现在应该非常明确地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大量的党内矛盾都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目标一致基础上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或矛盾。把这一点明确起来，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保障党内团结的重要认识前提。

党内同志在思想认识上有先进有落后，有正确或不正确的，这种差异和矛盾什么时候都会有。由于建设和改革的事业很复杂，反映到党内，又由于人们的知识、经历、经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等等都会有所不同，这就不可能在思想认识上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差异。这种认识上的差异，绝对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反映。当然，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在社会上，都不应排除有极个别或极少数的人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的立场，甚至会采取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行为。但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情况同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以至绝大多数人民的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地区别开来。

当前，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的中心任

务,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潮流,党内和人民中某些不同的意见往往又集中反映在对建设和改革的某些不同的认识上和实际做法上,这也是很自然的。那么,我们处理这类思想认识上不同看法或某种意见分歧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方针和办法呢?归根到底,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强调指出的,就是要引导大家都去面向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通过实践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人们对许多问题在认识上不一致,常常是由于各自了解的情况都不全面,都有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同时互相又不交流,或者老是凭自己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一套,从理想出发,从原则出发,不与实际相结合,这种情况越是严重的地方和部门就越容易产生种种不同意见的分歧,以致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因为不接触实际,也就没有客观实践这个检验正确与非正确意见的标准,许多分歧意见讨论来讨论去,就往往长期争论不休,难以取得认识上的一致。说到底,解决这种认识问题,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定要通过实践。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偏差和片面性的产生,说到底,是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克服的根本办法,是引导大家面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很多,尤其需要加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这样才能同心协力地开拓前进。我们一定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使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在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下,使大陆同胞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更加辉煌的新胜利。

中共十三大的理论和实践*

(1988年4月)

中国共产党于1987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总结了从1979年以来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实践经验，阐述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划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蓝图。我们党内的同志们普遍认为，十三大有可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新的广阔前景，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或里程碑。当然，这个认识是否正确或正确的程度，还有待于今后实践的检验和证明。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作者曾作为中共中央的报告员，于1988年春被派往东欧一些国家通报我党十三大的情况，这是当时写的通报提纲。

二

我们党过去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过程中，有过有益的探索，也有过失误，尤其是发生过长达十年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使党和人民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经过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才逐步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关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判断，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分析我国基本国情而得出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十三大召开前，我们党多次做出过这样的论断，但由于对这个论断没有展开充分论证，因而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直到党的十三大，在总结过去九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认识问题：

第一，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一方面，认定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认定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尚未确立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较高的社会主义阶段。明确了这样的理论认识，将有利于我们既防止犯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右倾错误，又防止犯采取超越阶段的方针政策的“左”倾错误。

第二，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我国条件下建设社会

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本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没有能够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后，虽然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贫穷落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这就决定了在我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努力实现别的许多国家通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国家工业化，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然后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因此我们党认为，从50年代后期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下个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估计，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需要大约六七十年年的时间。

第三，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生产力落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由此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党内党外和社会上还存在着广泛的影响。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但它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现在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第四，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根据上述的

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我们党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主要应该是：1.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脱贫穷和落后；2. 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改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3. 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逐步改变为商品经济充分发达的国家；4. 通过探索和改革，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当然，这几个方面的任务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党在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我们党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在我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特定的历史阶段；二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补充、修正和提高。

三

依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我们党制定了在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相互联系的要点：

第一，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应该这样。人民的富裕幸福，国家的繁荣强盛，种种社会矛盾的解决，社会主义制度

的巩固和完善，归根到底都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采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形式。过去我们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忽视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不相容的，因而不注重价值规律，不注重市场供求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在它的初级阶段，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赖以建立的基础就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可能得到最终的巩固和完善。当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后者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前者是在计划指导下发展的，后者基本上是由市场盲目调节的；前者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后者的发展是为了追逐最高利润。

第三，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改革过去同发展商品经济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我们党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配置资源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从总体上说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相互结合，两种经济手段都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运行机制。同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和配合，还要逐步推进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等体制的改革。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但绝

不能把自力更生片面地理解为一切都要靠自己，放弃利用国际交换和分工，放弃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甚至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闭关自守只能导致愚昧，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要扩大对外开放，努力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逐步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第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应当有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和现代化的精神文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既因为封建主义影响很深而具有特殊的迫切性，又因为受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限制而只能有秩序有步骤地逐步进行，并且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团结为前提。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实现现代化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为了便于广大的党员和人民掌握，我们党把上述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通常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

四

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党确立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

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十三大的召开，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第一步的发展任务，现在正在为实现第二步的发展任务而努力。

以 1987 年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 1978 年相比较，我国的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到 1987 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0920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120%，平均每年增长 9.3%；工业总产值比 1978 年增长 174%，平均每年增长 11.8%；农业总产值比 1978 年增长 74%，平均每年增长 6.4%；国民收入达到 9153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127%，平均每年增长 9.56%；财政收入达到 2346.6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98%，平均每年增长 10.9%。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87 年和 1978 年相比，粮食产量从 3.04 亿吨增加到 4.02 亿吨；猪牛羊肉从 856.3 万吨增加到 1921 万吨；原煤产量从 6.18 亿吨增加到 9.18 亿吨；钢产量从 3178 万吨增加到 5602 万吨；发电量从 2566 亿千瓦小时增加到 4960 亿千瓦小时等等。它们在世界上都居于前列，所占的位次都比过去提前了。当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仍居于世界的后列。

——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1978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206 亿美元，1987 年达到了 827 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位次由原来的第 30 位上升到第 12 位。

——人民生活有了改善。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1987年提高到504元，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左右。城乡居民一年消费的肉类由10公斤增加到19公斤。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家用电器消费量增加较快，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的彩色电视机达到34.6部，电冰箱19.9台，洗衣机66.8台，录音机57.4台。而这些消费品在1978年以前，居民中基本上都没有。九年来我国城镇共建住宅15亿多平方米，农村建新房39亿平方米，超过了建国以来将近30年的总和。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还比较差，但比过去有了改善。随着收入的增加，人民储蓄达到了3075亿元。当然，这些都是同我们过去的情况相比较而说的。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我国人民目前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甚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要低。

以上情况的变化和成绩的取得，都是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分不开的。

——根据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在企业中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制，试行股份制，实行厂长负责制，改善企业内部的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加强经济核算，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使企业增加了活力，增强了自我发展和自我改造的能力。

——经过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商品直接由国家计划控制的部分逐步缩小。在生产领域，农业方面把过去对粮食、棉花等重要产品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实行的指令性计划，已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其他农副产品的生产则由市场调节。工业方面，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由原来的一百几十种减少到目前的60种左右，其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由

40%下降到17%左右。在流通领域，国家统配物资从1978年的256种减少到20种。统配物资的比重也下降了。比如钢材，国家统配的比重，从1978年的85.5%下降到1987年的46.8%；木材由95.4%下降到26.2%。在消费品分配方面，1979年由国家商业部直接管理的商品有188种，1987年已下降到23种。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都在逐步发展。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即在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城乡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同时，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中外合营和外资企业。现在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对搞活经济、繁荣市场和方便人民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

党的十三大以后，我们党正在继续努力组织实施十三大的决议和部署，加快和深化改革，带动各方面的工作，以达到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今年三月底到四月中旬，我国全国人大和政协分别召开七届一次会议，顺利地完成了各自的换届任务。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实行了新老干部的交替和年轻化。这将有利于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全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

案，目前正在组织实施。这次国务院的机构改革，重点是适应经济改革的深化，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进一步贯彻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适当精简机构和人员，以达到增强政府机构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和克服官僚主义的目的。

——国务院提出的并经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今后5年（1988—1992）的经济发展目标，确定到1992年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500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增长7.5%左右，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和趋势，实现这个目标是完全可能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到1992年将比1980年增长2.7倍。这样，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就会更有把握了。

——加强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十三大以后我们党做出的重要决策。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就是要充分利用沿海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挥这些地方经济技术力量比较强、产品成本比较低的优势和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现已决定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地区，增加开放140个市、县，包括8000多万人口和17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大体相当于过去九年已逐步开放的地区的总和。同时要积极发展沿海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系，向内地转让技术、管理经验和输送人才，带动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这个战略，有利条件很多，但难度也很大，需要在加快改革现行的外贸体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等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

——为了实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要下更大的力量

改善投资环境，以便吸引更多的外商到中国投资，兴办企业。现在中国已有一万多个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营企业，我们正在努力把它们办好，还要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我们党认为，这些企业由外商来管理或以外商为主管理，可以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并使之成为培养我国经济管理人才的学校，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

——继续根据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深化企业改革，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为此，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以深化企业改革为中心，还要分阶段、有步骤地搞好计划、投资、物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方面的配套改革，逐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完善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宏观调节体系，努力在今后五年内使新的经济体制逐步居于主导地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把制度改革和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我们党更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还要更广泛地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增加党政活动的开放程度和透明度，做到重大事件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过人民讨论，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合作。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形势是好的，但在前进中也还有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工作还有缺点乃至失误。我国经济建设中还存在着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物价上涨过多和财政赤字过大等不稳定因素，工作中还存在着忽视经济效益和技术进步等缺点。改革正在探索前进的过程中，新旧两种体制并存，还存在着不少的摩擦和矛盾。

党风和社会风气中，还有不少人民很不满意的不正之风。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正在通过深化改革和改善各方面的工作来加以解决。

历史性飞跃的新起点

(1988年4月)

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很重要的话：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这段话对我们党的历史，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如实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总结。

这段话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从根本上说，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实现这个结合的关键，在于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经历过艰难曲折，有过成功与失败，都是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成果

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一次飞跃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第二次飞跃的杰出代表，是邓小平同志。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它的真理性已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完全证实。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在实践中，路还没有走完，但从总体上看，它的真理性也已经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九年多来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所证实，并将为今后的实践继续证实。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它所取得的成就，标志着十三大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新起点。

所以这样说，可以举出很多理由，择其要者而言：

——它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提供了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它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了这条路线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它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制定了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蓝图；

——它确立了我国经济、政治等体制改革的性质、目标、原则和任务，为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它系统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了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初步回答

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如此等等。

立足在这样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新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我国的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和光荣任务。

实现这个历史使命和光荣任务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只要我国坚持这样做，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前进

(1988年5月)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大会的召开和成功，是继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今后五年的实践将证明，这次大会定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里程碑，而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

国务院向这次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我国各个领域过去五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坦率地指出了前进中仍然面临的许多困难和工作中仍然存在的许多缺点，明确地指出了今后五年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这个报告既是我国第七届政府的施政纲领，也为全国人民进一步指明了团结奋斗的方向。

当前，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能够更加坚定地坚持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把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那么，学习《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应该从总体上把握哪些基本的精神呢？

第一，学习《政府工作报告》，要同继续深入学习党的十

三大报告紧密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掌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自觉地以这条路线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党的十三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深刻分析我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基本国情，科学地阐明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依据这条路线规划了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当前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时期中，我们的各项工作都不能偏离党的十三大精神，而只能以它为指导，并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它。这次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无论是对过去五年工作的总结，还是对今后五年建设和改革任务的提出，都是十三大精神的体现、延续和具体化。因此，把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对党的十三大报告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就不能不成为我们在当前各项工作中必须充分注意的首要问题了。

《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我认为，为了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从根本上说，必须联系我们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通过学习进一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认识问题。一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尤其是在它的初级阶段，必须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和衡量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事情，必须坚决支持；凡是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事情，必须坚决革除。只有牢固树立这样的科学观念，才能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也才能始终不渝地、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二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尤其是在它的初级阶段，必须充分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相互渗透、紧密结合、唇齿相依的两个基本点，任何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赋予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离开了改革开放，我们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成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成为充满蓬勃生机的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成为是有无限创造活力的科学理论而相反地会被当作僵死的教条，党的领导也就不可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而得到真正的加强和改善。这样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只能成为禁锢人们思想和实践的僵化观念。现在看来，通过学习继续解决好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恐怕仍然是十分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第二，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学习，一定要更加坚信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不可逆转的强大潮流，是解放生产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动力和必要条件，并坚定地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我们国家当前的总形势及其发展趋向。

我们国家当前的形势究竟怎么样？正确地观察和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对过去实践的如实评价，又关系到对实现今后任务的信心，是我们继续前进的立足点，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举大量的事实和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充分论证了我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思想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勾勒了国家面貌的深刻变化。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国经

济在改革和开放的推动下持续稳定发展，人民得到的实惠是建国以来很少有过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科技、教育、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日益显示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进一步从根本上打破了我国过去封闭半封闭的闭关锁国状态；人民解放军的整编和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效，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加快；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和开创了新的局面，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这一切说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括上届政府的五年间，我们国家的确是重新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它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前进的脚步赢得了世人的普遍公认和注目。

在对上述总的形势如实加以肯定的同时，对于我们仍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显示了不负众望的坦诚态度。对广大人民普遍关切和议论纷纷的所谓“热点”问题，报告都没有回避。对此，会内会外以至国际舆论，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赞赏。近几年来尤其是去年我国物价上涨过多，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使部分城市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报告不仅直率地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检讨了政府在工作指导上的缺点和失误。其他如对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的急于求成、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和尚未根本清除的不稳定因素，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相当严重存在着的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敲诈勒索、假冒伪造等恶劣行为，对一些干部的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一些政府机构的严重官僚主义，一些部门、地方和企事业单位惊人的奢

侈浪费之风，以及对交通运输和生产建设中不时发生的恶性事故，报告都毫不留情地作了公开的揭露和批评，并且十分严肃地指出了“所有这些都给改革和建设事业以至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重大损失”，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认真加以解决。我想，报告所持的这种比较坦率的实事求是态度，既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及其领导对人民的信赖；也充分表明了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这种信心来自哪里？我想，从根本上说，可能主要的有三点：一是，我们的进步同仍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相比，已经取得的成就同缺点和失误相比，前者毕竟是全局、是主流，后者毕竟是局部、是支流；二是，得到广大人民拥护并积极参加的改革开放确实已在我国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强大潮流，它既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的重要动力，也是我们继续前进和力量源泉；三是，我们仍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缺点和失误以及种种困扰人们的社会矛盾，归根到底，只有通过加快和深化改革来解决，也一定能够在深化和完善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通过学习，使越来越多的人都能牢固确立这种鲜明的认识和正确观念，我们才能真正面对当代中国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实际，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不断前进，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学习，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改革，把改革和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加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经过对过去五年国内工作的总结，从中得出了对我国今后的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的五条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牢固树立建设要依靠改革，改革要促进建设的指导思想。”当谈到今后五年我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

和任务的时候，除了正确地强调了必须以坚决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以外，还讲了依据于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必须采取的四条工作方针，其中第一条就是：“把改革和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更好地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毫无疑问，坚持改革，使改革和发展很好地相结合，既是过去实践经验的基本总结，也是今后必须更加自觉地加以坚持的重要方针。政府工作千头万绪，只有坚持这样做，才能高屋建瓴，驾驭复杂局势，带动各方面的工作，促进我国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在这里，我还想进一步谈一谈的是，《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的今后工作的另外三条方针的能否得到顺利实施和取得预期的效果，任何时候特别是在当前和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都离不开改革。

报告中讲到的第二条方针是：“认真执行长期稳定发展经济的战略，更加突出地抓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进一步促进全国经济的繁荣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当然，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离开了改革，决不可能创造出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奇迹。同样，科技的进步，教育事业的发展，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组织实施，也都必须从科技、教育和外贸体制的改革入手，否则即使投资增加（增加是应该的和必需的），而在这些领域里工作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的手脚仍然受到不合理的旧体制的严重束缚，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不出来，科技进步、智力开发和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都会成为无根之木和无源之水，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报告中讲到的第三条方针是：“在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而又稳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条本身已经讲得很清楚，不需要作过多的解释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果不积极改革现行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缺乏活力、效率不高的政治体制，要想建立起充满活力和效率很高的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人们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报告中讲到的第四条方针是：“围绕着经济建设并为经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造成适应社会主义要求的良好社会风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离不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离不开加强舆论宣传工作。改革要宣传，宣传首先要改革。如果仍然停留于用党八股式的陈词滥调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来做宣传教育工作，加强的目的不仅达不到，而且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效应。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思想、宣传、理论工作必须贯串改革的精神，切实加以改进，这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了。

根据以上的看法，我认为，不仅各级政府，不仅各部门、各地方和各企事业单位，而且包括各级干部和广大的人民，如果都能牢固确立坚持改革的观念，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那么，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再大的困难和风险，我们也能越过激流，绕过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

第四，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学习，各级政府、各地

方各部门各行业以至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应当努力树立照顾大局的全局观念，同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各自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出了今后五年建设和改革的奋斗目标和方针之后，比较多的篇幅着重论述了国务院要努力实现的十项任务，从而构成了比较系统的政府施政纲领。本次人代会开会期间，在将近三千名代表广泛深入的认真审议中，普遍认为政府工作报告认真落实十三大精神，对今后五年里所要进行的工作讲得比较全面，对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照顾到了，因此大家都比较满意。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如果把它比之为一首交响曲，既要有不可缺少的主旋律，又要有各种同它相配合的和音，奏起来才能协调、和谐、悦耳动听。我们的各项工作似乎也有类似的道理。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推进改革潮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抓住了这个根本，全盘就活了。既要提倡树立全局观念，又要提倡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讲前者，只讲后者，很可能导致有碍全局发展的盲目积极性的泛滥；只讲前者，不讲后者，又有可能导致大家都按部就班，因循守旧，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失去生机与活力。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以至每个人的创造活力，这对于保证各项工作的蓬勃前进是很重要的。这方面的道理浅显易见，大家都懂得，现在的问题是贵在落实。

除了以上几点，我还想着重讲一下的是，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曾经鲜明、准确地指出过中国人民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一）维护世界和平；（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三）大力推进国内现代化建设。这三项任务相互紧密联系，最根本

的是搞好国内建设。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我国的外交工作，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世界上的“热点”问题都表明了我国政府的政策立场，其基本点就是要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既为国内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又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报告还对台湾海峡两岸近来出现的新的动向作了积极的评价，表示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访友和观光，欢迎海峡两岸进一步发展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并重申了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和最终按“一国两制”原则实现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殷切期望。我们一定要在继续集中力量搞好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进一步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努力推动祖国统一的进程，使我国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能够相互促进地得到逐步实现。

把以上讲的一些看法归结起来，也许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前进！我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大家都能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这一点上来，那么，任何艰难险阻就都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从物价问题和价格改革谈起

——兼论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方针

(1988年10月)

怎样理解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怎样理解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问题。当前物价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这次中央全会确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及其政策措施，做出的关于要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的决定，也是同对物价问题和价格改革问题的正确剖析直接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对物价问题和价格改革问题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也就能够从主要的方向掌握住十三届三中全会方针的基本精神。

一、物价为什么上涨？

这次中央全会明确指出，十年改革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明显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同时还特别强调，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结束了过去那种封闭的停滞的局面，开创

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总的来看，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在前进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集中的突出的表现是物价上涨过多，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因此，如何分析物价上涨，弄清楚为什么上涨，能不能和怎样才能控制物价的上涨幅度，也就成了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我国物价上涨较多，大体上是从1985年开始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社会零售商品物价指数，1985年上升8.8%，1986年上升6%，1987年上升7.3%，1988年1—9月上升16%。有同志说，这个指数同群众的感受有很大的差距。应当看到，统计局对物价指数的统计，是从全国150个城市、203个县城、1.4万多个商店和集市中，采集1000多种规格的300多种代表性商品的价格，每月一般采集样价6~8次，然后以大量数据为基础，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这种统计方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通用的，是比较科学的和能够反映或接近反映实际情况的统计方法。但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商品往往是上述数百种商品中的若干种，比如副食品和一些日用工业必需品，而这若干种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又往往大于平均数。因此，人们的感觉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据说国务院正在研究，准备提出一个职工消费指数的统计方法，选择职工日常生活的若干必需品，比如粮食、蔬菜、肉禽蛋、棉纺织品、化纤织物、民用燃料等几十种，根据其价格变动情况，据以计算职工消费指数，并定期公布，以便群众监督。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何时能够确定，还不清楚。总之，由于物价连续几年的较多上涨，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人们的严重不安。十年改革成绩巨大，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广大群众亲身感受到的普

遍承认的。但是，物价连续几年上涨较多，也给人们的思想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形势的发展感到有点困惑不安。

那么物价为什么近几年涨得较多，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一些经济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经济学专家，他们一般认为大体上可以从六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结构性价格调整的影响。这也就是我们主动进行的价格调整和改革，这是必须要做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几十年中，在僵化思想的影响下，长期搞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产品经济，对物价实行的是基本冻结的方针，不重视和不遵循价值规律。物价基本上由国家确定，即“官”定价格，长期固定不变，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经济越搞越死，越来越缺乏活力。现在我们要从产品经济转到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违背价值规律。而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这就需要对过去几十年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进行必要的改革。比价不合理，要进行必要的调整，这种结构性的价格调整是必须的，但是这也会带来整个物价水平的一定上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过去的比价不合理，价格体系不合理，集中表现为初级产品，即人们通常说的“上游”产品，包括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能源、原材料等重要生产资料，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价格长期偏低，某些加工产品，工业制成品或称做“下游”产品的价格长期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比价关系严重妨碍了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实，抑制了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初级产品生产的发展。这种状况不改变，要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要对农产品、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进行合理调整，适当提高它们的价格，整个社会商品的物价水平也就必然会有所

上升。这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成本推动的因素。生产成本是决定价格的重要因素。成本上升，必然推动物价上涨，以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为例，1987年与1978年相比，化肥施用量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多。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并且年年在缩减，每年要减少好几百万亩，而人口每年却增加一千几百万，要解决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就必须大面积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因此，必须增加农业投入，包括资金、物资的投入，还要花大量的投入来开垦荒地，开发新的农业资源，进行新的农业开发。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了，成本变化了，价格不变，那是不行的。工业生产也是一样。煤炭要扩大生产，增加产量，要打深井，进行深层次开发，必然要增加投资，石油要增加产量，既要在老油田上进行深层开发，又要大力加强新油田的勘探，投入也要比过去大大增加。近年来由于煤炭、石油需要提价而没有提，煤炭行业已出现全行业亏损，石油行业也已濒于全行业亏损的边缘，这种情况显然是难以为继的。生产成本上升推动物价上涨，这不是人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客观上必然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们的经济工作如果能够进一步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是单纯靠外延扩大生产，扩大基建规模，而是主要依靠从内涵扩大生产，提高技术，改进管理，降低物质消耗，提高产品质量，真正把效益搞上去，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对地使生产成本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有所抑制。但是，要做到完全抵消成本上升对物价上涨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需求膨胀的推动。这几年经济发展过热，需求过大，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供求矛盾严重。需求膨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一个是消费基金增

长过快。这几年无论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长速度，或者是消费资金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种社会总需求过大地超过总供给的情况，就必然形成市场供不应求。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这个理论概括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决定价格的直接因素是供求关系。供求紧张了，供不应求了，价格必然向上浮动。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要建设，二要改善人民生活，这种需求的扩大，投资的膨胀和消费需求的膨胀，有一种强有力的内在的推动力量。总的来看，我国将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总体上的买方市场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形成，过大的社会需求对物价上涨必然形成一种内在的推动力量，因此，经常注意克服经济过热现象，经常注意自觉地控制投资膨胀，控制消费膨胀，防止消费超前，缓解需求过分大于供给的矛盾，才能使物价上涨过多和明显通货膨胀的问题得到控制。这也就是说，防止经济过热，治理经济环境，是必须长期注意和经常注意的重要问题。

第四，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驱动，或者说局部利益的驱动。近几年财政实行了包干体制，地方包干有一定的基数，超过基数按一定比例分成，超得越多，地方分得越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也有一定的基数，上缴利税增加了，企业留利水平就可以提高，职工福利基金可以增加，生产基金也可以增加。这种办法，正像有些同志指出的还很不规范，但它们的的确确有利于调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的有效的改革措施，是符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实行财政包干和企业承包后，地方财力增加了，

经济搞活了，企业潜力也进一步地挖掘出来了。不这样做，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就会更大。但是，实行财政包干和企业承包后，也就必然会使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驱动得到强化。这种强化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的一面，即只顾局部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的一面。尽管中央一再打招呼，三令五申，对此要十分注意，但这方面的问题并未解决。举例来说，国务院今年在决定放开和调整部分名烟名酒价格的时候，就曾明确宣布今年内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并希望各地、各部门、各企业同国务院的这个部署相适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严格控制物价，尤其不要乘机搭车涨价。这个话虽然说了，但基本上没起多大的作用。许多地方都没有认真地照办。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这里有一个利益关系的问题。财政包干后，地方管理的物价上涨，可以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对企业来说，通过涨价，转嫁负担，转嫁给国家和消费者，是最不费力气的最方便的增加企业收入的方法。现在许多企业滥发奖金、实物，发这个发那个，增加千奇百怪的补贴，此风屡禁不止，越刮越厉害，钱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不能说全部都是靠涨价，但涨价的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现在你到下面去，几乎所有企业都异口同声地反对乱涨价，反对别人涨价，但又都说自己企业的产品不涨不行，总的是反对别人涨，而要自己涨。这样，轮番涨价的趋势就很难避免。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总之，财政包干，企业承包，确实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但消极因素不可小看，必须深化改革，对承包体制进一步加以补充、发展、改进和完善，逐步确立地方、部门和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否则的话，盲目的自发涨价就不可能得到约束。

第五，流通领域投机性活动的影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官倒”和“私倒”活动猖獗，相互结合，以权谋私，以钱买权，权钱结合，造成流通领域的秩序相当混乱，推动物价上升。物价上涨，价格双轨制，甚至一物多价，价差很大，为流通领域的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提供了条件和土壤；流通领域的混乱，又推动了物价的上涨。两者相互推动，愈演愈烈。有些短缺的重要生产资料，有些紧俏商品，被名目繁多的公司插手经营，又搞垄断，又搞多头经营，中间环节很多，层层抽头，层层盘剥。有些重要的紧俏商品，还没动地方，价格就涨了一倍、两倍、几倍甚至十几倍。对这个问题，当然也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不能笼统地不加分析地一概地说，中国土地上现在出现的公司统统都是投机倒把的公司，都是破坏正常经济活动的和扰乱金融的公司，都是不好的。除了从事生产经营、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有益活动的公司以外，即使在流通领域中，开展合法的正当的有利于商品流通的经营机构和经营环节，还是很多的，是很需要的，是应当肯定并适当发展的。但是，目前确有相当一部分公司，主要是利用价差，从中转手倒卖，从事不正当的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它们为本公司赚了不少钱，给本公司职工发高工资、高奖金、高福利。经过它们的倒腾，一没有给生产企业增加什么好处，二没有使国家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它们偷税漏税严重，使大量社会财富从中间环节流失掉了。它们不仅造成经济生活的紊乱，而且增加社会分配不公，后果是严重的。现在我们的市场交易还很不规范，各种商业活动还没有都拿到市场上来公开进行，更远远没有实现市场交易的货币化、票据化、规范化、制度化。有些交易根本不上市场，成交双方在下面说合说合就做成了买卖。许多人从

中拿回扣，取佣金，甚至贪污受贿。这种非法经营活动很多，积弊很大，而且越来越严重。这种流通领域的混乱，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这是大家最痛恨的一种现象。它充分说明了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整顿流通领域的秩序非常必要，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注意、经常注意的重大问题。

第六，国际价格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总方针总政策。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这些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很快，其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快，当然其中也存在着某些出口发展过快和进口不当的偏向，但总的说来，对外开放给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强了活力，扩大了回旋余地，起了很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现在，我国进出口商品总额已达到 800 多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近三倍，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到 14%，进出口总额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近 30%。而美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1%。当然，它两方面的绝对额都比我们大。无论是分母还是分子都比我们大得多。由于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比较大，这样就使得国内物价的涨落不可能不受到国际价格变动的影响。今年我国进口的主要产品如粮食、有色金属、钢材、化肥等等，国际价格大体上上涨了 50% 到一倍左右。由于我国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生产使用的是进口原材料，国际价格上涨了，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国内商品的价格。如果想不受影响，那就只好实行一个办法，就是由于国际价格变动造成的企业亏损统统由国家财政来补贴。这种办法过去我们采取过，现在在若干方面还在采取，但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国家财政补贴已经越来越无法负担了，这种补贴决不能无限制地扩大下去了。而财政贴补过多，国家负担不起，

财政出现赤字，最终还会影响国内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因此，随着国际价格的变动，国内某些商品的价格不能不随之变动，这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的分析，可能还说得不够周全，但是大体上把主要的物价变动因素都包括进去了。那么，我们从上面这些情况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哪些基本的看法呢？一是，十年前我们走的路，是搞产品经济，冻结物价，表面上看物价是稳定的，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市场商品严重匮乏，许多东西有行无市，或者大量发放票证，有钱买不到东西，人民购买力得不到实现，经济学家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隐形的通货膨胀”。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样做经济搞死了，停滞了，看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现在，我们通过改革，从产品经济的模式逐步转到商品经济的模式上来，努力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结果这十年生产发展了，经济搞活了，商品丰富了，市场繁荣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既然要按价值规律办事，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必须调整和改革，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要保持物价水平不动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立足于努力做到保护物价的适度上涨，使之既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又有利于社会和人心的安定，不超过国家、企业和人民的承受能力。这是我们应该做到和能够做到的。二是，从现在经济部门、统计部门和经济学家们提供的材料，还不可能准确地说出上述各种因素在物价变动中各占多大的比例，因此还不可能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但如果从合理的结构性价格调整和基本不合理的自发涨价两方面来观察，前者在这几年的物价上涨中并不是主要因素，大体占不到四分之一，在今年1—9月物价上涨16%的幅度中，只占3%~4%。因此，抑制物价上涨，主要的是要抑

制自发涨价。三是，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必须采取多方面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综合配套措施，单纯地或主要地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控制物价上涨，使之不超过我们的承受能力，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愿望问题，我们必须为此而创造种种条件，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

二、前个时候出现的抢购风潮说明了什么？

今年7、8月间，特别是8月中、下旬，在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几十个大中城市，都程度不等地发生了抢购商品的风潮。当然，抢购范围的大小，持续时间的长短，各地情况不一。现在这股风潮已基本平息。那个时候，有的地方，人们到银行挤兑存款，到商店里见什么买什么。据有的同志讲，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典型的事例，说什么电风扇不管转不转，只要有叶子就往家扛；电冰箱只要有壳子，制冷机究竟起不起作用也不管，买回去再说。这种情况当然是个别的，但也反映了人们的紧张心态。抢购风潮为什么会出现？其中可能有些是属于触发性的因素，也可能更具有根本性的原因。

就触发性因素所起的诱导作用来说，大概可能有这么几种：一是，今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发表了新闻公报，宣布中央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新闻公报中说，我们进行价格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除了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定价以外，大多数商品价格都放开，由市场调节。公报还强调指出，这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在今后五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内，主要

是基本理顺价格关系，解决突出不合理的、障碍生产发展的价格问题。但是，许多人往往只注意到了前面讲的价格改革目标，而没有注意后面讲的意思，并且误认为价格放开就是大涨价，因而使原来就已存在的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进一步加剧。二是，人民银行8月份宣布从9月1日起调整存款利率。这本来是因为物价上涨，把利率调高一点，使人们的存款减少贬值，是立足于保护人民利益的措施。后来，人民银行又决定对三年以上的存款，参照物价指数提高利息，实行保值储蓄，更是为了进一步保护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但在人民银行公布9月1日调整利率时，许多老百姓却把它看成是又一个大涨价的信号，误认为利率都提高了，物价还能不大涨吗？三是，银行发行了大面值的票子。人们感到票子越多，大面额的票子都出来了，可见物价还得涨。发行大面额货币，是因为商品的流通量大了，需求大了，货币流通相应的增加了，只发行小面额人民币不能适应流通的需要了。但是，人们把这件事也看作是进一步涨价的信号了。四是，部分名烟名酒放开和调整价格的影响。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和调整，目的是为了打击投机倒把，抑制部分名烟名酒的消费，同时还可以适当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像茅台酒，不仅是高消费品，实际上应列入奢侈品。全国就那么一个茅台酒厂，能酿造茅台酒的泉水只有那么一点，再怎么扩大生产，也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只能满足少数高消费者的需求。放开和大幅度提高这类产品的价格，使之随行就市，是完全应该的。这也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并不奇怪。法国名酒路易十三、路易十四，至少几百美元一瓶，年头久的上千、几千甚至上万美元一瓶，比茅台酒要贵得多了，一般人确实喝不起。在我国的实际生活中，茅台酒主要是集团消费，

经常个人花钱买茅台酒喝的恐怕也是很少很少。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后，价格大幅度上涨，这是对特殊商品的特殊政策，但却被有些人误认为是将要采取的普遍政策，什么东西都要大涨价了。当然，在部分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和调整时，不少地方乘机搭车涨价，也加剧了群众的紧张心理。五是，谣言的作用。今年以来，在一些地方，有人先是造谣说“七一”将大涨价，后来说“九一”大涨价，接着又说“十一”国庆将大涨价。当然，这些谣言都被后来的事实所否定，不攻自破，使人们的紧张心理逐步趋于缓解，但它们在一段时间里的谣传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就触发性的诱导因素来说，可能大体就是这些。

但是，触发性的诱导因素所以能起作用，导致抢购风潮的发生，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早已存在，有着普遍希望储蓄存款能够保值的心理因素和实际要求。对群众的这种心理和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细细体察，决不能忽视，更不能随意斥责。许多职工和干部，辛辛苦苦几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积攒那么一点钱，以备急需，派点用场，或者添置几大件，或者用于儿女嫁娶，买点家具或其他什么耐用消费品，他们对存款因物价上涨过多而贬值当然是很在乎的。因为有了这条根本性原因，再加上那么一些诱发因素，抢购风潮就成为难以避免的情况了。现在，经过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抢购风虽然已经基本平息，但我认为，如果物价继续较大幅度地上升，不能逐步得到适当控制，再次出现挤兑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还是可能发生的，这种潜在的危险依然存在。搞得不好，如果再度出现甚至出现比8月中、下旬更大的抢购风潮，后果将更加严重，经济生活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我们应该力求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工作做得好，也是完全可

能做到的。那么，从前段出现的抢购风潮中，我们应该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第一，对我国城乡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宁可估计低些，切不可估计高了。经过十年改革，我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对物价上涨的确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看不到这一点，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人们的实际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连续几年物价上涨过多，今年上涨幅度又达到了两位数，人们是难以承受的。这两年人们对物价问题的意见越来越强烈，以致今年一度在较大范围内发生了抢购风潮，就是一个证明。在这点上对人民的承受能力估计低些，有利于我们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抑制人们迫切希望加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而是恰恰相反，认为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还比较大，甚至认为通货膨胀可以拉动需求，扩大消费，刺激生产，不仅无害，而且有益，至少利大于弊，按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去作决策，订规划，搞改革，搞建设，那是很危险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做出一种量的分析，确认究竟对物价上涨要控制在什么样的幅度以内就不会出大问题呢？看来，要讲得很准确还难，但从这几年的实践看，如果物价上涨达到两位数的水平，恐怕人民就承受不了，企业也承受不了，国家也承受不了。这次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明显低于今年，此后几年必须控制在10%以内，并且把它作为衡量价格改革是否积极而又稳妥的一个尺度，就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从更长远的一些角度看问题，是否还可以考虑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得更低

一些，比如大约5%左右，这样是不是更符合我国国情，我看这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二，基本稳定物价的方针还是要坚持。基本稳定物价，当然不是冻结物价，不是不遵守价值规律，不是不考虑市场供求关系，不是不合理调整各种商品价格的比例关系。前个时候有一种说法，认为商品价格一放开就活，一活就多，一多就稳，一稳就降。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看不到各种经济因素对物价的制约，简单地用这种公式来看待复杂的价格问题，认为价格改革就是单纯地把各种价格都放开，这种看法不全面，不符合实际，过于简单化了。有些商品价格放开之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很明显，来得也快，但很多产品生产的发展却并非如此，它们还要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搞得不好，还可能发生新的扭曲的价格信号，不仅不能刺激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还会起相反的诱导作用。从对经济工作的全面指导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努力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在这个前提下，认真作好细致的工作，该调的调，该放的放，调放结合，积极稳妥地推进价格改革。

第三，在物价问题的宣传上需要采取慎重的、实事求是的方针，避免片面性、简单化。现在人们对物价问题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心理状态，有点所谓“心理失衡”，对物价问题非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正确宣传党的物价方针，既不能对物价上涨情况过分渲染和夸大，也不能对稳定物价简单地许愿，以免引起人们的期望值过高，愿望达不到时更增加失望以至埋怨情绪。对物价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讲清楚。物价上涨有诸多的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不是只从愿望出发想降就能降下来的，宣传上决不能那么简单化。

第四，物价问题在我们国家，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切不可小看。这次十三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必须努力做到明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地低于今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央全会着重指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对我们党和政府驾驭局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是能不能继续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社会安定和改革深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有人说物价涨不涨在于政府，对政府的考验与我无关，主要看政府有没有这个本事了。现在群众中还有这样一种反应，他们认为政府的用心是好的，是想要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住的，但担心政府是否有这个能力，能不能做到，有些不放心。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当然要为此而做出更大、更多的努力。但从我们共产党员，从我们国家干部，特别是从经济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来说，都这样看问题，保持这样的心态，对形势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我们大家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把自己应该分担的责任承担起来。对党和政府驾驭局势的考验，也包含着对我们广大干部、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考验。我个人认为，中央主要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领导，领导对不对，主要看重大决策对不对，当然中央也还要检查督促，要抓落实，从国务院来讲，要督促各级政府去贯彻中央的决策，要采取有力措施，要动员，要组织，要检查督促。但是，从我们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来看，恐怕也不能有这样的态度：工作做好做坏，政策落实不落实，全看党中央、国务院的了。决不能认为中央决策的落实跟自己无关。在改革中，我们不是希望和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分担风险、共渡难关吗？希望和要求人民这样做，恐怕首先我们党员干部要自觉地这样做才是。

三、价格改革不再继续推进行不行？

当前，我国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来说，情况又是比较严峻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应该或不能够推进价格改革了呢？我个人认为，价格改革和其他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还必须进行，就价格改革之所以不能不继续推进来说，主要有以下四条理由。

第一，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根本的就是要对过去那种产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加以改造，逐步建立起能够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的目标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市场体系的完善。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不断发育，是我们建立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可缺少的条件。要发育市场，完善市场体系，就绝对离不开这样一个条件，就是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合理的价格体系，主要指的是各种商品价格相互之间的比价关系比较合理，能够反映价值规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从而能够正确地引导企业行为，能够使国家的产业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能够较好地达到合理配置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比如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无粮则乱，现在这个基础经过十年改革有所加强，但还很不稳固，还比较脆弱。又比如，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现在相当紧张，尽管这几年发展相当快，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不但国家要增加对这些方面的投入，还要引导地方、部门和企业去发展这些产业，要使得他们有向这些方面投资的积极性，这里就

必然要解决一个合理调整价格的问题。对农民发出的价格信号，要有利于促进他们去发展种植业，特别是发展粮食生产。如果价格扭曲，粮价太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甚至越来越低；农民种粮少了，民以食为天，十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怎么从温饱走向小康。现在各地对修建楼堂馆所的兴趣很高，除了挥霍浪费，奢侈铺张之风的影响之外，一些旅馆、宾馆、招待所之类盖起来后赚钱快，赚钱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价格不合理，办能源，办原材料，办交通运输赚钱少，甚至不赚钱，要动员地方、部门、企业都积极去办，就比较难了。一些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国家当然还要集中投资，但国家的财力又有限。现在国家预算内资金大约是2000多亿元，预算外资金也有2000多亿元。由于有价格扭曲的因素，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预算外投资不仅在规模上很难控制，尤其在投资结构上很不合理，大量投资并没有用到从宏观上看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方向上去。价格关系扭曲，不能正确地反映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不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很难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有利于引导地方、部门、企业的经济行为都真正向合理方向发展的局面。

所谓价格形成机制，也就是价格由什么来确定。在过去搞产品经济条件下，价格大多由国家定，是“官”价，定下了又很少变动，结果窒息了经济的活力。现在要发展商品经济，我们进行价格改革的目标，必须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做到少数很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定价，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随行就市，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实行市场调节。如果不经改革逐步理顺价格关系，逐步建立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就不可能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有秩序地健康发展，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也就达不到。所以，中央早在1984年做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曾强调指出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_{关键}。这次中央全会又再一次明确指出，不顺_理价格关系，就谈不上真_正确立新_经济体制的基础。

第二，从现实的情况看，在过去十年当中，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改革，但从总体上看价格关系尚未理顺，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加以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决定之后，这十年中，总的来看，农业情况近年来虽也有新的徘徊，但比之过去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有三条：一是打破了过去那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企不分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农民积极性解放出来了。过去几十年在旧体制下进行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和其他方面对农业的物质投入，由于旧体制的束缚和农民积极性受到压抑，其作用没有能够得到较好的发挥，现在比较好地发挥出来了。三是国家对农产品价格作了几次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20%至30%左右，这对调动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当然，经过这些年来整个物价水平和物价结构的变化，现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已在淡化，又需要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整了。总的算帐，1987年同1978年相比，全国城市职工的平均实际收入，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上升85.6%；农民的收入，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长1.8倍。总起来讲，城乡人民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当然也不均衡。由于物价上涨，收入有高有低，近年来又出现了较

明显的社会分配不公，因此必须看到在平均水平提高中掩盖着一部分人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去年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约有20%左右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其中主要是部分机关干部，科技教育文艺战线的工作人员，一些亏损企业、微利企业、经营不当企业的职工，以及部分退休干部和职工等。所以，对价格改革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十年来的初步价格改革的确起到了促进生产、搞活流通的作用，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进行结构性价格调整，物价总水平提高，使一部分人的实际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十年来的初步价格改革，虽然使某些不合理价格得到一定的调整，但从根本上讲，价格关系还远远没有理顺。目前价格关系在好多方面还是扭曲的，无论是工农业产品之间，初级产品与加工产品之间，农产品内部和工业产品内部都还有许多价格关系不顺的地方。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这些年放开了一部分，商品的价格随行就市，实行市场调节，但还有不少应该放开的商品价格没有条件放开。由于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合理，某些需要调价的产品由于这些年价格上涨较多，一时又不宜再调，再加上价格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价格问题呈现出相当错综复杂的态势。这些年，政府每次有计划调整某些商品价格的时候，总有些部门和企业趁机“搭车”涨价，或者乱涨价和变相涨价，再加上流通领域中的秩序混乱，以至从原材料到加工工业产品，到其他方面的商品价格和劳务价格，轮番涨价，互相推动，结果就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在更高物价水平上的旧的比价复归。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旧的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还没有合理化，新的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不合理，成了一种价格问题上的“双重扭曲”现象。面

对这样的现实，怎么办呢，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如果价格改革就此停止，价格关系不理顺，经济改革的目的也就很难达到。

第三，价格双轨制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取消，但又必须逐步地稳妥地朝着取消的方面前进。现在我国许多产品都存在价格的双轨制。比如粮食，一部分由国家定价，按合同收购，一部分由农民自己交易，随行就市。钢铁、有色金属、水泥、木材、煤炭、电力等重要生产资料和能源都存在这种情况，既有计划内的平价供应，又有计划外的议价销售。如何看待目前的价格双轨制呢？首先，这是我国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迫于情势不得不采取的过渡办法。我们的承受能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把许多产品特别是重要初级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都放开。比如，如果把粮食的购销差价都取消，现在两亿多城镇人口的吃粮价格马上就要大幅度上升。又比如，钢材紧张，现在国内钢材产量已达到4000多万吨，加上每年进口1000多万吨，共计5000多万吨，但整个社会还是供应紧张，价格也不能完全放开。没有计划内国家控制的这一部分，统统放开，价格暴涨，许多重要企业就难以维持生产。而且一种很重要的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必然带起一大片商品价格上涨，我们的经济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如果不放开一部分钢材，让它进入市场，议价销售，那么，目前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产值四分之一的乡镇企业，就将无法生存。这就是说，国家既要保证对若干重点企业的计划供应，又要使遍布城乡，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得到生存和发展。所以说，没有国家管住的这一头，国家重要的经济生活将陷入混乱，价格暴涨，难以维持；没有放开的这一面，

相当多的企业也就活不下去。

目前人们对价格双轨制的议论很多，普遍认为它的流弊很大，越来越大，是造成流通领域许多混乱现象的重要原因。对这个方面当然必须看到；但同时也要看到，双轨制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取消。双轨制是在我国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既要解决推进价格改革这个难题，又不能带来经济和社会过大震荡的情况下，从我们国家自己的实际出发，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的措施。在采取这个措施的时候，我们对于可能带来的问题，可能对国家经济生活以至社会生活带来的混乱，开始是有点估计不足，看得不够。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由此出现了一批利用价差专门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所谓公司。或者说，为某些专门从事中间盘剥、做无本生意的皮包公司等提供了土壤和环境。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走后门，拉关系，批条子，利用平议差价倒买倒卖紧缺物资，就可以赚一大笔钱。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类混乱现象，人民强烈不满，十分痛恨。它腐蚀了党政机关的一批干部，也使得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更加突出起来。一些人“倒腾”一下，收入就比一般人多得多。某些党政机关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相当集中地就表现在“官商不分”，党政机关经商，党政机关干部利用权力经商，牟取暴利。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采取必要的法律的、行政的措施，依法严厉打击种种非法经济活动外，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坚持深化改革，逐步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使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价格双轨制逐步地稳妥地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从历史上消失。

第四，价格改革既绕不过去，时间也不能拉得太长。我们说价格改革绕不过去，就是因为如前所述，如果价格关系不理顺，就根本谈不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体

制的基础。我们说价格改革的时间不能拉得太长，就是说为了实现新旧体制转换，建立新体制的基础，同其他各项改革相配套，要相应地集中一段时间基本上理顺价格关系，建立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当然，在基本理顺价格关系和基本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之后，局部的必要的价格调整还要根据实际需要随时进行。但集中一段进行的价格改革如果时间拉得太长，人们的心理状态总是处于相当紧张之中，对价格上涨的紧张心理状态，像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种情况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利于人心的安定。当然，对价格改革又不能太急，急于超越条件采取较大的改革步骤，甚至主张一步到位，这样国家、企业和人民都无法承受。搞得过急过猛，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我们不能那样做。各项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肯定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大家要来共同承担，分担风险，共渡难关。改革确实不容易。总之，改革的方向要坚持，步骤要稳妥，要随时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正确的调整。

四、价格改革不讲条件和孤军深入行不行？

这次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根据个人的理解和体会，贯穿着两个最基本的观点：一个是，价格改革和其他改革必须继续进行，但又要为此而创造必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是遏制住目前正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要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来实现。另一个是，价格改革很重要，切不可停顿下来，但它又决不能孤立进行，不能孤军深入，必须有其他方面的综合改革相配套，这也就必然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

可以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及其政策措施，是在我国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根据对当前改革和建设形势的科学分析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配套、相互促进的完整的方针。这次全会还强调，“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是长期要注意的大问题，最要紧的是明后两年，首先要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因此，我们理解这次三中全会的方针，既要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相互密切联系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方针，还要看到它决不仅仅是一个解决当前困难的方针，而是一个应该长期执行的方针，是在整个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或者说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都要继续执行的方针。当然，随着情况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如果两年后治理后整顿的效果的确很好，改革的进程也就可以相应地加快一些。

所谓治理经济环境，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要把连续多年存在的过大的社会需求压下来；二是要把目前日趋严重的物价上涨势头遏制住。一句话，要坚决抑制通货膨胀。为了压缩社会总需求，必须下最大的决心，采取最坚决有力的措施，把超过国家财力、物力负担可能的过大的基建规模砍下来。许多外国朋友到中国参观以后，都说中国到处是大工地，处处盖房子，盖楼堂馆所，修马路，到处在搞“一条街”，大城市搞，中等城市搞，小集镇也在搞。有的中、小城市把马路修得快跟天安门前的大街差不多宽了，这要拆多少房子，占多少土地，花费多少钱啊！贪大求快，大干快上，经济过热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到处是建设工地，热气腾腾，当然反映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但这里面确实也隐藏着很大的隐忧，因为国家财力物力承担不了这么大的基建规模。现在，中央对压缩基建规模的

政策规定都非常明确，一是对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和农业项目这些保证经济发展后劲所必须的建设要保住；二是已经同外国人签约的合资合作项目要保住，至于那些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那些楼堂馆所的建设，特别是那些非经营性的楼堂馆所建设，那些盲目的重复的或者说已经超过实际需要的加工工业建设，过大的城市建设规模，要坚决砍下来，要真砍，不是假砍。明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要比今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达到的规模砍 20% 以上，相应地要减少几百万吨钢材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措施。真正落实了，会对物价上涨幅度和通货膨胀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可能要到明年下半年以后或后年见效。至于消费基金的压缩，首先是要压缩集团购买力。现在，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随便慷国家之慨，盲目追求生活现代化，讲豪华，讲排场，这股风不刹不得了。有人形容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贫穷的国家，奢侈的社会”，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当然，一些必要的接待外国游客的旅游宾馆，盖得稍好一点是必要的。但是，现在一些以接待国内客人为主的内部招待所、普通旅馆，也要大翻修，甚至还要请外商来装修，花大量外汇进口许多高级家具、高级装备，这股风不刹也不行了。对集团购买力，凡是能压缩下来的，都要坚决压缩下来。中央要求在今年压缩的基础上，明年社会集团购买力还要比今年再压缩 20%。

所谓整顿经济秩序，当前最关键的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重点整顿流通环节，认真清理各种公司。这个不能含糊，不能手软，不能动摇。现在全国共有 40 多万个公司，这几年公司的发展相当迅猛，而其中从事生产经营、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的公司只占 40%，60% 的公司集中在流通领域。国务院

经过调查研究，对各种公司的基本情况、主要问题以及应该清理的重点，已经做到心中有数。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清理公司的决定，提出了清理、整顿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现在各省也都行动起来了，有的省第一批已撤消了300多家公司。清理整顿公司的重点，首先是要对那些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扰乱和破坏金融的公司，对那些增加中间盘剥，既不为企业服务，又不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公司，坚决进行清理，该整顿的整顿，该撤消的撤消。二是要严格禁止各地方、各个部门在经济生活中实行垄断封锁，采取行政手段分割市场，以及对企业乱收费、乱摊派。现在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只从各自的局部利益出发，有的划地为牢，有的垄断后又实行多头经营，层层中间盘剥，有的对企业搞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企业难以负担，只好通过涨价把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当然，企业资助一点公益事业是可以的，但也需要作出明确的政策规定，不能乱搞各种各样的所谓“赞助”，一方面使国家财力从多种渠道流失掉，一方面又刺激了消费膨胀。三是要进一步端正企业本身的行为。要坚决反对企业乱摊成本，防止偷税漏税，甚至抗税，截留利润，乱发奖金、实物。要坚决取缔生产和出售种种伪劣商品，严格禁止坑骗国家、坑骗消费者的行为。我们讲整顿经济秩序，现在首先要集中地解决好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中央提出明后两年要突出地抓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后，国内外舆论反映不少，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改革的方向变了，改革放慢了，甚至说停滞、倒退了。对此，我们应该很明确地回答：这样做恰恰不是改变改革的方向，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改革，深化改革，为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治理经

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中的许多重要措施，本身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价格改革还要继续，但改革决不仅仅是价格改革这一项，而是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三个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

一是企业改革的深化。这是最重要的。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逐步形成企业既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又能自我约束的机制。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而又是我国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现在许多地方和企业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继续搞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物质消耗大，生产成本低，产品质量差，更新换代慢，经济效益不高。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大力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严格内部制度，加强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企业真正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经营的轨道，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希望。这几年，我们的生产发展速度相当快，但是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还很不理想。企业中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水平要比经济发达国家高好几倍，甚至 10 多倍，全国工厂大约要富余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所以，要进一步在全国企业特别是国有的大中型企业中，进一步完善承包制，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度，实行严格的定员定额管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转换企业机制，使得它们真正能够自负盈亏，能够把效益搞上去，这样才能提高对物价上涨的消化能力，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机制，是多方面配套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

二是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要反对搞市场分割，反对封锁，反对垄断，逐步形成统一的而不是分割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社会主义市场。要把现在种种市场交易活动中不

规范、不正规、不依法办事、不依法经营的状况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使市场交易逐步做到货币化、票据化、制度化、规范化。要严格市场管理，建立健全各种制度，逐步完善市场秩序。要坚决实行人民银行的现金管理办法，加强现金管理，提高现金使用率和资金周转率。

三是国家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的改革。过去我们搞产品经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财政统收统支，劳动力统一分配，物资统一调拨，现在这套办法不行了，新的一套又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还在建立当中，以至在相当一些经济领域中出现了某些程度的甚至相当严重的失控现象。这就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需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在新的调控手段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对过去一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包括某些行政手段，还需要继续使用，对此不能简单地说是走老路。这次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五管齐下”，用经济的、法律的、纪律的、行政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加强宏观调控，这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中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只用经济手段调控，对一些机关、团体、国营企业的违法行为只从经济上处罚，罚来罚去是公家罚公家，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对那些利用行政权力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违法乱纪者，必须处罚到人，坚决追究行政责任，犯法者必须依法处理。

要围绕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搞好计划、劳动、商业、物资、外贸、财政、金融、投资、住房等各项配套改革，以逐步实现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总之，价格改革不讲条件不行，孤军深入不行，必须同其他各项改革配套进行，我们面临的全面深化

改革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五、落实中央方针政策的情况和前景如何？

为了解决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国务院已经提出了一整套相应的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的条例、规定和通知，并且正在下大力量组织落实。举例来说，在控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方面，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关于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在制止乱涨价方面，颁布了《关于开展 1988 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通知》，并决定向地方派驻物价特派视察员。在稳定金融方面，国务院作出了进一步控制货币发行和稳定金融的决定，人民银行采取了开办长期保值储蓄存款等措施。在加强流通管理方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决定》、《关于做好 1988 年度棉花收购工作和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加强粮食管理稳定粮食市场的决定》。在为政清廉方面，国务院颁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筵席税暂行条例》，国务院办公厅还发出了在接待中不得摆烟酒的通知等等。还有一些措施，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拟定实施办法。由于有了一系列具体规定，政策界限明确了，在这些方面再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了，这样既便于执行，也便于检查、督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已经行动起来，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

虽然还不到一个月，但经过这一段的工作，在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方面已经初步见到一些效果，或者说开始出现一些好的苗头，发展的趋势是好的。

这里也举一些例子来说一说。比如，在控制物价、稳定市场方面：物价上涨过猛的势头，在有些地方开始得到一定的控制；前一段波及许多城市的抢购风，已经大体平息。总的来看，目前各地市场供应还比较充足，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恐惧心理和不满情绪有了程度不等的或者说渐趋减弱的逐步缓和。随着税收、财务、物价、信贷大检查和其他检查的展开，以及物价管理的加强，情况将会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今年第四季度副食品供应的情况会好一些。猪肉库存充足，年底以前销售价格可望大体保持在目前的水平。秋菜种植面积增加，北方大白菜长势良好，供求可以大体平衡。在稳定金融方面：从9月份开始，特别是从9月中旬以来，银行各项贷款增长过猛的势头受到一定的抑制，贷款总额比8月份少增加100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扭转了8月份下降的局面，从9月中旬开始回升，各地群众挤兑储蓄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货币投放从9月底以来，出现了比去年同期少投放的情况。在压缩投资规模，清理在建项目方面：国务院已经成立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领导小组，即将派出10个工作组，各由一名副部长级干部率领，分赴各地进行检查督促。对北戴河、兴城楼堂馆所项目的清理已有结果，决定停建39个项目和12个单项，面积为21万平方米，占在建项目总面积的61%。不少地方也已经行动起来，相继停建、缓建了一批项目。在清理、整顿公司方面：国务院作了部署以后，各部门、各地区正在着手清理、整顿工作。国务院对影响比较大的全国性公司，提出了清理、整顿的明确要

求和具体规定。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其他措施也正在组织落实。从上面的情况看，只要我们思想统一、坚决贯彻中央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各项政策，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打保票，做出不切实际的预言，还要努力做好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但丧失解决问题的信心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们之所以应该有信心，首先要看到，目前面临的形势虽然相当严峻，问题和困难不少，但同十年改革和建设的成就相比，总起来说，成绩毕竟是第一位的，问题和困难还是第二位的，是在前进中出现的。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巨大，举世公认，这里只举几个重要数字和事实来说一说。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来看，1986年同1981年相比较，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比过去我国的增长速度要高得多；同世界各国的情况相比，在同一期间，美国增长3%，日本3.7%，联邦德国1.4%，英国2%，法国1.6%，印度5.4%，韩国8.2%。从国民收入增长来看，1986年同1981年相比，我国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9.6%，在同一期间，苏联增长2.9%，民主德国4.5%，捷克斯洛伐克1.8%，波兰0.7%，匈牙利1.4%，保加利亚4%，罗马尼亚4.7%，南斯拉夫1%。从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来看，1987年和1978年相比，我国原煤由6.18亿吨增加到9.28亿吨，由原来占世界第3位进到第1位；钢由3178万吨增加到5628万吨，由世界第5位进到第4位；原油由10405万吨增加到13414万吨，由世界第8位进到第5位；发电量由256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4973亿千瓦小时，由世界第7位进到第4位；粮食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473万吨，由世界第2位进到第1位；棉花由217万吨增加

到 425 万吨，由世界第 3 位进到第 1 位。当然，我国人口众多，按人平均占有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占有的位次还是很低的，这正是我们落后的方面。但是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除了看人均的水平，也必须看总的经济实力。我国总的经济实力这十年是显著增强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十年中国不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而且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都越拉越大了，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就是我国按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下降了。这需要作点分析。用按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前进和后退，是不那么科学的，因为按美元折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主要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而汇率是个复杂问题，它主要反映的是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我国一元人民币和美国一个美元各自实际上可以实现的购买力，不一定从汇率变化中可以表示出它们之间的恰当的比例。现在世界银行等一些国际组织也认为这种计算指标不能恰当反映各国经济实力的真实状况，因而正在试图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统计体系来衡量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一些有权威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认为，我国现在的实际水平，已经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000 美元甚至还多，这里显然有他们对我们高估的因素。国内一些经济专家也认为，简单地用上述一个指标来说明这十年我国整个经济实力同国外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说法也是不科学的。如果由此而得出我国十年改革和建设的结果是在总体上同世界各国的差距越拉越大的结论，那么我们会或者越发丧失信心，或者导致更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在目前已经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还要猛追猛赶，追求更高的速度，那么中央的方针政策还怎么落实呢！现在还要大干快上，后果

将更加严重。当然，我们讲不能笼统地说这十年中国在总体经济实力上同国外的差距越拉越大，并不是不承认这些年确有一些继续拉大差距的方面，对此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找出差距所在，弄清原因，想出办法。我们应该有民族危机感，应该发愤图强。但必须立足于充分肯定这十年来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又实事求是地看到我们在哪些方面的严重不足，由此激励大家团结奋斗，共同来进一步改变我们国家的落后面貌。

我们之所以应该有信心，还要看到我们有着克服困难和解决面临问题的有利条件。概括来说，是不是主要有这样几条：第一，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中央和省市主要负责人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必须采取的方针、措施有了一致的认识，这就为上下步调一致，解决问题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这次中央确定的方针措施是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拥护，这是我们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力量源泉。只要各地方各部门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是会取得成功的。第三，我国经济正处在持续增长的阶段，各个方面都蕴藏着很大的潜力。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经济实力，克服困难的回旋余地很大。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充分利用这种潜力和回旋余地，就有了解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四，我们历来有克服困难的经验，国家手里还掌握着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只要善于运用，处置得当，就能够驾驭复杂的局势。尽管面临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大，但是，我们党有能力、有办法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我们要贯彻落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

改革方针，必须根据这次中央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创造一个更为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包括社会舆论环境。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比如说，要不要努力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不恰当地过多地去渲染我们的贫穷落后和阴暗面，以致使人们失去前进的信心。落后要鞭挞，阴暗面要揭露，目的是为了动员人民克服它们，消除它们，走向先进和光明，这个社会效果还是要讲究的。我们要提倡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努力更新观念，否则无法适应和推动改革、开放。这是必须十分强调的。但是不是也要注意，我们还是应该在坚持唯物辩证法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来吸收一切有益的思维和观念，来丰富和活跃我们的思想，力求更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更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发展。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也要辩证地、历史地加以分析，不能笼统地肯定，也不能笼统地否定。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剩下的只是封建糟粕，认为只有全盘引进西方文化才是出路，这种观点对吗？可行吗？据报道，日本首相竹下登到敦煌参观，有人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日本文化的根子就在这里。日本可以说是现代化了，对东方传统文化尚且如此尊重，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珍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并广泛开展同西方现代文化的交流，既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又进行创新，从而增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加快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吗？对于先进人物、先进思想，我认为还是要坚持宣传。一个时候以来有点注意不够，要不要考虑加强呢？这方面的宣传，有时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往往烘托和渲染的都是社会的落后面，是社会各方面对先进人物的种种磨难和横加蹂躏。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当然有，但如果

过分突出这一面，往往使人读后不是从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中受到鼓舞，留下的只是更想诅咒我们的社会。从社会责任，社会效果考虑，是不是也要注意呢？总之，说这些话只不过是提醒一点，就是在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方面，我们确有不少值得总结和注意的问题。

这次中央全会十分强调，我们要克服面临的困难，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必须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核心作用和保证监督作用，坚决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严守纪律，顾全大局，遵循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要坚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反对一切腐败现象。在这些问题上，现在方针政策都已经比较明确了，我们各级机关和广大干部恐怕都应该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努力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在各自的岗位上，解决好各自应该解决的问题。这样，中央方针政策的落实就有希望。

目前，全党全国正在贯彻落实这次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从初步反映的情况看，中央的方针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面临的困难毕竟是前进中的困难，只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首先是我们各级干部都能够从自己做起，做出表率，团结广大人民，任何难关都是可以度过的。用带点浪漫主义色彩的话来说：路在哪里？路就在我们的脚下！希望在哪里？希望就在我们的前头！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治理整顿问题

(1988年12月)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观察形势，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前提。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对当前经济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三中全会对形势的分析，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总的经济形势还是好的，但在前进中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集中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多。根据这个总的分析，我想对当前的形势谈三点看法。

(一) 从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确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这是我们观察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立足点。

有的同志可能要问，现在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还说是前进中的问题？为什么还说总的形势是好的？我觉得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十年来的改革和建设做点简要的回顾。

我个人认为，这十年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从总体上

看，改革带来了国家的前进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经济生活比之过去来说，充满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很多，最重要的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形态来说，已经打破了过去那种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以财政统收统支，劳动统包统配为特征的，“统”字当头的调拨产品经济的模式，逐步走上了发展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

应该看到，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目前还处在这个转变过程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估计：过去多年实行的那样一种僵化、半僵化的经济模式已经打破了，调拨产品经济的模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在多方面逐步地建立起来，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当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现在还没有在各方面起到主导的作用。这说明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我觉得，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经济形态，这一点具有根本性的长远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坚决排除了过去那种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错误的传统观念，逐步确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这是经济领域中的根本性的拨乱反正。总之，经过十年改革，过去那样一种僵化、半僵化的产品经济模式被打破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在逐步建立起来，商品经济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第二，从所有制结构来说，打破了过去那种单一的、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

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些年来，公有制经济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增强了它们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中外合营、外商独资企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今后还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是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的。它对于解放社会生产力，对于搞活生产和搞活流通，对于方便人民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第三，从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来说，过去那种政企职责不分、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的状况已基本改变，企业有了自主权。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合理机制。但正在向着这个方向转变，企业逐步搞活了。乡镇企业的机制更灵活一些，国营企业的活力也比过去大大地增强了，从而有效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

第四，从国家宏观管理的角度，从国家以及地方、部门、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来说，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僵化的管理体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地方、部门和企业几乎没有什么权利、财力和自主权的状况变化了，地方、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在宏观管理上，过去那种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并基本上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的方式，已经基本上改变了。

第五，从收入分配关系来说，过去那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正在改变。当然，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正像大家已经感觉到的和社会上反映很强烈的那样，也出现了新的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基本的趋势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就必须拉开差距，某些社会分配不公就必然会出现。问题在于

我们现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决不能回过头去再搞平均主义的分配，还是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同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抑制某些高收入，防止社会分配的悬殊过大。当然，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论怎么说这也是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果不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要想调动整个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当然现在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等。在教育科技界，在知识分子当中，对这个问题反应更为强烈。知识分子的收入还不如小商小贩！本来小商小贩大都只能勉强糊口，顶多略有盈余，现在他们当中许多人却腰缠万贯，成为社会上最神气的人了。知识分子从事的是复杂劳动，收入却几乎被贬低到了社会的底层，这确实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是一种历史现象，在打破平均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我们必须在坚持克服平均主义的前提下，在历史的前进过程中去加以解决。也许有同志说现在还看不到解决的前景，我倒不是那么悲观，虽然也感到解决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我想还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的。总之，经过十年改革，总的趋势是严重压抑劳动者积极性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体制正在逐步被打破，过去那种一潭死水的状况变化了。

总起来说，经过十年改革出现的以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变化，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打破了封闭、停滞的局面，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以至混乱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十年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说改革的方向正确，并不等于说一切改革的具体政策、具

体步骤都是正确的；说改革是成功的，并不排除改革中也含有失误。看问题不能绝对化。整个改革过程中，一切改革都会既有利又有弊，绝对有利而毫无一点消极作用的改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只能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就看我们如何抉择了。

正因为十年改革总的来看是成功的，所以统观全局，纵横对比，纵的同我国自己的历史相比，横的同世界各国同期的发展情况相比，我觉得这十年都是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十年。这十年，无论是经济增长率，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增长，还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都充分表明了这十年是我国大前进、大发展的十年。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若干个主要数字和事实来说一说。1981年到198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8%；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增长3%，日本增长3.7%，联邦德国增长1.4%，英国增长2%，法国增长1.6%，印度增长5.4%，韩国增长8.3%。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概念，而使用国民收入这个概念。1981年到1986年，我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9.6%；同一时期，苏联增长2.9%，民主德国增长4.5%，捷克斯洛伐克增长1.8%，波兰增长0.7%，匈牙利增长1.4%，保加利亚增长4%，罗马尼亚增长4.7%，南斯拉夫增长1%。这些数据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处在世界的前列，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再看看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即主要生产实物量的变化情况。从1978年到1987年，我国原煤产量由6.18亿吨增加到9.28亿吨，由原来占世界第3位进到第1位；钢由3178万吨增加到5628万吨，由世界第5位进到第4位；原油由10405万吨增加到13414万吨，

由世界第8位进到第5位；发电量由256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4973亿千瓦小时，由世界第7位进到第4位；粮食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473万吨，由世界第3位进到第1位。这些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工农业产品。总的来看，应该说经过十年努力，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幅度更大。1978年到1987年，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幅度平均每年16%多，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78年我国出口总额占世界第32位，现在占到第14位，进口总额由原来占第27位前移到第11位；进出口总额由原来占世界的第28位前移到第12位。从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目前达到的实际水平来讲，当然我们现在要比发达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得很多，这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从这十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来看，在世界上恐怕也找不出几个国家。当然，在人民平均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的情况下，随着这几年的物价上涨较多，在平均数下面也掩盖着一部分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一点也不能不看到。但我不赞成现在有人说的这十年我国在经济上、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当然，我们在看到我国这十年总体经济实力同世界各国的差距有所缩小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还有同人家拉大差距的方面，主要是经济效益不好，科技、教育的某些领域的差距拉大。我们既要肯定自己的进步，又要找出差距所在，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不低，实物增长量不慢，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不是资源优化配置，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比较低，产品质量比较高，效益比较好，不是这样一种高效益的集约经营型

的经济，而是浪费相当多的资源，耗费相当多的劳动力，耗费相当多的物资，靠拼资源、拼设备、拼人力来支撑发展速度的一种粗放经营型的经济。这恰恰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从经济上讲，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速度慢，而是太快了，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如果现在我们还讲速度不够，还要从速度上赶超别人，那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效益不好。在科技领域，这些年我们有领先发展的某些方面，但在相当多的领域特别是高技术领域人家走得快，我们走得慢，跟不上。对教育事业恐怕也应该是这样一个估计。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差距是：经济上效益不好，技术领域特别是某些高技术严重落后；“教育是立国之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教育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今后我们必须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科技进步，积极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提高教育质量，为从根本上保持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后劲而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总之，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第一点看法就是，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和建设是大踏步地向前发展的，同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但它们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这样看，当然不是为了掩盖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决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是我们的立足点。假如拿现在面临的困难同六十年代面临的困难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现在发生的困难决不是在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在各项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都无法维持、甚至肚子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和克服困难的物质基础，都比过去好得多了，因此，我们决不应该也没有理由丧失度过当前困难的

信心。

(二) 从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程度来讲，必须看到情况是严重的，形势是严峻的，解决这些问题既很紧迫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任务是很艰巨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发生的，而是几年来积累下来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过多，经济领域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比如投机倒把、层层盘剥、牟取暴利、官倒私倒相结合等等，都不仅是这一、两年的问题。就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过多这个问题来说，虽然今年才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但问题是从1984年底1985年初就开始出现了。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物价指数1985年上涨8.8%，1986年上涨6%，1987年上涨7.3%，今年又在前几年物价连续上涨的情况下上涨较多，上涨幅度超过了两位数，全年预计可能达到18%~19%。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指数，老百姓还常常感到不符合实际，认为偏低。有的人甚至说，国家统计局是官方机构，公布的数字无非是为官方粉饰太平，是糊弄老百姓的。老百姓实际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幅度，要比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大得多。对这个问题我一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笼统地发牢骚式地怨恨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是没有根据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是从全国150个城市和203个县城，根据1000多种规格的300多种代表性商品，经过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一万多名专职物价统计员，每周采集样价6~8次（包括国营商店和集市贸易的价格），将大量数据统统汇总到国家统计局，然后通过复杂运算，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这种统计方法世界通用，只不过各国所采取的代表性商品

有所不同。因为各国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不大一样，有的取这几种，有的取那几种。据统计局的同志介绍说，日本的、联邦德国的、美国的以及联合国经济组织的一些专家到中国来了解了我国的统计方法以后，认为我国这方面的统计方法是先进的。所以，它是基本上能够反映我国实际情况的。因为物价上涨幅度较大，有意见甚至发点牢骚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就无边无沿地发泄怨气，骂大街，笼统地简单地说国家统计局只是为官方说话，不顾事实，捏造数字，是不符合事实的。希望我们的干部不要在群众中助长这种情绪。

第二，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实际感受同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不一样，这又是合乎情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物价局统计的物价指数是根据几百种商品加权平均得出来的，而我们每个人绝不会天天消费统计局统计的那几百种商品，只是消费其中的若干种，特别是肉、禽、蛋、蔬菜等副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而恰恰是这些东西涨价幅度高于包括其他那几百种商品加权计算出来的平均数。所以人们的实际感受不一样，这又是很可以理解的。另外再说一点，从党和国家决策的角度讲，当然要立足于科学的统计数据，但又必须深刻体察群众的情绪。如果不细心体察这种情绪，对广大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承受能力估计过高，对控制物价上涨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不力，使物价上涨幅度失控，老百姓就会用行动对这种政策作出惩罚。前些时候在许多地方发生的抢购风潮，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因此，我们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必须抓得很紧很紧，决不能掉以轻心。

总之，我们必须充分看到当前困难的严重性，首先因为这种困难是几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是第一点。

其次，我们要克服面临的困难和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决非一纸行政命令或采取某些控制性措施就能奏效的，必须花很大的气力，认真进行综合治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而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对这一点，我们只要对连续几年物价上涨过多的原因作一些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几年物价上涨幅度过高，起码可以讲出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需求拉动的因素。1984年底以来，经济过热，需求过旺，投资和消费双膨胀，连续几年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外经济学家们都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的国家是个发展中国家，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我们原来的经济落后，要想改变这种状态，不搞建设，不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当然是不行的。这些年来全国到处大搞基本建设的情况既反映了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也反映了现有的建设规模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负担的可能。这种投资需求的过度膨胀又带动了人民消费的膨胀，投资和消费双膨胀，使社会总需求连续多年超过总供给，供需矛盾越来越尖锐，物价必然较大幅度地上涨。

二是生产成本推动的因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土地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人均占有耕地较世界平均水平低得很多。我们要解决十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粮食产量，而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只能依靠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相应地加强农业开发，进一步开垦可开垦的土地。不论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是扩大农业开发，都必然要求增加农业投入。1987年同1978年相比，全国使用的化肥量

就增加了一倍多，其他如农田水利建设，科技的推广和普及等，也要大量的投资，这样粮食生产成本就当然要增加。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后，粮食价格当然要相应提高。工业生产也是这样。比如石油、煤炭越来越向深度开发，你不增加投资，不扩大勘探，不开挖深井，哪来的石油和煤炭？所以，生产成本增加，必然推动物价上涨。

三是地方和企业利益的驱动。现在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和企业承包经营，这种办法是从农村承包得到的启发，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提高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措施。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完成了国家一定的承包任务以后，就可以相应地得到更多的利益，地方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用于举办各种事业；企业留利水平可以提高，从而增加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消费基金，可以给职工多发工资，多发奖金等等。当然这是好事。这样做，比之过去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做法来说，明显地调动和发挥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这是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但是，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往往同国家要在宏观上控制物价上涨幅度的政策相矛盾，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整体利益相矛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只从地方和企业局部利益出发的消极的利益驱动。因为涨价对地方来说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对企业来说可以把涨价负担转嫁给国家和消费者，是一种最方便的增加企业收入的途径。

听说我受国务院委托在电视上发表了两次有关物价的讲话后，社会上有这么一种传闻，说什么“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袁木发表电视讲话，他一讲话就涨价”。这种传闻既反映了人们对物价上涨的不满情绪，也反映了对我的讲话有所误解，借

此机会我想作点解释。1987年下半年，物价上涨幅度大了一些，国务院要我讲一讲政府已经准备采取的措施，但并没有说以后就再也不涨价了，只是强调各地必须加强物价管理，以利于稳定人心，防止发生抢购，否则将会加剧供求矛盾，更不利于控制物价。当时的用意是好的，讲过之后也有一定效果，但有些商品价格还在上涨，所以大家有意见。今年部分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和调整的时候，我又受国务院委托发表了电视讲话。首先讲了放开和调整部分名烟名酒价格，一是有利于抑制烟酒消费，二是有利于打击投机倒把，三是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在此同时，我在讲话中宣布了两条。一条是，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国务院决定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另一条是，希望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要同国务院的部署相适应，严格物价纪律，防止乱涨价，变相涨价，更不允许乘机搭车涨价。第一条是兑现了的，今年国务院从烟酒价格放开以后，至今并没有再采取全国统一的国务院管辖范围内的价格调整。第二条讲了以后，许多地方基本上没有听。为什么没有听，这里头当然有一个是否做到“令行禁止”的政治纪律问题，但还有一个利益关系问题。前面已经说了，因为地方涨价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企业涨价可以提高企业收入。

现在你去同厂长们接触一下，就会发现几乎厂长们都反对别人涨价，而且情绪很强烈，但谈到本厂生产时，又都表示难以消化各方面的涨价因素，本厂产品非涨价不可。如果大家都是这样一种“心态”，轮番涨价和最终把涨价因素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趋势就很难避免了。

四是投机性活动的推动。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混乱现象，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投机倒把、层层盘剥、牟取暴利等等非法经

营，是物价上涨的又一个因素。这一点很好理解，就不多作解释了。

五是国际价格变动的的影响。这几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很快，成绩很大，必须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就必然要使我国经济生活受到国际经济生活的制约。我国现在进出口总额已达到80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已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0%，其中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的活力和周旋余地，这些年我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较快的持续增长，就包含了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在内。另一方面，往往容易使人们忽视的是，我国经济因为同国际经济联系更密切了，也必然要受到国际经济生活变化的影响，国际价格的变动就必然要影响到国内物价。举例来说，今年以来，我国进口的主要物资，包括粮食、钢材、有色金属、化肥等，国际价格上涨了50%到一倍以上。为了减少价格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往往实行国家财政补贴，但补贴增加过多，国家财政负担过重，财政出现赤字，转回来又会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六是我们还不得不主动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不得不主动进行对不合理价格的结构性的调整。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很不合理，集中表现在不同类商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同类商品之间的质量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没有拉开，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加工工业产品价格偏高。为了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适当调整和提高初级产品的价格，使物价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就必然会推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一定上升。这几年来，结构性物价调整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在整个物价指

数的上升中大体上占 20% ~ 30% 左右。今年全国大约上升 18% ~ 19% 的物价指数中，我们主动进行的结构性价格调整的因素大体上占 6% 左右。

上述的粗略分析说明，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必须进行综合治理，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还要坚持改革，着重解决机制上的问题。为了克服经济过热，抑制需求过旺，必须坚决压缩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的过快增长，同时大力增加和改善有效供给。为了消化生产成本增加而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必须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大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对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必须保护，但对它们的消极利益驱动和短期行为又必须通过机制的完善和制度的健全，加以必要地有效地抑制。这一切都离不开治理和整顿，离不开深化改革。那么，在治理、整顿的条件下，价格改革是否就应该停下来，不再进行了呢？这也不行。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要从调拨产品经济的模式转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而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比价关系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不合理，关系扭曲，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必然严重阻碍市场的发育，也就谈不到充分有效地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从根本上讲，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非改革不可，除非不再对过去那种僵化的产品经济模式进行改革，还走过去的老路。应该看到，在过去那种僵化半僵化的经济体制下面，冻结物价，名义上没有通货膨胀，实际上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缺乏生机和活力，人民生活长期很少改善，购买力得不到实现，有钱买不到东西，或者大量地发票证；经济学家们把这种情况称为“隐形的通货膨胀”。其实，

究竟是坚持改革走新路好，还是放弃改革走老路好，人们心理都有一本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十年来，绝大多数城乡人民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明显高于物价上涨的幅度，多数家庭个人财产的占有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吃的、穿的、用的都比十年前好多了。听说现在又有人喊“毛主席万岁”，说什么“宁要物价不涨的过去而不要现在”，说这种话的人显然带有因为对物价上涨不满发牢骚的性质，尽管我们对群众的这种情绪不能忽视，但对此也不必过于认真，不必看得过重，因为十年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取得的成就是主流，大多数人都从中得到了实惠，真正想回到过去的人毕竟为数不多。现在无非是一个物价上涨过多，一个社会分配不公，一个党政机关和社会上还存在某些腐败现象，因而导致一些人们虽然“端起碗来吃肉”，但“放下碗来还得骂娘”。针对这种情况，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能不能通过十三届三中全会方针的落实，通过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既有效地遏制住通货膨胀，克服混乱现象，又能把包括价格关系在内的各方面的经济关系理顺，使我国的改革和建设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个任务的确十分艰巨，十分复杂，对此缺乏信心当然不对，盲目乐观也不行，一定要立足于现实，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三）对目前经济形势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它们的产生的原因，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应该看到其中既有两种体制转换期间不可避免要产生的现象，也有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失误，要采取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这些问题。充分认识两种体

制转换期间某些困难和问题之所以产生的不可避免性，当然不是为了把什么问题都推到客观原因上去，无视主观原因和推卸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改革的规律，真正懂得改革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懂得改革必须承担风险和付出一定的代价，更好地掌握改革的规律，更加自觉地坚持和推进改革。从这方面看，我们对改革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是很不够的。我们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十年改革在总体上是成功的，我们决不能也不应该放弃改革。我们要解决两种体制转换期间产生的矛盾、摩擦和漏洞，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持改革，深化改革，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我们又不能忽视了正是由于我们对经济规律、改革规律的认识不够，以及某些问题显露出来以后的见事迟，抓得晚，导致了一些工作上和认识上的失误。如果对这一点认识不足甚至根本不认识，也会产生很大的盲目性，就不可能做到吃一堑长一智，就会忽视从战略上、决策上、方针政策上以及工作安排上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当前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物价上涨过多，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原因，概要来说主要是由于经济过热，投资和消费双膨胀，形成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市场供求矛盾尖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关键是由于地方、部门、企业特别是企业还缺乏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市场发育不健全，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正在建立，还很不健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有体制的许多调控手段有的失灵了，有的消弱了，而新体制的作用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还不可能从机制上来控制

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无论是投资的膨胀，还是消费的膨胀，以至这两个膨胀带来的社会需求大于社会供给，货币过量发行，导致物价上涨过猛等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可能立即从机制上加以解决。相反地，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摩擦和漏洞，恰恰是由于新的运行机制还不健全，旧的运行机制尚未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这样那样的矛盾愈益显现出来。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促进了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反过来又为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于是二者相互推动，愈演愈烈。所以，在分析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和混乱现象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两种体制转换期间产生这些问题的不可避免性。这样的认识，不是为了把我们工作上的失误通通推到机制上，只是要告诉我们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新体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失灵，以至必然产生种种矛盾、摩擦和漏洞，这恰恰是改革时期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过程。人们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认识得越自觉、越深刻，就越能主动地、积极地、自觉地坚持改革，推动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对改革过程中已经发现的措施不配套，制度不健全，法制跟不上，管理监督工作没有及时加强等等问题，必须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适时地加以解决。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也应该坦率地说，从认识上讲，任何人对事物发展的分析，对客观规律的掌握，都不可能一贯正确。认识落后于实践，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能够在实践过程当中见事早一点，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那就是很好的了。工作的决策上和具体安排上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现象。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有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暴露的

过程，人们对它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前所以出现日益明显的经济过热，投资、消费膨胀带来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日趋严重，这个问题也有一个逐步积累、逐步发展的过程。1984年底的时候，就曾经指出过当时已经出现经济过热，需要解决，那时曾设想不要采取过分硬性的调整措施，而是采取“软着陆”，踏步几年，慢慢地把矛盾缓解下来，不要像过去几次调整时期那样大砍基本建设，大压消费，大减工人，避免引起社会的过大震动。那时也提出过警告，“软着陆”的好处是社会震动可以减轻一些，坏处是人们往往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叫他“软着陆”，他不着陆，不但不踏步，还大干快上，还要起飞，导致问题更加严重。现在看来，这个警告不幸而言中了。实际情况是1985年控制了一下，有了一点“软着陆”的趋势，1986年一些人又叫唤起来，刚采取了一点控制措施，就说资金不够，说这不够那不够，说速度下来了，说生产萎缩了，叫喊的结果，空气加热了，矛盾尖锐起来，1987年情况就更加严重。到1987年底1988年初，提出了“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当时很明确地讲，稳定经济首先要稳定物价，改革要稳一点，经济发展也要稳一点。结果这个方针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现在来简要回顾一下这段情况，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总之，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时候，特别是分析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都认识清楚，第一某些问题和困难的产生是两种体制转换期间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坚持改革的自觉性。两种体制转换的时间过长，对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当然，主观主义

地想叫它缩得很短也不可能，转换的速度快慢要从实际出发。改革的方向不能改变，改革不能停滞，具体的步骤和方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第二，在两种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又不能把现在存在的问题统统归结到新旧体制转换中必然产生的矛盾和摩擦上去，而要对我们执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在正确制定改革的步骤方法方面，以至在工作上是否既很积极又很谨慎地处理一切重大经济问题方面，认真地考虑和研究一下，是否还有哪些不足之处，真正弄清楚某些失误的情况和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认为这两点都很重要，不能忽视。从根本上讲，我们必须积极地促进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但在两种体制转换时期，如果不十分谨慎地实事求是地考虑工作，不认真地对待经济发展战略上的盲目冒进，不充分重视急于求成、经济过热的倾向在各级干部当中依然存在的实际，而是听任其发展下去，这就会严重地干扰改革，尽管你想的是深化改革，要坚持的是不断完善新体制，但导致的却是经济环境恶化，经济秩序混乱，其结果就会是既不利于深化改革，又不利于稳定发展经济。

从前一段走过的路来看，由于有的时候往往对改革带来的好形势看得多一些，而对问题估计不足，因此使这两年的问题越积越多。假如对问题看得及时一点，重一点，措施得力一点，情况会好一些。这与前面讲的十年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是不是矛盾？不矛盾。十年改革的方向正确，取得的成就巨大，这是事实，决不能抹煞，不能不承认，但这并不是说对改革的每一个具体步骤都可以不去认真考虑它既有积极因素，又往往带来某些消极因素。如果对这一点注意不够，也会陷入盲目性，从而对面临问题的分析研究不深不透，解决的决心不大，

措施不力，以致有些问题不断发展，越来越严重。

上面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概括起来说是三句话：第一，从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性质来说，它们是前进中和发展中的问题。这是认识当前形势的基本立足点。第二，从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程度来讲，情况是严重的，解决它们是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第三，从形成目前这些困难和问题的原因来分析，既有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的现象，也有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失误，同时也包括这些困难和问题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人们对它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总之，我们对形势的认识，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二、十三届三中全会方针的落实情况和 对进一步落实中央方针的几点认识

这次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狠抓中央精神的落实，总的来看工作是紧张的，是雷厉风行的。现在已经陆续发了二十多个有关治理整顿的决定、通知、条例和规定，其中包括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清理基建项目、稳定金融、加强物价管理、治理整顿公司、打击投机倒把、禁止请客送礼、强调为政清廉等等。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拥护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方针和措施，反映是好的。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和措施究竟能否真正落实。应该说，尽管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但在狠抓落实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从物价方面来讲，现在涨势过猛的势头开始有所减弱。10月份是全国涨价幅度最高的一个月，从11月份开始，

有些城市的物价涨势较之 10 月份略低一两个百分点。虽然降得不多，但总给了人们希望，不再是一个劲儿地猛涨。现在，人们对物价上涨的紧张心理已略有缓和。但是，物价失控的危机尚未过去，如果物价再继续上涨，抢购风潮还随时有发生的可能。

(二) 在稳定金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 9 月下旬以后，贷款规模得到了控制，9 月下旬到 10 月减少了 100 多亿元，11 月份又有减少；二是城乡居民储蓄由下降开始回升。当然，今年货币过量发行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这个问题还会影响到明年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三) 从清理整顿公司来说，中央和各个地方都做了部署，开始行动起来。中央、国务院直接抓了全国性大公司的清理和整顿。各地进展情况不完全一致，有好点的，也有差点儿的，以辽宁为例，到现在为止已经撤消了几百个党政机关搞的不该搞的或违法经营的公司。

(四) 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在建项目的清理来说，非生产性的楼堂馆所的清理工作成绩比较大。国务院带头，首先清理了北戴河、兴城的楼堂馆所建设。北戴河、兴城的楼堂馆所建设停了 60%，基本上该停建、缓建的都停建、缓建了。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积极清理，总的都有进展，但决心大小不一。截至 11 月中旬，全国停建缓建项目 9880 个，可压缩投资 317 亿元，其中，中央各部门停缓建的项目 283 项，压缩投资 17.8 亿元；各地方停建缓建项目 9597 项，压缩投资 299 亿元。在停缓建的项目中，楼堂馆所 1591 项，压缩投资 160 亿元。但有些地方还在强调“你热我不热”，对压缩投资规模特别是对清理在建项目的阻力还不小，任务还很艰巨。

(五) 在控制消费基金方面。国务院于10月初颁布了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将原来的十九种专项控制商品扩大到二十九种。最近两个月来，社会集团消费的零售额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与去年同月相比，9月份上升24.2%，10月份上升19.9%，11月份为13.1%。其中，专控商品零售额有较明显的下降。为了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国务院规定从10月1日起，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奖金、补贴等消费基金，一律维持在8月份的水平上。但是，总的来看，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的势头还没有控制住。

(六) 从全国范围总的情况来看，目前的市场情况基本上还是好的。全国猪肉库存是充足的，最大的问题是调运问题。今冬明春的猪肉价格水平预计大体上可以维持在现在的水平上，不会有过大幅度的上升。北方城市冬季大白菜的生产、贮存情况是好的，可以大体上满足供应。对新年和春节的市场供应，各地都已积极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明年第二季度以后市场和物价会不会发生较大的波动，还要看一看，稳定市场和控制物价的工作难度还相当大。

两个多月来的实践证明，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已经对稳定经济发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看到，按照三中全会精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工作，现在还刚刚开始，明年的任务将更加繁重、更加艰巨。对面临的困难，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的决策，经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我们的经济才能逐步摆脱通货膨胀的困扰，出现一个新的局面。现在，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没有理由悲观。目前，在相当一

部分干部和群众当中，担心中央的方针和措施落实不了的情绪还相当普遍和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希望中央、国务院的措施更有力一些，抓得更紧更狠一些，决不要手软，下更大的力量抓出效果来，以便使人们进一步增强信心，这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央和国务院也正在这样做。在这里，我还想从我们自身的角度讲几句。现在，在许多干部中，甚至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常常有这么一种情况：一说起种种困难和问题来，一说起种种消极腐败现象来，一批评起别人来，一发起牢骚来，激昂慷慨，情绪激烈得可以义愤填膺。但是一说起自身所管的事情究竟搞得怎么样，往往那种激昂慷慨的情绪就相对地减弱了。我觉得，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蔓延开来，相互影响，也会严重影响中央方针的落实。现在总有人说，这样那样的事能不能办好，就看中央能不能做出样子来了！这话当然也对，但恐怕又不完全对，或者说只对了一半。中央决策是否正确，当然是关键，但决策对了，能否落实，固然还要中央动员、组织、检查、督促，但从根本上说，还要靠我们大家的努力，靠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所以说，那种对上下左右、左邻右舍、对别人批评起来慷慨激昂，对自己所管的事情、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起来不那么积极的精神状态，恐怕也得改变改变。如果大家都不积极动员起来，不从我做起，信心恐怕也很难树立起来。我们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央、国务院，寄希望于各级领导能够认真地抓出成效来，以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信心；另一方面从我们自身来说，也要自我增强信心，为十三届三中全会正确方针的落实贡献自己应该贡献的一份力量。

为了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的方针，我想还要从我们的认识

上解决好一些问题，这里再谈几点个人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我认为它决不仅仅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方针，而是在新旧体制转换期间，在整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都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方针只是在明后两年治理整顿中要实施的，我不这样看。当然，它首先要解决的是当前经济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坚决抑制通货膨胀，因此才提出了要突出地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但是，正如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长期要注意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即使明后两年在治理和整顿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逐步确立，仍然是我们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任务。

有的同志担心，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各个方面都要紧缩，会不会又把经济管死了。这种情况在执行中央方针的过程中，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或在某种范围内发生，但决不是中央方针的本意。改革、开放、搞活，是坚定不移的长期的战略方针。我们治理环境也好整顿秩序也好，都是为了治乱，为了更有利于搞活经济，而决不是搞死。现在，企业有两种担心：一是中央已经确定下放给企业的自主权，会不会在治理、整顿中又收回去？我个人理解，企业自主权不但不会收，而且一定要落实到企业，决不允许地方、部门和其他中间环节层层截留；二是认为紧缩银根，企业流动资金会发生困难。对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第一，紧缩银根，压缩贷款和基建规

模，主要是把不必要的基建和贷款压下来，把楼堂馆所压下来，把盲目发展的重复的加工工业建设压下来，比如上百条的彩电、电冰箱生产线，已经太多了，贷款不能再给了，乡镇企业建设还要发展，但对盲目发展的那一部分也不能再扶持，不能再扩大贷款了。至于企业正常需要的流动资金，还是会保的。第二，企业如果不加强经营管理，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科技水平，使资金周转大大加快，节约使用资金，将不能适应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大环境，今后也没有出路，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竞争。现在许多企业粗放经营，资金管理混乱，漏洞很多，这种情况必须努力加以改变。

在这里，我倒想从另一方面提出一种担心，这就是假如明后两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确落实得比较好，在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方面有了较大的效果，到了那个时候会不会又有人头脑发热，又要大干快上，又要搞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又要盲目扩大贷款，又要过量发行货币？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担心，这是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比较能够自我约束的机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一二年、二三年不可能，四五年、五六年或七八年大体建立就很不错了。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要建设，又要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人民有这种希望。各级领导干都想做点好事，今年办十件，明年想办二十件，还要报纸上登，谁不想在任期内做出一点成绩来呢？这种心理状态人皆有之，可以理解。由于地方、企业利益的驱动，要千方百计地扩大地方企业的收入，要千方百计地为职工增加工资，发放奖金和实物，这种情况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如果我们不始终在宏观上很好地注意这种趋势，而是总是要过热，要高速度，这种积极性是非常容易调动的。现在形势

严峻，还有许多人在强调“你热我不热”，如果形势好转，缓解了矛盾，又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就更可能是意料中的事了。所以，现在就非常有必要强调什么时候都要边治理、边整顿，强调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是长期的方针。

(二) 明年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把过高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地降下来。这是个大局。国务院最近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又再次强调，这个目标已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做得到做不到，是能不能取信于民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工作，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一定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尽可能使物价上涨幅度降低得多一点。这一点做不到，不仅不能取信于民，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问题都很难解决，会给我们整个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要做到这一条就必须釜底抽薪，就必须压缩空气，克服经济过热，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下来，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少发些票子，使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个矛盾得到逐步缓慢。

(三) 在治理、整顿中，必须认真搞好经济结构的调整。现在一方面总的建设规模大了，我国经济在总量平衡上矛盾很大，另一方面经济的许多结构很不合理。从投资结构讲，一方面非生产性建设搞得太多，一方面超过社会需要的许多加工工业搞得太多。比如从国外引进组装件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生产线，就搞得太多了。有些原料紧缺的生产建设还在搞，如小棉纺厂、小纱厂、小毛纺厂等。全国棉花紧张，大工业都吃不饱，小家伙还在大上。所以投资结构必须调整。要保证那些短线的、紧缺的、能缓解能源原材料紧张的真正能够保持经济发展后劲的生产建设能够上去。生产结构也要调整。要保证真正增加有效供给。把长线产品抑制住，把不适销对路的

产品抑制住，把那些过多地消耗能源、原材料的产品遏制住，保证那些社会急需的、重要农副产品的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紧俏商品的生产，以及经济效益好、能出口创汇的产品能够增产。消费结构也要调整。现在我们的消费状况在许多方面是超前了。但消费结构的调整比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生产结构的调整可能更难。这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切实搞好结构调整，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经过一段治理整顿以后，过大的规模是降下来了，但结构还是不合理，结果发生经济滞胀。另一种情况是，在治理整顿了一段以后，稍不注意，过热现象又再次发生，又出现第二次新的通货膨胀。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使整个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企业内部劳动组合、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实行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方面，一句话，在合理调整整个经济结构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这样，我国整个经济的效益才能提高，才能逐步走上集约经营的轨道，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问题。

（四）必须正确处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治理、整顿同全面深化改革，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整顿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不仅要在坚持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进行，而且从根本上说，只有依靠改革的深化，才能取得应有成效。同时，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促进整治目标的实现。

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第一，积极推进企业改革。重点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真正引进竞争机制，强化企业管理，优化劳动组合，整顿劳动秩序，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加快技术

进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上下大功夫，以利于治理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第二，大力整顿流通领域的秩序。要进一步抓好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大力减少流通环节和中间盘剥，特别是要严肃整治各种违法经营。认真组织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流通，加强市场的组织和建设，健全市场运行规则，建立市场正常秩序。严格物价管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要管严管住。第三，有步骤地推进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措施。包括积极推行住宅商品化，出售部分国营小企业产权，以及有偿转让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等。无论是整治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还是全面深化改革，都要求把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放在突出的地位上来，这样才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

(五)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同坚持对外开放也是互相促进的。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次治理、整顿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充分利用开放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调剂国内供需，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出口创汇，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治理、整顿的困难。另一方面，搞好治理、整顿工作，可以为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有利的环境。当前，为了缓解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要少出口一些国内紧俏的商品，同时相应地减少进口那些不应该进口的东西。要继续执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稳步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一要更多地吸收外商来中国搞独资企业；二要多利用国内现有企业的厂房、设备嫁接国外的资金、技术；三要在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多搞以进养出、两

头在外、少用或不用国内紧缺原材料的外向型经济，以增强我国经济的回旋能力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就我国经济问题与 在京外国专家的对话

(1988年12月)

各位专家朋友们！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并就中国的经济情况和问题，同大家交换看法和意见。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大家都很关心这次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认为，中国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在前进中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根据这种情况，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确定明后两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要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要采取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措施，把目前过大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地降下来，把通货膨胀控制住。

当前的治理经济环境，主要的是办好三件事。第一，压缩基建规模。明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要比今年实际达到的规模压缩20%。专家们在北京和在外地，都可以看到我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到处都是工地。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兴旺发达，一方面很多建设是超前了，大大超越了国家财力物力的负担能力。要坚决把那些豪华的超越我国实际需要的楼、堂、馆、所

建设停下来，把那些重复的不必要的加工工业建设停下来，把过大的城市建设规模压缩下来。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保住国家确实需要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重点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比如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的建设，要集中必要的资金保住。第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是控制集团消费的过快增长。现在国内国外都有人批评中国是“贫穷的国家，挥霍的社会”。这个批评是中肯的。有些机关团体，吃公有制的大锅饭，奢侈浪费，请客送礼，风气很不好，这股风必须刹住。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种种超前消费现象，同我们国家的国力不相适应。第三，坚决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把经济的发展速度，主要是工业的发展速度降下来。今年1月到10月，我们的工业增长17%，明年要求降到10%左右或10%以下。在把产值增长速度降下来的同时，要大力提高经济效益。这样，我们的经济就不会萎缩，反而能够更健康地发展。

整顿经济秩序主要是整顿流通领域里的混乱现象，这方面也要着重办好三件事。第一，整顿流通领域，清理各种公司，取缔中间盘剥、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等违法行为。许多公司都要整顿，有些要坚决撤销。第二，健全市场秩序，克服混乱现象。反对用行政手段分割和封锁市场，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并把各种市场规则逐步建立起来。第三，端正企业行为，督促它们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改善经营管理，制止滥发奖金实物、偷税漏税、侵吞国家财产等行

为。

我认为，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不会影响改革、开放。治理和整顿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前提下进行

的。环境和秩序搞得好一些，将会更有利于改革、开放，许多治理和整顿的措施本身也是改革。

根据这次中央全会精神，国务院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发布了有关的条例、决定、规定和通知，并已先后在报纸上发表，目前正在全国贯彻执行。从中央全会结束到现在刚刚一两个月，执行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因为时间还短，当然现在还很难说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我相信经过中央的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必定会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进展得更健康一些。

（下面是对在京外国专家提问的回答）

问：刚才你介绍的治理和整顿的方案，对我们研究中国情况来说很有意义。我想知道最近在稳定金融和控制货币供应方面将会采取哪些措施？

答：在治理和整顿中，稳定金融和控制货币发行是很重要的。由于前几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这是形成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这次治理、整顿，对金融方面也将采取必要的措施。首先，坚决控制信贷，对楼、堂、馆、所建设的贷款，对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工程的贷款等，将不贷或少贷。第二，采取开办保值储蓄、多种形式的有奖储蓄和提高利率等办法，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储蓄存款。第三，加强对现金管理，减少社会的货币流通量。第四，明后两年将持续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以利于控制通货膨胀。

问：你能不能预计一下今年国家财政赤字有多少？明年能把赤字降低到什么水平？

答：今年的赤字，年初通过的计划是 80 亿元。这个计划估计不会突破，工作做得好，有可能略微减少一点。预计明年的财政赤字将大体保持今年的水平。

问：现在有一种传说，说人民币要贬值。大概什么时候贬值呢？贬值的程度会有多大？

答：对人民币是否要贬值，我们国内有不同看法，西方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看法。一部分人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外贸情况很好，人民币可以不贬值或者少贬值。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不贬值，即使贬值也不多。究竟贬值不贬值、什么时候贬值和贬多少，我还说不准，国务院也没有授权我宣布。

问：物价上涨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很大，有什么措施克服物价上涨和防止投机倒把？

答：物价上涨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幅度，需要进行综合治理。我们除了将采取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和消费膨胀、稳定金融和抑制货币过量发行、控制社会总需求和增加社会有效供给等措施外，还将对某些紧缺商品和某些重要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在国家宏观管理下开辟和发展批发市场，以及健全市场规则，整顿市场秩序，加强物价管理等措施，从而防止投机倒把和控制物价上涨。当然，采取了这些措施，也不能说不会再发生投机倒把现象了。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投机倒把现象总会存在，见利忘义的人永远是会有的。因此，我们要为克服这种现象作长期努力。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发展副食品生产基地，努力解决好城市居民的“菜篮子”问题，使广大职工特别是低收入职工的基本生活不致受到太大影响。

问：副食品生产基地指的是什么？

答：副食品生产基地，指的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郊区、部分中等城市郊区和重要工矿区，要开辟和确定一定的地方，组织农民从事种菜、养猪、养鸡、养鱼等项生产，以保证城市居民和工矿区职工的副食品供应。

问：如果发展商品经济，同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常常发生矛盾，这在理论上如何解释？

答：中国共产党经过对国内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经过对人类经济形态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并且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能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商品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最终得到巩固和完善。与此同时，我们又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不同的。最基本的不同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基本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就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具有商品经济属性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商品经济的通常做法和有效经验在我们国家也可以借鉴和采用；就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毕竟是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条件下通常适用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做法运用到我们国家来又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的国情和特征。由此，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看法：1.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决不能动摇和削弱以公有制为基础或者说为主体；2. 我们不把计划调节

同市场调节对立起来，而是要求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3. 我们将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以此作为社会分配的主体，同时允许其他分配形式存在并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4. 我们通过改革要建立的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将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正如提问的专家所指出的，我们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若干不可避免的矛盾和问题，但我们相信只要按照前面所讲的原则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先例，改革的过程将是很艰难的。但我们党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路。历史的实践证明，过去按照僵化的模式搞社会主义，效果很不理想。我们必须走另外一条路。尽管这条路将充满荆棘和艰难，但我国十年改革总的来看是成功的，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问：现在有取消外汇券的可能吗？

答：中国发行外汇券是从1980年4月开始的。外汇券使用以来，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作用是有利于外汇管理，有利于发展旅游业，有利于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消极的一面是有些人无视国家的有关规定，采取各种手段套取外汇券，进行黑市活动，扰乱外汇管理。尽管我说到这样的事感到脸红，为中国人感到羞耻，但不得不指出这是事实，而且这一行为现在还有发展的趋势。少数人向外国人套换外汇券的手段很恶劣。有什么办法呢？钱就是那么吸引人嘛！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外汇券的使用，是否取消或什么时候取消

外汇券，现在我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回答。

问：我提一个小问题，明年基本建设规模压缩 20%，会不会影响到工人失业？

答：你提出的不是个小问题，而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大问题。由于压缩基建规模，一部分建筑工人会失去工作岗位。中国有相当一大部分建筑工人是从农村来的，我们将说服动员他们回到农村去。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大的问题。小部分失去工作的城市建筑工人，将采取适当办法安置。有的可以参加新的工作，有的可以培训，需要时再工作。中国现在的失业率只有 2%，明后年可能有所增加，比如增加到 4% 左右。达到这样的失业率，在世界上也是低的。即使如此，我们对这个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使城市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不致发生大的问题。

问：国际经验表明，已进城的农民是从来不会回去的。北京现有 150 万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他们都集中在建筑部门，这影响到了北京和一些大城市的生活，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这些人能够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吗？

答：你提的这个问题，进一步提醒了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对待。不过，据我所知，中国城市的农民建筑施工队，大部分是有组织地进城来的。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渠道，说服、动员和组织那些在城市已没有施工任务的农民建筑队回到农村去的。他们到农村是有事情可以做的。我们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各项工作中，执行任何一项措施都会存在某些困难，但不这样做又不行。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深入研究各种具体方法。

问：几个月以前，中国就说要发展各种商品市场，还说对

重要的原材料、有色金属、钢材、粮食、棉花等市场要整顿，使倒买倒卖现象有所减少，不知最近有何进展？

答：对紧缺的、重要的生产资料，有的将实行专营，有的将组织产销直接见面，有的在产地和销地建立和发展批发市场，加强市场管理，整顿市场秩序。这些工作都正在进行。至于发展各种商品市场的工作，过去就在做，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问：现在有不少工作人员搞第二职业，这样做会不会精力不能专一，纪律也松散了？工资改革什么时候进行？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否已引起了人心惶惶？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全文今天发表了，这是在会议闭幕一个月以后，为什么发表晚了？内容有没有什么变化？

答：先说关于第二职业的问题。现在我们已明确规定，任何在职的党政干部决不允许经商办企业，任何党政机关干部如果做买卖或从交易双方达成交易中取得佣金或回扣，都是非法行为。任何党政机关干部都不允许在企业里兼职。这些规定都正在执行。与此同时，政府允许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可以在不妨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在业余时间从事翻译、写作，作学术报告、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等活动，并从中取得合法的报酬。只要做得适当，不会对本职工作有多大影响。当然，也有些人做得过分，以致做起本职工作来无精打采，甚至违反工作纪律，把本职工作时间都侵占去搞其他事情了。任何事情都可能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我们鼓励合法的正常的业余创收，限制和批评消极的方面。

关于工资改革，我们一直在逐步地做，今后还将继续进行。明年在重点抓治理和整顿的条件下，职工工资将进行适当

的调整。

关于通货膨胀是否会引起人心惶惶的问题，我应该坦率地讲，中国城乡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对于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前一段时间，主要是8月中下旬，相当一部分城市里出现了挤兑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这既表明中国老百姓对过大幅度的物价上涨承受不起，也表明了他们对通货膨胀的紧张心理和恐慌心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老百姓承受物价上涨的能力不能估计过高，宁愿估计低一点。我觉得，这次中央全会决定通过治理和整顿，首先要求把过高的物价上涨幅度降下来，就包含着这样的考虑在内。

这次中央全会是共产党内部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中央提出的经济工作方针，参加会的同志都赞成。那么，没有参加会的广大党员是不是都赞成呢，这要在传达以后才能了解到。为了广泛听取意见，所以就先一级一级地在党内传达下去，经过一个月，听到的意见都是赞成的，所以今天报告就公开发表了。我们党有一个传统，就是做出重要的决策，都要在事前或事后广泛征求意见。现在公开发表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与当时在会上讲的，有某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没有什么变动。

问：对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有何变化？中国现在有多少外债，以什么方法偿还？怎样理解党的作用？

答：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总的来看，不会影响对外开放。相反地，可以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有利于对外开放。我们要压缩基建规模，但对涉外项目将采取保护政策。对于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项目，对于高技术领域和适用的先进技术领域的项目，对于有利于出口创汇的项目等等，我们都将进一步加强与外商的

合作，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对于已经签约和开工的合作项目，我们将严格履行协议与合同。正在谈判和准备谈判的项目，如属于已超过我们实际需要的楼、堂、馆、所建设，某些技术落后、重复建设、高耗能、高消费的项目，将会受到必要的限制，不能再引进。总之，外商在我国还会找到许多合作领域，可以发展的机会还很多，可以发挥作用的方面还很大。

中国现在的外债总额是三百多亿美元。按国际上通用的计算方法，我们国家偿还外债的能力尚未超过警戒线。中国对外严守信誉，从来不赖债。

关于党的作用，从我们党的整体来说，它将在我们的国家里发挥领导作用、核心作用和监督保证作用。无论中国如何改革，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当然同时也要认真改进。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平等协商和合作共事，但不会实行多党执政或轮流执政。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我们要求它们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作为共产党员个人，要在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坚决实行党政分开，不代替政府的作用，不向群众直接发号施令，而是靠它的主张和政策的正确在群众中发挥领导作用。

关于当前经济宣传的若干意见

——在全国宣传部长和首都新闻单位
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1月)

最近，国务院就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问题，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此讲过许多重要意见。现在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归纳起来给大家通通气，吹吹风，供大家掌握当前经济宣传时参考。

—

党的十三大的路线和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方针，都不能变。这两个不能变，应该成为当前经济宣传的总口径。

十三大的理论和路线是管总的。它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分析，提出的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各项工作指出了总的原则方向和奋斗目标。当前的经济宣传和形势教育，当然不能离开用十三大的理论和路线进一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这个总的要求和目的。

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作出的1989和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

点是治理整顿的部署，是以十三大的理论和路线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对当前形势作了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实施这样的方针和部署，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十三大路线，使我国的改革和建设继续沿着十三大指引的方向前进。

因此，十三大路线和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基本精神是相通的，是统一的。

宣传中要注意：十三大和十三届三中全会对重大方针原则问题的论述，重要的口径和提法，都不能随意变动。变了，就会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严重影响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我们的宣传中，要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的关系。治理整顿，是在坚持改革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治理整顿的许多措施，本身就是改革的内容。治理整顿搞得好，将为深化改革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当前改革的步骤和方法，要服从于和有利于治理整顿。这种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辩证统一关系，应当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宣传中，很好地体现出来。

二

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坚持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法。

我们党经过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作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

这个理论判断，第一，它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排除了过去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完全对

立起来的错误的传统观念；第二，它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虽然都有商品经济的属性，但两者之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排除了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完全等同起来的错误观念。

这个理论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已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和广大的干部群众所普遍认识和接受，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根据。因此，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应该是能够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实际工作的宣传中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由于强调治理整顿，就误认为又要回到那种高度集中的、管得过多过细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上去；另一种是：错误地认为商品经济同公有制是不相容的，同计划调节是不相容的，因而主张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只有实行私有化，就只有全部摒弃有计划按比例而实行完全的市场调节。

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强调沿海地区注重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是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丰富和发展。这个发展战略也不能变。变了，就会严重影响沿海地区近两亿人的积极性。

当然，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也要同治理整顿和经济调整的总要求相适应。在沿海开放地区和经济特区，也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还应该强调真正做到“两头在外”，而不是利用沿海优惠政策与优势同内地争利；应该强调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提高效益，而不是一哄而起，盲目扩大建设规模。

在当前关于对外开放和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宣传中，应多讲些成绩和经验：1. 吸引外商多来我国办独资企业；2. 多利用我国现有企业的厂房、设备嫁接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3. 真正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降低换汇成本的有效措施和成果。

总之，治理整顿和对外开放也不是矛盾的。在治理整顿中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真正用得好，将有利于缓解国内经济困难和增强我国经济的回旋能力。

三

一心一意狠抓两年经济调整，在治理整顿中坚决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权威。

当前的治理整顿，实质上是一次新的经济调整。工作做得好，遏制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我们将因祸而得福。

现在治理整顿的方针、政策、措施和要求都已经很明确，关键在于坚持贯彻执行，增强信心。因此，必须强调一心一意，抓紧抓狠抓实，决不能三心二意，犹豫动摇，半途而废。

实行紧缩金融和财政的政策以后，各地叫喊资金紧缺、叫喊困难的呼声高涨起来，有些该保、该发展的生产经营活动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实际困难。对此，应该讲两句话：一是，总体上实行紧缩的方针不能动摇，否则经济过热无法降温，需求过旺无法抑制，控制通货膨胀也就会成为空谈，这对稳定发展经济的全局是很不利的；二是，应该在符合国家宏观要求、经济调整 and 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区别对待，该保的保，该压的压，做到紧中有活。

在宣传中，要特别注意表扬那些善于通过深化内部改革，挖掘潜力，改善经营，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有效供给的企业单位，介绍和交流它们的经验，而不是盲目地跟着下面叫喊困难，助长向上伸手要钱要物的情绪。

治理整顿要取得成效，必须建立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权威。

为此，在实际工作和宣传中，应强调这样几点：1. 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2. 切实维护政令法令的严肃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3. 对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凡违纪违法的，必须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正常现象。否则，人民就会失望，中央、国务院的权威就建立不起来，治理整顿也就很难取得成效和达到预定的目标。

四

在治理整顿和经济调整中，要注意运用法制手段，加强法制建设，以利于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

自从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已经陆续发布了四十多个文件，包括通知、决定、规定、条例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

这样做，是国务院按宪法办事，是执行宪法赋予国务院的权力。

为了实现治理整顿和经济调整的任务，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等多种手段，

五管齐下，加强宏观管理和调控，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的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都要用。要更多的采用经济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尽可能制定必要的法规和使之形成制度，以尽量避免主观随意性。

国务院颁布的治理整顿和调整经济的各种法规，以及其他种种法规，不仅对它们本身要宣传，要解释，要登报，而且对于它们的贯彻执行情况，也要加强宣传。对贯彻执行得好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通过公开的宣传报道加以表扬，并传播它们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对贯彻执行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或法规本身有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也要通过多种渠道把信息反馈上来，以便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五

在治理整顿和经济调整中，认真贯彻执行正确的产业政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进一步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一项对压缩社会总需求和抑制通货膨胀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又容易见效的重大措施。国务院已经将该保、该压的建设项目的目录予以颁布，各地各部门必须对号入座，无条件地遵照办理，决不允许阳奉阴违，弄虚作假。

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必须把过大的社会总需求坚决压缩下来，同时大力增加有效的社会供给，这样才能平衡供求关系，稳定市场，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国务院领导同志已多次强调指出，我们所要增加的有效供

给，主要是粮棉油肉禽蛋和蔬菜等重要农副产品、人民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适销对路的轻纺产品、回笼货币多的紧俏产品和出口创汇产品，以及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的能源和短缺原材料，而不是不加区别地增加所有产品的生产。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的关键，在于大力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各行各业都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走以着重提高经济效益来发展社会生产的路子。

就总体上说，在经济紧缩的条件下，必须增加对农业、对教育的投入，努力保证能源、交通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方面的重点建设。

国务院已经多次组织讨论过《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个文件经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后，将正式颁布施行。

在有关产业政策的宣传中，希望能够注意强调这样的精神，这就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权在国务院。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只能根据各地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执行国务院颁布的产业政策的实施细则，而不能只从局部利益出发另搞一套。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克服小而全、大而全的现象，从宏观上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布局的合理化，逐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六

积极探索和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的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既是当前治理整顿、调整经济和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迫切需要。

回顾以往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以放权、让利、搞活为特

征的。通过放开搞活，打破了原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旧秩序，这是很大的历史功绩。但在放开搞活的同时，由于新体制新秩序还没有相应地建立健全起来，特别是由于宏观经济的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还没有相应地建立健全起来，这就使得在新旧两种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现象，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某种程度活而无序的状态。

为了推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的逐步建立，有利于这方面工作的顺利推进，在当前的经济宣传中，有这样几点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

第一，加强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监督，本身就是深化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的内容，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有序、持续稳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决不能认为这样做就是走老路，就是旧体制复归。

第二，为了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的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对于过去使用过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我们都不应该拒绝使用。我们不能只从理想的模式出发，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一定要用更多的心思，花更大的力气，积极探索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调控手段和措施。

第三，必须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综合部门、监督部门要大力协同，密切合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而不能各搞一套，各行其是，相互掣肘。

第四，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微观搞活和宏观调控的关系。中央有关论述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中曾经指出过，总的来说，大的方面要管住管好，小的方面要放开放活；还曾经指出过，微

观经济开放活的范围和程度，要以宏观调控的能力为前提，使两者能够相互适应。这些恐怕还是我们正确处理上述两者关系和保证国民经济活而有序的指导原则。

七

对于我们面临的困难，对于几个月来紧张进行的治理整顿工作，我们在宣传中都要注意有一个正确的基本估计。同时，要注意正确地总结经验，使之成为有利于推动改革和建设的精神财富。

无论是对于我们面临的困难还是对于前一段的治理整顿工作，恐怕都应作两个方面的基本估计：第一，我们面临的困难，其性质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有着克服困难的许多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前一段的治理整顿工作，虽然刚开始不久，时间不长，但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通过我们的宣传，帮助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将有利于增强人们克服困难和搞好治理整顿的信心。第二，我们面临的困难，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困难既不能估计过头，看得过重，同时也要高度重视，要认识到有的问题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解决起来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前一段的治理整顿虽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距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在宣传中帮助人们充分认识这一点，才有利于团结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共渡难关，进一步增强一心一意搞好治理整顿的坚定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年来，我们在改革和建设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面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

变化，各项工作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没有犯过大的错误。这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但不论在改革方面还是在建设方面，小的失误是有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一定要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正确路线的前提下，联系各项工作的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总结的目的，是为了把当前的治理整顿工作搞得更好，把改革和建设搞得更好。

八

根据党的十三大路线和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了把当前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进一步宣传好，我们应该在这方面的宣传中把握哪些要点呢？

第一，联系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和人们的思想实际，进一步加强治理整顿必要性的宣传，消除妨碍进一步坚持治理整顿的思想阻力；

第二，进一步强调消除经济过热，克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和从根本上控制通货膨胀；

第三，继续强调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真正把清理和整顿公司的工作抓好抓到底；

第四，一定要在狠抓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上下大功夫，使整个经济发展真正转到逐步实现结构合理、资源优化配置和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

第五，坚定不移地把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密切地结合起来，努力帮助人们消除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和观念；

第六，在治理整顿中积极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使之有利于缓解国内经济困难和增强回旋能力；

第七，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努力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可以说以上的每个题目都是有許多文章可做的。这也就是说，使宣传工作和新闻报道工作进一步发挥推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作用，是大有可为的。

广播、电视、报刊等的公开宣传报道，总的来说，都要有利于人们增强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信心，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才好。

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几个问题

(1989年1月)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第二，十三届三中全会方针的落实情况和对进一步落实这个方针的几点认识；第三，关于总结经验、坚持改革的问题。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观察形势，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前提。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对当前经济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三中全会对形势的分析，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总的经济形势还是好的，但在前进中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集中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多。根据这个总的分析，我想对当前的形势谈三点看法，供同志们观察和研究形势时参考。

(一) 从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确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这是我们观察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立足点

有的同志可能要问，现在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还说是前进

中的问题？为什么还说总的形势是好的？我觉得作出这样的判断还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十年来的改革和建设做点简要的回顾。

我个人认为，这十年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从总体上看，改革带来了国家的前进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经济生活比之过去来说，充满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很多，最重要的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形态来说，已经打破了过去那种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以财政统收统支，劳动统包统配为特征的，“统”字当头的调拨产品经济的模式，逐步走上了发展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

应该看到，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目前还处在这个转变过程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过去多年实行的那样一种僵化、半僵化的经济模式已经打破了，调拨产品经济的模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在多方面逐步地建立起来，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当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现在还没有在各方面起到主导的作用。这说明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我觉得，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究竟应该是一种经济形态，这一点有根本性的长远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坚决排除了过去那种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逐步确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这是经济领域中的根本性的拨乱反正。总之，经过十年改革，过去那样一种僵化、半僵化的产品经济模式被打破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在逐步建立起来，商品经济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我国 960 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第二，从所有制结构来说，打破了过去那种单一的、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些年来，公有制经济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增强了它们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中外合营、外商独资企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今后还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是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的。它对于解放社会生产力，对于搞活生产和搞活流通，对于方便人民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第三，从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来说，过去那种政企职责不分、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的状况已基本改变，企业有了自主权。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合理机制。但正在向着这个方向转变，企业逐步搞活了。乡镇企业的机制更灵活一些，国营企业的活力也比过去大大地增强了，从而有效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

第四，从国家宏观管理的角度，从国家及地方、部门、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来说，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僵化的管理体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地方、部门和企业几乎没有权利、财力和自主权的状况变化了，地方、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在宏观管理上，过去那种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并基本上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的方式，已经基本上瓦解了。

第五，从收入分配关系来说，过去那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正在改变。当然，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正像

大家已经感觉到的和社会上反映很强烈的那样，也出现了新的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基本的趋势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就必然要拉开差距，某些社会分配不公就必然会出现。问题在于现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决不能回过去再搞平均主义的分配，还是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同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抑制某些高收入，防止社会分配的悬殊过大。当然，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论怎么说这也是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果不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要想调动整个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当然现在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等。在教育、科技界，在知识分子当中，对这个问题反应更为强烈。知识分子的收入还不如小商小贩！本来小商小贩大都只能勉强糊口，顶多略有盈余，现在他们当中许多人却腰缠万贯，成了社会上最神气的人了。知识分子从事的是复杂劳动，收入却几乎被贬低到了社会的底层，这确实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是一种历史现象，在打破平均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我们必须在坚持克服平均主义的前提下，在历史的前进过程中去加以解决。也许有同志说现在还看不到解决的前景，我倒不是那么悲观，虽然也感到解决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我想还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的。总之，经过十年改革，总的趋势是严重压抑劳动者积极性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体制正在逐步被打破，过去那种一潭死水的状况变化了。

总起来说，经过十年改革出现的以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变化，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打破了封

闭停滞的局面，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以至某些混乱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十年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说改革的方向正确，并不等于说一切改革的具体政策、具体步骤都是正确的；说改革是成功的，并不排除改革中也包含有失误。看问题不能绝对化。整个改革过程中，一切改革都会既有利又有弊，绝对有利而毫无一点消极作用的改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只能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就看我们如何抉择了。

正因为十年改革总的来看是成功的，所以统观全局，纵横对比，纵的同我国自己的历史相比，横的同世界各国同期的发展情况相比，我觉得这十年确是中国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十年。这十年，无论是经济增长率，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增长，还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都充分表明了这十年是我国大前进、大发展的十年。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若干个主要数字和事实来说一说。1981年到198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8%；而在同一时期，美国增长3%，日本增长3.7%，联邦德国增长1.4%，英国增长2%，法国增长1.6%，印度增长5.4%，南朝鲜增长8.3%。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概念，而使用国民收入这个概念。1981年到1986年，我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9.6%；同一时期，苏联增长2.9%，民主德国增长4.5%，捷克斯洛伐克增长1.8%，波兰增长0.7%，匈牙利增长1.4%，保加利亚增长4%，罗马尼亚增长4.7%，南斯拉夫增长1%。这些数据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处在世界的前列，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再看看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即主要生产实物量的变化情况。从

1978年到1987年，我国原煤产量由6.18亿吨增加到9.28亿吨，由原来占世界第3位进到第1位；钢由3178万吨增加到5628万吨，由世界第5位进到第4位；原油由1.0405亿吨增加到1.3414亿吨，由世界第8位进到第5位；发电量由256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4973亿千瓦小时，由世界第7位进到第4位；粮食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473万吨，由世界第3位进到第1位。这些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工农业产品。总的来看，应该说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幅度更大。1978年到1987年，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幅度平均每年16%多，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78年我国出口总额占世界第32位，现在占到第14位；进口总额由原来占世界第27位前移到第11位；出口总额由原来占世界的第28位前移到第12位。从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目前达到的实际水平来讲，当然我们现在要比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低得很多，这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从这十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来看，在世界上恐怕也找不出几个国家。当然，在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较大提高的情况下，随着这几年的物价上涨较多，在平均数下面也掩盖着一部分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一点也不能不看到。但我不赞成现在有人说的这十年我国在经济上、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站不住的。当然，我们在看到我国这十年总经济实力同世界各国的差距有所缩小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还有同人家拉大差距的方面，主要的是经济效益不好，科技、教育的某些领域的差距拉大。我们既要肯定自己的进步，又要找出差距所在，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我们的

经济增长率不低，实物增长量不慢，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不是资源优化配置，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比较低，产品质量比较高，效益比较好，不是这样一种高效益的集约经营型的经济，而是浪费相当多的资源，耗费相当多的劳动力，耗费相当多的物资，靠拚资源、拚设备、拚人力来支撑发展速度的一种粗放经营型的经济。这恰恰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在经济上讲，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速度慢，而是太快了，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如果现在我们还讲速度不够，还要从速度上赶超别人，那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效益不好。在科技领域，这些年我们有领先发展的某些方面，但在相当多的领域特别是高技术领域人家走得快，我们走得慢，跟不上。对教育事业恐怕也应该是这样一个估计。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差距是：经济上效益不好；技术领域的某些高技术严重落后；教育是“立国之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教育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今后我们必须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科技进步，积极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提高教育质量，为从根本上保持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后劲而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总之，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第一点看法就是，十年来我国的改革和建设是大踏步地向前发展的，同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但它们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这样看，当然不是为了掩盖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决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是我们的立足点。假如拿现在面临的困难同60年代面临的困难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现在发生的困难决不是在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在各项生产严重萎缩、人民正常生活都无法维

持、甚至肚子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和克服困难的物质基础，都比过去好得多了，因此，我们决不应该也没有理由丧失渡过当前困难的信心。

(二) 从我国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程度来讲，必须看到情况是严重的，形势是严峻的，解决这些问题既很紧迫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任务是很艰巨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发生的，而是几年来积累下来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过多，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比如投机倒把、层层盘剥、牟取暴利、官倒私倒相结合等等，都不仅是这一两年的问题。就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过多问题来说，虽然今年才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但问题是从1984年底、1985年初就开始出现了。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物价指数1985年上涨8.8%，1986年上涨6%，1987年上涨7.3%，今年又在前几年物价连续上涨的情况下上涨较多，上涨幅度超过了两位数，全年预计可能达到18~19%。

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指数，老百姓常常感到不符合实际，认为偏低。有的人甚至说，国家统计局是官方机构，公布的数字无非是为官方粉饰太平，是糊弄老百姓的。老百姓实际感受到的物价上涨幅度，要比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大得多。对这个问题我一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笼统地发牢骚式地怨恨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是没有根据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是从全国一百多个大、中、小城市，根据几百种代表性商品，经过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一万多名专职物价统计员，每周取样价6~8次（包括国

营商店和集市贸易的价格)，将大量数据统统汇总到国家统计局，然后通过复杂运算，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这种统计方法世界通用，只不过各国所采取的代表性商品有所不同。因为各国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不大一样，有的取这几种，有的取那几种。据统计局的同志介绍说，日本的、联邦德国的、美国的以及联合国经济组织的一些专家到中国来了解了我国的统计方法以后，认为我国的统计方法是先进的。所以，它是基本上能够反映我国实际情况的。因为物价上涨幅度较大，有意见甚至发点牢骚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就无边无沿地发泄怨气，骂大街，笼统地简单地说国家统计局只是为官方说话，不顾事实，捏造数字，也不符合事实。希望我们的干部不要在群众中助长这种情绪。

第二，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实际感受同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不一样，这又是合乎情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统计局统计的物价指数是根据几百种商品加权平均得出来的，而我们每个人绝不会天天消费统计局统计的那几百种商品，只是消费其中的若干种，特别是肉、禽、蛋、蔬菜等副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而恰恰是这些东西涨价幅度要高于包括其他那几百种商品加上权数计算出来的平均数。人们的实际感受不一样，这又是很可以理解的。另外再说一点，从党和国家决策的角度讲，当然要立足于科学的统计数据，但又必须深刻体察群众的情绪。如果不细心体察这种情绪，对广大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承受能力估计过高，对控制物价上涨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不力，使物价上涨幅度失控，老百姓就会用行动对这种政策作出惩罚。前些时候在许多地方发生的抢购风潮，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因此，我们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必

须抓得很紧很紧，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充分看到当前困难的严重性，首先因为这种困难是几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们要克服面临的困难和解决现存的问题，决非一纸行政命令或采取某些控制性措施就能奏效的，必须花很大的气力，认真进行综合治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这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对这一点，我们只要对连续几年物价上涨过多的原因作一些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这几年物价上涨幅度过高，起码可以讲出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需求拉动的因素。从1984年底以来，经济过热，需求过旺，投资和消费双膨胀，连续几年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外经济学家们大都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的国家是个发展中国家，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我们原来的经济落后，要想改变这种状态，不搞建设，不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当然是不行的。这些年来全国到处大搞基本建设的情况，既反映了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也反映了现有的建设规模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负担的可能。这种投资需求的过度膨胀又带动了人民消费的膨胀，投资和消费双膨胀，使社会总需求连续多年超过总供给，供需矛盾越来越尖锐，物价必然较大幅度地上涨。

二是生产成本推动的因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土地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人均占有耕地较世界平均水平低得很多。我们要解决10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粮食产量，而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只能依靠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相应地加强农业开发，进一步开垦可开垦的土

地。不论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还是扩大农业开发，都必然要求增加农业投入。1987年同1978年相比，全国使用的化肥量就增加了一倍多，其他如农田水利建设，科技的推广和普及等，也要大量的投资，这样粮食生产成本就当然要增加。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后，粮食价格当然要相应提高。工业生产也是这样。比如石油、煤炭越来越向深度开发，你不增加投资，不扩大勘探，不开挖深井，哪来的石油和煤炭？所以，生产成本增加，必然推动物价上涨。

三是地方和企业利益的驱动。现在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和企业承包经营，这种办法是从农村承包得到的启发，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提高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措施。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完成了国家一定的承包任务以后，就可以相应地得到更多的利益。地方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用于举办各种事业；企业留利水平可以提高，因此增加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消费基金，可以给职工多发工资，多发奖金等等。当然这是好事，这样做，比之过去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做法来说，明显地调动和发挥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这是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但是，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往往同国家要在宏观上控制物价上涨幅度的政策相矛盾，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整体利益相矛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只从地方和企业局部利益出发的消极的利益驱动。因为涨价对地方来说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对企业可以把涨价负担转嫁给国家和消费者，是一种最方便的增加企业收入的途径。

听说我受国务院委托在电视上发表了两次有关物价的讲话后，社会上有这么一种新闻，说什么“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袁木发表电视讲话，他一讲话就涨价”。这种传闻既反映了人们对物价上涨的不满情绪，也反映了对我的讲话有所误解，借此机会我想作点解释。1987年下半年，物价上涨幅度大了一些，国务院要我讲一讲政府已准备采取的措施，但并没有说以后就再也不涨价了，只是强调各地必须加强物价管理，以利于稳定人心，防止发生抢购，否则将会加剧供求矛盾，更不利于控制物价。当时的用意是好的，讲过之后也有一定效果，但有些商品价格还在上涨，所以大家有意见。今年部分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和调整的时候，我又受国务院委托发表了电视讲话。首先讲了放开和调整部分名烟名酒价格，一是有利于抑制烟酒消费，二是有利于打击投机倒把，三是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在此同时，我在讲话中宣布了两条。一条是，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幅度，国务院决定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另一条是，希望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要同国务院的部署相适应，严格物价纪律，防止乱涨价，变相涨价，更不允许乘机搭车涨价。第一条是兑现了的，今年国务院从烟酒价格放开以后，至今并没有再采取全国统一的国务院管辖范围内的价格调整。第二条讲了以后，许多地方基本上没有听。为什么没有听，这里头当然有一个是否做到“令行禁止”的政治纪律问题，但还有一个利益关系问题。前面已经说了，地方涨价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企业涨价可以提高企业收入。

现在你去同厂长们接触一下，就会发现几乎厂长们都反对别人涨价，而且情绪很强烈，但谈到本厂生产时，又都表示难以消化各方面的涨价因素，本厂产品非涨价不可。如果大家都是这样一种心态，轮番涨价和最终把涨价因素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趋势就很难避免了。

四是投机性活动的推动。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混乱现象，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投机倒把、层层盘剥、牟取暴利等等非法经营，是物价上涨的又一个因素。这一点很好理解，就不用多作解释了。

五是国际价格变动的影响。这几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很快，成绩很大，必须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就必然要使我国经济生活受到国际经济生活的制约。我国现在进出口总额已达到80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已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0%，其中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的活力和周旋余地，这些年我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较快的持续增长，就包含了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在内。另一方面，往往容易使人们忽视的是，我国经济因为同国际经济联系更密切了，也必然要受到国际经济生活变化的影响，国际价格的变动就必然要影响到国内物价。举例来说，今年以来，我国进口的主要物资，包括粮食、钢材、有色金属、化肥等，国际价格上涨了50%到一倍以上。为了减少国际价格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往往实行国家财政补贴，但补贴增加过多，国家财政负担过重，财政出现赤字，转回来又会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六是我们还不得不主动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不得不主动进行对不合理价格的结构调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中不同类商品之间的比价不合理，同类商品之间的质量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没有拉开，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加工工业产品价格偏高。为了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适当调整和提高初级产品的价格，使物价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就必然会推动

整个物价水平的一定上升。这几年来，结构性物价调整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在整个物价指数的上升中大体上占 20~30% 左右。今年全国大约上升 18~19% 的物价指数中，我们主动进行的结构性价格调整的因素大体上占 6% 左右。

上述的粗略分析说明，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必须进行综合治理，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还要坚持改革，着重解决机制上的问题。为了克服经济过热，抑制需求过旺，必须坚持压缩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的过快增长，同时大力增加和改善有效供给。为了消化生产成本增加而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必须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大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对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必须保护，但对它们的消极利益驱动和短期行为又必须通过机制的完善和制度的健全，加以必要地有效地抑制。这一切都离不开治理和整顿，离不开深化改革。那么，在治理、整顿的条件下，价格改革是否就应该停下来，不再进行了呢？这也不行。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要从调拨产品经济的模式转到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而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比价关系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不合理，关系扭曲，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必然严重阻碍市场的发育，也就谈不到充分地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从根本上讲，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非改革不可，除非不再对过去那种僵化的产品经济模式进行改革，还走过去的老路。应该看到，在过去那种僵化半僵化的经济体制下面，冻结物价，名义上没有通货膨胀，实际上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缺乏生机和活力，人民生活长期很少改善，购买力得不到实现，有钱买不到东西，或者大量地发

票证，经济学家们把这种情况称为“隐形的通货膨胀”。其实，究竟是坚持改革走新路好，还是放弃改革走老路好，人们心理都有一本帐。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0年来，绝大多数城乡人民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明显高于物价上涨的幅度，多数家庭个人财产的占有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吃的、穿的、用的都比十年前好多了。听说现在又有人喊“毛主席万岁”，说什么“宁要物价不涨的过去而不要现在”，说这种话的人显然带有因为对物价上涨不满而发牢骚的性质，尽管我们对群众的这种情绪不能忽视，但对此也不必过于认真，不必看得过重，因为十年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取得的成就是主流，大多数人都从中得到了实惠，真正想回到过去的人毕竟为数不多。现在无非是一个物价上涨过多，一个社会分配不公，一个党政机关和社会上还存在某些腐败现象，因而导致一些人们虽然“端起碗来吃肉”，但“放下碗来还得骂娘”。针对这种情况，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能不能通过十三届三中全会方针的落实，通过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既有效地遏制住通货膨胀，克服混乱现象，又能把包括价格关系在内的各方面的经济关系理顺，使我国的改革和建设走上更加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个任务的确十分艰巨，十分复杂。对此缺乏信心当然不对，盲目乐观也不行，一定要立足于现实，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三) 对目前经济形势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关于这个问题，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应该看到其中既有两种体制转换期间不可避免要产生的现象，也有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

的失误，要采取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这些问题。充分认识两种体制转换期间某些困难和问题之所以产生的不可避免性，当然不是为了把什么问题都推到客观原因上去，无视主观原因和推卸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改革的规律，真正懂得改革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懂得改革必须承担风险和付出一定的代价，更好地掌握改革的规律，更加自觉地坚持和推进改革。从这方面看，我们对改革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是很不够的。我们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十年改革在总体上是成功的，我们决不能也不应该放弃改革。我们要解决两种体制转换期间产生的矛盾、摩擦和漏洞，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持改革，深化改革，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我们又不能忽视了正是由于我们对经济规律、改革规律的认识不够，以及某些问题显露出来以后的见事迟，抓得晚，导致了一些工作上和认识上的失误。如果对这一点认识不足甚至根本不认识，也会产生很大的盲目性，就不可能做到吃一堑长一智，就会忽视从战略上、决策上、方针政策上以及工作安排上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当前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物价上涨过多，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原因，概要来说主要是由于经济过热，投资和消费双膨胀，形成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市场供求矛盾尖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关键是由于地方、部门、企业特别是企业还缺乏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市场发育不健全，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正在建立，还很不健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有体制的许多调控手段有的失灵了，有的削弱了，而新体制的作用还没有能够

充分发挥出来，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还不可能从机制上来控制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无论是投资的膨胀，还是消费的膨胀，以至这两个膨胀带来的社会需求大于社会供给，货币过量发行，导致物价上涨过猛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可能立即从机制上加以解决。相反地，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摩擦和漏洞，恰恰是由于新的运行机制还不健全，旧的运行机制尚未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这样那样的矛盾愈益显现出来。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促进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反过来又为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于是二者相互推动，愈演愈烈。所以，在分析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和混乱现象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在两种体制转换期间产生这些问题的不可避免性。这样的认识，不是为了把我们工作上的失误通通推到机制上，只是要告诉我们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新体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失灵，以至必然产生种种矛盾、摩擦和漏洞，这恰恰是改革时期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过程。人们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认识得越自觉、越深刻，就越能主动地、积极地、自觉地坚持改革，推动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对改革过程中已经发现的措施不配套，制度不健全，法制跟不上，管理监督工作没有及时加强等等问题，必须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适时地加以解决。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也应该坦率地说，从认识上讲，任何人对事物发展的分析，对客观规律的掌握，都不可能一贯正确。认识落后于实践，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如果能够在实践过程当中见事早一点，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那就是很好的了。工作的决策上和具体安排上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现象。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有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暴露的过程，人们对它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前所以出现日益明显的经济过热，投资、消费膨胀带来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日趋严重，这个问题也有一个逐步积累、逐步发展的过程。1984年底的时候，就曾经指出过当时已经出现经济过热，需要解决，那时曾设想不要采取过分硬性的调整措施，而是采取“软着陆”，踏步几年，慢慢地把矛盾缓解下来，不要像过去几次调整时期那样大砍基本建设，大压消费，大减工人，避免引起社会的过大震动。那时也提出过警告，“软着陆”的好处是社会震动可以减轻一些，坏处是人们往往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叫他“软着陆”，他不着陆，不但不踏步，还大干快上，还要起飞，导致问题更加严重。现在看来，这个警告不幸而言中了。实际情况是1985年控制了一下，有了一点“软着陆”的趋势，1986年一些人又叫唤起来，刚采取了一点控制措施，就说资金不够，说这不够那不够，说速度下来了，说生产萎缩了，叫喊的结果，空气加热了，矛盾尖锐起来，1987年情况就更加严重。到1987年底1988年初，提出了“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当时很明确地讲，稳定经济首先要稳定物价，改革要稳一点，经济发展也要稳一点。结果这个方针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这也就是十三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如果1988年初就下决心解决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问题，可能情况比现在要好一点。我们现在来简要回顾一下这段情况，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总之，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时候，特别是分析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都认识

清楚，第一，它是两种体制转换期间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坚持改革的自觉性。两种体制转换的时间过长，对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当然，主观主义地想叫它缩得很短也不可能，转换的速度快慢要从实际出发。改革的方向不能改变，改革不能停滞，具体的步骤和方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第二，在两种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又不能把现在存在的问题统统归结到新旧体制转换中必然产生的矛盾和摩擦上去，而要对我们执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在正确制定改革的步骤方法方面，以至在工作上是否既很积极又很谨慎地处理一切重大经济问题方面，认真地考虑和研究一下，还有哪些不足之处，真正弄清楚某些失误的情况和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认为这两点都很重要，不能忽视。从根本上讲，我们必须积极地促进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但在两种体制转换时期，如果不十分谨慎地实事求是地考虑工作，不认真地对待经济发展战略上的盲目冒进，不充分重视急于求成、经济过热的倾向在各级干部当中依然存在的实际，而是听任其发展下去，这就会严重地干扰改革，尽管你想的是深化改革，要坚持的是不断完善新体制，但导致的却是经济环境恶化，经济秩序混乱，其结果就会是既不利于深化改革，又不利于稳定发展经济。

从前一段走过的路来看，由于有的时候往往对改革带来的好形势看得多一些，而对问题估计不足，因此使这两年的问题越积越多。假如对问题看得及时一点，重一点，措施得力一点，情况会好一些。这与前面讲的十年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是不是矛盾？不矛盾。十年改革的方向正确，取得的成就巨大，这是事实，决不能抹煞，不能不认识，但这并不是说对改革的

每一个具体步骤都可以不去认真考虑它既有积极因素，又往往带来某些消极因素。如果对这一点注意不够，也会隐入盲目性，从而对面临问题的分析研究不深不透，解决的决心不大，措施不力，以致有些问题不断发展，越来越严重。

上面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概括起来说是三句话：第一，从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性质来说，它们是前进中和发展中的问题。这是认识当前形势的基本立足点。第二，从目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程度来讲，情况是严重的，解决它们是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第三，从形成目前这些困难和问题的原因分析，既有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的现象，也有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失误，同时也包括这些困难和问题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人们对它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总之，我们对形势的认识，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二、十三届三中全会方针的落实情况和 对进一步落实中央方针的几点看法

这次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狠抓中央精神的落实，总的来看工作是紧张的，是雷厉风行的。现在已经陆续发了二十多个有关治理整顿的决定、通知、条例和规定，其中包括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清理基建项目、稳定金融、加强物价管理、治理整顿公司、打击投机倒把、禁止请客送礼、强调为政清廉等等。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拥护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方针和措施，反映是好的。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和措施究竟能否真正落实。应该说，尽管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只有两

三个月的时间，但在狠抓落实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 从物价方面来讲，现在涨势过猛的势头开始有所减弱。1988年10月份是全国涨价幅度最高的一个月，从11月份开始，有些城市的物价涨势较之10月份略低一两个百分点。虽然降得不多，但总给了人们以希望，不再是一个劲地猛涨。现在，人们对物价上涨的紧张心理已略有缓和。但是，物价失控的危机尚未过去，如果物价再继续上涨，抢购风潮还随时有发生的可能。

(二) 在稳定金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1988年9月下旬以后，贷款规模得到了控制，9月下旬到10月减少了100多亿元，11月份又有减少；二是城乡居民储蓄由下降开始回升。当然，今年货币过量发行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这个问题还会影响到明年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三) 从清理整顿公司来说，中央和各个地方都做了部署，开始行动起来。中央、国务院直接抓了全国性大公司的清理和整顿。各地进展情况不完全一致，有好点的，也有差点的。以辽宁为例，到现在为止已经撤销了几百个党政机关搞的不该搞的或违法经营的公司。

(四) 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在建项目的清理来说，非生产性的楼堂馆所的清理工作成绩比较大。国务院带头，首先清理了北戴河、兴城的楼堂馆所建设。北戴河、兴城的楼堂馆所建设停了60%，基本上该停建、缓建的都停建、缓建了。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积极清理，总的都有进展，但决心大小不一。截至1988年11月下旬，全国停建缓建项目9880个，可压缩投资317亿元，其中，中央各部门停缓建的项目283项，

压缩投资 17.8 亿元；各地方停建缓建项目 9597 项，压缩投资 299 亿元。在停缓建的项目中，楼堂馆所 1591 项，压缩投资 160 亿元。但有些地方还在强调“你热我不热”，对压缩投资规模特别是对清理在建项目的阻力还不小，任务还很艰巨。

（五）在控制消费基金方面。国务院于 1988 年 10 月初颁布了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将原来的 19 种专项控制商品扩大到 29 种。最近两个月来，社会集团消费的零售额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与去年同月相比，1988 年 9 月份上升 24.20%，10 月份下降到 19.9%，11 月份为 13.1%。其中，专控商品零售额有较明显的下降。为了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国务院规定从 10 月 1 日起，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奖金、补贴等消费基金，一律维护在 8 月份的水平上。但是，总的来看，工资总额过快增长的势头还没有控制住。

（六）从全国范围总的情况来看，目前的市场情况基本上还是好的。全国猪肉库存是充足的，最大的问题是调运问题。今冬明春的猪肉价格水平预计大体上可以维持在现有水平上，不会有过大幅度的上升。北方城市冬季大白菜的生产、贮存情况是好的，可以大体上满足供应。对新年和春节的市场供应，各地都已积极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明年第二季度以后市场和物价会不会发生较大的波动，还要看一看，稳定市场和控制物价的工作难度还相当大。

两个多月实践证明，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已经对稳定经济发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看到，按照三中全会精神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工作，现在

还刚刚开始，明年的任务将更加繁重、更加艰巨。对面临的困难，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的决策，经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我们的经济才能逐步摆脱通货膨胀的困扰，出现一个新的局面。现在，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没有理由悲观。目前，在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当中，担心中央的方针和措施落实不了的情绪还相当普遍和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希望中央、国务院的措施更有力一些，抓得更紧更狠一些，决不要手软，下更大的力量抓出效果来，以便使人们进一步增强信心，这是很自然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央和国务院也正在这样做。在这里，我还想从我们自身的角度讲几句。现在，在许多干部中，甚至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常常有这么一种情况：一说起种种困难和问题来，一说起种种消极腐败现象来，一批评起别人来，一发起牢骚来，激昂慷慨，情绪激烈得可以义愤填膺。但是一说起自身所管的事情究竟搞得怎么样，往往那种激昂慷慨的情绪就相对地减弱了。我觉得，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蔓延开来，相互影响，也会严重影响中央方针的落实。现在老有人说，这样那样的事能不能办好，就看中央能不能做出样子来了！这话当然也对，但恐怕又不完全对，或者说只对了一半。中央决策是否正确，当然是关键，但决策对了，能否落实，固然还要中央动员、组织、检查、督促，但从根本上说，还要靠我们大家的努力，靠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所以说，那种对上下左右、左邻右舍、对别人批评起来慷慨激昂，对自己所管的事情、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做起来不那么积极的精神状态，恐怕也得改变改变。如果大家都不积极动员起来，不从我做起，信心恐怕也很难树立起来。我们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央、国务院，寄

希望于各级领导能够认真地抓出成效来，以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信心；另一方面从我们自身来说，也要自我增强信心，为十三届三中全会正确方针的落实贡献自己应该贡献的一份力量。

为了进一步落实三中全会的方针，我想还要从我们的认识上解决好一些问题，这里再谈几点个人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我认为它决不仅仅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方针，而是在新旧体制转换期间，在整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都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方针只是在明后两年治理整顿中要实施的，我不这样看。当然，它首先要解决的是当前经济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坚决抑制通货膨胀，因此才提出了要突出地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但是，正如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长期要注意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即使明后两年在治理和整顿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逐步确立，仍然是我们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任务。

有的同志担心，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各个方面都要紧缩，会不会又把经济管死了。这种情况在执行中央方针的过程中，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或在某种范围内发生，但决不是中央方针的本意。改革、开放、搞活，是坚定不移的长期的战略方针。我们治理环境也好，整顿秩序也好，都是为了治乱，为了更有利于搞活经济，而绝不是搞死。现在，企业有两种担

心：一是中央已经确定下放给企业的自主权，会不会在治理、整顿中又收回去？我个人理解，企业自主权不但不会收，而且一定要落实到企业，决不允许地方、部门和其他中间环节层层截留；二是认为紧缩银根，企业流动资金会发生困难。对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第一，紧缩银根，压缩贷款和基建规模，主要是把不必要的基建和贷款压下来，把楼堂馆所压下来，把盲目发展的重复的加工工业建设压下来，比如上百条的彩电、电冰箱生产线，已经过多了，贷款不能再给了，乡镇企业建设还要发展，但对盲目发展的那一部分也不能再扶持，不能再扩大贷款了。至于企业正常需要的流动资金，还是会保的。第二，企业如果不加强经营管理，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科技水平，使资金周转大大加快，节约使用资金，将不能适应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的大环境，今后也没有出路，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竞争。现在许多企业粗放经营，资金管理混乱，漏洞很多，这种情况必须努力加以改变。

在这里，我倒想从另一方面提出一种担心，这就是假如明后两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确落实得比较好，在治理环境和整顿秩序方面有了较大的效果，到了那个时候会不会又有人头脑发热，又要大干快上，又要搞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又要盲目扩大贷款，又要过量发行货币？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担心，这是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比较能够自我约束的机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一二年、二三年不可能；四五年、五六年或七八年大体建立就很不不错了。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要建设，又要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人民有这种希望。各级领导干部都想做点好事，今年办十件，明年想办二十件，还要报纸上登，谁不想在任期内做出一

点成绩来呢？这种心理状态人皆有之，可以理解。由于地方、企业利益的驱动，要千方百计地扩大地方、企业的收入，要千方百计地为职工增加工资，发放奖金和实物，这种情况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如果我们不始终在宏观上很好地注意这种趋势，而是总要过热，要高速度，这种积极性是非常容易调动的，现在形势严峻，还有许多人在强调“你热我不热”，如果形势好转，缓解了矛盾，就又可能头脑发热，急于求成。所以，现在非常有必要强调什么时候都要边治理、边整顿、边改革，强调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是长期的方针。

(二) 1989年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把过高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地降下来。这是个大局。最近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再次强调，这个目标已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做得到做不到，是能不能取信于民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工作，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一定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尽可能使物价上涨幅度降低得多一点。这一点做不到，不仅不能取信于民，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问题都很难解决，会给我们整个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要做到这一条就必须釜底抽薪，就必须压缩空气，克服经济过热，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下来，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少发些票子，使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个矛盾得到逐步缓解。

(三) 在治理、整顿中，必须认真搞好经济结构的调整。现在一方面是总的建设规模大了，我国经济在总量平衡上矛盾很大，另一方面经济的许多结构很不合理。从投资结构讲，一方面非生产性建设搞得太多，一方面超过社会需要的许多加工业搞得太多。比如从国外引进组装件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生产线，就搞得太多了。有些原料紧缺的生产建设还在

搞，如小棉纺厂、小纱厂、小毛纺厂等。全国棉花紧张，大工业都吃不饱，小家伙还在大上。所以投资结构必须调整。要保证那些短线的、紧缺的、能缓解能源原材料紧张的真正能够保持经济发展后劲的生产建设能够上去。生产结构要调整。要保证真正增加有效供给。把长线产品抑制住，把不适销对路的产品抑制住，把那些过多地消耗能源、原材料的产品遏制住，保证那些社会急需的、重要农副产品的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紧俏商品的生产，以及经济效益好、能出口创汇的产品的增产。消费结构也要调整。现在我们的消费状况在许多方面是超前了。但消费结构的调整比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生产结构的调整可能更难。这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切实搞好结构调整，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经过一段治理整顿以后，过大的规模是降下来了，但结构还是不合理，结果发生经济滞胀。另一种情况是，在治理整顿了一段以后，稍不注意，过热现象又再次发生，又出现第二次新的通货膨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使整个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企业内部劳动组合、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实行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等方面，一句话，在合理调整整个经济结构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这样，我国整个经济的效益才能提高，才能逐步走上集约经营的轨道，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问题。

（四）必须正确处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治理、整顿同全面深化改革，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整顿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不仅要在坚持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进行，而且从根本上说，只有依靠改革的深化，才能取得应有成效。同时，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促进整治目标的实现。

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第一，积极推进企业改革。重点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真正引进竞争机制，强化企业管理，优化劳动组合，整顿劳动秩序，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上下大功夫，以利于治理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大力整顿流通领域秩序。第二，要进一步搞好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大力减少流通环节和中间盘剥，特别是要严肃整治各种违法经营。认真组织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流通，加强市场的组织和建设，健全市场运行规则，建立市场正常秩序。严格物价管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要管严管住。第三，有步骤地推进那些对治理通货膨胀有重大作用的改革措施。包括积极推行住宅商品化，出售部分国营小企业产权，以及有偿转让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等。无论是整治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还是全面深化改革，都要求把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放到突出的地位上来，这样才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

（五）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同坚持对外开放也是互相促进的。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次治理、整顿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充分利用开放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调剂国内供需，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出口创汇，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治理、整顿中的困难。另一方面，搞好治理、整顿工作，可以为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有利的环境。当前，为了缓解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要少出口一些国内紧俏的商品，同时相应地减少进

口那些不应该进口的东西。要继续执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稳步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一要更多地吸收外商来中国搞独资企业；二要多利用国内现有企业的厂房、设备嫁接国外的资金、技术；三要在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多搞以进养出、两头在外、少用或不用国内紧缺原材料的外向型经济，以增强我国经济的回旋能力。

三、关于总结经验、坚持改革的问题

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是正确分析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产物，也是在总结十年改革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然，由于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由于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需要尽快实现决策上的转折，这次中央全会还没有来得及对十年改革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我们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央的方针，更自觉地执行中央的方针，同时也为了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看来在改革已经搞了十年的时候，回顾一下这十年改革的历程，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总结经验，坚持改革，决不能离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理论概括，已为全党同志以及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所普遍接受。这个理论概括，坚决排除了过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具备商品经济属性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指出了我们要搞的商品经济既具有一般商品经济的属性，又区别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它是以公有制为基

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根据这个概念，我们所要建立的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也就是党的十三大所确认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为此，我们必须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逐步建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必须反对封锁和垄断，提倡公平竞争，逐步建立统一的而不是分割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充分发育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纪律的、行政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逐步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以间接管理为辅的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这些基本的东西，是经过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而得出的。这些基本的东西，大家都是赞同的。但回过头来看，在实践中往往产生某种程度上或偏于这一面，或偏于那一面的倾向。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生活中之所以产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投资与消费失控、社会分配不公以及种种混乱腐败现象等问题，我认为不能不说同改革中在掌握上述基本要领上多多少少存在的偏向有关系。因此，应该对符合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继续认真坚持，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不符合的，就要吸取教训，加以纠正。

其次，总结经验，坚持改革，要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态势有一个正确的估计。有些经济理论界的同志认为，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以“放”为主。通过放权、让利、搞活，打破了国家对企业的禁锢；通过放，冲破了产品经济的模式，把市

场机制引了进来；通过放，把价格放开，不再是全部或基本上由国家定价；通过放，使企业、农民都有了自主权。放的结果也带来了许多我们始料不及的问题。概括来说，通过放，冲破了旧的经济秩序，这是很大的功绩，但还没有使新的秩序相应建立起来，这样就使得经济运行离开了此岸（旧的秩序），但还没到达彼岸（新的秩序），处在新旧体制互相矛盾的状态之中。过去有人认为放开价格就会形成市场，有了市场就会形成公平竞争，但实践中要比这复杂得多。由于旧体制中需求膨胀的问题不可能从机制上得到解决，加上价格改革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进行，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其结果是价格的进一步放开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价格由双轨制过渡到单轨制的时间不得不延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此同时，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也受到了严重的障碍。据以上分析，今后，该放开的还要放开，但不能只依靠放，要从以“放”为主转到以“造”为主，即更多地致力创造新秩序。旧的秩序还要继续破，但不创造新秩序以代替旧秩序，新旧秩序的矛盾和种种混乱就难以避免。以上看法，不论其个别用词或某些概括性的表述是否准确，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改革的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新体制、新秩序，但如果在改革中不注意治理和整顿，就不能离开此岸，达到彼岸，新旧体制转换中必然会产生混乱现象就会使我们的改革受到阻碍，甚至改不下去，遭到失败。对这种危险不能不估计到，所以我们说改革必须与治理整顿结合起来。从这点来说，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解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和认真总结改革经验的重要性。

第三，总结经验，坚持改革，必须更加坚定地、自觉地贯

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的改革也好，建设也好，都不能只从理想的目标模式出发。我们的改革当然要有一个长远的明确的奋斗目标，但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怎样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和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取得改革的胜利，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国情弄清楚，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步骤和方法，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只从理想的模式出发，会带来许多问题。前一个时候，有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主张或宣扬的“通货膨胀无害”、“市场决定一切”、“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就是僵化”、“微观搞活就是一切”、“消费超前有益”等等观点，这些看法多多少少都带有只从理想的目标模式出发的空想成份。如果按照这些看法去做，将对我国的改革和建设造成很大的危害。回顾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几十年，搞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了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经济发展不快，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贫穷落后的状况改变缓慢。因此，必须进行改革，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来解决这一矛盾。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着极大的空想主义的成份，什么都要一大二公，认为所有制越纯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是社会主义等等，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吃了苦头。因此，我联想到在当前的改革中也要防止某种程度的空想主义的成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的来说是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办事的。现在我们当然还不能说，脱离实际的空想成份已经对我们的改革和建设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或者说已成了多么严重的倾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对此引起警惕，防患于未然。因此，通过总结经验，在我们的认识上或实践中，

更加牢固地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原则，无论对中国的改革还是对中国的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立足于以上几点基本认识，下面从总结以验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当然还谈不上解决问题），仅供大家思考和研究。而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对于我们正确地坚持改革和深化改革，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离不开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完全或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当然，我们又决不能因为现在市场活动中出现一点混乱就回到老路上去。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要结合，如何结合？这个问题尚未解决。中央的文件中曾经讲过这样的意思，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形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经济活动的。现在有的同志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以市场为“主体”，认为“主体”论是对计划和市场“结合”论的突破。这个突破对不对，是否意味着对“有计划按比例”的摒弃，这种摒弃是对还是不对？总之，这几年的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以进一步思索的新材料，我们应该通过总结经验，把这个问题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二）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的关系。前一段对微观搞活注意较多，对宏观调控注意不够。宏观调控决不是国家把经济管死，而是国家通过一定的必要的调控手段能够加强整个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资本主义没有宏观调控，经济都难以健康发展，我们更是这样。宏观调控少不得，而前一阶段我们研究不够，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过去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东西完

全加以排斥的情况，这不利于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文件中曾讲过，微观放活的程度和范围，应以宏观调控能力为前提。这个提法是否还正确，还要不要坚持，如果坚持，是否会形成对搞活经济的一种思想禁锢？实践证明，进一步搞清楚加强宏观调控同微观搞活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三) 地方、部门、企业，特别是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问题。改革以来，企业先后实行了扩大自主权，利改税，承包制等办法，对地方实行了财政包干，还有全行业包干等。企业承包、地方财政包干和行业包干，对调动企业、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也形成了一种消极的利益驱动，这种利益驱动往往与国家的、整体的利益是相矛盾的。企业短期行为难以避免，最终对企业发展也是不利的。现在提出了股份制，对这个问题，有两点首先必须明确：第一，我们搞股份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实行私有化；第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没有先例。世界各国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证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私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股份制是行之有效的组织经济活动和财产关系的好形式，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运用，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在中国怎样实行，需要什么样的章程，如何才能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还需要好好地探讨，需要认真进行试点，通过实践进一步总结经验。

(四) 国家资金分配关系的调整 and 保证重点建设的关系。现在国家财政分散，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逐步缩小，现在不到一半，过去所占的比例有时达到 60~70%，甚至 70% 以上。目前每年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共 4000 多亿

元，预算内和预算外大体各占一半，在预算内的 2000 多亿元中，中央财政占的份额也在缩小。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统收统支，又要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有的同志主张中央财政只搞“吃饭财政”，保证发工资、行政费、教育费、国防费等，各种建设都交给地方和企业去搞。中央不搞建设了，这种思路行不行？行不通又怎么办？这既是一个现实的重大经济决策问题，又是一个很深刻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权威离不开经济权威。现在不是往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吗？这恐怕还不仅仅是个纪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利益关系问题。财力过于分散，地方不听中央的怎么办？

(五) 价格双轨制问题。双轨制是在中国条件下，既要逐步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不超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引起过大社会震动，而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采取的过渡办法。它的好处，有了计划价格这一轨可以保证国家的主要经济生活大体上正常地进行；有了放开的市场价格这一轨，对经济的搞活起了重要作用。双轨制在一定时期内还取消不了。在保持双轨制的情况下，宏观的管理监督和调控体系如何加强和改善；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逐步过渡到以市场定价为主，逐步取消双轨制，建立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六) 消费基金的控制问题。企业承包是对的，成功的，效果很显著，但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一种在机制上推动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地方财政包干以后，尽管三令五申，强调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但效果甚微，关键也在于机制。对我国改革造成威胁的，一是投资规模过大，一是消费基金膨胀。投资规模过大相对来说好解决一些，消费增长是个刚性的东西，上去

了下不来，消费失控更难解决。过去虽也三令五申要解决，但效果很差。谁要是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能拿出一套办法来，将是一大功绩。

(七) 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问题。总的说，两者应该是一致的。改革为了发展，为了搞好四化建设，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才有利于促进改革。改革和发展究竟如何相互适应和促进，深化改革和稳定经济怎样才能相互结合，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八) 经济改革与其他改革，以至政治社会环境的改善问题应该怎样联系起来考虑。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是不可能成功的。经济改革、经济建设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也是搞不好的。我觉得当前在舆论上，在对待中国文化上，有一种偏向，好像否定的越多越好，一点都不考虑怎样激励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对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一切，包括好的、坏的都要骂。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一切不管过去怎么样，总应当去改造它、改革它，把我们的国家变成现代化的文明国家，使我们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黄土地、黄土高原，的确有许多可悲的愚昧落后的东西。但归根结底它们是大自然对我们的“赏赐”。更何况，当年在这里产生过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革命圣地，如今比之过去也开始有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许多生产建设的成就，总不能一切都加以抹煞吧！把它们都扔到大海里去，总不行吧，办不到吧！如果否定了一切，大家都灰心丧气，对前途丧失信心，靠谁去实现现代化？现在特别需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和社会环境，即有利于人民心情舒畅，奋发图强，既看到自己的不足，又不失去信心，真正踏踏实实地立足于现实，兢兢业业地工作，面向世界，创造未来。这是我

们不可缺少的精神。

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通过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财产关系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关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作用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总之，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的大前进、大发展。十年改革的丰富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总结经验、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我们必定能够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对我们国家改革和建设的前途是乐观的，是充满希望的。

关于 1988 年经济情况和 1989 年经济工作的通报和答记者问

(1989 年 1 月)

各位记者女士和先生！在 1989 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很高兴借今天的机会，把过去一年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和治理整顿情况，以及国务院关于今年经济工作的安排，向大家作点简要介绍，并回答大家的问题。

1988 年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3853 亿元，比 1987 年增长 11.2%；国民收入达到 1153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4%。全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 28%。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工业增长速度仍高达 17.7%，全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 18.5%。

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三个半月来，治理整顿工作已取得初步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物价上涨过猛的趋势开始略有减缓。去年 8 至 12 月，逐月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为 23.6%；26.4%；27.1%；26.8%；26%。9 月份比 8 月份上升 2.8 个百分点；10 月份比 9 月份上升 0.7 个百分点；11 月比 10 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12 月比 11 月下降 0.8 个百分点，呈现出上涨幅度略有下降的趋势。广大群众对物价上涨仍然很不满意，但紧张心理稍有缓和。

二、储蓄存款逐步回升。去年 8 月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减少 26.14 亿元，9 月份增加 16.97 亿元，10 月份增加 72.18 亿元，11 月份增加 64.5 亿元，12 月份增加 112.38 亿元。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 37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0 多亿元。

三、投资规模有所控制。截止去年 11 月底，全国已停建缓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0200 个，压缩投资 334 亿元。

四、在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社会集团购买力增长幅度开始下降。去年 8 至 11 月的社会集团购买力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28.3%，24.4%，19.9% 和 13.1%。从增长幅度看，9 月比 8 月下降 3.9 个百分点，10 月比 9 月下降 4.5 个百分点，11 月又比 10 月下降 6.8 个百分点。

五、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取得一定成效。截止去年 11 月底，全国查出各种违纪金额 79 亿元，其中应上缴财政的 44 亿元，已经入库 24 亿元。

六、清理整顿公司工作全面展开。在国务院各部门管理的 600 多个公司中，已查出各类违纪违法问题 200 多件，目前正在进行严肃处理。在这 600 多个公司中兼职的党政机关现职干部已有 150 多名辞去一方职务。有 30 多家违法经营的公司由国家工商管理局宣布取缔。各地已经并将继续撤销一批政企不分或违法经营的公司。

附带说一下，各地政府对今年春节市场供应作了认真安排，货源比较充裕。粮、油、肉、蛋等定量商品将保证供应。从南方调入北方的蔬菜将达 6 亿多公斤，比去年增加 20%。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和郊区的日用工业品货源，比去年将增加 10% 到 60% 不等。

治理整顿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经济过热、需求过旺

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1989年要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着重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决把目前过高的增长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初步确定：今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5%，比去年降低3.7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率为8%，比去年降低9.7个百分点；农业增长率为4%，比去年上升1个百分点。

二、运用各种手段抑制通货膨胀，使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去年。

三、进一步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求今年比去年实际达到的规模压缩20%左右。为实现这个目标，规定了9类在建项目先停工再清理。

四、增加对农业投入，争取农业丰收。在财政、金融紧缩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比去年增加14%。地方政府和其他方面也将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总数预计可达几十亿元。农业银行以及信用社系统将增加农业贷款180亿元，比去年增加22%。

五、在压缩投资总规模的同时，今年国家对科技的经费拨款不减少，教育经费将增加50亿元。

六、在压缩需求的同时，大力增加有效供给。积极增产市场适销对路的、人民生活必需的产品。做好副食品的生产与供应，特别是城市的供应。

七、深化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逐步推进企业联合、兼并，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在企业内部优化劳动组合，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企业革新技术，降低成本与消耗，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八、继续发展对外贸易和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进一步发展

外向型经济，鼓励出口创汇。改善投资环境，继续鼓励和吸引外商到中国投资。

(下面是对记者提问的回答)

意大利安莎社记者：请问 1989 年的通货膨胀要比 1988 年低多少？

答：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物价上涨幅度要明显地低于去年。究竟低多少，现在还说不十分精确。比方说，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可不可以降低几个百分点。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工作做好了，这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假如我们要求通货膨胀率降得过多，可能性也不太大，而且，我们过于急切地降低通货膨胀率，要求降得过多过快，可能反而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英国《南华早报》记者：你刚才是不是说为了控制和减少基建规模，所有的在建项目都要停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也包括一些外资企业？

答：我们要求今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比去年压缩 20% 左右。这就要求停建缓建一批在建项目，当然不是所有的在建项目都得停下来。在压缩投资规模的过程中，我们对外资企业将采取保护的政策。在提出治理整顿之后，我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治理整顿不影响我国与外资合作和利用外资；已经和外商签署的合同将严格履行。没有签署的合同和准备新签署的合同要与我们治理整顿的环境相适应，某些项目要作一些调整。新签的合同项目要与我国制定的产业政策相符合。

《科技日报》记者：现在有些学者和专家认为，当前的治理整顿为科学技术的振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有些地方还提出了以科技振兴省、市的发展战略，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答：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真正走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促进科技进步为手段的路子。我们治理整顿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从而使中国经济由浪费资源、浪费劳动力的粗放经营方式逐步转变到集约经营的轨道上来。要实现这个目标，科技的发展很重要。所以，我很赞成刚才这位记者的说法，治理整顿给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我赞成用科技来振兴经济的做法。

越南通讯社记者：中国目前压缩基建项目和优化劳动组合，请问有多少人会因此而失业？如何解决这些失业者的出路？

答：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停止某些基本建设工程，可能会使一部分建筑工人失去工作。现在在中国城市里从事建筑的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对这部分来自农村的建筑人员，我们将尽量地说服他们回到农村去。农村目前在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农业开发的天地很广阔，这些人回去后不存在失业问题。另外一部分来自城市的建筑工人和企业优化劳动组合后多余的工人可能会失去工作。如何安置这一部分人呢？对建筑工人我们将安排一部分人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另外，我们将对一部分人进行技术培训，将来需要时再重新工作。企业里优化劳动组合后多余的工人基本上由企业内部自我消化，如发展第三产业。总的说，中国的失业率不会有过多的增加。借此机会我说一下，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是2%，大概是世界上最低的。今年治理整顿会使失业率可能略有增加，比如增加一两个百分点左右，那也是很低的。即使失业，我们还有社会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不会受影响，但收入会减少一些。因此，我觉得，总的来看，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不会成为中国很大的

社会问题。但是，由于中国职工队伍人数众多，失业工人增加一两个百分点，绝对额就是一两百万人，所以我们也决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英国《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几个月前，你曾经说过，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总额在 1988 年比 1987 年同期增加 24%，这个增长率要高于通货膨胀率。请问，1988 年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是多少？

答：请我们国家统计局的同志来回答你的问题。

章钟基：根据银行的统计资料，1988 年城镇居民工资、奖金和津贴的收入增长了 26.5%，扣除城市物价上涨指数，实际增长是 0.7%。1988 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 520 多元，扣除消费品的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可能还增加 2% 以上。

《中国日报》记者：刚才您谈到了清查的问题。最近，有关清查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的报道有所减少。不少人担心清查工作会走过场，对此你有何评价？国务院对清查工作是否满意？

答：对政府机构里某些人违法乱纪的腐败现象，国务院的态度非常明朗。有什么问题都要清查，而且，要认真处理。现在，清查工作有进展，但是，还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希望清查工作有更大的进展，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另外，我要补充一句，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毕竟是少数，而不是主流。

南斯拉夫《劳动报》记者：1988 年的货币发行量是否超过了原计划？如果超过了原计划，具体数字是多少？今年的货币发行量是多少？

答：1988 年的货币发行量是超过了我们原来的计划，而

且，超过的量还不小。由于需求过旺，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货币发行量过多，这正是我们现在通货膨胀比较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今年在治理整顿中要进一步控制货币的发行。今年货币发行量要比较大幅度地少于去年。

香港《文汇报》记者：根据以往的经验，有人担心，经济收紧的状况会同时波及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最近领导层有人指出，对一些问题不适合进行公开讨论。请问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吗？您对此怎样看？

答：我们之所以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集中的表现就是明显的通货膨胀。治理整顿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这和政治、思想领域的问题没有关系，不存在经济调整要紧缩，政治思想领域也要收紧的情况。至于说到报刊上有些问题可不可以讨论，这不是现在的问题，过去就有。例如，在中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心的问题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已经载入我国的宪法，并为全国人民所公认和拥护，当然就不需要在报刊上进行什么公开讨论了。我再补充一句，在政治思想领域，我们的目标一直是创造一个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气氛。在治理整顿经济的过程中，更需要这样的气氛，而不是相反。

《农民日报》记者：去年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可是，农村却面临着资金短缺。许多地方农副产品的收购只能打“欠条”，乡镇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通货膨胀与农村的资金短缺是矛盾的，您对此怎么看？

答：1988年农副产品收购中打“欠条”的现象确实存在。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盲目扩大建设规模，挪用了银行本来用于

支付农副产品收购的那部分资金，因此造成了收购副产品的资金短缺。因为基建项目太多，规模太大，需求膨胀，导致了通货膨胀。因此，通货膨胀和农产品收购一度出现资金短缺的现象，与其说是相矛盾的，不如说是一种因果关系。这个问题在许多地方现在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银行已采取了措施，农民手中的“欠条”都可以到银行兑现。在少数的地方，这种现象可能还存在，问题尚未得到全部解决。

日本共同社记者：现在中国一些企业非常急于得到外汇。例如外资企业服务公司要求付外汇。为什么他们都希望得到外币？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要贬值？

答：人民币和外汇的汇率现在没有变动的计划，目前不变动。至于说外资企业服务公司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外方以外汇来支付中国雇员的工资。这是未经请示主管部门，擅自作出的错误决定，现已经予以撤销。不能这样做。

苏联《消息报》记者：1988年11月起，中国实施破产法。您可否介绍一下中国目前企业破产情况，《破产法》是否有效？执行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答：《破产法》正在进行试点。实行破产法的目的是为了处理那些经营情况不好的企业，不是为了促进更多的企业破产。我们处理这类问题也是为了贯彻优胜劣汰的原则，促进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但是，由于我们以前并没有这样做过，企业的一些干部在观念上对此法的执行还不太适应。这也是我们实施《破产法》的主要困难。至于实际实施此法后，如工人的处理、资产的处理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只是人们在观念上还跟不上《破产法》的实施。为了稳妥，《破产法》正在进行试点，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行。

中央电视台记者：部分群众对物价上涨幅度的实际感受往往与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不一致。您对此如何看？

答：我们国家统计局关于物价指数的统计，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统计方法。调查统计的范围包括全国 150 个城市，203 个县城，1.4 万个商店和集市，从中取得 300 多种代表性商品的 1000 多个规格的价格，大体上是每月采取样价 6 至 8 次，然后把大量的数据汇集到国家统计局，经过计算机复杂的运算，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这种统计方法是世界通用的，是科学的，大体符合实际的。为什么群众的实际感受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常常不一致呢？这是因为我们消费者不可能每日每时地消费统计局统计的那几百种商品，而只是消费其中的若干种，例如肉、禽、蛋、蔬菜、日常用品等等。而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要比几百种商品加权平均的物价上涨指数要高，因此，群众会产生这种感觉。我认为，群众的感受是符合情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正在考虑选择几十种群众日常消费的商品加以统计，然后计算出职工的消费指数。这个工作正在做，成熟了以后将在报纸上经常公布，从而解决这个矛盾。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我列举几个数字。如蔬菜，去年的上涨幅度是 34.9%，肉禽蛋的上涨幅度是 38.1%，水产品的上涨幅度是 30.7%，这些都高于全国总的零售物价上涨指数 18.5%。这些又是群众经常消费的商品，因此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实际感受同统计局的统计有差别，这也是很自然的。

美国之音记者：刚才你提到产权问题，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政府是否准备这么做？

答：关于中国企业产权的问题，或者说所有制的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看法：1. 中国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点不会变。中国不搞私有化。2. 中国的企业将普遍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认真地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3. 中国的国有企业将进行股份制的试点，以进一步解决明确产权关系的问题。但这种试点有个原则，即股份制不是搞私有化。我们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解决的是明确产权关系的问题而不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补充一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所有制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 10 年改革中已探索了一些道路，但还需要继续探索以寻求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学术界、理论家们会提出许多各种各样的意见，有相同意见，也有不同意见，甚至完全对立的意见，我们鼓励这种探索。

新华社记者：你在去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紧缩政策将不影响已经签约的合资企业项目和进出口合同。但是，从前一段情况来看部分合资企业项目因为中国支付不起已保证了的资金而毁约，部分进出口合同被取消。请你解释一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政府对这种情况持何态度？今年的外汇储备和外汇收支平衡情况如何？

答：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外汇结存是 180 多亿美元，其中包括现汇结存和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两方面。在治理整顿中，我们要继续履行与外商的合约，这是我们始终要坚持的政策。另外，我们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个我们已多次讲过。但在执行过程中，总会发生少数的个别的与政策不相符合的事例。我想，这种现象任何时候都会有。遇到这种问题，凡是中方主动毁约而又不对的，如有正当理由是另一回

事，我们要予以纠正。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总的数字，去年全年包括9月份提出整顿之后，全国总的利用外资是88亿多美元，比1987年增加16.2%。此外，在提出治理整顿之后的3个月，利用外资仍比前年同期有所增加。这说明从总体上看，中国政府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仍在认真执行当中。现在，利用外资还在呈增加的趋势。

总结经验 坚持改革

(1989年1月)

1988年的结束，1989年的到来，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了。

十年改革，为国民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了中国的大发展、大前进。这是我们党的结论，也是人民的亲身感受。

十年改革，不仅在于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它结束了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必将为我们带来新的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党的期望，也是人民的期望。

要把党和人民的期望变成现实，关键在于坚持改革，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我们一定要善于总结经验，保证今后的改革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

总结经验，坚持改革，决不能离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我们党经过对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

结，做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概括。

这个理论概括，已为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以及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所普遍认识和接受，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根据。

这个理论概括，第一，它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商品经济的本质属性，排除了过去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二，它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虽然都同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但两者之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从而排除了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完全等同起来的错误观念。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和在总体上有计划发展的商品经济，而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和在总体上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

根据这一理论认识，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能够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

为此我们必须努力做到：

——坚定不移地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最佳实现形式，逐步建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

——反对封锁和垄断，提倡公平竞争，逐步建立起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统一的而不是分割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充分发育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

治工作的手段，积极进行治理和整顿，逐步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以间接管理为辅的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

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实现的这些要求是构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基本框架：在合理的企业机制下运行的现代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载体；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可缺少的条件；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是社会商品经济活而不乱的基本保障。

十年来的改革，总的来看正是按照上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向前发展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十年改革中也有过在某种程度上从这一面或那一面偏离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情形。当前出现的经济过热、投资和消费失控、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上涨过多、社会分配不公以及其他种种混乱现象，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又不能不说同改革中的这种情形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也就不能不提醒我们：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凡是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凡是不符合的，就要吸取教训，切实纠正，以保证改革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二

总结经验，坚持改革，需要对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态势有一个正确的估计，进一步处理好破和立的关系。

十年来的改革，基本上是以“破”为主，冲破了旧体制旧秩序，这是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但新体制新秩序尚未建立健全起来，经济运行离开了此岸（旧体制旧秩序），但尚未达到彼岸（新体制新秩序）。这种状况，历史地、客观地决定了我

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相互对峙、相互胶着、相互渗透的转换时期，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新旧体制、新旧观念的撞击和磨擦。这种撞击和磨擦，有时相当剧烈；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有时相当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根本的出路只能是：坚持改革，深化改革，促进旧体制进一步向新体制转化，否则，是没有出路的。在时机成熟和条件具备的时候，不积极推进全面配套改革，不加快促进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就会犯丧失时机的历史性错误；在时机不成熟或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不着重于努力创造条件，却是全面出击，或是单项突进，都会欲速不达，犯求成过急的错误。

就过去十年改革的总体进程来看，我们还不能说存在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全局性的大的失误。但是，仔细考察起来，无论从上述两方面的哪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是不是也都有一定程度的不足之处，有着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里，对于今后的改革来说，有一点恐怕是应当明确起来的。这就是，今后的改革，要从过去的以破为主，以放权、让利、搞活为特征，逐步转到破立结合、以立为主，以边改革、边治理、边整顿为特征的轨道上来。只破不立，只放活不整治，它将不利于新体制新秩序的逐步建立。

因此，我个人认为，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当然首先针对的是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以通货膨胀为其集中表现的严重问题和困难，但它又决不仅仅是一个只着眼于克服当前困难的短期方针，而是一个在整个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即新旧体制转换的历史过程中都要认真贯彻执行长期方针。只有在坚持改革中

随时注意和抓紧治理、整顿，为改革的不断深化创造较好的环境和条件，同时又不忘记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新体制新秩序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经济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轨道。

三

总结经济，坚持改革，还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决剔除只从理想的模式出发的空想主义成分。这可能是更带根本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前个时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出现过的“通货膨胀无害”、“消费超前有益”、“市场决定一切”、“微观搞活就是一切”、“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就是僵化”等等这类主张或观点，都不能不说多多少少都同带有某种程度的只从理想的模式出发、而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空想成分有关。

毫无疑问，如果按照这样的主张和观点去做，它们给中国改革和建设带来的严重危害是可以想见的。

由此我想到了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曾经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很大挫折的许多错误观点，诸如社会主义所有制越纯粹越好，越大越公越好，越穷越要过渡等等，不也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带有极大的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空想主义成分吗？！

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情况决不能同这以前的情况相类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从总的方面看都是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

则办事的。当然现在我们不能说只从理想模式出发的某种程度的空想成分已经对我国的改革和建设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危害，或者说已经成了多么严重的倾向性问题，但对此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可能也是很有必要的。

四

立足于以上几点基本认识，我觉得通过总结十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当前有一些问题特别需要我们在思想上进一步提高认识和统一认识。限于篇幅也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这里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离不开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完全或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当然，我们又决不能因为现在市场活动中出现一点混乱就回到老路上去。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要结合，如何结合？这个问题尚未解决。过去大家曾经确认过，中央的文件中也曾经讲过这样的意思，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形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经济活动的。现在有的同志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以市场为“主体”，认为“主体”论是对计划和市场“结合”论的突破。这个突破对不对，是否意味着对“有计划按比例”的摒弃，这种摒弃是对还是不对？总之，这几年的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以进一步思索的新材料，我们应该通过总结经济，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二）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的关系 前一段对微观搞活注

意较多，对宏观调控注意不够。宏观调控决不是国家把经济管死，而是国家通过一定的必要的调控手段能够加强整个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强符合整体利益的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资本主义没有宏观调控，经济都难以健康发展，我们更是这样。宏观调控少不得，而前一阶段我们研究不够，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过去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东西完全加以排斥的情况，这不利于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党中央关于论述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文件中曾经讲过，微观放活的程度和范围，应以宏观调控能力为前提，两者应该相互适应，相互配合。这个提法是否还正确，还要不要坚持，如果坚持，是否会形成对搞活经济的一种思想禁锢？实践证明，进一步搞清楚加强宏观调控同微观搞活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三）地方、部门、企业，特别是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问题 改革以来，企业先后实行了扩大自主权，利改税，承包制等办法，对地方实行了财政包干，还有全行业包干等。企业承包、地方财政包干和行业包干，对调动企业、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也形成了一种消极的利益驱动，这种利益驱动往往与国家的、整体的利益是相矛盾的。企业短期行为难以避免，最终对企业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现在提出了股份制，对这个问题，有两点首先必须明确：第一，我们搞股份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实行私有化；第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没有先例。世界各国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证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私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股份制是行之有效的组织经济活动和财产关系的形式，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运用，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在中国怎样实行，需要什么样的章程，如

何才能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还需要好好地探讨，需要认真进行试点，通过实践进一步总结经验。

(四) 国家资金分配关系的调整 and 保证重点建设的关系

现在国家财政分散，国家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逐步缩小。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现在占不到一半，过去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有时占到 60%~70% 甚至 70% 以上。目前每年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共 4000 多亿元，预算内和预算外大体各占一半，在预算内的 2000 多亿元中，中央财政占的份额也在缩小。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统收统支，又要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有的同志主张中央财政只搞“吃饭财政”，保证发工资、行政费、教育费、国防费等，各种建设都交给地方和企业去搞，中央不要再搞建设了，这种思路行不行？行不通又怎么办？这既是一个现实的重大经济决策问题，又是一个很深刻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权威离不开经济权威。现在不是往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吗？恐怕这不仅仅是个纪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利益关系问题。财力过于分散，尾大不掉，地方完全不听中央的怎么办？

(五) 价格双轨制问题 双轨制是在中国条件下，既要逐步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不超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引起过大社会震动，而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采取的过渡办法。它的好处，有了计划价格这一轨，可以保证国家的主要经济生活大体上正常有序地进行；有了放开的市场价格这一轨，对经济的搞活起了重要的作用。双轨制在一定时期内还取消不了。在保持双轨制的情况下，宏观的管理监督和调控体系如何加强和改善；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逐步过渡到以市场定价为主，

逐步取消双轨制，建立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六) 消费基金的控制问题 企业承包是对的，成功的，效果很显著，但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一种在机制上推动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地方财政包干以后，尽管三令五申，强调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但效果甚微，关键也在于机制。对我国改革造成威胁的，一是投资规模过大，一是消费基金膨胀。投资规模过大相对来说好解决一些，消费增长是个刚性的东西，上去了下不来，消费失控更难解决。过去虽也三令五申要解决，但效果很差。谁要是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能拿出一套办法来，将是一大功绩。消费基金膨胀，一个是难以解决，一个是危险性比投资失控还大。从东欧几个国家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南斯拉夫，还是波兰、匈牙利，他们改革受到挫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改革开始时，生活提高很快，一个是消费超前，一个是投资超前。后来投资超前不了了，消费还继续超前。最后消费超前也维持不下去了，结果经济萎缩了，改革也难以进行。我们如果不注意，也可能重复走他们走过的路。

(七) 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问题 总的来说，两者应该是一致的。改革为了发展，为了搞好四化建设，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才有利于促进改革。改革和发展究竟如何相互适应和促进，深化改革和稳定经济怎样才能相互结合，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八) 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以至政治社会环境的改善问题应该怎样联系起来考虑 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最终是不可能成功的。经济改革、经济建设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

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也是搞不好的。我觉得当前在舆论上，在对待中国文化上，有一种偏向，好像否定的越多越好，一点都不考虑怎样激励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对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一切包括好的、坏的都要骂。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的一切不管过去怎样，总应当去改造它、改革它，把我们的国家变成现代化的先进的文明国家，使我们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黄土地、黄土高原，的确有许多可悲的愚昧落后的东西，但归根结底它们是大自然对我们的“赏赐”。更何况，当年在这里产生过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革命圣地，如今比之过去也开始有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许多生产建设的成就，总不能一切都加以抹煞吧！把它们都扔到大海里去，不行吧，办不到吧！如果否定了一切，大家都灰心丧气，对前途丧失信心，靠谁去实现现代化？现在特别需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和社会环境，既有利于人民心情舒畅，奋发图强，既看到自己的不足，又不失去信心，真正踏踏实实地立足于现实，兢兢业业地工作，面对世界，创造未来。这是我们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除了以上这些问题，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通过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比如，关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财产关系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关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作用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总之，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的大前进、大发展。十年改革的丰富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总结经验、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我们必定能够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国家改革和建设的前途是光明的，希望就在我们的前头。

一心一意治理整顿

(1989年3月)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正在集中力量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1989和1990两年建设和改革的重点是治理整顿。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主题和基调就是一心一意治理整顿。下面，我就围绕着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问题，分成几个部分来讲一讲。

一、如何估价半年来的治理整顿工作

概括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基本估价有两点：第一，治理整顿取得了初步成效；第二，已经取得的成效确实仅仅是初步的。距离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的任务还相当繁重，相当艰巨，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国务院多次议论治理整顿问题，基本的看法就是上述两点。

作出上述的基本估价，有什么根据呢？

首先，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到1989年2月底为止，全国已经压缩1.8万多个投资项目，可压缩今后几年的投资647亿元。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容易的，但距离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还差一半，甚

至差得还多一些。国务院要求 1989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 1988 年压缩 920 亿元，减少 21%；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压缩 500 亿元，减少 19%。现在已压缩的项目和投资规模，1989 年就能见效的，还不到要求的一半。因此，任务还很艰巨。而且，还要看到，前一段压缩的很多投资项目还是计划中的纸面上的。现在要进一步压缩，必须把在建项目真正砍一批下来，这就要伤筋动骨，可能遇到的阻力会更大。

第二，在控制消费基金方面，首先在控制集团消费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1988 年县以上单位（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集团消费是 280 亿元，实际金额比上年增长 1.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87 年压缩了 16%。中央要求压缩 20%，任务没有完成。在压缩消费基金方面，除了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还需作进一步的努力外，职工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仍然表现出继续膨胀的趋势。今年以来，情况仍然如此。国务院正在研究控制消费资金的办法，有的措施已经实施了，比如进一步完善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文件就已经下达了，但怎么样更好地全面控制消费基金尚未找到好的办法。企业、公司和各种事业单位五花八门的“灰色收入”基本上还处于失控状态。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我们经济生活中的问题集中表现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需求过旺、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双膨胀。现在主要用行政的办法，再加上若干经济手段，来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见效的。而消费基金的控制难度却很大。目前，消费超前，消费欲望过高，消费基金增长超过国民

收入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这样一种状况，已经形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相当严重的威胁。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转化为更加尖锐的矛盾。一些国内外学者和一些外国朋友，对我们国家有这样一句评语，说中国是“贫穷的国家，挥霍的社会”。这个批评意见很尖锐，也很中肯，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严重警惕。

第三，关于稳定金融。当前的金融形势仍然相当严重，但1988年10月以后开始有了一些好转：1. 滥发贷款、信贷失控的状况初步得到控制。1988年计划全社会信贷规模为1600亿元，这个数字还是控制住了，基本上没有突破。2.!! 1988年8月以后一度储蓄严重滑坡的现象，由于采用了提高利率和保值储蓄等措施，基本上得到制止。城乡居民储蓄逐步回升。1988年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达到3789亿元，比1987年增长724亿元。1989年以来，2月份又有所回升。到2月底，城乡储蓄余额达到4000多亿元，比年初增加200多亿元。但是，在这种好的情况下面也出现了新的问题：1. 企业存款下降；2. 资金在银行体外循环日趋严重。原来个体工商户中使用现金交易比较普遍，现在国营和集体单位也开始采取这种办法。听说有用大卡车运钞票去买货的，当然这可能是很典型的例子。现在社会上已经出现这样一种风气或情况，不通过银行划拨、汇兑或用支票支付，而用现金作买卖，价钱上可以优惠得多。出现这种情况无非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银行支付不是很便当，或者说银行信誉有所下降；一个是直接通过现金交易，更便于一些单位和个人倒买倒卖，贪污受贿，从中牟利。

因此，在金融形势方面由于采取了紧缩的方针，采取了提高利率、保值储蓄等措施，贷款得到了控制，储蓄开始回升，

但也出现了两个似乎相矛盾的现象：一是，全国货币过量发行的趋势还未控制住，今年以来货币净投放的数额还相当大；二是，不少地方和企业呼声强烈，感到资金紧缺，特别是有些需要保的企业发生了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治理整顿中碰到的新情况。

第四，1988年开展的全国性的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到现在为止，据统计，全国已查明各种应上缴财政的违纪金额74亿元，已入库上交财政56亿元。这对弥补1988年的财政赤字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1988年财政赤字，基本上可以维持原定的计划。通过这次检查，拿回了一部分跑冒滴漏的违纪金额，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在这同时，还查处了一大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监守自盗等种种非法行为，对抑制经济秩序混乱和违法乱纪现象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不能对此作过高估计，只能说起了使违法行为有所收敛的作用。

第五，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清理整顿各类公司，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从1988年9月以来，清理整顿公司大概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全国停止审批新的公司，刹住了盲目组建公司的势头。
2. 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搞公司，在职党政干部和离退休干部兼职经商的现象，已经基本上得到制止。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很坚决，最近又专门发出文件要求3月底前全部解决。这项工作的进展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在官商不分的公司中，大体上已有80%左右，或者被撤并，或者已经同党政机关脱钩。兼职经商的党政干部，已有70%以上辞掉了一

方的工作。中央明确要求3月底以前解决问题，这是不能含糊的，预计到3月底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3. 结合工商企业重新登记的年度检查，对所有公司进行了经营资格、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的重新审查。通过审查，现在已撤消了1.7万多家不该办或没有条件办的公司。这当然做得还不够，看来需要撤消的公司还远不止这个数字，但总的说清理整顿工作还是有成绩的。

4. 查出了一大批违法乱纪案件，其中一批是大案要案。其中也有一批，已经得到处理，报纸上也登了一批，但总的来看，还是案子抓了不少，但有一些案子往往处理时就没有下文。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纠正，否则人民就会失望，党中央、国务院的威信也会受到严重损害。现在，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期望值很高，大家翘首相望，等待着看对那些大公司的清理整顿结果。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国务院已经下了决心，对全国人民关心的大公司的清理整顿结果，都要公诸于众，接受群众的评议和监督。而且要求各省、各地都要这样做，不能把清理整顿的结果不公开，这样才能防止走过场。现在讲“两公开一监督”，在清理整顿公司的问题上就要执行这个制度。要把清理整顿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让群众都知道，接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

在流通领域，还对许多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粮食、棉花、汽车、钢材、彩电、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等，有的加强了计划管理，有的加强了市场管理，有的实行了专营。分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于这样做的结果，各地反映不一。特别是对专营，有的同志认为实行专营，流通渠道容易堵死，生产、销售和使用单位都会感到不方便，

甚至会出现专营单位凭借垄断地位来牟取私利。应该说这些现象现在都有，将来还会有。但是，针对前一段时间流通领域那样严重的混乱局面，若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的情况将更严重。反正做什么事情都只能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反映专营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动摇，只能因势利导，边贯彻执行边解决执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不能动摇既定的政策。譬如，专营单位利用垄断地位不为群众着想，不为生产着想，专门违法乱纪，非法牟取私利，随时发现就随时解决。确实也有些渠道因为实行专营而搞得不流畅了，比如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不及时，结果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就应当想办法疏通渠道。但是，我们整顿流通秩序的方针不能动摇。应该说，从宏观上看，经过整顿，前一段时间相当泛滥的、在各地都出现的抬价抢购、非法倒买倒卖的行为已有所收敛，这对建立市场秩序和稳定物价起了积极的作用。

现在，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估计：经过半年来的治理整顿，第一，经济过热开始降温。今年一二月份，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已降到8%。总的看，这是正常的，是好事。但是，在发展速度下降的同时，结构失衡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恶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坚定不移地降温，进一步克服经济过热造成的恶果，这一点决不能动摇。与此同时，必须抓紧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国营工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速度降得过快，而集体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速度仍然居高不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应保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的。国营工业下降得这么猛，恰恰使某些支柱产业和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而生产不去，国家财政收入相应地受到严重影响，这对我们整个经济

的全局是不利的。第二，物价上涨势头有所减弱，物价还在涨，但涨势已不像去年10月份以前那样猛，而是稍稍趋于缓和，因此，群众对物价上涨的紧张心理也有所缓和。现在，有少数地方还不时地发生一些小规模单品种的抢购，大范围的抢购尚未发现，但这种危机并未完全渡过。所以，我们也不能对目前出现的缓和趋势估计过高。总起来讲，从全国范围来看，物价上涨出现了稍趋缓和的势头，但还很不稳固。第三，城乡市场基本上是稳定的。今年元旦和春节市场供应比较充分，商品比较丰富，广大群众基本上是满意的。所以说，经济形势总的来看，应该认为经过治理整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但转化的程度和效果还不理想，还不巩固。

我觉得，充分认识经过半年治理整顿所取得的初步成效，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广泛的正确的宣传，使我们对坚持治理整顿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1988年9月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时，从要闯物价改革关转到强调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当时广大的党员和干部群众都松了一口气，觉得中央这个决策很及时，很正确，但又普遍担心这个决策能否真正得到落实，就怕做不到。现在看来，半年来治理整顿的实践告诉我们，目前已取得的初步成效表明，只要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去做，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从总体上看，已经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有些成效还不巩固，有的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又带来新的矛盾和困难，距离治理整顿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别的，而只能说明一点，这就是坚持治理整顿的方针决不能动摇，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虚情假意，不能半途而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种选择，这就是在进一步

执行治理整顿方针的过程中，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得治理整顿的方针政策能够坚决地、认真地、全面地贯彻下去。

二、关于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

十三届三中全会对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已经作了原则性的表述，各个方面都讲到了。治理经济环境应治理哪些？整顿经济秩序包括哪些内容？这些都讲到了。治理整顿要首先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坚决遏制明显的通货膨胀。198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根据国务院多次研究的意见，根据十三届三中全会方针和半年来的实践经验与初步成效，把所要达到的治理整顿目标又进一步具体为以下六条。这里根据个人的理解，逐条作简要的解释。

（一）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

我们前段时间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于经济过热，急于求成。国务院明确提出，消除经济过热，普遍压缩空气，把发展速度降到合理水平，应是治理整顿的首要目标。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才叫比较合理的水平。到本世纪末即200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个目标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其间经过中央几次重要会议至十三大，直到现在，这个目标都没有变。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如果分成两个阶段来说的话，即前10年翻一番，后10年再翻一番，那么，前10年翻一番的目标已经提前两年实现了，即在1988年就实现了。从现在算起，即从1989年到2000年的12年内，如果再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任务，

大体上要求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左右即可达到。现在看来，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已经是相当宏伟的事业了。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全党全国再也不必要提出比翻两番更高的总的目标要求了。这也就是说，在今后的12年内，我们只要保持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了。当然，要求翻得更多一些，发展速度更快一些，憋足了劲干，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以此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不但必将欲速而不达，而且必然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目前困扰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总量不平衡，结构失调，经济效益不高，资源不能优化配置，地区经济布局不够合理，各方面妨碍经济效益提高的种种问题很多，矛盾很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一味地盲目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和高速度，必然使各方面的矛盾更加尖锐。各地盲目发展加工工业的势头就不仅控制不住，而且还会恶性发展；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将更加难以改变；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这些方面的全面紧张状况，也将更加难以缓解。这一切，已为历史的实践反复证明。如果再不把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建设思想从根本上加以消除，讲调整，讲治理，都是空话。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就没有出路。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就可能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是历史的经验总结，是已经被反复证明了的不可违反的经济发展规律。现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过热。当然，我们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也要认真注意防止出现经济滞胀，但现在的工作重点还是消除经济过热，首先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这一点必须明确起来。

(二) 坚决遏制通货膨胀，使 1989 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 1988 年，1990 年以后的上涨幅度进一步降低

现在各地反映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很大。应该说，这方面的工作难度确实很大。但是，这个目标决不能动摇。动摇以后，就会失信于民，我们以后的事就更难办了。在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要恢复到过去那种冻结物价的老路上去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国民经济也搞不活。今后还会有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中国如果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国家、企业和群众都会承受不了，这在国内外经济理论界的看法也是基本上一致的，同时已经为实践所证明。那么，在我国，把通货膨胀大体控制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才比较合适呢？这显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和实践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可能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5% 左右比较适当，老百姓能够承受，国家和企业也可以承受，社会会比较稳定，各方面的情况都会比较好。当然，要把目前已经超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降到这样的水平上，还需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不是一两年或两三年内就能够做到的。在前不久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逼着问我，中国政府要求 1989 年的物价上涨幅度要明显低于 1988 年，这个“明显低于”究竟是降低多少？我根据自己对中央精神的理解回答说：“譬如说，下降 3 到 5 个百分点，如果工作做得好，是有可能的。”我还说：“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要求物价上涨幅度陡然下降过多，也是不现实的，而且是做不到的，对经济的发展也未必有利。”我的这个回答，首先是以“譬如”的口气举例而言，不是讲的硬指标，并且强调了只有工作做得好才有可能做到，强调了要求下降过多也难以做到。现在看来，这个回

答还是实事求是的。控制物价上涨，的确难度很大。但是，如果决心动摇，连下降3个百分点左右都做不到，那就很难说明显降低了。当然，要求降幅再大，可能性不大，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可能。这是因为，物价不是人们想叫它下降就能下降的，它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比如，1988年物价涨上去了，它要翘尾巴翘到1989年；1989年还有某些物价调整非出台不可；例如1989年已经宣布粮食收购要调价，棉花收购要调价；还有一些已经放开的商品由于成本推动的因素、各种比价关系变动的因素，价格也不可能完全管死。所以，经过各方面的综合测算，1989年大体上能够做到使物价下降3个百分点，就很不错了。今后，即进入1990年以后，经济环境一步步治理得再好一点，经济秩序整顿得再好一点，缓和了结构失调、总量失衡的矛盾，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下降是有可能的。

(三) 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其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坚决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其同国民收入的增长相适应

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材料，现在全国在建的5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0多万个，投资总规模达到13000多亿元，也就是说已经相当于我们整整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如何承受得了?!按这个规模测算，即使从今以后一个新项目也不上，完成现有的全部在建项目还需要5年到6年的时间。实际上，今后一个新项目都不上是是不可能的，该上的新项目还得上。这些年来，许多外国朋友来中国参观，得到的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中国好像全国是一座大工地。各地来北京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北京的高楼大厦盖得确实不少。到各地省会城市去看看，哪一个省会现在不是大大

地改变了面貌；到中等城市去看看，哪里不是大兴土木；到小城市去看看，哪里不在盖房子。农村这些年普遍在盖新房子，总共已盖了好几十亿平方米。有的县城把马路扩建得和天安门广场的马路差不多宽，当然这可能是个别的，但这种现象确实有。现在有些地方借发展旅游为名，普遍搞宾馆升级。高级的旅游宾馆当然应该搞一点，但现在搞得太多了。现在差不多的县里面都有一个相当高级的宾馆，现代化家具，高档的盥洗设备，冷热风，每个房间都有大屏幕的彩色电视，一应俱全。现在我们有些电影电视镜头里所表现的家庭设施和日常生活水平的情景，几乎已经同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别，真是“错把中国当成美国”了。当然，它们选拍的是典型，绝大多数家庭达不到那种水平。总之，盲目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消费超前，这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各个方面都表现了出来，使国家的经济实力无法承受。消费基金从1984年开始过度膨胀，1985年想控制但未控制住。这几年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连年超过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这种状况不坚决加以改变，肯定是难以为继的。

（四）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

前一段时间，确实有人曾经认为，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要努力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基本平衡，这并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而是在主观上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框框，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框框，要加以突破。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反复证明，这是突破不得的。现在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缺口较大，外汇基本上还能平衡，但也比较紧张，可以回旋的余地不大。这种状况，严重制

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已成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的重要动因。现在我们的商品可供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一般估计有600—700亿元的差额，这种状况很难维持下去。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如果长期地严重不平衡，国民经济的发展肯定会失控。这个基本经济规律是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的。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一定要努力实现这四大基本平衡。这是不能改变的，改变了就要吃苦头。国务院已经确定，在财政收支的问题上，从1989年开始一定要逐步减少赤字。这个方针已经定了下来而且十分强调今后在指导思想上决不能靠打赤字财政来弥补建设资金的需要。我国这些年来连年出现财政赤字，累计起来已有五六百亿元之多。这就需要经过连续多年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五) 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

应该看到，经过1988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全党全国对农业的基础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全国各地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去冬今春以来，农业战线出现了比过去要好一些的形势。这大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去冬今春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农业的重视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其二，各地都相应地加强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对农业的资金、物资和科技等各个方面的投入普遍有了增加；其三，去冬今春以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规模扩大了，质量提高了，是最近五六年来搞得较好的一年；其四，夏粮播种面积扩大了，大概扩大了六七百万亩左右。前个时候，因为棉花收购价格偏低，比价不合理，种棉花需要的化肥、农药等的供应跟不上等等原

因，有些地方感到种棉吃亏，出现了棉田面积缩小的趋势。最近，因为中央决定调整棉花收购价格的信息已经传了出去，再加上各地也做了许多工作，农民的种棉积极性正在回升，估计还不会出现棉田的大面积缩小。如果棉花进一步减产，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将会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现在全国棉纺厂普遍吃不饱，原料供应十分紧张，这是一个大问题。据农业部估计，目前虽然有些地方出现了小范围的春寒和冻雨，但总的情况还好，若不出现特别大的自然灾害，夏粮增产五六十亿斤或七八十亿斤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可以使我们在农业问题上稍微喘口气，但也不能放松警惕性，必须继续下大力量确保夏粮丰收。如果夏粮严重减产，市场粮价再度出现较大波动，经济全局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的情况，不能说悲观，但也不能过于乐观，还要花很大的力量把农业搞上去。能源由于煤炭减产而影响到电，电又影响到千家万户，许多地方的不少企业原来停三开四，现在变成了停四开三，有的甚至变成了停五开二。重要原材料的供应也十分紧张。交通运输和通信能力不足，货运不畅，客运拥挤，通讯不灵，也已成为十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缓解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必须采取增产和节约并重的方针，同时坚持压缩过大的加工工业的生产建设。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毫不动摇地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作连续多年的艰苦努力，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六) 建立健全必要的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

回顾以往 10 年的改革，基本上是以放权、让利、搞活为特征的。我们原来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管理过多过细过死的，并且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指令性计划的经济体

制。这种体制是同计划产品经济的僵化模式相适应的，当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和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打破旧体制，强调放权让利，强调搞活，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过放开搞活，打破了原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旧秩序，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大的活力，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功绩。我们过去 10 年的改革开放所以有成绩，恰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个胆量，就不会发展到今天，就不会使我国经济的发展勃发出新的生机。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宏观管理和监督究竟应当怎样搞还探索得不够，注意得不够，在微观放活的同时，宏观调控没有跟上。由于新体制新秩序还没有相应地建立健全起来，特别是由于宏观经济的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还没有相应地建立健全起来，这就使得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现象，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某种程度活而无序状态。

本来，关于微观搞活和宏观调控的关系，中央早就有过正确的论述。总的原则是，大的方面要管住管好，小的方面要放开放活；中央还曾经指出过，微观经济放开搞活的范围和程度，要以宏观调控的能力为前提，两者要互相适应。我认为这些仍然是我们正确处理上述两者关系和保证国民经济活而有序的指导原则。我觉得，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在前段时期的改革中，这样的原则并没有真正在实践当中充分体现出来，往往偏重了搞活的方面，放松了宏观调控和监督的方面。因此，今后不能不把加强宏观调控这个问题提到更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当然，这里需要着重地补充说明一句，这并不是说以后就不要坚持搞活了。但是，在我看来，给企业放权，还要

坚持，要放到底，不能中间截留，但同时要强调企业必须建立能够自我约束的机制，认真执行国家的宏观决策。给地方和部门放的权，有些放过了头的，恐怕还要收回来一些。至于让利，中央已经没有什么再让的余地了。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降到 19.2%，过去一般在 30% 以上；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降到一半以下，过去一般占 60% 至 70%，有时还在 70% 以上。现在恐怕不仅不能再让了，而且还要逐步地适当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有同志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央以后只搞“吃饭财政”，只管发工资、教育费、外交费和国防费等等，一切建设都由企业和地方去搞。这当然不能不说是一种可以探索的思路，但是也不能不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如果按这个思路去做究竟能不能行得通？按这种思路去做，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各个地方都更加财大气粗了，更加尾大不掉了，中央说话更没有人听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就更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这种状况会不会出现？如果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国家的统一还能不能维持？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政治权威是以一定的经济权威为基础的。手里没有米，叫鸡也不来！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现在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决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涉及到利益分配关系的问题。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为了维护局部利益，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如果权力再进一步分散，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这不能不从大局上想一想。别的国家也有前车之鉴，我们要不要重走别人的失败之路，这也是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以上讲的是我们进行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必须强调指出，前面讲的六条，从消除经济过热，到遏制通货膨胀，到压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到实现财政、物资、信贷、外汇基本平衡，到认真调整经济结构，到建立健全宏观调控和监督体系，这是一项各个方面紧密联系的系统工程，必须采取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有力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才能奏效。现在看来实现这样的目标所需要的时间，两年肯定不够。一致的看法是标准不能降低，时间可以延长，总之要按标准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样，才有可能使我国经济的素质和效益真正地逐步提高，不断提高，也才有可能真正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地持续地稳定发展，防止大起大落，防止发生过大的波动。防止大起大落，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首先不要大起。有大起才有大落，大起必然大落。如果国民经济能够比较有序地协调地稳定发展，大落就不会出现，波动造成的损失也就会大大减少。中国的经验反复说明，大干快上这样的话还是少说一点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多方面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综合利用，只有这样，才能符合经济需要稳定发展这个规律的要求。如果猛抓一个方面而其他方面严重失调，必然会发生大起大落。这方面的苦头我们已经不知吃了多少遍，已经有过多次的教训。

三、进一步贯彻治理整顿 方针的几个认识问题

我们对前半年的治理整顿作了基本估计，从实践上论证了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要使中国经济摆脱目前的严重困境，真正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就必须按照前面所说的目标，

一心一意地进行治理整顿。而要做到一心一意，不受干扰，首先又必须切实克服目前仍然存在的某种思想阻力，把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的认识真正统一起来。

现在治理整顿虽说已取得初步成效但还很不够，其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首先反映了全党上下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不那么完全一致。当然，总的来说大家都拥护治理整顿，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各种意见就多得很，矛盾也很多。目前特别需要大家在思想上进一步统一认识的，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 必须知难而进，毫不动摇，绝不能半途而废

现在这个问题我看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下的决心还不大。治理整顿难在哪里呢？首先，治理整顿本身是很难的。要想舒舒服服、平平稳稳，一点既得利益也不触动，还要原封不动地保持现有的利益格局，就要渡过治理整顿这一关是不可能的。现在对各方面提出的要求，不论消除经济过热也好，控制物价上涨也好，整顿经济秩序也好，清理整顿公司也好，逐步减少财政赤字也好，都是稳定经济全局所必须的。实现这些要求都相当难，但又必须努力实现。第二，难还难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还会带来新的矛盾和困难。对这一点，我看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思想准备不够，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想到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其实，这是很清楚的。譬如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要下马，基建工程要下马，就要撒摊子，干部要重新安置，工人有些要暂时失业，需要重新培训、开辟新的就业门路或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不是新的困难就来了吗！你要真正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如果对所有现存的企业单位一个也不动，都要

保得那么齐齐整整，尽管它亏损严重也要保，尽管它不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的要求和政策的导向也要千方百计地保，那就无法实现调整。要调整，就要有一部分企业关、停、并、转。这是大局所需，是难以避免的，除非你不搞调整。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治理整顿本身提出的各项要求要真正落实，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这不仅仅是因为治理整顿本身难度很大，而且在治理整顿过程中还要带来新的矛盾和困难。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和单位对此还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有的甚至没有准备，或者不想有这种准备。这就必然会妨碍中央决策的真正贯彻落实。

那么，既然治理整顿本身很难，还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困难，不坚持治理整顿行不行？不坚持治理整顿，半途而废，我们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从经济上说，不但无法走出现在的困境，而且将越发不可收拾；从政治上说，党和政府的威信将进一步下降，将严重威胁政局和人心的稳定。

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突出的表现为经济过热、需求过旺、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从性质上讲，我们的通货膨胀，经济理论界认为是一种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或者说是总量失衡加结构失调引发的通货膨胀，总之最突出的矛盾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且超过的量一年比一年大。这种状况若不改变，能不能勉强地闯过去？回答只能是不可能的。还要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88年通货膨胀明显，把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了，但是问题的积累已有好几年了。从物价上涨的情况来看，1985年上涨8.8%，1986年上涨6%，1987年上涨7.3%，1988年则超过了两位数，涨幅达到18.5%。所以，1988年出现的明显的通货膨胀，是在前几年

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进一步积累起来的。矛盾经过几年的积累就变得更加尖锐了，再拖下去不解决就更难办了。尤其要看到的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尽管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但它们也是多年来许多问题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综合反映。因此，单靠采取几项行政性的措施，或者某几项经济办法，就想解决面临的困难，是不可能的。必须坚决进行综合配套的治理整顿，才有可能渡过难关。

这里，有必要对1985年提出“软着陆”的紧缩方针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教训，以及1988年初提出“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也未能得到认真贯彻的教训，作一点简要的回顾和分析。1984年底中央就已经发现经济过热，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提出要加以控制，并提出要采取“软着陆”的方针，不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主要是不再扩大建设规模，原地踏步几年，以逐步缓解供需矛盾。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就曾经指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造成过大的经济损失，可能引起的社会震荡较小。但当时中央也曾经强调指出过，坏处可能是全党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紧缩的决心不大，想软着陆而着陆不了，现在看来，后一句话恰恰是不幸而言中了。1985年刚刚开始紧缩，后来工业生产速度略有下降，各方面就叫唤起来，不仅难以继续压缩，反而不得不很快放松。放松的结果，反弹力很大，反弹回来的力量比起原来的冲击力更大，导致了连续几年的进一步经济过热。现在我们会不会再次出现上次的曲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如果现在治理整顿搞了一半，各方面一叫唤，说是紧缩得不行了，于是再度放松，我估计到那时再次出现的热劲将更加难以抑制，物价、金融、财政失控

的程度比现在还会更厉害。可能任何事物大体都是如此，反弹回来的力量会比原来的力量大许多倍。这一点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1988年在工作中也是有教训的。1988年年初曾经提出“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意思同现在提出的治理整顿有所不同，内含也不完全一样，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说，当时已经看到了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所在，主要就是经济过热，需求过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导致了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物价上涨过多过猛。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在解释“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时，曾经着重强调过稳定经济首先就是要稳定物价。但是，由于后来对1987年的经济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当时已进入健康的高速发展时期；不但微观搞活了，宏观控制的问题也解决了；认为价格改革既重要也不难；物价问题主要是副食品的价格问题，改革时只要把价格放开，同时给大家相应地增加工资，问题也就解决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后来就进一步提出了价格改革要闯关的思路，认为长痛不如短痛等等。这样，由于对建设和改革的形势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不仅没有把原来提出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坚持贯彻下去，而且在通货膨胀已经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没有充分注意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反而进一步调整和放开了某些商品价格，以致在许多地方诱发了商品抢购风潮和储蓄滑坡。结果，1988年许多问题进一步暴露，矛盾愈益尖锐化，物价上涨过多过猛的势头也就更加难以控制。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对过去的工作做这样的简要回顾，应当从中接受怎样的经验教训呢？我觉得，我们全党上下，我们每

一个同志，都应当充分认识到当前的治理整顿势在必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决不能让它再次遭到挫折，否则的话，面临的问题解决不了，难关过不去，造成的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现在，我国经济总量严重失衡，结构严重失调，再不下决心治理整顿和调整，这个难关是怎么也闯不过去的。还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如果治理整顿的方针不能坚决地贯彻下去，1985年、1986年乃至1987年的情况也难以再现，因为现在的情况同前几年大不一样了。最主要的是1985—1987年虽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但还都在一位数以下，在6~8%左右，而现在已超过两位数。去年物价总指数上升达18%以上，大城市已达到30%左右。如果现在还不坚决治理整顿，首先集中力量把明显的通货膨胀控制住，随时都有可能再次爆发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这种现象一旦出现，任何好的方针政策都难以顺利贯彻，只好赶快“救火”。我们已经吃了这样的苦头，再也不能对此不保持应有的清醒认识了。这里还想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说前两次中央要求紧缩，有些地方和部门顶着不办，结果还从中得到了局部的“好处”，现在恐怕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了。如果治理整顿失灵，全盘皆输，局部的利益也必将无法维持。因此，现在还在等待观望，执行中央的方针不坚决，甚至还想等风头过去大干快上的想法，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现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别无他路可走。若不坚持走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只能知难而进，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毫不动摇，再不能重犯过去正确方针制定以后半途而废的历史教训。现在治理整顿的方针、政策、措施和要求都已经很明确，关键在于坚

决贯彻执行，增强信心。也只有执行坚决，一步步取得实际效果，才能增强信心。我们的信心只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盲目乐观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强调一心一意，抓紧抓狠抓实，决不能三心二意，犹豫动摇，更不能半途而废。

（二）在治理整顿中，一定要坚决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权威。治理整顿要取得成效，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权威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调整经济，克服困难，要取得成效，没有必要的集中统一是办不到的。权威的建立有两个方面。从全局来讲，从中央和国务院的角度来讲，对现在经济领域中特别是流通领域当中存在的许多混乱现象，对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对各种腐败现象，要坚决抓，抓到底。对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些典型表现，抓住了就要“曝光”，公诸于众，轻则批评，重则惩处。现在案子抓了不少，但有些案子的处理往往没有下文。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凡违法乱纪的必须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正常现象。不处理，人民失望，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也建立不起来，很容易出现政令不通、人心不齐的现象，治理整顿也就很难取得成效和达到预期的目标。

从我们大家各方面来讲，现在有这么一种情绪：认为治理整顿能否坚持下去，全看中央、国务院做出样子来。这种看法至少是只对了一半，或者说很不全面。当然，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对不对很重要，决策对了，能不能抓紧贯彻执行，加强监督检查，纪律严明，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中央的正确方针能否坚持下去，取得预期效果，从根本上说，还要依靠

全党上下和各方面的同志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能主动地、自觉地执行中央、国务院的大政方针，做好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全局性的胜利也才有保证。一级抓一级，一级监督一级，广大干部都能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的。从党的角度来讲，中央强调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每一个党员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央、国务院正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维护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权威，这是治理整顿的需要，全局的需要，大局的需要。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都应该提高自己的党性，提高自己执行中央决策的自觉性。

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一讲到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困难和腐败现象，一批评上下左右或别的什么单位什么人，就义愤填膺，慷慨激昂，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一说到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情，这种情绪就淡化了。这对增强全党全国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不利的。中央、国务院正确政策的贯彻，说到底，需要全党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团结广大群众，共渡难关。因此在实际工作和宣传中，应该特别强调这样几点：1. 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2. 切实维护政令法令的严肃性，坚持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3. 对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如果逐步做到了这几点，越来越见成效，中央、国务院的权威就能建立起来，治理整顿就能取得胜利。

(三) 坚决树立顾全大局的思想，局部服从整体

治理整顿，调整经济，必然要对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一切地方、部门和单位都应该牢固树立顾全大局的观念。如果大家对既得利益一点不做自觉调整，一点不想触动，

治理整顿就将成为空谈，就很难取得成效。当然，这决不是说地方、部门、单位的一切利益都不照顾不尊重了。不讲物质利益原则，不讲发挥地方、部门和单位的积极性，是片面的、错误的。但从一定意义上讲，要治理整顿，调整经济，也就是因为现有的利益格局不合理，现有的利益分配结构中有些既得利益是妨碍大局的，或者说是符合国家宏观要求的，妨碍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的。这就需要人们对这些方面自觉地进行调整，自觉地做出一些自我牺牲。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准备，调整就会成为纸上谈兵。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正常的、应当得到的、应当照顾的既得利益都要调整，需要调整的只是不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或者超前的、或者妨碍全局的局部利益。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以至我们每个同志如果都有这种自觉性，经济调整的阻力就会大大减少。

如果情况恰恰相反，一方面经济调整本身的难度较大，大家又缺乏自觉性，使调整的阻力加大，这就必然会使治理整顿工作增加新的困难因素。由于困难因素增多，阻力加大，就会出现两种可能性：或者被迫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或者不调整、不治理、不整顿，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这两种前途对我们都十分不利。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可能生效于一时，但也可能行政性干预更要加强，就有可能使在深化改革中把调整推向前进的初衷无法实现，为将来的进一步改革增添障碍。如果由此而把正确的治理整顿方针收回，半途而废，同样也不利，这样，我们面临的困难将更严重。这两种局面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是要竭力避免的。因此，需要大家都能顾全大局。

(四) 各级政府、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在治理整顿中都要有过几年紧日子的思想准备

我们应当看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导致总需求多年来过多地大于总供给，是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形成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的基本原因。在治理整顿期间，希望各方面的日子过得更加宽松，包括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幅度更大一些，这是不可能的。甚至于在某些方面，在一段时间内，还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有所降低，这也将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前段治理整顿，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反对铺张浪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远远不够。今年，国务院要求社会集团购买力比去年实际达到的水平再压缩 20%，各地都应该努力做到，大力紧缩开支，开辟新财源，减少各种浪费现象。在治理整顿期间，在今后两三年内，怎样更加雷厉风行地克服铺张浪费现象，还是一项带关键性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各级政府、各级党组织都做出了样子，带了头，群众的工作也就比较好做了，治理整顿也就容易多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绝不容许我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前一段时期，有的同志讲“不要错把中国当美国”，讲得很有道理。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现在还根本谈不上过发达国家的生活，甚至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我们也还赶不上。在思想上不改变“贫穷的国家，挥霍的社会”的状况是不行的。党政机关首先要带头，如果这点做到了，把情况向群众说清楚，就会取得群众的谅解和支持。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起到表率作用。应当说，现在过紧日子同 60 年代调整时期相比大大地不一样了。但问题往往是有两面性的。60 年代碰到那样一种情况的时候，既有政治的原因，又有“大跃进”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相当多数的人吃不饱饭，许多人饿死了，当年的困难确实要比现在不知大多

少倍。但是，在当年的情况下，贯彻中央调整经济的方针，也有比现在易于号召的一面，精简几千万人下乡，一下子就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当然也留下了不少的后遗症），较快地扭转了形势，人民生活很快也就改善了。现在既没有这种需要，也没有这种可能。今天说的过紧日子，不会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现在的情况又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是在这些年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物质基础毕竟还很不丰裕的条件下，消费严重超前。而且消费又是刚性很强的东西，能上不能下，上去了就很难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大家过紧日子，难度也会相当大。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还把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等风气看作是一般的作风问题，认为没有什么了不得，不下决心迅速把这种风气扭转过来，空喊口号来号召老百姓都同意和我们一起过紧日子，那难度就会更大了。

（五）我们一定要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个相互配套、相辅相成的完整的统一方针，作为整个新旧体制转换时期都要认真执行的长期方针，自觉地加以贯彻落实

所以要这样提出问题，这同我们对改革态势的正确分析有很大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态势是，离开了旧体制的此岸，还未达到新体制的彼岸，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之间，经常产生严重的磨擦和撞击。这种磨擦和撞击有时是相当激烈的，产生的矛盾有时是相当尖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本身需要配套，不能单兵突进，孤军深入。此外，改革必须同治理整顿结合起来。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如果说前10年的改革是以放权、让利、搞活为基本特征的话，那么，今后的改

革应当是以边改革、边治理、边整顿为基本特征，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目的，边改革边把环境和秩序治理整顿得好一点，才有利于改革的深化。

今明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清除目前经济生活在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从更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们不能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仅仅看作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方针。随着治理整顿取得成效，难关渡过，形势好转，我看治理整顿还应当坚持下去，当然内容和要求将会有所不同。把它作为一个长期应当贯彻的重要战略方针看待还有一个好处，这就是一旦我们治理整顿效果比较明显，形势较为好转以后，可以从根本上防止重新出现新的过热。现在有的同志很担心治理整顿期间会发生经济滞胀。这当然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既要注意防止治理整顿期间发生经济萎缩，生产严重滑坡，也要注意防止形势好转后又重新出现经济过热。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可能是我们更需要注意防止的。这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全党同志都更加自觉地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长期地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我看就有可能使我们真正跳出几年重复出现一次的“过热—调整—又过热—又调整”的周期性“怪圈”。

四、实现治理整顿目标的关键环节

实现治理整顿的目标，关键性环节是什么？根据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通观全局，可不可以概括为五句话二十个字，这就是：压缩需求、调整结构、整顿秩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一）坚决压缩需求是为了解决总量不平衡的问题，这仍然是当前治理整顿的重点

在治理整顿期间都要注意两手抓，一手抓压缩社会需求，一手抓增加社会有效供给，以缓解供需矛盾，但现在需要特别注意的仍然是进一步压缩社会需求。现在压缩全社会的投资规模，要把重点放到清理在建项目上来，该压的必须坚决压下来。当前有不少地方用各种扩大社会集资的手段，进一步盲目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种情况很值得严重注意。有些地方，集资的手段和集资的用途，都是同治理整顿期间在宏观上要求实行紧缩的方针是不相符的。一些该压的建设项目不仅没有压下来，反而更加扩大了建设规模，这种状况令人担忧。有些地方以扩大股份制试点的改革为名，实际上搞的不是真正的股份制，无非是一种筹集资金，扩大生产建设规模的手段。有的地方保证股金红利达到 20% 到 30%，远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而且不承担风险，这种做法的后果不堪设想。有的地方搞的所谓“股份制”实际上是变相侵吞国家财产。其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公司，股份红利从来都低于银行存款利率，它主要通过经营得好实现股份增值，而且要承担风险。现在国内有些地方搞股份制成为变相地地侵吞国家财产，或者以此来吸收资金扩大建设规模，进而盲目地扩大消费基金，这对贯彻治理整顿的方针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必须强调进一步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千方百计实现中央的要求，并且要防止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干扰这项重大政策措施的落实。

与此同时，要采取坚决措施压缩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为了做到这一条，首先，压缩集团购买力仍是当前的重点，各地必须保证完成今年比去年压缩 20% 的任务；其次，

要严格控制工资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坚决制止屡禁不止的滥发奖金、津贴和实物的状况；再次，进一步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包括调整利率等经济手段，包括各种方便人民群众的措施，包括加强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大力鼓励人民储蓄，这是缓解需求过大、货币回笼乏力、金融形势严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必须强调，吸收和扩大储蓄，只能是宣传、提倡、鼓励，不能搞命令主义。现在有的地方，行政机关下死命令，要求职工的每月工资一定要储蓄多少，而且把增加的储蓄存款又用于盲目扩大当地的生产建设规模，造成银行资金周转不灵，发生支付危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比多发票子的危害更大。

当然，在压缩需求的同时也要注意增加有效供给。在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有效供给。我们所要增加的有效供给，主要是粮棉油肉禽蛋和蔬菜等重要农副产品，人民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品，适销对路的轻纺产品，回笼货币多的紧俏商品和出口创汇产品，以及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的能源、交通和短缺原材料，而不是不加区别地增加所有产品的生产。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的关键，在于大力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生产的效率和效益。各行各业都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走着重提高经济效益来发展社会生产的路子。绝不能以增加有效供给为名，盲目扩大长线产品的生产，盲目扩大生产建设规模，严重违背治理整顿的目标。目前的重点还是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把过大的社会需求压缩下来，首先保持国民经济在总量上的大体平衡。实现总量的大体平衡应当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实现总量的大体平衡。我们必须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

(二) 只有在治理整顿中切实抓好经济结构的调整, 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出现经济滞胀现象, 也才能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 保证和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经济结构的调整, 从宏观上看, 主要应当抓好三个环节:

1. 要下最大的决心和力量把农业搞上去, 千方百计保证今年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能有一个好收成, 这对于稳定经济和实现治理整顿的目标至关重要, 否则全局就会相当被动。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快一点或慢一点, 影响都远不会有农业减产那么大。我们一定要从资金、物资、科技、交通运输、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保证农业特别是粮食稳定增产, 尽快结束徘徊局面。
2. 大力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逐步缓解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供应全面紧张的状况。发展能源工业必须坚持增产和节约并重的方针, 只靠增加生产还不行, 还必须厉行节约, 这方面的潜力还相当大。节约能源, 不仅生产单位要做, 包括机关团体和全体居民在内, 都要大力节约用电、用煤、用油、用水。现在电力所以这么紧张, 同民用电的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同消费基金的迅速膨胀是有关系的。据我了解, 这些年北京市民用电每年就增加 20~30%, 大大超过了其他方面用电的增长幅度。
3. 在加快发展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的同时, 必须坚持控制加工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按我国现在的情况, 即使尽最大的可能来保证加快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产业的生产建设, 也支撑不了现在已经过大的加工工业规模。因此, 只有同时坚决地把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控制住, 才有可能逐步缓解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供应全面紧张的尖锐矛盾。

前些年，由于农业发展较快，原来工农业之间结构失调的矛盾已经有所缓解。这几年由于农业徘徊，加工工业发展过快，使工农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又激化起来。农业内部也有一个结构问题。棉粮油这些主要农产品或者减产，或者发展缓慢，其他如水产品和水果等赚钱多的产品发展较快。农民所以种粮积极性下降，固然同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偏低有关，同时也是同农业内部种粮食的比较利益大大下降是分不开的。我们强调要按价值规律同农民实行等价交换，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我们必须看到，要真正按照价值规律同农民进行等价交换，粮价还需要提高好多倍才行，这在目前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根本做不到的。完全靠国家来调整和提高粮价，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来平衡农业内部的各种比较利益，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工业内部结构最突出的问题是能源紧张。这几年能源的生产和开发应当说并不算慢，特别是电力发展不算慢。从“六五”计划以来每年平均增长五六百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去年新增发电能力达到了 999 万千瓦。发展这么快，为什么供求矛盾还那么尖锐？这主要地就是因为我国现有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根本支撑不了盲目扩大的加工工业以及非生产性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所以，我们必须从多方面采取配套措施，下大力量把农业搞上去，缓解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供应紧张的矛盾，同时坚决控制加工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把这三条抓住了，才能从总体上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当然，围绕着这三个环节还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这涉及到生产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地区经济布局的合理化等一系

列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两三年内都解决，但在治理整顿期间必须努力把大的产业结构问题解决得合理一点。这样，其他方面就有时间有条件逐步加以调整。为此，国务院最近经过多次讨论和研究，通过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策，需要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因为，无论是投资规模的控制，什么该压，什么该保，无论是现有生产的调整，哪些该压缩，哪些该发展，无论是增加哪些有效供给，都需要有产业政策的导向。我们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制定的产业政策，才有可能真正地在调整中逐步解决结构失调的问题。国务院已经将该保、该压的生产建设项目的目录予以颁布，各地各部门必须对号入座，无条件地遵照办理，决不能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国务院关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颁布，使我们的改革和发展都有了一个重要的依据。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各地方各部门的同志都要明确一个观念，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权在国务院。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只能根据各地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执行国务院颁布的产业政策的实施细则，而不能从局部利益出发另搞一套。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小而全、大而全的现象，从宏观上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布局的合理化，逐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结合压缩需求和调整结构，进一步整顿经济秩序，这在整个治理整顿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通过认真整顿经济秩序，使国民经济发展中种种活而无序的紊乱现象得到解决，这不仅在经济上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缓和人们的不满情绪，稳定人心，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当前整顿经济秩序的重点还是流通领域。首先必须继续把清理整顿公司特别是清理流通领域中各种公司的工作

抓紧、抓好、抓到底，不能走过场，草率收兵。其次，认真整顿市场秩序，严格物价纪律，严格财经纪律。中国处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发达的商品经济相比较，我们一方面市场发育还很不够，另一方面市场秩序又非常混乱，而且还存在相当一部分脱离市场的地下交易。整顿市场，首先要严格取缔地下交易。各种物资除实行计划调拨和实行专营的以外都要进入市场，加强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第三，对一些重要物资的流通方式要逐步进行改革，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和发展。

（四）实现总量平衡，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经济秩序，都离不开改革，不能偏离改革的方向

关于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的关系，我们需要在以下几点上把认识进一步统一起来。

第一，我们的治理整顿是在坚持改革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决不是脱离改革。要正确地坚持改革的方向，当前需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由于前一段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由于强调治理整顿，就误认为又要回到高度集中的、管得过多过细过死的计划产品经济的旧模式上去。一句话，就是想走老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要走老路，要搞旧体制的复归，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决不能变，变了，就会导致天下大乱。治理整顿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进行。另一种倾向是，错误地认为商品经济同公有制是不相容的，同计划调节不相容的，因而主张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只有实行私有化，就只有全部摒弃有计划按比例而实行完全的市场调节。我们也绝对不能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私有化道路。中国经济要保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保持它

的主导地位，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建立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结构，对此必须明确。因此我们的改革就是要坚决按照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设计我们的体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我们党经过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做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这个理论判断，第一，它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排除了过去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错误的传统观念；第二，它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虽然都有商品经济的属性，但两者之间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排除了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完全等同起来的错误观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两点，第一，以公有制为基础；第二，总体上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有机结合的，而不是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这两点我们要明确。我们一不能搞私有化；二不能搞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我们所要坚持的方向。

第二，治理整顿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依靠改革的深化，而且治理整顿的许多措施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整顿搞得不好，将为深化改革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举例来说，要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必然要求企业提高对物价上涨因素的自我消化能力，提高企业效益，这就必须花很大的力量深化企业机制的改革。不解决这个问题，提高企业效益就是一句空话。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必须坚持并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领导关系还要理顺，企业法必须坚持贯彻。现在听说下面有一种反映，叫“厂长不到位，书记怕越位”。这样不仅企业法贯彻不下去，企

业内部的领导关系也理不顺。这种状况决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企业改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外部条件的要求比较多，眼睛向内挖掘潜力的工作做得比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弱点。再比如，我们要在治理整顿中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逐步解决国民经济活而无序的问题，就必须积极探索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各种宏观调控的新的措施、制度和办法，这也是需要花很大的力量，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必须认识到治理整顿搞得越好，才能为深化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宏观环境。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强调良好的环境只有在改革的过程中才能形成，这个观点不能说不对，因为深化改革的过程也是创造良好环境的过程。但现在看来，我们还要讲另外一面，这就是一边深化改革，一边治理环境，否则主观愿望很好，通过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环境，但改革往往深化不下去，因为宏观环境不允许。譬如，价格改革就不能不受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制约。本来我们考虑价格改革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点，时间再缩短一点，这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来看也是需要的。因为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中的地位很重要，价格理不顺，市场形不成；市场不发育，商品经济就发展不了。价格改革有可能加快一点就加快一点，步子能迈大一点就迈大一点。可是，现在为什么不行呢？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因为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不允许这样做。去年工作中的教训之一，就是在通货膨胀已经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又推出了一些商品价格的调整和放开，加剧了群众对物价的恐慌心理，在全国许多地方诱发了抢购风潮和储蓄滑坡。

第四，当前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一定要服从于和有利于治

理整顿目标的实现。当前的治理整顿，实质是一次新的经济调整。工作做得好，通过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遏制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我们将因祸得福，加快全面改革的条件和基础也就会更好了。

现在治理整顿的方针、政策、措施和要求都已经很明确，关键在于坚决贯彻执行，增强信心。实行紧缩金融和财政的政策以后，各地叫喊资金紧缺、叫喊困难的呼声高涨起来，有些该保、该发展的生产经营活动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实际困难。对此，应当讲两句话：一是总体上实行紧缩的方针不能动摇，否则经济过热无法降温，需求过旺无法抑制，控制通货膨胀也就会成为空谈，这对稳定和发展经济的全局是很不利的；二是，应该在符合国家宏观要求、经济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区别对待，该保的保，该压的压，做到紧中有活。目前要特别注意表扬那些善于通过深化内部改革，挖掘潜力，改善经营，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有效供给的企业单位，介绍和交流它们的经验，而不是盲目地跟着下面叫喊困难，助长向上伸手要钱要物的情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0年来，我们在改革和建设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面貌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各项工作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没有犯过大的错误。这是我们的立足点。但无论在改革方面还是在建设方面，小的失误是有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一定要在坚持十三大路线和十三届三中全会方针的前提下，联系各项工作的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总结经验的目的，是为了把当前的治理整顿工作搞得更好，把改革和建设搞得更好。

为了比较顺利地实现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当前特

别需要注意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注意运用法制手段，加强法制建设，以利于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自从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已经陆续发布了 40 多个文件，包括通知、决定、规定、条例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这样做，是国务院按宪法办事，是执行宪法赋予国务院的权力。在今后的治理整顿中，国务院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们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等多种手段，五管齐下，加强宏观管理和调控。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都要用。要更多的采取经济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无论采取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要尽可能制定必要的法规和使之形成制度，以尽量减少主观随意性。

二是积极探索和逐步建立宏观经济的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在这方面，可能有这样几点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注意：1. 加强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监督，本身就是深化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的内容，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有序、持续稳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决不能认为这样做就是走老路，就是旧体制复归。2. 为了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的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对于过去使用过的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我们都不应该拒绝使用。我们不能只从理想的模式出发，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一定要用更多的心思，花更大的力气，积极探索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调控手段和措施。3. 必须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综合部门、监督部门要大力协同，密切合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而不能各搞一套，各行其是，相互掣肘。4.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微观搞活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使两者不致相互

脱节，而能相互适应。

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认识这一点，对于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是很重要的。

(五) 在治理整顿中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坚持执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强调沿海地区积极发展“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是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不能变。变了，就会严重影响沿海地区近两亿人的积极性。同时也要强调，执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真正做到“两头在外”，而不是利用中央的优惠政策与本地区的优势同内地争利。不仅不能这样，相反地应当促进沿海与内地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协调发展。否则，就会加剧沿海地区和内地的矛盾，不利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贯彻执行，不利于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的共同发展。在执行沿海发展战略时，还应该强调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提高效益，而不是一哄而起，盲目扩大规模。沿海地区也必须服从于和适应于全国治理整顿这个总环境，也要抓紧治理整顿，不能特殊。沿海地区如果能够认真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使自己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一定能够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更加富有成效的新层次。

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多地通过“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外资，不断提高“两头在外”商品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并且努力降低换汇成本。内外销要统筹安排。国内紧缺的物资要尽量少出口，国内市场比较富裕的商品要尽可能地多组织出口。同时要吸引外商多来我国办独资企业，这样有利于缓解国内资金

困难，而且外资经营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们可从中吸取经验。新的经济开发区不能盲目扩大。要多利用我们现有企业的厂房、设备嫁接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努力做好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和消化工作，多发展能够替代进口的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国产化水平。这样做了，就可以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

这次治理整顿与历次经济调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次有对外开放这个有利条件。现在国际经济环境总的来看对我们是有利的。只要我们把这个有利条件利用好了，就有可能更好地达到治理整顿的目标，而不是与治理整顿发生矛盾；就有可能增强克服国内经济困难的能力，扩大我国经济的回旋余地。

以上就是我今天向同志们讲的四个问题。在结束报告之前，我还想着重讲一讲的是，在全党全国集中力量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十分注意保持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稳定。现在很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广大的共产党员，我们一切真正关心国家前途、真心想搞四个现代化、真心想搞改革开放的同志，就要注意不要被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思潮所左右，不要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突发事件而影响我们一心一意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缓解经济困难，同时努力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安定团结，没有稳定的政局，什么都搞不成。全国人心思稳。经济要稳定，政治要稳定，社会要稳定。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是什么，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不断增强全党全国的凝聚力。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党就会涣散，人心就会涣散。我们必须坚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建设，但必须积极稳妥，以稳定政局为前提。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政治局面不稳定的东西，我们都要注意警惕。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明确，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我们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一切都搞不成，治理整顿也就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想提醒大家，在讲这种话的人之中，有些人的用心是不良的。他们所谓的“严重滞后”，就是共产党已经官僚化了，完全腐化了，形成了特权阶层，党已经统治不下去了。当然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党确有某些组织或某些成员经不起考验，发生了种种令人不安的腐败现象。对此我们党已下决心加以克服，人民也希望我们党能够克服。但无论如何，也决不能够和不应该得出前面说的那种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按他们所说的不滞后来办，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当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人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是持这种观点，他们是真心希望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现在却有人在别有用心地扩散种种蛊惑人心的错误观点。现在已经有极少数人在国外发了宣言，他们讲得很清楚，中国必须有另外的执政党，不能光由共产党执政。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明确指出，中国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坚持共产党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将国无宁日，必将四分五裂。我们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能够随着时代和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停滞的、僵化的教条。

趁此机会，我想建议同志们更多地向年轻同志和青年学生

们多做一些讲道理的思想政治工作。前几天我同大学生们有过一次接触。刚去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因为听说在有的大学中某些“新潮”人物去讲了一通，说什么20世纪最大的收获就是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有些学生听到这样的话居然还起劲地鼓掌。我想我去讲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被某种人认为“僵化”的观点，可能要被哄下台。于是，我对他们说，今天我做好了被哄下台去的准备，但还是要向你们讲下面的话。我说，共产党的领导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没有希望，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不要说现在还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即使将来有了（究竟会不会有姑且不论），他们要想把共产党赶下台去也不那么容易，必然导致打内战，国家也就没有希望。在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行吗？我问他们，当年如果不出现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党，充分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坚持革命，中国的人民大革命能胜利吗？新中国能建立吗？新中国的诞生，对全中国人民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我又问他们，如果新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宣布不再搞社会主义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要让位给资产阶级来统治我们的国家了，劳动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还会拥护共产党和跟着共产党走吗？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失误和挫折是不少，但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旧中国能够比拟的吗？我们不搞社会主义，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而搞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能在目前这么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基本解决10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吗？过去的年代里发生的种种失误和挫折，又是谁主动作自我批评和进行纠正的呢？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10年，改革开放的10年，总的来看，难道不是确实实实在在地结束了停滞、封闭的落后局面，带来了我们国家生机勃勃的大前进、大发展吗？我进一步问他们，今天的中国如果放弃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会是美国那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吗？会是瑞士、瑞典、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吗？我们必然要重走别人走过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因为你现在只有人均才几百美元的生产力水平，在这样的水平上，梦想搞资本主义就能马上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搬到中国来，这可能吗？你必然要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然后积累资本，塑造出一个资产阶级来统治我们的国家，这条路走得通吗？革命了一辈子的老同志会答应吗？至今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人民会答应吗？不答应又怎么办，必然要打内战，全面内战。假设真的打起来（当然这仅仅是假设），我看那些主张在中国要搞资本主义的人未必能打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最后说，如果认为我讲的这些是“僵化”的观点，我愿为这种“僵化”而奋斗一辈子。结果，学生们没有把我哄下台，反而报以热烈鼓掌，从中我再次体会到了人心所向。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工作。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不能含糊。现在我们的确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但它们都是前进中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经过了10年的大发展、大前进，需要有一段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发展规律吧！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大家同心同德，一定能够渡过眼前的困难。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希望就在我们的前头。

关于治理整顿的情况通报和答记者问

(1989年3月)

各位记者女士和先生们!

我很高兴再次同大家见面，借此机会首先向大家通报以下情况。

—

今年以来，国务院为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继续发布了12项法规、规定，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已经采取的重要措施共有40多项。

二

经济上的治理整顿进一步取得成效，主要表现在：

——截止2月底，全国已停建缓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8万个，可压缩投资规模647亿元；

——集团消费得到控制，增长幅度继续下降；

——城乡居民储蓄持续回升，到2月底储蓄余额为4019.2亿元，比年初增加217.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亿

元)；

——物价涨势减弱，群众紧张心理有所缓和，城乡市场基本稳定；

——截止1月底，已撤并不具备条件和不该办的公司17092家。党政机关办的24187家公司中，已有8667家撤并，有10632家与机关脱钩(占80%)。在公司兼职的党政机关干部32798人中，已辞去公司职务或机关公职的23526人(占72%)。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政企不分的公司有9577家，已实行政企分开的3975家(占41.5%)。重新审查各类公司经营资格、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的工作正在继续抓紧进行。

——今年一二月份工业增长速度为8%，已降到计划要求的水平，但结构性矛盾尚未缓解甚至有所加剧。

必须强调，治理整顿取得的成效只是初步的。进一步治理整顿不仅难度很大，而且还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困难。但是，我们坚持治理整顿的决心不应该也不能够动摇，决不会半途而废。

三

治理整顿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进行的。实行治理整顿以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继续改善，优化劳动组合的工作取得新进展，企业活力进一步增强。去年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9.3%。在发展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外汇调剂等市场方面有了新的发展，相应地进一步推进了计划、投资、物资、金融、外贸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去年全国进出口

总额突破 100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4.4%；实际利用外资 98.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6.4%；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5896 家，是过去 10 年中最多的一年。

四

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实现经济治理整顿任务的重要保证，为此：

我们将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国务院机构改革已按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方案基本完成，今年将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职能转变，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加强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推进廉政建设。监察部、审计署已在国务院 40 多个部门设立派出机构，派出人员编制共 1056 名。各级政府普遍设立了群众举报中心，正在推行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加强群众监督的制度。继续鼓励广播、电视、报刊等舆论单位揭露违法乱纪行为和腐败现象。进一步抓紧查处政府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违法案件。

继续坚决依法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强化社会治安。

同样应该强调指出，这方面的工作距离人民的希望和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必须继续作出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

五

为增加政务活动的透明度，从现在起如无特殊情况，国务院发言人一般将在一个月左右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逐步形成制度。目前，国务院已有近 40 部委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他们也将进一步积极开展工作。

（下面是对记者提问的回答）

《人民日报》记者问：李鹏总理在春节团拜会上说，今年要在控制物价上涨，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以及消除腐败现象等广大群众和干部普遍关心的问题上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你能否谈谈中央和国务院将采取哪些政策和措施来保证在这些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答：记者招待会主持人刚才提出希望每位记者只提一个问题，以便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提问。你虽然提的是一个问题，可是涉及到了我们国家经济和政治的极其广泛的领域。限于时间，我只能作最简短的回答。我国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同时在总量不平衡的前提下经济结构失调这样的原因造成的。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必须进一步压缩社会需求，压缩投资需求，压缩消费需求，同时认真调整经济结构。只有这样，才能釜底抽，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还要采取一系列加强物价管理的措施，防止继续发生各种各样违反政府规定的乱涨价行为。解决社会分配不公，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对现在一些违法经营的必须依法惩处，这决不能含糊；第二，对导致社会收入过分悬殊的一些高收入，要严格征收个人调节税。我们将逐步建立个人应税收

入的申报制度，并首先在国家机关、大城市、各类公司和个体工商户当中开始实行，严格执行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制度。通过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来缓解某些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矛盾。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还要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逐步建立。为了克服现在人民群众当中很不满意的种种腐败现象，我们主要将抓两件事：第一，继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检举揭发各种违法乱纪案件，并且下大力量抓紧查处；第二，要抓紧制度建设，主要就是要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加强群众监督，把这“两公开一监督”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来。这两件事抓好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克服腐败现象、加强廉政建设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德新社记者问：最近国务院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有关经济问题的新闻报道，甚至《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样的党报、党刊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都要征得国务院新近成立的以您为主任的研究室同意，这是否意味着国务院要控制党报、党刊？国务院在这方面的权力是否更大了，是一个更高的总管经济问题的机构？

答：我想，你大概是误解了。我们是发了一个通知，但通知只是说，由于国务院负责整个经济工作及其政策的执行，对情况比较了解，今后关于经济方面的宣传由国务院来进行指导，并不是控制。这是一。第二，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国务院责成国务院研究室经常为报刊的经济宣传提供一些信息。我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提供消息，提供情况，提供国务院决策的大体情况，以便大家进行宣传，这是一项服务性的工作。第三，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报刊登的文章，都由总编辑

负责。如果他们自己感到对某些文章或者报道没有把握，需要送到某个机关看一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帮助他们看一看。仅仅是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检查他们的稿件，也不是控制他们的报道。

香港《大公报》记者问：李鹏总理在春节团拜会上说，去年的经济工作中有失误，你能否讲一讲这些失误是什么，怎么造成这些失误的？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谈一点个人的看法，而不是官方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经济工作上的失误，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我们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过急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急于求成。我们的国家人口多，资源相对紧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我们各方面要求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有时常常脱离这种国情，要求过高过急。因此，对于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盲目攀比速度，追求产值产量，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等等这些现象，往往注意纠正和防止不够。我们去年出现的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国内国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是几年来经济过热造成的。这就和我刚才讲的我们在指导上的失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改革总的方向是对的，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在采取某些措施的时候，往往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够，所以常常表现在没有很好地注意综合配套。我们在强调微观经济搞活的时候，对宏观控制注意不够，没有能够认真地抓紧建立宏观调控体系。这也是我们经济生活上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呼吁政府今年释放政治犯，政府对此持什么态度？

答：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有人提出要释放的所谓

“政治犯”实际上是被依法判处的一些刑事犯罪分子。比如魏京生，他的主要犯罪事实就是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在今天的中国，不存在没有触犯刑律而被判罪的所谓“政治犯”。所以，也就不存在释放你们所谓的“政治犯”的问题。

问：对于签名呼吁释放政治犯的人政府持什么态度？

答：中国存在着各种正常的渠道，可以向中国共产党，向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级政府，各级人代会，各级党的组织提意见，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或建议。对这种事情，我们向来是采取支持的态度。但是，有的人写了信，在国内外广为散发，并且借助于国外的一些势力，想以此形成对本国政府的压力，这种做法我们是不赞成的。

路透社记者问：一周前，国务院宣布在拉萨实行戒严。根据官方的报道，现在拉萨的局势已趋正常，这是否意味着你们将取消戒严？中国高级领导人最近对西藏问题很少有评论，这是为什么？在国务院是否对西藏问题有争论？

答：西藏实行戒严，目的是稳定社会秩序，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维护西藏人民、拉萨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实行戒严以后，正如这位记者先生刚才说的，现在情况已经逐步趋于正常。什么时候宣布取消戒严，我想，等到决定宣布的时候，大家也就知道了，现在我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家的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的行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任何有可能导致分裂祖国的行为和言论我们都是反对的。同时，我们在西藏将实行有利于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我们还会继续坚持这样的政策。为了维护祖

国的统一，维护民族的团结，为了推动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央政府还会继续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有关力量，帮助西藏人民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国内国外任何势力，任何个人，要想在西藏从事分裂活动，都是不能允许的。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藏族同胞都是不会同意的。

中央电视台记者问：今年在物价改革方面，国务院有什么计划要出台？国务院怎么能够确保今年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低于去年？

答：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这种实际情况下面，我们价格体系的改革还要坚持进行，但是步骤要放慢，因为它要受到通货膨胀的制约。如果价格改革步骤搞得太快，会不利于控制通货膨胀。所以今年只对极少数必须进行的价格进行调整。简单地说，就是价格改革要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适当进行。今年物价上涨幅度要求比较明显地低于去年，这个要求能够做到，但是难度也相当大，甚至可以说难度很大。从今年一、二月份的情况看，物价涨势稍稍趋于缓和，今年全年能否实现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去年的目标，还要看今后发展的情况。我还要补充一句，尽管实现今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去年这个目标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但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包括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都正在采取措施，努力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意大利《卫报》记者问：如果政府不能使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去年，政府会不会辞职？

答：我想这个问题现在问得还早了一点，还是看一看今年的发展情况再说吧。

新华社记者问：刚才袁木同志讲，这次在清理整顿公司中

已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党政机关干部同公司脱钩或辞去职务，那么也就是说还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干部没有脱钩或辞去职务，是什么原因，是否在清理整顿中遇到了什么阻力？这次清理整顿强调宏观控制和加强政府的权威，这同前一段时间改革中提出要放权搞活是否有矛盾的地方？这同过去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有什么区别？

答：据我掌握的情况，全国党政机关办的公司一共有2.4万多家，现在已经有8600多家撤消或者合并，有1万多家已经同党政机关脱钩，两者加在一起，可以说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已经有80%得到解决。在公司兼职的党政机关干部一共有3.2万多人，已经辞去公司职务或者辞去机关公职的有2.3万多人，占72%，所以我讲这个问题也基本解决了。现在还有一部分没有解决，我想，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逐步运行的过程。我的看法，不能说清理整顿中一点阻力没有，但也不能说是遇到了多么严重的阻力，无非工作要一步一步地进行。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三月底这个问题要全部解决。这是我对你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体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所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这种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既能保证各个企业微观经济充满活力，同时又能加强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宏观管理和控制，做到活而不乱，或者说活而有序。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们在前一段的改革当中，在比较充分注意微观经济搞活的同时，对宏观管理和调

控的问题注意不够。现在，我们在治理整顿当中强调加强宏观管理和控制，正是为了纠正前一段这方面的缺陷。这是必要的。这同重新回到过度集中的管得过多过细过死的旧的经济模式上去完全是两回事。

越通社记者问：昨天的《人民日报》上有人说，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是不少地方抗拒停建缓建。针对这种情况，请问：今后中央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新措施？您是《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人，请您给我们透露一点报告的内容。同去年的报告相比，它有些什么特点？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在我们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压缩社会需求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地方碰到了一些阻力，主要的是这些地方下不了决心，不愿意牺牲某些局部利益，不愿意把已经花了很大功夫准备建设的工程停下来。把它们停下来，心里舍不得，有一些思想阻力。对这个问题，我们将采取思想教育的方法，行政的方法以及经济的方法，比如说停止贷款，提高贷款的利率等，再加上必要时采取纪律的手段来解决。我还要说一句，我们提出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来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几个月就已经取得了我才说的停建缓建 1.8 万多个项目的成绩，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它从总体上反映出地方和部门还是在执行国务院的决定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首先我想说的是，李鹏总理是《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人，我只是在他的领导下做一点文字工作。第二，这次报告的主题是适应全国的形势，集中讲进一步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问题。

匈通社记者问：在 50 年代，在政府负责干部中，中共成员和民主党派成员的比例为 1/3 比 2/3，现在是否采取措施来

恢复这个比例？

答：我一时还说不清楚你所说的当年的比例数字是否准确。我想说的是，我们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这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特点和优势。我们将继续发挥这个优势。据我了解，目前正在考虑要在政府的负责工作人员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民主党派成员，具体比例究竟多少，正在研讨当中。这件事情将来还要通过法律的程序贯彻实施，现在究竟要搞到多大的比例，我还无法提供具体情况。

《美国之音》记者问：袁先生是否能为我们提供在过去几天西藏动乱中伤亡、被捕和被监禁的具体人数？您说中国的西藏政策是正确的，然而在西藏却出现了动乱，你们不得不实行戒严；您还提到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让人们发表意见，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绕开这些渠道来发表意见。那么中国在这两方面的政策是否是合适的、充分的，是否在对这些政策进行讨论，是否有变的可能？

答：拉萨前几天骚乱的情况，骚乱分子以及维持秩序的武警伤亡的数字已经在报纸上公布了，我没有新的数字提供。实行戒严以后，的确依法拘留了一些为首的、触犯刑律的、制造骚乱的分裂主义分子，对他们依法进行审查，但具体拘留多少，我现在没有掌握这个具体数字。我还想说一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在正确的政策下面，都可能发生一些和政策的目标不相符合的反面的情况。我想这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的。这不能反证政策的正确或者不正确。拉萨骚乱，核心的问题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要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中国的政策就是不允许这种分裂。一个要分裂，一个不允许分

裂，这必然就要产生冲突。这种骚乱本身并不能证明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正确。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比较广泛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同时也规定，公民在行使这种权利的时候，不能妨碍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我们的宪法和法律还规定：中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有的人硬是发表违反宪法的言论，他在国内找不到发表这种言论的地方，因此，就希望外国的什么人给他提供机会，也确有这样的人愿意给他提供。我们对这种做法是不满意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决不全盘引进不符合我们国家情况的西方的政治制度。

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问：达赖喇嘛去年已表示要同中国政府谈判，他在建议中提出可以由中央政府来管理西藏的外交和防务。看来他似乎已放弃追求西藏独立的目标。那么目前中央政府为什么还不同达赖喇嘛开始谈判？

答：我想，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也多次公开宣布过，只要达赖喇嘛愿意放弃西藏独立，愿意维护祖国统一和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他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对话渠道始终是畅通的。

问：从达赖的建议书看，他好像已经放弃独立的要求了，我的问题主要是这种会谈的前景如何？

答：我们要察其言，观其行。对你的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了。我的话只能说到这儿。也只愿意说到这儿了。

（据新华社报道）

关键时刻的正确抉择

——读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札记

(1989年4月)

一、中国的建设和改革正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

进，就可以走出当前令人担忧的困境，柳暗花明又一村，前景广阔灿烂；

退，就会出现经济滞胀，即发展停滞又通货膨胀，陷入较长时间的生产萎缩。

我们完全应当也一定能够争取第一种前途，竭力避免也能够避免第二种前途。

争取第一种前途，惟一正确的抉择只能是：一心一意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

读了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令人耳目一新，振奋了精神，增强了信心。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报告强调治理整顿的主题和基调十分鲜明。

报告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方针和基本精神，立足于实事求是，在肯定成绩，讲清困难，对困难的性质、成因和工作失误坦率陈述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进一步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系列相互配套的综合治理措施。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对这个报告，代表中有些人担心讲到的政策措施将难以完全落实（这是在实践中必须认真解决的），还有些人认为已经提出的政策措施还不过硬不配套（这是会后执行中需要逐步充实和完善的）。但是，始终还没有听说哪位代表对报告的主题和基调提出过怀疑或异议。

这，应该说正是我们完全可以争取实现第一种前途的希望和信心所在。

二、坚持治理整顿，必须对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前段的治理整顿工作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弄清楚我们的立足点

立足点是否正确，至关重要。只有立足点正确，才能真正脚踏实地，坚持实事求是。

无论对当前的困难和前段的治理整顿，我认为都应该作两点基本估计：

第一，十年改革带来了中国的大前进、大发展，需要有一段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间，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前段的治理整顿，虽然时间不长，但实践证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第二，现在的困难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困难既不能估计过头，丧失信心，又必须高度重视，不能掉以轻心。有些问题因多年的积累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

充分认识第一点，才能增强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共渡难关的信心；充分认识第二点，才能增强自觉坚持治理整顿的坚定性。

三、一心一意治理整顿，必须知难而进，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不达目的不罢休，决不能半途而废

因此，必先“知难”，懂得难在哪里？

首先，坚持治理整顿，实现治理整顿的目标，这件事本身就很难。从消除经济过热，到遏制通货膨胀，到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到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基本平衡，到合理调整经济结构，以至规范经济行为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这一切都是当前必须做的，又都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想舒舒服服，平平稳稳，不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不牺牲任何一点既得利益，就能渡过治理整顿这一关，实现治理整顿的目标，是根本办不到的。

其次，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还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困难。比如，许多基本建设工程下马，就得撒摊子，干部要重新安置，有些工人就会暂时失业，需要重新培训或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再比如，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调整经济结构，相应地调整产业结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这是保证治理整顿取得成效的关键环节，是绝对必须的。既然要调整结构，就必然是有的要保，有的要压，有的要发展，有的要限制，有些企业必须关、停、并、转，这是治理整顿和稳定发展经济的大局需要，是不可避免的。而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肯定难度必定是相当大的。

现在的情况是，对于治理整顿本身的难度，特别是对于治理整顿必然会带来新的矛盾和困难，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可能至今还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甚至还不曾想过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是最值得注意的。

那么，既然治理整顿难度很大，不坚持下去行不行呢？我

们完全可以肯定地预料，如果治理整顿再遭挫折，半途而废，从经济上说，不但将无法走出现在面临的困境，而且将越发不可收拾；从政治上说，党和政府的威信必定会进一步下降，严重威胁我国政局和人心的稳定。

因此，坚持治理整顿，必须顽强奋斗，坚韧不拔，决不能等待观望，更不能犹豫动摇。

四、为了进一步坚定治理整顿的决心和信心，有必要强调认真吸取 1985 年提出“软着陆”的紧缩方针而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教训，以及 1988 年初提出“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又未能得到认真贯彻落实的教训。

回顾 1984 年末的时候，中央就已经发现了经济过热，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因而提出全国的建设规模要踏步几年，不再扩大，实行“软着陆”的紧缩政策，以逐步缓解当时已严重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各种矛盾。

在提出“软着陆”的同时，中央也曾经提醒大家，实行“软着陆”，好处是社会震动小，可以减少经济损失，坏处是有可能使许多人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紧缩失灵，想“软着陆”而着陆不了。

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央的这种担心，不幸而言中了。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不能不说是几年来经济过热、总量失衡、结构失调日益严重的结果。

当 1988 年初提出“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时，曾经着重指出过：稳定经济，首先要稳定物价；稳定经济要靠改革的不断深化，但深化改革也必须首先为稳定发展经济服务。

这样的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得人心的。

可惜的是，上述方针提出后不久，由于对 1987 年经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同时由于在推进价格改革时对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考虑不够，估计过高，从而在通货膨胀已经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没有能够及时采取稳定金融、控制物价的有力措施，又调整、放开了一些商品价格，以致在许多地方诱发了商品抢购风潮和储蓄滑坡，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这种情况的出现，从接受教训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认为：人民群众以抢购商品的行动，惩罚了我们在经济工作指导上的失误。

现在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说前几年由于正确的方针虽未能真正落实还能够在通货膨胀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话，那么，如今在 1988 年通货膨胀率已超过两位数、物价总指数上涨已达 18.5% 的情况下，假如治理整顿的正确决策再度受挫，也就不可能再出现前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或者说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十分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这样，工作中发生某些具体的缺点和失误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真正使之成为指导今后工作的借鉴。如果我们能够因此而更加坚定治理整顿的决心和信心，就一定可以消除经济过热，遏制通货膨胀，使建设和改革的进展更加顺利，由此而因祸得福。

五、从统一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对坚持治理整顿的认识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三点，这就是：

1. 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权威，切实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2. 必须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

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3. 必须有过几年紧日子的思想准备。

这三条切中时弊，讲得太好了，太重要了。

我们广大共产党员，一切真正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真心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真心想坚持改革开放的同志，都应该自觉地以这三条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六、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为了一步一步地达到治理整顿的预定目标，我们应该抓住哪些关键性的重要环节呢？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通观全局，我认为可以大体上概括为：“压缩需求，调整结构，整顿秩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坚持压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这是当前治理整顿的重点，也是稳定经济全局的前提。

压缩需求必须与调整结构结合进行。否则的话，不仅压缩需求的目的难以达到，社会有效供给难以增加，而且经济滞胀现象的发生将难以避免。因此，必须努力做到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合理调整结构，在调整结构的基础上实现供求总量的大体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素质和效益，从根本上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在压缩需求和调整结构的过程中，一定要同时抓紧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的整顿。清理各类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各类公司的工作要继续抓紧抓好抓到底。对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应分别不同情况，有的加强计划管理，有的加强市场管理，有的实行专营，坚决取缔非法经营。只有这样，才能使压缩需求、调整结构的效应不致由于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

的混乱而被抵消，真正能够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较快地、有效地显现出来。

无论是压缩社会需求，调整经济结构，还是整顿经济秩序，都必须主要依靠改革的深化，更好地积极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至关重要的一点。

在当前以至整个治理整顿的过程中，一定要下大决心，花大力量，争取农业特别是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获得好收成，逐步缓解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供应全面紧张的状况，确保科技事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努力改变教育包括社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落后状况，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政治和道德素质，特别具有全局的、长远的重大意义。

七、正确理解和处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对于保证治理整顿的顺利进行和达到预期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有必要在以下几点上把人们的认识进一步统一起来。

第一，治理整顿是在坚持改革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为了正确地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当前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由于在前段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紊乱现象，由于强调治理整顿，就误认为又要回到过去那种过度集中的、管得过多过细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上去，这种老路只能窒息中国经济的活力，是绝对走不通的。另一种是，错误地认为商品经济同公有制是不相容的，同计划调节是不相容的，因而主张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只有实行否定公有制的私有化，就只有全部摒弃有计划按比例而实行完全由市场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

通过改革，中国所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能够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有机结合地经济运行机制。

第二，治理整顿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依靠改革的深化，而且治理整顿的许多措施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比如，我们要抑制通货膨胀，必然要求提高企业对物价上涨因素的消化能力，这就必须花很大的力量来深化企业机制的改革，大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比如，我们要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逐步克服国民经济活而无序的紊乱现象，就必须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调控制度、手段和措施，这个问题也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第三，只有治理整顿逐步取得成效，才能为深化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宏观环境。前一段较多地强调良好的宏观环境只有在改革过程中才能形成，这种看法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实践证明，现在还需要强调另一面，就是不能把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割裂开来，如果不一边治理整顿，一边深化改革，宏观环境不改善，改革也深化不了。很明显的例子是，当前以至今后价格体系的改革，就不能不受到通货膨胀程度的严重制约。

第四，当前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一定要服从于和服务于一心一意治理整顿这个中心任务。一切改革措施，都要有利于压缩需求，调整结构，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提高经济效益。一句话，都要有利于治理整顿目标的实现。

八、关于深化改革，还有必要专门讲一讲有关逐步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治理整顿的内在要求，也是逐步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需要

以往 10 年的改革，可以说基本上是以放权、让利、搞活为特征的。通过放开搞活，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经济体制的旧秩序，使我国经济增添了强大的活力，这是巨大的历史功绩。但在这同时，由于新体制新秩序特别是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尚未相应地建立健全起来，这就使得在新旧两种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现象，国民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某种程度活而无序的状态。

为了有利于推动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的逐步建立，可能有这样几点认识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

一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本身就是深化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的内容，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有序、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决不能认为这样做就是走老路，就是旧体制复归。

二是，为了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当然不能拒绝使用过去用过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措施，但同时必须强调，一定要用更多的心思，花更大的力气，积极探索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和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调控手段和措施。

三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综合部门和监督部门，要大力协同，密切合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而不能各搞一套，各行其是，相互脱节，相互掣肘。

四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微观搞活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总

的来说，大的方面要管住管好，小的方面要放开放活；微观经济放开放活的范围和程度，要以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为前提，使两者能相互适应。这恐怕还是正确处理上述两者关系和保证国民经济活而有序的指导原则。

九、这次治理整顿或者说经济调整同过去历次经济调整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这次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有利条件运用得好，将十分有利于缓解国内经济困难，增强经济回旋能力，有利于实现治理整顿的目标

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倡和鼓励沿海地区积极发展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是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丰富和发展。这个战略不能变。变了，就会严重影响沿海地区近两亿人的积极性。

当然，沿海开放地区和经济特区，也要认真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而且应该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做得越有成效，可能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的优势就越能发挥出来，投资环境就会更加改善，从而也就更能增加对外商的吸引力，更能增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能力。

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还要强调沿海地区不要利用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和本身的地理优势与内地争利，而要真正做到沿海与内地分工协作，互助互利，优势互补。

当前以至今后，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和扩大对外开放，都要同我国已经颁布执行的产业政策相适应。当前尤其要强调的是，一要多吸引外商来我国办独资企业；二要多利用我国现有企业嫁接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三要千方百计降低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四要努力吸收和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发展能够替代进口的产品，提高国产化水平。一句话，我

们实行对外开放也必须十分注意和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工作做得好，治理整顿和对外开放不仅不矛盾，而且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的工作应该立足于这一点。

十、我们的国家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任何决策包括治理整顿方针的实施都不能“一刀切”，这无疑是对的

但是，如果总体上不“切一刀”，治理整顿和调整经济，也就会成为空谈。

比如说，目前经济过热已开始降温，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已经回落。在这同时，结构性矛盾尚未缓解，甚至有的方面进一步恶化，有些该保该发展的企业或产品生产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受到了本不应该受到的严重影响。对此，我们的正确态度只能是：首先从总体上肯定降温是对的，必要的；同时抓紧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改善外部条件，把该保的保上去，而该压未压的还要压下来。

再比如说，实行紧缩金融的方针，从总的方面对治理整顿方针的落实起了积极作用，但也有些应该保证其发展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资金紧缺而发生了某些实际困难。对此，首先要坚持在总体上实行紧缩金融的方针不动摇，否则就无法压缩过旺的社会需求和控制通货膨胀，对稳定发展经济的全局很不利。在总体紧缩的前提下，也要根据符合国家宏观发展的要求和产业政策的导向，区别对待，该保的保，该压的压，做到紧中有活。

归结起来说，我们既要防止不区别任何不同情况的“一刀切”，也要防止以反对“一刀切”为名而抵制治理整顿方针的

贯彻落实。

十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创造稳定的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是经济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坚持改革开放，都将导致中国天下大乱。现在，全国人心思稳。经济要稳定，政治要稳定，社会要稳定。离开稳定，什么也办不成。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得好：“必须把稳定、改革和发展统一起来，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求得发展。”“任何社会动荡和混乱都不利于建设和改革的进行，严重损害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违背广大群众的心愿的。”

十二、总之，要一心一意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

这样，少则二三年，多则三四年，我们不仅将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而且必将迎来建设和改革更加健康、更加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路在哪里？路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希望就在我们的前头！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基本认识

(1989年4月)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条重要的指导方针，至今尚未普遍被人们特别是肩负着改革和建设重任的相当一部分负责干部所深刻认识。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精神文明建设相对于物质文明建设来说，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是薄弱环节，甚至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跛足”状态。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某些混乱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不能不说同这种情况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促进新旧体制转换的社会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旧体制之间，新旧观念之间，现代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经常相互撞击，发生磨擦，产生矛盾。这种撞击和磨擦有时相当剧烈，矛盾有时相当尖锐和深刻。不断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而解决矛盾，推动社会进步，最终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明建设，同时也离不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长期遭到忽

视，社会主义就难以摆脱畸形发展以至蜕化变质的危险。

下面，我谈谈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若干基本认识。

一、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者必须同时抓。一起抓，不能偏废，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在它的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没有物质生产水平的极大提高，没有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不实现生产的高度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显现出来。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期也不能忘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发生过的一切失误，特别是长期错误地坚持所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偏离了这个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正确的认识。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建设，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维护、促进、保证和指导，也就难以把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和发挥出来，不可能获得极大的推动力来充分有效地促进物质文明建设，更重要的是物质文明建设就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就有走上邪路的危险。长期忽视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就必然渗透到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侵入党和国家的肌

体，使我们一些干部和群众在这种渗透和侵入面前丧失必要的鉴别能力和防止腐蚀的能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人的纲领、旗帜和理想。我们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生产的概念，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概念，它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而不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越来越局限于只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丧失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平等互助、亲密合作的关系也就会越来越淡漠。这当然是同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和理想相违背的。而当前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的甚至正在发展着的许多消极现象，无疑已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这一点的充分警惕。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认识越清醒、越深刻，就越能自觉地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这个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战略方针。

二、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但精神文明又决不是物质文明的附属品和派生物，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真正提高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

毫无疑问，离开物质文明建设，放弃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最根本性的任务，侈谈精神文明建设，必然流于空谈，甚至走上精神决定一切的主观唯心主义，是错误的。但是，反过来认为，生产发展了，物质文明搞上去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

地建设起来，这种观点对不对呢？生产发展了，物质财富增加了，人民的富裕程度提高了，是不是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呢？当然，社会成员受教育的程度、知识的普及、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的确是同他们富裕程度的高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贫穷往往是愚昧落后的主要根源。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财富增加了，物质文明发达了，并不等于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再存在什么苦闷、彷徨，不再有什么精神腐化和道德堕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臻至充分团结、和谐的完善境地，精神文明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践，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在他的讲话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很重要的话：“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纪律，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是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我们要记住这个真理，保持住真正的优势，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长期自觉地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样，我们也才能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使全体人民逐步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精神境界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永葆青春，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上包括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和加强理想建设、道德建设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一定要认真搞好这两个方面的建设并使它们能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必然要求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方面事业的发展，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物质文明建设的条件和基础，但实践也证明只有它们能够有适度的“超前”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有利于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曾经形成过一个极其简单化的错误概念，即认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因而对人类知识的积累，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优秀文化的继承，都严重地遭到了忽视。再加上什么“无文化的无产阶级光荣，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可耻”等等这类荒谬观念作怪，曾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相当严重地轻视文化、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极度落后的不良风气。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努力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这样才能有利于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加快发展，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此同时，无论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事业的普及，文化知识的提高，文学艺术等多项文化事业的发展，还都要坚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方向，一切教育、科学、文化工作者，无疑都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和崇高的历史使命。

理想建设和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极

为重要的地位。一个人如果缺乏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必然会趣味低下和庸庸碌碌。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缺乏共同的理想和优良的道德风尚，这个国家必然会缺乏坚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精神萎靡，风气日下，缺乏生机与活力。在全社会的理想建设上，我们必须首先着力于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这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对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积极思想和精神，对于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积极思想和精神，对于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积极思想和精神，都应当尊重、保护、鼓励和发扬，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一切应该和可能团结的力量，发挥一切应该和可能发挥的积极因素，努力实现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同时又要指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尽管这还是相当遥远的事情，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为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对此，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在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方面，我们必须同现阶段的经济基础相适应，首先着力于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道德，努力在各民族和各阶层人民中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并针对不同职业的人们提出适应其各自职业特点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这是可能做到和应该做到的，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觉悟程度相适应的，同时又不能忘记，公而忘私、舍己为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等这些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也应当在社会上加以提倡（当然

不能强迫推行),并要求共产党员、先进分子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广大群众,以利于带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对先进分子的先进性要求和对广大群众的普遍要求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引导人们和全社会不断前进的强大的精神吸引力。

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必须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服从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不动摇地贯彻落实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不能离开而且只能服从于这个中心。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治国的根本,是改革开放的政治前提和思想保证,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就会“改”到和“开”到邪路上去,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坚定不移地进行全面改革,不扩大对外开放,现行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中的种种积弊得不到克服,闭关锁国的愚昧落后状态打不破,社会生产力得不到解放,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停滞和僵化,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逐步趋于

完善。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相互结合的，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忽视了这两者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将背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实行对外开放，不仅适用于和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要充分利用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有益的思想文化学到手，结合我国实际加以运用，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在这同时，当然我们也要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不能让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我国自由泛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应当做到也必须做到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历史与当代世界上创造出来的一切思想文化成果，使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这样才能逐步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必然要求不断消除封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做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并采取正确的方针

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封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我们国家里的影响是很广很深的，消除它

们的影响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长期任务，必须伴随着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自觉地、经常地、逐步地进行。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既不能用资本主义思想去反对封建主义思想，也不能用封建主义思想去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只能用社会主义思想去逐步克服它们。由于我们的国家大，情况复杂，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人们的思想觉悟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在不同的地方和单位，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人们当中，究竟是封建主义思想还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更大更深一些，危害更严重一些，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人民中，笼统地提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为主，还是以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影响为主，或者提出反对其中哪一种思想影响更为紧迫更为重要，恐怕都未必妥当。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应该是，在不同的地方（如城市或农村），在不同的人们当中，在不同的问题上，哪种思想影响更为突出就着重克服哪种，有什么反对什么，这样做可能更加切合实际一些。当前，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名而否定我国现存的一切，以反对资本主义为名而反对改革开放，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的。

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

这既是一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任务，又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我们全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不能不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

论为指导。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是错误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而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学说，也是错误的。”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必须继续反对这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行坚持和发展的统一，使它们统一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之中。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侈谈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种离开正确坚持的所谓发展，必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用僵化的观点去裁判生活和实践，这种离开正确发展的所谓坚持，也必然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不愿促进甚至阻碍改革，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是应该注意防止和纠正的。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在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前进又指导实践前进。

从总体上看，十年改革带来了我们国家的大前进、大发展。尽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但已有的实践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以进一步思索的丰富养料，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我们必定能够继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同首都高等院校学生的对话

(1989年4月)

受国务院和李鹏总理的委托，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4月29日下午在团中央会议室同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了坦诚的座谈、对话。

这次座谈、对话是由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主持召开的。

在对话中，大家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道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广大同学的一些希望同政府的 愿望是一致的

座谈、对话开始时，袁木首先告诉在座的同学，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托他给大家，并通过大家向广大同学捎几句话：希望广大同学能够尽快复课。如果大家对国家事务，对社会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提出来。

袁木说：李鹏总理还特别让我告诉大家并转告北京高校的广大同学，《人民日报》社论当中讲到的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的问题，是针对极少数

人的违法行为说的，并不是针对广大同学的。广大同学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希望推动民主化进程，深化改革，惩治贪污，克服腐败，这些希望，同政府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们的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要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经过冷静的、理智的思考，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党和政府进行治理整顿，渡过眼前的困难。

袁木指出，应该说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不少困难，如果再动乱，再不稳定，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希望同学们和社会各方面努力支持党和政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到底，以取得预期的胜利。

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一位学生说，同学们提出的“官倒，官倒，不打不倒”的口号，反映了现在存在的一些严重腐败现象。同学们怨气大的是：中央查处官倒的措施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人们希望能看到查处的结果。

袁木说，同学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采取打倒的办法，恐怕未必能达到目的。要解决“官倒”问题，主要靠两条：一是靠对问题的揭露。谁掌握了这方面的材料，我们都欢迎向举报中心举报。再一点是靠制度建设，比如现在推行的“两公开，一监督”制度。

袁木提供了几项数字：1988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 313306 件，其中包括“官倒”的经济犯罪案件有 55180 件，审理结案的有 55170 件，判决的有 74923 人。目前

有 2784 个检察院建立了举报中心，158 个大中城市建立了举报中心，仅 1988 年下半年就受理各种举报材料 147000 多件，其中贪污受贿的 52000 多件，已立案侦查的 5700 多件，万元以上的 1500 多件。据监察部最近提供的材料，一年多来监察机关受理单位和个人检举控告材料 77297 件，由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 25255 件，到目前已结案 17757 件，直接给予或建议给予行政处分的有 12699 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 432 人；建议给予党纪处分的 1187 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 1571 人。

袁木说，我列举这些材料，并不是说查处“官倒”和其他贪污受贿等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只是想说明一点，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惩处“官倒”和贪污受贿的，是决心要克服腐败现象的，但不加调查，用简单的“打倒”的办法，可能会导致我们不愿看到的后果。我再次代表国务院欢迎社会各界，包括青年学生对“官倒”等问题进行举报。

北京理工大学一名学生问：中国出现“官倒”，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现象，还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上的失误？袁木回答说，“官倒”的出现，有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从经济上讲，首先是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还处于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发育不健全，因而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从政治上说，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目前还缺乏必要的法制，缺乏必要的制约，以权换钱，以钱换权，权钱结合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严重地存在；从思想领域讲，还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此外，政府决策上出现的失误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家在决策上也要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只靠一两次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北京医科大学一位学生问：您认为中国最大的“官倒”是谁？治理整顿以来效果如何？

袁木回答，关于谁是最大的“官倒”，我在这儿很难指名道姓地说清楚。我可以告诉大家，对康华、中信、光大、农业投资等几家大公司，审计署已经派了工作组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审计，初步审计的结果已经出来，并决定在情况核实后，公布审计结果。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各地各部门对整顿公司的结果要采取多种形式加以公布，其中包括登报，接受群众监督，防止走过场。

要调整教育布局

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位学生问：许多同学提出教育问题，请问有什么重视教育的措施？何时兑现？

何东昌说，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教育领导小组，今年准备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中央全会。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包括思想品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教育。这里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的因素。我认为，教育的失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上的失误。要调整布局，包括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高教师待遇。首先全党同志要重新认识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没有钱不行，北京市今年教育经费投资占全市财政投资的20%，比去年提高了2%。全国要建立一种新的税种来改善教育，做到人民教育人民办。

陆宇澄说，关心教育就是关心民族的素质、国家的前途。北京市财政用于教育的投资每年都有增加，中小学师资队伍

建设是教育大计，因为教育以教师为本。为了吸引和动员更多的学生上师范，我们将创造一些条件。

袁木说，今年国家的财政收支相当紧张，相当困难，但由国家拨款的教育经费，还是要由去年的 320 多亿元增加到 370 多亿元，增加 50 亿元，增长比例是 15.4%。知识分子待遇低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失误，国务院已经认识到这一失误，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问：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对胡耀邦辞职没有做出解释。既然说胡耀邦对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那么为什么又要让耀邦同志辞职呢，请问党内的民主生活正常吗？

袁木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作为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不便回答这个问题，但作为党员，我愿意谈谈我的看法。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忠诚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党中央对胡耀邦同志已经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胡耀邦同志 1987 年初提出辞职，他对自己在那段工作期间的缺点做了自我批评，他觉得自己不适宜做总书记工作，主动提出辞职，当时曾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来又经过中央全会的批准。

国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说，要求新闻说真话是学生最强烈的要求之一。我们要求新闻报道全面、真实、及时。如果新闻不自由，民主建设也无从谈起。要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袁木说，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抓

紧草拟新闻法、出版法，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今年有可能拿出草案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是记者出身。据我所知，国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新闻报道工作实行的是报社总编辑负责制。有时当他们感到有些报道难以把握时，也往往会将稿子送到有关部门审阅核实。报禁问题是指旧社会的新闻审查制度，有时对一些新闻报道，检查官不让发，补别的稿子排版来不及，就会出现报纸“开天窗”的现象。现在没有这种现象。

何东昌说，新闻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报纸上的每一行字，每篇文章都要对读者负责。

袁木补充说，根据宪说，新闻报道享有自由，同时，也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因为报道承担着社会责任，要对广大读者负责，不能有什么报道什么，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学生和公安战士要互相谅解

中国政法大学等校学生提出，在4月20日学生游行和静坐过程中有警察打学生的现象。

袁立本说，“4·20”那天，我在新华门现场，我看见有人从后面朝武警战士扔汽水瓶。游行队伍走后，新华门前有许多汽水瓶渣。有人传言，有警察带警棍，用大头鞋踢学生。根本就没有持警棍和穿大头鞋的警察。有关部门规定，武警上岗必须扎皮带，穿胶鞋，公安干警中有些人穿的是皮鞋，但没有大头鞋。如果有人看见警察带警棍，请指出来。有关部门对武警和公安人员经常进行文明执勤、严守纪律的教育，不准打人。

当然武警战士和公安人员有的比较年轻，不能保证上百上千个武警战士和公安人员都不犯一点错误。公安干警也有挨打的，希望大家相互谅解。如果有武警战士和公安人员有过激行为，打了人，查有实据，也要依法处理。我们已做出规定，凡是有学生反映武警战士或公安人员打人的问题，武警部队或公安部门都要派人到学校找到他，核实情况，做出处理。

只要不触犯法律，一概不究

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提出，“4·21”、“4·27”两次学生游行，有数以万计的北京市民欢迎，有的把钱、烟扔给大学生，有的喊：“大学生万岁！”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民心所向。

袁木说，大多数同学怀着满腔热情，要求推进改革，反对腐败的愿望与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何东昌接着说，同学们在游行中喊的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等口号。如果有人混在队伍中，提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生参加。搞动乱谁高兴？一些用心不良的人高兴，台湾、香港、美国的一些右翼势力高兴，北京大学就出现了在美国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支持信。

袁木希望大多数学生在保持满腔热情时，要多一点理智和冷静。

袁立本说，北京有1000万人口，流动人口近200万。27日学生游行那天，北京有30多万人坐不上公共汽车，有许多人取不到牛奶、换不上煤气罐。这一点《北京日报》今天已做了报道。游行使交通严重阻塞，影响生产。

袁立本说，现在发现有人到中学串联。大学生有满腔热情的一面，也有理智的一面，但是中学生一旦乱起来，局面就难以控制。希望不要去中学串联。关于游行问题，同学们可以做调查，许多国家有游行法，到什么地方游行，如何组织，甚至连哪些口号不能喊都有规定。在有些国家，如果违反游行规定都会受到制裁，使用警棍和警具就不必说了。

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问，学生游行，为什么用解放军阻挡？

袁立本回答说，我们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是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违反了这一规定，因此我们对这样的游行不赞成。北京的警察不多，学生游行时又要防止有坏人趁机捣乱，为了保护王府井、大栅栏一带商业区，也分散了不少力量。这样做是从全局考虑的。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问：既然把极少数人同广大学生分开，那么中央对学生运动将怎样评价，对运动的组织者如何对待？

何东昌回答，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无论对学生，对教师，还是对任何人，哪怕说过一些出格的话，做过一些出格的事，一概不追究责任。袁木表示完全赞成何东昌同志的意见，并表示将把这个意见转告给国务院有关部门。

对党要有基本估计

清华大学一学生问：许多同学反映现在党风不正、腐败现象严重。根据有人画的“关系图”，一些干部子弟凭借裙带关系获得高级职务。请问怎样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袁木说，关于党风，现在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我想说一点，对我们的党还是要有个基本估计。应该承认，这几年党风问题确实有日益严重的趋向，这是事实。但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党还是好的。学生们不是也打出“拥护共产党”的标语吗？如果这个党彻底腐败了，变质了，不要说同学们不拥护，我也不拥护。

他说，近10年间，党和政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这10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但由于历史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包括由于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以及实行对外开放以后的一些消极影响，所以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党风不正问题。但是，党是有决心、有信心克服这些问题的。

袁木说，至于“关系图”，这要分析。有些人把与领导人同姓的中青年负责干部说成是某领导人的儿子，不同姓的说成是女婿，有的与事实完全不符，有的出入很大。总之，我不赞成画“关系图”这类的做法，像“文革”中搞的“百丑图”，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安定团结。

北京建工学院一学生问：中央提出要过几年紧日子，领导干部应该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但有的领导却一个星期携夫人打一次高尔夫球。

袁木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可以转达你的意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表示，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机关要带头过几年紧日子。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已经决定，从今年起，夏天不再到北戴河办公。因为那样会增加财政开支，造成交通紧张，与过几年紧日子的要求

不相适宜。

他说，中央还决定，从现起，国家不再进口豪华轿车。

北方工业大学一学生说，中央说不论对任何人，只要有贪污行为都要进行查处。如果有，请公布事实。

袁木说，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机关中，不论是哪一级干部，如果有贪污现象，一定严肃查处。但让我现在就公布事实，这很困难，不仅仅在于我并不了解全部情况，更在于我讲的话要负法律责任。因为，许多问题的查处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这点，请大家能够谅解。

对话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但不包括非法成立的组织

有些学校的学生提出，对话应在同学生选举的、能够代表学生的代表中进行，并希望同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直接对话。

袁木说，我认为对话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对话，不是对手之间的谈判。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而是为了相互交谈，沟通思想，增进理解。只要大家有诚意，愿意坐在一起谈，就不应该有什么先决条件。

当一位政法大学的学生提出政府应同“北京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对话时，袁木和何东昌明确表示，我们是来同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

对话进行了近三个小时。主持座谈对话的全国学联负责人表示，今天的对话气氛很好，今后愿意继续组织这样的对话。

(据新华社报道)

就北京学潮和动乱问题答记者问

(1989年5月)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5月3日上午说，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袁木是在全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这番话的。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镠、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出席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问：昨天，一些高校学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部门递交了“请愿书”，提出有关与政府对话的问题，并要求今天中午以前作出答复，请问政府将如何答复？

袁木答：昨天下午3时，中办和国办信访局负责同志在信访局接待站接受了这份“请愿书”。“请愿书”表示欢迎与政府对话。这一立场与政府是一致的。我上次与学生对话时就说过，政府愿意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通过不同渠道与各种不同观点的同学对话，这种对话是为了沟通思想，增进了解，以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同对手的谈判。昨天部分学生的“请愿书”中对对话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

件，而我早就说过，对话应建立在相互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袁木说，部分学生在“请愿书”中总共提出十二条，核心的问题是三条。第一，他们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举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袁木说：“请愿书”第二个核心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请大家想一想，他们这样的说法是否合情合理。

袁木说，第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请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是真心实意地爱护广大青年学生、关心他

们的成长的，也希望他们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明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

美联社记者问：刚才提到在幕后挑起动乱的少数人是个什么人，是学生，还是其他什么人？政府对这些人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袁木答：我说学生上街游行，后面有极少数人出主意，蓄意制造动乱，我个人认为，这些人主要不是学生，但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学生。我们已经宣布、如果不触犯刑律，学生的一些过激言论和行动都不予以追究。但如果触犯刑律，就将按刑律追究。对于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我再次代表政府重申，要加以保护、爱护，给予充分理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问：亚洲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袁木答：我已经看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方励之先生的这种主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任何一个真心诚意地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公民，任何一个真正希望中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富强起来的公民，都会作出他的判断。方先生一向打着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号，如果这篇报道是事实的话，那么这种主张同他打的旗号是否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呢？

袁木说，在中国正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发生某种动乱以及国家经济发生某些临时困难的时候，方先生提出这种主张，他

的用心又是什么？请主持公正舆论的朋友们去判断。

袁木接着说：可能有些外国朋友看到了中国目前有些临时性动乱，而由此想到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坚持。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决不变。一些暂时的动乱，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有决心加以制止。也许一些临时性的现象会在某些人的心理上投下一些阴影，造成一些对中国开放的暂时的影响，但历史的发展会证明，中国对外开放决不会改变，而会越来越开放，这是我们既定的政策。

袁木重申，中国在实行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对于一切外国、外商在华投资，将绝对地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任何影响。不管中国发生什么情况，绝对地保障外国、外商在华的合法权益。从这一点上说，不仅中国公民不愿意中国动乱，一切真正关心中国，愿意和中国人作朋友的外国朋友，也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动乱。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明天将有多少公安武警来对付学生的游行？是采用武力的、暴力的方法来镇压学生的游行，还是跟上次一样心平气和地对待学生的游行？

袁木说：关于游行示威，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中国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也要遵守有关法律规定，譬如在北京必须遵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项规定。我们不希望再看到影响社会稳定的游行示威。如果一旦再发生，我们将采取我们前一个时期已经采取的正确的心态和做法对待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北京市的负责人是否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袁立本表示，完全同意袁木同志的看法。

美国之音记者问：说学生背后有一些人活动，能否举出一些人和机构，方励之先生是否列入这类人？

袁木答：种种迹象表明，最近在北京高等院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有极少数人在那里出谋划策。举一个例子来说，被中国政府宣布为反动组织的、设在美国的“中国民联”的一些成员，就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对方励之先生的全部言行，我在这里不发表评论。我刚才的评论，只是对刚才那位记者先生所提到的问题而说的。至于这位记者先生问到的方励之先生应该划入哪一类人，我希望方励之先生以他自己的言行作出回答。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问：目前各国新闻舆论对中国学生的问题十分感兴趣，这一点是否对当局处理学生示威游行有一定影响？

袁木答：各国舆论的确对中国最近学生的行动表现出程度不等的关注。但是，关注和支持是两个概念。我已经注意到，目前一个时期以来，国际舆论对有关中国学生的行动作出了种种报道。从中我们看到，各种报道所表现出来的关注、角度、看法差异很大，但有一点是相当共同的，就是在处理学生游行示威的过程中，都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要说区别的话，从根本上说，有些舆论是企图在中国煽动动乱，希望这场动乱越闹越大，有的舆论则希望事态尽快平息下去。我赞成后一种舆论，而不赞面前一种。道理很简单，中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使经济建设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符合世界人民的意愿。我们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和大局来劝告青年学生们尽快复课，停止游行示威。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懂得这个大局的。我还想说，有些学生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对有的道理一时接受不

了，我们也不强求，但希望他们在行动上理智一点，冷静一点，认真想一想，政府并不是要与学生对立。在这个问题上，学校当局，合法选出的学生组织和许多同学在这方面做了很艰苦的工作，我对他们表示敬意。

何东昌接着说，非常赞成袁木同志的讲话。对支持我们的国际舆论表示感谢。4月19日、20日以前，有一段时间，大学里出现的大字报中和个别人的讲演中，发表过一些反对政府的言论。4月27日的游行中，学生们呼喊的口号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宪法”。对这两种对立的态度，有的舆论报道是不一样的。

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问：为什么少数人可以挑动十几万人上街游行、罢课，其中是否有社会的背景和原因？

袁木答：我认为，刚才香港这位记者先生讲的少数人能够挑动动乱，的确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原因，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有缺点和失误，譬如说，我们现在还有这样或那样的贪污、腐败现象，群众不满意。少数人就利用群众这种不满意挑动他们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本人就是坚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一直顽固坚持这种立场。有些人就是要反对中国的宪法，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中国的各种规章制度。有的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有的人是要想在一场动乱中达到一些在安定的条件下不能达到的目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挑起动乱。

袁木指出，据我所知，有一些人已经在我们的高等院校当

中进行了几年的灌输种种错误思想，提出种种错误的政治纲领，进行种种非法的组织串联活动。希望这些人不要以为政府很天真，不了解这种情况。

何东昌说：我们的大学生 99.9% 以上是好的，是善良的。但是，确实有人在背后企图挑动，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被他们挑动的。挑动的人里头公开提出的纲领性口号，就是要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过去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间有某些缺点，譬如某些文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是应当改进的。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主张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

他指出，在北京，包括外地的高等院校，有所谓 7 条要求、9 条要求，共同点就在这里。4 月 18 日清晨，有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演说中间也有这个内容。4 月 18 日一些学生要求递交的“请愿书”中也有这个内容。这几位学生中间有的人就是在 4 月 22 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下跪，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来接请愿书的。作为国家教委副主任，我相信这几位同学的心地是善良的，有的仅仅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但是，我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挑动。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问：你们是否准备在什么时候、准备以某种方式来同学生组织起来的那个包括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进行对话，甚至有可能这个对话是同承认这个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呢？

袁木答：关于对话问题，我已多次表明了政府的态度。我们真心诚意地愿意同广大学生对话。为了方便政府和学生之间对话的进行，我们认为应该由广大同学经过民主法定的程序，并经过合法批准的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以及各高校的学生

会、研究生会作为组织者来组织学生进行对话。我们所以一再表明这个态度，正是因为我们尊重广大青年的民主权利。

袁木说，回顾历史，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所以长期受外国人欺负，就是因为中国一盘散沙。回顾“文革”的沉痛教训，所以造成那样严重的动乱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在学校中，后来扩展到社会各方面，分成两派、三派、几派，使群众队伍严重分裂。

他指出，政府真心实意地、满腔热情地爱护我们的青年学生，尊重和理解他们的爱国热情。因此，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每一个步骤必须十分地慎重，不能有一点点不利于加强学生之间团结的做法。有些学生对现在合法的学生组织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完全可以给学校当局，给学生组织自身，或者给北京市的有关方面提出意见。不这样做，一时之间一部分人就成立这样那样的组织，不管什么组织，都要政府予以承认，并且同它对话，就会招致相当多的同学不满意，我们就要犯一个严重的挑起学生斗学生的历史性错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也不能这样做。

何东昌补充说，学生联合会是中学生和大学学生的代表选举产生的。大学的学生会、研究生会也是经过代表大会产生的，是有任期的。不到任期、不经过代表大会产生的，都不合乎法定的民主程序。现在有的学生采取串联签名的方式来产生学生组织，这是不符合学生会的章程的。学生中其他的社团组织，必须经过学校当局或者北京市的民政局登记才是合法的。

汪家镛说；我完全同意袁木同志和东昌同志的讲话。在当前学生的情绪比较激动，意见比较分歧、正常的学习秩序没有恢复的情况下，采取合乎民主程序的方式来产生学生的组

织，是完全不利于学生团结的。我们的同学在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推进民主、反对腐败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她说，我们北京市学联和很多学校的学生会不赞成采取未经批准上街游行、罢课的办法，认为采取这种大民主的办法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在游行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又呼吁政府对游行的学生采取宽容、克制的态度，并且也有一部分学生会的干部参加了游行，帮助维持秩序，这是顾全大局，爱护同学的表现，是理智和现实的选择。而有些学生拿这一点作为推翻市学联和各校学生会的理由是错误的。

香港《虎报》记者问：对少数有反对政府言论的人，政府是否考虑根据法律采取行动，如拘捕他们？

袁木答：对于在前一时期的动乱中，直接进行打砸抢烧违法行为的人，我们已经随时发现，随时拘捕了一些，比如在西安、长沙。虽然有一些没有露面，躲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但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许多人被裹进了动乱，鱼龙混杂，难以分清，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如果采取直接的拘捕之类的措施，那我们就是愚蠢的。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立场和做法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心里爱护我们的学生，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子弟。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我们的任何行动都要十分慎重，不要伤害好人，尤其不要伤害我们关心和爱护的青年学生。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如果学生明天进行游行的话，政府是否采取措施防止他们接近明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行年会”的代表。如果学生们能接触这些代表，他们将就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现状谈些什么？

袁木答：我认为，经过我们多次表明政府的态度，许多同

学会认真思考。我希望，明天不要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也许我的希望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我衷心希望并相信，即使明天举行了游行，广大同学对于在北京召开的“亚行年会”，他们会自觉地采取维护的态度，不会去扰乱。我想，同学们是会这样去做的。

(据新华社报道)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反自由化等 问题答记者问

(1989年5月)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5月12日上午就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在中国记协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袁木首先向记者们通报了我国今年1至4月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关于外贸出口、基建投资和货币发行情况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在实行紧缩政策过程中，基建投资、外贸出口、货币发行量等数字时，袁木说，根据我国海关的统计，今年1至3月的外贸出口额为9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4%，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十五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经过控制和压缩有所下降，今年1至4月份全民固定资产投资总金额是30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6%，但还没有实现计划的要求。此外，经济效益方面也不够理想，国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的可比的产品成本，由于物价的因素，加上管理工作的落后，比去年同期上升15%。另一方面，每100元销售收入所实现的利税，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

袁木说，关于货币发行情况，去年末全国货币流通量为2100亿元，比1987年末多600多亿。今年以来，虽然又新投放了一些货币，但目前还是处于净回笼的状况，并且回笼货币多于去年同期。

袁木说，从今年1至4月份的整个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的工业生产没有在全局上出现滑坡现象。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某些国营企业生产滑坡的现象是存在的，这里有资金短缺的原因，有原材料涨价的因素，也有某些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工作跟不上的原因，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在回答今年物价零售指数是多少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章钟基插话说，今年1至4月的平均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27%，上涨幅度逐月有所下降。据统计，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有18个城市的物价指数4月比3月是下降的。

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靠三条

当记者提到歌星毛阿敏偷、漏税一事时，袁木说，毛阿敏女士“走穴”演出偷漏税一事披露后，经有关部门做工作，她已主动补交了税款。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我们也希望其他有这方面行为的人补交应交的税款。

他指出，这件事也反映出我们的税制还不健全，税务工作还没有跟上。因此，通过深化改革，缓解社会上普遍关注的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是我们抓紧要做的一项工作。为了缓解这一矛盾，第一，首先必须坚决打击那些违法行为，依法取缔各种违法经营活动，坚决地进一步整顿流通秩序，清理整顿公

司；第二，要进一步健全税制，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特别是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管工作。一切达到收税标准的都要照章纳税，杜绝偷漏税现象；第三，从长远来看，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人们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搞运动

有记者问：您上次在同学生对话时曾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彻底”，这是否意味着谁将对这种不彻底承担责任？是否意味着准备再开展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

袁木回答：据我个人理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同一个概念，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曾多次对此作过解释，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核心问题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我们同它的矛盾、斗争，将在我国社会长期存在。

他还说：我在上次的对话中并没有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彻底”的意思，只是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出现过“不坚决”的现象，“不彻底”和“不坚决”是两个概念。在我的谈话中，没有任何一点要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意思。我个人认为，解决这种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能靠艰苦、耐心地加强和改进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不能靠搞运动的办法来解决。

相信广大同学会从维护稳定的大局出发

有记者问：听说学生们要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游行示威，并要求同他对话，请问政府对此有何反应？

袁木回答：关于学生的游行、示威、罢课，作为国务院发言人，我已经在和学生的对话以及记者招待会上谈了我的观点。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通过各种不同的场合对这一问题表明了看法。我相信，同学们会按照党和政府提出的，更加理智，更加冷静，遵守秩序，采取克制的态度，通过对话的办法，依照合理的途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使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我还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会从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这个大局出发的，是会维护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的。

（据新华社报道）

关于首都反革命暴乱的真相

(1989年6月)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6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内容如下：

袁木：今天举行一个国内记者招待会，主要是因为从6月3日凌晨以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反革命暴乱。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国外舆论的密切关注，所以国务院委托我请来了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丁维峻，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有关情况。我们可以先讲一讲，大家有什么问题再问。我先讲几点：

第一点，现在的局势。总的来看，6月3日凌晨极少数暴徒策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在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下面，暴乱者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或者说第一步的胜利，现在暴乱还没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势仍然是相当严峻的。

第二点，暴乱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界，对伤亡情况都很关心。国务院也很关心这件事，因此，让有关方面尽可能去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局势还不稳，秩序还相当混乱，许多正常渠道还没有恢复，所以统计数字还不完全，经再三核实的

不完全统计，情况是这样的：

解放军官兵受伤 5000 多人；

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 2000 多人；

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 300 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除此之外，军队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 400 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将来局势稳定下来有些可能生还，有些可能牺牲了。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个数字，我已经再三说过不是很准确，但是有一个数字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是经过向各个大学了解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北京各个大学死亡的大学生 23 名。我预计随着事件的发展、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各方面情况了解了，可能这些数字还会有变化。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给同志们通报一下。

再一点是关于天安门清理过程中的情况。这件事等会儿请张工同志来介绍，因为他当时在场，还有一段录像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大体的情况是，用原来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形象语言，他们基本上是和平撤离的。

张工：或者说自动撤离。

袁木：自动撤离、和平撤离，学生自己提出来是和平撤离，后来双方达成了协议。具体情况张工同志可以讲一讲。

再一点，国务院认为，现在首都形势还很严峻，稳定全局，进一步恢复秩序，这是关系到首都的大局。首都有一千几百万人，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秩序不能恢复，就会给极少数暴徒、歹徒有可乘之机。据现在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他们还在

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打、砸、抢、烧、杀都有，公共汽车继续受到烧毁，路障还继续在搞，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现在还要切断水源，切断电源，进一步把交通搞瘫痪，他们都还有这个计划，而且在一些地方还在进行着破坏活动。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首都 1000 多万人民的生活无法保证。现在已经面临着市场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特别是日常的副食品、蔬菜的供应已经相当困难，如果烧的煤气也没有了，液化气也没有了，用电再发生困难，交通再进一步瘫痪，这个局面就更加严峻了。我们希望全首都人民都能和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一起，为迅速恢复正常的秩序来共同努力。有同志建议现在可以提一个口号：大家来保卫人民生活、保卫社会安全。现在人民生活秩序如果再不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群众的利益就更难保护了。再向远一点说，如果再乱，乱得更严重，原来就对社会主义、对我们国家怀有种种仇恨的这些歹徒们的阴谋得逞，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颠覆，问题就更严重了。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指战员、公安干警、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希望我们的舆论机构无论如何从这个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地使我们这种内部的矛盾不要再激化，大家都来共同地维护社会秩序。这样，为非作歹的、打砸抢烧杀的犯罪行为也容易暴露，也容易得到处置，违法分子也容易得到处理，整个秩序也可以得到维护。我们对暴乱的幕后组织者、策动者不能手软，因为他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对的矛盾，这个问题不明确、不进一步地解决，也就不能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广大群众，包括广大的青年学生，从学潮开始以来，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

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我在这里呼吁：通过我们的舆论界尽可能地、更多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以消除各种误解，缓和各种可以缓和的矛盾。人民之间，人民和军队之间，人民和武警部队指战员、公安干警之间，无论如何应该团结起来。为了使目前的局面得到改变，希望广大市民在现在混乱的情况下不要再到街上围观。上班坚守岗位，下班就回家，不要在街上过多停留。这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民的自由。戒严本来是为了恢复正常秩序，因为在目前这么一个状况下，如果这些真正得到遵守，可能会比较快地把局面稳定下来。不稳定，很多事情都很难办，我们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以及国家的建设都谈不到。现在把局势稳定下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人都能做出一份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务院领导同志还要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一旦大局稳定，首都秩序恢复正常，我们政府同各界人士包括广大学生之间的对话就要继续进行，在各个层次上，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进行。各界人士包括青年学生在前一个时期提出的惩治官倒，克服腐败，推进民主建设等等这些意见，政府都要认真地考虑，并且通过对话认真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因为局势这样的严峻，本来开始考虑的一些事情的进程被打乱了。我想今后我们还是弥补这方面的损失，能够尽快地把局势稳定下来，能够把党和政府工作中应该克服的种种缺点尽快加以克服。这也是广大群众的愿望。

张工：首先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任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了，就是6月4日凌晨4时半至5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袁木：就是说没有用坦克、军车轧人。

张工：没有轧人，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当前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还有的传说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焚尸，这纯粹是谣言，根本没有这个事情。我想这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制造的，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谣言。现在谣言很多，我进门时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人说我们的两个集团军为了“争夺”南苑机场，相互之间发生了激战，从昨晚一直打到现在，并且动用了大炮。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集团军根本就不在南苑机场住，没有在那个地方，这种谣言纯粹是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

除了说明这个问题之外，我想把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简要地说明一下。6月4日凌晨1点半，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反复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算起来大体用了3个多小时），反复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这个紧急通告指出了在6月3日到我们清场期间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要求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尽快离开。经过反复广播之后，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在广场的群众逐渐离去，只剩下一部分人仍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呆着。部队在正式清场以前，为了使更多的人离开这个广场，再次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在反复广播宣传之下，学生代表向我们戒严部队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让他们和平撤退或者是自动撤退。戒严部队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又通过广播反复向学生说明，戒严部队完全同意他们的要求，请他们自动地、和平地离开广场。这样，就有不少的学生比较有组织地打着旗，从东南方向离开了广场。

清场开始时，广场上的人已经比较少了。部队由天安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推进，并且留下一个通道，让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能够自动地离去。直到学生和群众全部走完之后，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逐一地对他们临时搭起的帐篷进行了检查，看看里面有人没人。在确实弄清楚这些帐篷没有人之后，才用车辆把这些帐篷和各种障碍物，还有那个所谓的什么女神像统统推倒。在清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带着七个人，有的坐在一辆装着两桶汽油的车上，有的手里提着装满汽油的瓶子，企图用这些东西来烧毁军车，并且要搞爆炸，还扬言要烧毁天安门城楼，当我们干部战士发现他们之后，他们的车没有开，提着瓶子向金水桥方向跑，跑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抓获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整个清场过程可以说是在强大的反复的宣传之下，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撤退。这个过程很清楚，没有死一个人，没有轧伤一个人。

袁木：让我们看看当时撤离的一段录像。（看录像毕）

袁木：请张工同志继续讲吧。

张工：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戒严部队的全体官兵从5月20日执行戒严任务以来，对围攻、殴打解放军战士和干部的群众，当然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坏分子，一直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我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有个部队在石景山古城到八角地带被围困三天三夜，根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被打、被揪，有的军长、政委在你推我搡的情况下站了五个多小时，一直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从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1点半，部队向天安门开进，遭到暴徒的疯狂袭击。大家刚才看到一些录像镜头，其实有些镜头是没法录的，来不及做这个事情。就部队反映的情况，有些

暴徒使用的是钢筋棍、带钉子的大棒、装有汽油的自制的燃烧瓶。一些汽车、装甲车就是被这些东西烧毁的。他们还投掷了大量的石块、砖头、玻璃瓶，这些就像雨点般地打到部队指战员的脑袋上。好在我们部队戴着钢盔。许多同志到达天安门时，这儿打破一块，那儿伤了一块，这还都不计入受伤之列。还有一些极其坏的分子，从战士手中夺过枪就向战士开枪。因此，部队伤亡是比较大的，我们的战士在崇文门被他们抬到过街桥上摔下来，摔死还不算，还浇上汽油把战士烧焦，烧焦了以后就挂起来示众。除了伤亡比较大之外，我们一些装备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暴徒们烧毁和破坏了我们各种军用车辆，就现在初步的不完全的统计，大概有几百辆。

袁木：有个统计是烧毁各种车辆五百几十辆。

袁立本：现在有的还没有统计上来，据初步的不完全统计，烧毁的车辆是 568 辆，其中军车是 364 辆，公共汽车是 102 辆，其他是一些运输车辆，包括面包车、卡车等等。还有 202 辆公共汽车被推到路上作路障了。

张工：仅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被烧毁的装甲车、汽车就有 100 多辆。各种枪支被抢的有几百支（挺），现在很难说出具体的数字。现在我们巡逻的部队就看到有的暴徒骑着自行车，挎着冲锋枪。今天凌晨一点多钟，戒严部队在复兴门立交桥就遭到两股武装暴徒的开枪袭击。他们的头子已经抓住了，叫张军，22 岁，是北京崇光制件厂工人，家就在石景山区住。据他讲他那里现在还关着 4 名军人，一名军官，三名士兵。这些事实能充分说明两方面的问題：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首都当前发生的问题的的确确是非常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伙暴徒的气焰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

点。二是说明我们军队由于害怕误伤群众，因为这里有很多是受了他们的煽动、听信了传说的群众，有些是围观、看热闹的人群，所以部队始终采取非常克制的态度。从我们的伤亡和装备所受的破坏来看，如果我们不是采取克制态度，根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状况，就不会有那么多官兵伤亡，也不会有那么多武器装备被破坏、抢走，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军队如果不克制，手中有武器，不要那么多的军队，也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情景。尽管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凌晨已经是反革命暴乱了，我们部队被迫进行了一些自卫，也多数是对空鸣枪，万不得已时对空鸣枪，但是我们仍然是非常克制的，因为我们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袁木：请袁立本同志将暴乱发生之后所受到的损失，还有一些社会情况，一些暴徒还在那里策划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向大家介绍一下。

袁立本：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由于现在各方面情况比较困难，形势依然很严峻，所以有些情况不一定全面。这次反击反革命暴乱取得初步胜利以后，首都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伙暴徒现在变换了手法，不甘心失败，依然猖狂地进行反扑。现在大体上反映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继续造谣，蛊惑人心，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和政府作对，和人民作对。由于我们现在各方面条件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有一些事实真相澄清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包括我们的报纸，这两天都送不出去。从昨天到今天，大概报纸都送不出去。

袁木：我们有两天看不到报了，连我们这儿也看不到报。

袁立本：现在的谣言针对着群众的心理，有很大的蛊惑性。特别是在有些群众情绪比较激奋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比较

难以冷静下来考虑。在崇文门菜市场门口过街天桥，从天桥上扔下来的那个解放军战士，后来被汽油活活烧死。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造谣，说这个战士是在杀死3个人以后，由于群众激愤把他打死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正好，咱们昨天早晨接到了家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女同志打来的电话，把事情的过程重新讲了讲。她说，她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反映崇文门一个战士被烧的情况。她说她是亲眼看到的。说有許多人传谣，说这个战士打死了3个人，还说有个老太太给这个人跪下，这个人还把老太太打死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种事可能发生吗？这个女同志讲，实际情况是，6月4日晨5点左右，有3辆车，好像拉东西的，只看清楚一辆拖车上是大头菜。当3辆车经过崇文门时，有很多人往车上扔石头和瓶子。这时有2辆车调头回去了。但其中挂有拖车的那辆车比较长，没有及时调头，这时雨点般的石头往车上扔。开始，这位女同志还以为车上没人，光有司机。实际上车上有11个人，这时他们完全可以开枪，但没有开枪，就看见他们跳下车往胡同里跑。跑的时候，这几个人开枪没开枪没看见，好像有枪，但枪不多。其中有一个人没跑了，被打死，又从崇文门天桥上扔下来，然后泼上汽油烧了。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打人。这个人如果有枪，他完全可以自卫，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这个战士被活活打死，还说他打死了3个人，这人太冤枉了。死了，还遭这么多人的唾弃。她希望向戒严部队反映，能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所以现在这些谣言，造谣的固然很可恨，但是，有些听信谣言的，传得绘声绘色，如果深一问，你是看见的还是听见，他又说不上来了。这些谣言很能蛊惑人心。

袁木：对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

武装警察和公安干警，我们感到无比的悲痛。有些同志确实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残害。刚才同志们看到的这个录像，当然还有其他的材料，将来都可以公布，这是一。对于无辜的，只是去围观，只是去看热闹；并不是和人民解放军相对立的，也并不是参加暴乱，我想从录像上看，大多数恐怕还是这样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镜头上出现的都是在自觉地搞暴乱。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状态下，好人坏人混在一起，良莠不分，皂白不分，解放军在被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断然措施，因此误伤了一些人。对这些被误伤的人，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在我来之前就跟我谈，对他们表示很不安，而且要查实他是哪个单位的，哪个机关的。现在有的是已经知道了。（袁立本：有的已经知道了）都要责成这些单位很好地、妥善地处理他们的后事。对于这一点，我也希望新闻界把国务院的这个态度传达给大家。当然有些人受暴徒的影响，不明真相，本来就对戒严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有情绪，到时候也参加到了里头，向解放军扔一点石头，打几下，我说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我也不认为，凡是参与围堵或偶尔袭扰一下解放军的都是暴徒。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对广大学生，都不能对他们这么看，同暴徒要分开。围观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要和极少数暴徒、歹徒分开。我们所说的歹徒、暴徒，策划反革命暴乱的，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书中讲的那些。他们是在背后的策划者组织者，是一些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一些人，是一些向非法组织泄露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重要机密的人，有些是在背后阴谋策划的人。这些人倒也不一定真正到大街上动手，他们往往是在背后阴谋策划。动手的是那些打砸抢分子，是那些流氓团伙，是那些劳改释放、劳教释放、刑满释

放但又没有改造好的那些人，是那些外地流窜到北京犯法的人。我们决没有那个意思，笼统地把凡上了街的都称为暴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一开头就讲，现在的暴乱在性质上的确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所以说它是反革命暴乱，是因为有极少数暴徒、歹徒已经用极其残酷、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待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妄想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我想，那些围观的，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不会采取那样残酷的手段对待我们自己的部队。从那么高的天桥上扔下来摔死了，还要烧，肠子都要挑出来，人打死了还要吊在那里示众。汽车里打死的，人都死了还要砸上几块石头，不是对解放军、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是做不出来的。这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极少数。所以我们第一要明确这场暴乱是一场反革命性质的暴乱。你看，使出来的一些手段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对解放军已经不仅是侮辱谩骂，不是一般地骂一骂，而是非常残酷，毫无一点人性。再说，一两天时间里有 500 多辆汽车被烧、被砸、被毁，一辆汽车如果一般按 10 万元来算，500 多辆就是 5000 多万元，对国家的财产一点感情没有，决不是我们一般群众所能干得出来的。还抢劫了弹药，抢劫了枪支。学校里有些学生就自动地把它交出来了。有一个学校就交出来 40 多枝枪。如果这样的学生是暴徒，他怎么能会交给你呢？肯定不会。但是，肯定有一些枪支流传到了社会上。有的人就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明目张胆地挎着冲锋枪。打黑枪的也都有了。我并不是说被误伤的人都是打黑枪打的，那也不是实事求是。但确有打黑枪的。打了黑枪，然后又栽赃于解放军，这种情况确实是的。因此我们好心的人们、善良的人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团结起来去对付极少数暴徒。我诚恳地呼吁大家，第

一，要认识这的确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第二，要看到在我们首都的的确确存在着极少数惨无人道的暴徒。这些暴徒的所作所为不是好心的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我们有些善良的人们，有些群众对解放军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可能一时有些不大理解，我们都不能责怪他们。可能有时宣传解释得不够，舆论也跟不上，他也不大清楚，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和暴徒混同在一起。要把暴徒孤立起来，制止暴乱，对他们不手软，坚决地打击。广大的人民群众呢，我们无论如何自己要和自己站在一起，和解放军站在一起，保证他们能正常地执行戒严任务，不要去干扰他们，不要去刺激他们，不要去挑起事端。这样，我想局面的稳定就一定容易得多。我们同反革命暴徒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根本就不讲阶级斗争，甚至于连政治斗争都不讲，什么斗争都说没有啦，人与人之间统统是兄弟姐妹，让世界充满了爱。我不是说不要爱，我也不是说我们一般同志之间，人与人之间都不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们这个社会里确实还存在着这么一些坏人，这是个客观事实，他存在着，他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满意，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刻骨的仇恨。当然也要讲，我们的工作确实也有失误，党和政府都有许多工作没做好，但是失误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人民非把党推翻不可，人民非要毁掉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不可呢？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并不是这样。而现在就有些人利用这个，煽动这个，再加上立本同志刚才讲的，他们制造种种谣言来蛊惑人心，因此非把一些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对工作中某些不满，比如说对“官倒”，比如说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把你煽动到、引导到非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否定我们这个社会

制度不可。这就不行。我还要说，还要非常明确地说，尽管有些人有这样那样不满的情绪，受到了人家的挑动，这些同志也还是好的，无非是不太知道真相，这需要我們耐心地做一些工作。

这里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目前的国际舆论。现在舆论是不同的。应该说，对在中国首都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以及制止这场暴乱的斗争，现在国际舆论的态度也不太一样。已经有人公开在那儿谴责我们了，而且有人提出了要不给我们这个，不给我们那个，要限制我们这个，限制我们那个，来对我们进行所谓的制裁了。对这一点，我来以前已经请示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他让我在这里通过舆论界对这种情况说明两点。第一，我们不怕。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手段，谴责也罢，制裁也罢，要想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答应。我们决不是软骨头。即使由于他们那样做使得我们遭受一些暂时困难，我们也要顶过去。我们这场制止动乱的斗争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顶不住，你根本就不敢下手了，人民共和国都被颠覆了，你要他点贷款，要他给点什么技术有什么用？这是第一个态度。第二，我们希望国际舆论、外国政治家们、政府不要太近视了，应有一点长远观念。尽管我们现在在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时刻，党和国家可以说处在相当危急的关头，但中国的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想，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那种专门刺激中国政府和人民感情的做法。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

招待会上，袁木等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据新华社报道)

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问

(1989年6月)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6月16日下午在国际俱乐部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的电视采访。

采访进行了45分钟左右。一些中外记者旁听了采访。

问：袁木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现在整个世界都非常想了解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请问是邓小平主席下令进军的吗？

答：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是执行国务院颁布的戒严令，执行戒严任务，为了维护首都的秩序。在对天安门广场的清理中，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没有打死一个人，解放军的军车也没有轧死一个人。现在国外舆论中有所谓血洗天安门，轧死多少多少人这样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当时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排着队、打着旗和平撤离的，或者说自动撤离的。

问：我在您所讲的这番话中发现一些令我震惊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有几百尺长的胶片，可以表明：工人、学生被枪杀，无辜的旁观者也遭到枪杀，而且不但是来自我们西方国家的记者，还有一些中立国家的观察家，整个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人都看到人们站在很近的距离被解放军枪杀了。您怎么能够说，您的中央领导人却不相信有人受伤呢？

答：我没有说在整个镇压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没有发生伤亡。我刚才只是说，解放军在清理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没有发生打死人的事情。至于在整个镇压反革命暴乱过程中，有一些歹徒被打死，也有一部分看热闹、围观的群众遭到误伤，解放军本身也遭到很大伤亡。关于这个伤亡的情况，我已经在前不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国务院宣布过了。在这个事件中，解放军有 5000 多人受伤，围观的群众和歹徒伤的有 2000 多人。死亡的数字大体上 300 人，包括解放军，以及歹徒和少数围观的群众。

现在有些国外的报道说中国在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甚至说多少万多少万人死亡，是不确切的，是歪曲、夸大的。我觉得国外有些报道之所以不正确，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前不久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的性质没有弄清楚。这件事情的实质，是极少数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暴徒策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是镇压暴乱。在镇压的过程中，由于好人坏人混在一起，解放军采取了容忍的、克制的态度。在一进城的时候，并没有开枪，因为怕误伤群众，所以解放军的伤亡特别大。如果解放军一进城就开枪，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他们的武器就不会被歹徒抢走那么多，我们的军车、坦克也不会被烧毁几百辆，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当然，在镇压暴徒的过程中，由于围观的群众较多，也误伤了一些人，对这一点我们也感到不安。首先，我们要对在镇压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他们为人民，为捍卫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立了功。

我还认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当这个国家有一部分人要颠覆他们的国家时，这个国家的政府对这些人实行镇

压，这完全是这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

问：袁木先生，尽管我对您很尊重，但我还是想对您所提出的这些前提表示质疑。首先，许多外国的观察家，包括训练有素的西方记者，他们都看到成百乃至成千的年轻学生和无辜的旁观者被杀被伤。当然，他们也看到一些士兵受到伤亡，但其数量远远比不上示威游行。此外，您刚才说，示威游行是由少数流氓和歹徒挑动起来的，那么您认为这是不是对中国千百万人民的侮辱呢？因为过去这段时间，成百万的教师、商店的售货员、工人，甚至记者都参加了示威游行，他们要求更多的民主，要求减少领导层中的腐败现象。

答：首先我要纠正你的一个概念，我一直在讲我们镇压的是反革命暴乱。我们对从4月中旬开始的一部分学生的示威游行从来是这样看的：第一，他们在学潮中提出希望党和政府整治腐败、整治官倒、推进民主、深化改革这样的愿望是好的，是同党和政府的目标一致的。但是，学潮被躲在背后策动动乱以至于反革命暴乱的坏人利用了。我们从来不认为广大学生是暴徒，但是也有一部分暴徒混在学生中间，这是事实。至于你刚才说到，成千成百甚至于更多的人死亡，我已经跟你说了接近实际的比较准确的数字，我希望你不要听信那些夸大的说法。

学生进行示威游行，这样的方式我们也不赞成，因为我们对于示威游行有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赋予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同时，为了使别人的自由权利不受到示威游行的人的妨碍，交通秩序得到维持，我们也有对示威游行的法规性的管理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有这样的规定。学生不遵守这样的

规定，我们是不赞成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混在学生游行示威队伍中的极少数反革命暴徒，他们已经提出了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颠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纲领和口号，这是他们要达到的实现暴乱的目的，对这种目的，我们是绝不能让它得逞的。这同学生在学潮初期提出的某些要求，比如你所说的多一点“民主”和“自由”，完全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问：你们现在定下了一个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叛徒，那就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先生，他现在已经由美国大使馆给予了庇护。那么，你们是否准备冲进大使馆将他抓起来？

答：我们的公安部门已经对方励之发出了通缉令，他触犯了中国的刑律，犯的是反革命煽动罪。我们知道他已经躲进了美国大使馆，我们密切地注视这个事态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

问：您认为，方励之是否会送到一个中立的第三国呢？

答：我刚才已经说了，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此事。我国公安机关已对方励之发出了通缉令，我们是要将他缉拿归案的。

问：您认为，他在中国有可能被进行审讯，甚至判处死刑吗？

答：如果缉拿归案，我们将依法惩处，将依据法律来量刑。

问：袁木先生，现在中国的领导层怎么样呢？赵紫阳先生是不是被撤掉了总书记的职务？你们现在有新的总书记吗？

答：前不久，邓小平主席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领导干

部这件事，就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领导层的稳定。据我所知，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中确有个别人犯了支持动乱的错误。关于他的问题不久将得到处理，公诸于世。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问题，将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

问：一些领导人甚至包括赵紫阳是否会遭到审讯呢？

答：我说了，党的最高领导层个别人的问题是党内问题，将按党的章程进行处理。

问：如果美国商人和其他西方的商人认识到中国是在被全副武装的军队所控制着，那么你们怎么能够希望他们在经历了这个春天的动乱后会回到中国呢？

答：我想他们会了解事实真相的。中国现在的政府稳定地控制着全国的局势。在首都，也只是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我们所说的戒严，是指对一些要害部门，实行特殊的警戒，跟军管不是一个概念，这和整个国家都实行军事管制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而且其他地方也没有戒严，除了拉萨因为前一段时间发生了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骚乱以外。

我在这里请你给美国的企业家、工商界人士带去一个信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绝不变。邓小平主席在前不久的讲话中说，现在中国不是开放过头了，而是开放还不够，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改革、开放。当然，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改革、开放的方针不变。我们欢迎原来就在中国和中国方面进行经济合作、贸易往来的美国朋友回去的快回来，我们还欢迎更多的美国商人来中国做买卖、投资、办企业。

问：请允许再问一个问题。您们怎么能够使得西方的商人相信您的保证：中国将继续向西方开放？要知道，您们一直在

说：在天安门广场伤亡很小，而且士兵的伤亡大于平民的伤亡；示威游行只不过是少数的流氓、歹徒挑起的。您们要知道，现在有许多计算所证明的情况与此恰恰相反。中国是否会在世界上失去她的信誉呢？

答：我想，排除了国外、也包括我们国内某些歪曲的谣言，世界明白了中国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中国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会得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企业界、工商界的信任的。中国这个市场还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在明白了事实真相后，是会扩大对华投资的。而且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就是在首都发生反革命暴乱期间，也并不是所有的在华进行各种工商企业贸易、投资活动的外国商人都走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走，而且他们表示，在中国安全能够得到保证，各种业务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并没有使得他们的业务停顿。我想那些匆匆忙忙走了的人，总有一天也会后悔的，当然现在回来也不晚。

再说一句：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从来是把参加游行示威的广大学生，尽管他们的方式不对，同利用学潮、策动动乱以至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坏人区分开来。对学生在学潮中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政府将加以充分重视。我曾一再代表国务院宣布过，在局势稳定之后，我们还将同学生对话，同社会各界人士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纳他们合理的批评和建议，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问：中国已在上海判处了3个人的死刑，他们被指控是流氓、地痞。那么，今后几天是否会有更多这样的人被判处死刑？

答：在上海被判处死刑的人是由于他们破坏交通，放火烧

毁火车，是罪大恶极的罪犯。我想，今后还会有极少数（但不会是很多）犯有这类罪大恶极罪行的人受到应有惩处。比如说，把解放军战士从过街天桥扔到马路上活活摔死，又在他还没完全死的时候浇上汽油，焚烧而死，而且把尸体挂起来，暴尸于市。对这样极端凶残的暴徒，如果不惩处，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我还想最后说两句，我希望通过你向美国观众、听众以至于世界的观众、听众捎一个信息：现在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浴血奋战，牺牲了两千多万人，用鲜血换来的。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这个国家，不希望发生颠覆，这是最基本的事实。谁要想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阴谋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

对于我们在首都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正义行动，我们希望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理解。我们也要向世界宣布：我们将永远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继续发展友好关系。这也是我们坚定不移、不会改变的基本国策。

问：现在在美国有4万名中国留学生，您希望他们都能够回国吗？要知道，在美国，这些人对记者和别的想听他们讲话的人都说，他们希望留在美国。

答：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是会回到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当然，我也不排除一些人不愿意回来。对此，我表示遗憾。从我自己来讲，我衷心地希望他们回来，也相信他们会回来。

问：你们是否会驱赶更多的外国记者呢？

答：凡是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报道我国的情况，不违反

我们的戒严令，遵守中国的法律，进行正常采访的记者先生、女士们，他们的正当采访权利都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保护。正像你的采访权利受到保护和尊重一样。

最后，布罗考重复他的第二个问题，并将问题中原说的有几百英尺录像带表明学生和围观者被枪杀一句改为有几英里长的录像带。

袁木说：既然你又提起这个问题，我不能不再说几句，我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有的人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他们可以搞出比你说的更长的录像带来歪曲事实真相。谢谢你对我的采访！

(据新华社报道)

关于 1989 年上半年经济情况 和我国对内对外政策问题答记者问

(1989 年 7 月)

各位记者女士和先生们！今年上半年，我国虽然受到部分地区社会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的严重干扰，但由于各级干部、广大职工和农民坚守岗位，努力生产，认真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

——夏收作物获得丰收。据初步统计，全国夏粮总产量将突破 9300 万吨，比去年增产 200 多万吨，是历史上又一个丰收年景。夏收油菜籽 550 多万吨，比去年增产 50 多万吨。

——工业生产保持了比较适当的发展速度。上半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完成 6396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8%，增长幅度回落 6.4 个百分点。三月份以后，能源生产回升快，上半年一次能源总量达 47632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5.9%。主要原材料生产也扭转了年初下降较多的局面，产量逐步上升。基本日用消费品生产逐月加快，增加了市场可供货源。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开始压缩，新开工项目明显减少。前五个月，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42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资规模压缩 7.1%；新开工 5 万元以上投资项

目减少 73.6%。

——市场零售物价猛涨势头有所抑制，商品销售比较平稳。肉、禽、蛋、蔬菜等主要副食品价格比较平稳，扭转了去年猛涨的势头。上半年预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4100 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 左右，低于去年同期增长 24.6% 的幅度。

——对外经济继续发展，利用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前六个月，海关进出口货物总值达 503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全国新批准利用外资项目前五个月为 2569 个，比去年同期增长 66.7%；协议外资额 54.5 亿美元，增长 42%；实际利用外资 37.6 亿美元，增长 32.7%。

——城乡居民储蓄明显回升，信贷规模有所控制。上半年，居民储蓄存款增加较多，比年初增加 644 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定期储蓄，有利于增加生产建设资金和减轻对消费市场的压力。由于储蓄增加和现金支出有所控制，使货币回笼情况好于去年同期。

总之，上半年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社会总需求有所控制，社会总供给没有出现人们担忧的“滞胀”现象，有效供给持续增长。但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矛盾还比较多，主要有：

——通货膨胀势头虽有抑制，但要实现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去年的目标还要作更大的努力。预计上半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 25.5%，主要是去年物价翘尾巴因素影响，新涨价因素只影响物价总水平上升 7 个百分点。也正因为这样，广大群众对物价上涨的紧张心理比之去年有所缓解。

——出口增幅较少，进口居高不下，差额有所扩大。上半年，海关出口 222.6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5%；进口

280.4 亿美元，增长 26.7%。扣除无偿援助、捐赠及外商作为直接投资进口的设备等不付外汇部分外，入超额为 38.2 亿美元。

——经济结构还不合理，企业经济效益不理想，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较慢，支出居高不下，结余减少。和去年同期相比，前五个月，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可比产品成本超支 18%，亏损企业亏损额增亏 1.1 倍。

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下半年要继续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搞好经济结构的调整，把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等薄弱环节搞上去，切实增加有效供给，进一步缓解供需矛盾。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运动，节约能源，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加速资金周转，反对一切铺张浪费现象，切实提高各个方面的经济效益，努力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下面是对记者提问的回答)

在中国记协 7 月 11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通报了我国上半年的经济情况后，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一些有关我国对内对外政策的问题。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在北京继续实行戒严肯定会影响对外经济联系，把外国人吓跑。请问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北京实行戒严，什么时候取消？

袁木：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得不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因为北京发生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平息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但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极少数反革命暴徒还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一些被抢去的枪支弹药还散失在社会上，随时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影响社会稳

定。继续实行戒严是为了进一步维护和恢复首都的安定，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政府机关正常地执行公务，也包括保障到中国、到北京来做买卖、办企业、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和进行友好访问和旅游的外国朋友的安全，保障他们能够正常地开展各种业务活动。我想，在人们越来越弄清楚北京反革命暴乱的真相以后，原来有这样那样疑虑的外国朋友，他们的疑虑也会逐步减少。在北京部分地区继续实行一段时间的戒严，会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进一步稳定，有利于扩大开放，也有利于恢复旅游事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我还要再次在这里解释一下，中国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其含意就是对一些要害部门和交通要道实行一种特殊的警戒措施，这同“军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决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局势已失去了控制能力。戒严部队是根据国务院的命令协同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任务，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进一步平息动乱和暴乱；二是尽一切努力保障社会的正常秩序。我想，随着人们恐惧心理的逐步消除，大家对戒严的误解也会消除。

新华社记者：现在中国进出口差额扩大，这对90年代外债偿还高峰有何影响？还有，上次你说，在平息暴乱中，军人和群众死亡人数大体各占一半，而陈希同最近在人大常委会上说军人死亡数十人，究竟哪个数字准确？

袁木：关于第一个问题，今年下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内，我国要坚决采取努力实现进出口贸易大体平衡的政策，进口过多的情况要加以控制。我们在经济决策中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外债还债高峰问题，国务院将采取必要的各种措施来应付这种局面。我还想说明的是，目前中国所负外债还没有超过我们能够

偿还外债的能力。中国偿还外债是讲信用的。

关于暴乱中死亡人数问题，我的讲话是在反革命暴乱刚刚发生两天之后讲的，当时有些情况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弄清楚。陈希同同志六月三十日讲的死亡数字，经过了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

美国有线广播网记者：对于农民不愿意按政府所规定的价格把粮食出售给政府，政府将怎么办？

袁木：关于这个问题，我对它在程度上的估计可能和你有所不同。确实，由于存在两种粮食价格，农民按合同收购价格把粮食等农产品卖给国家，在经济上会减少一些收入，因此会有一些农民不怎么愿意，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极少数人的身上。事实是，每年我们要求完成的粮食合同订购任务还是按时完成的。今年夏收情况不错，不至于发生大批农民不愿按订购合同交售粮食的情况。相反地，各地广大农民正在踊跃向国家交售夏粮。对极少数不愿按合同价格交售粮食的农民，通过加强说服教育工作，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国家的广大农民历来有踊跃向国家交售爱国粮的传统，他们是会从国家的大局出发的。另外，除了对农民进行为国家尽义务的思想教育外，国家还通过拨给平价化肥、农药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等经济手段，使他们感到在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上应该采取按合同交售农产品的正确态度。

合众国际记者：中国政府不断地对外国投资者、旅游者说，在北京实行戒严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现在有一种矛盾：一方面说北京一切秩序都恢复正常，另一方面又说暴乱分子手中有枪，随时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这两种说法哪个正确？

袁木：我觉得你提的问题并不矛盾。由于北京发生了动乱

和暴乱，所以我们要在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如果不这样，那么反革命暴乱分子就要颠覆我们的国家政权，使首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我们哪里还有什么正常的秩序，哪里还有什么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哪里还有对外开放，哪里还有驻京外国机构的安全。正因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还因为这场暴乱的发生已经酝酿了很久，现在还有残余分子，所以戒严一时还不能取消。所以不取消，目的也正是为了进一步恢复和巩固首都的安定和正常秩序。

联邦德国电视台记者：在联邦德国有很多公司、投资者已经作出这样的决定：在北京戒严令解除之前，他们不再来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因为他们认为在没有戒严令的情况下，才是安全的。请问戒严令还要持续多久？

袁木：我首先想请这位记者女士转告作出这样决定的朋友们再考虑一下，这样做是否明智。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未必十分明智。因为戒严以后，北京的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正常。当然，继续实行戒严是有限期的，但什么时候取消，还要看情况的发展。如果各方面秩序完全恢复正常，需要解决的事情都解决了，那戒严令是会取消的，但现在还不能宣布。

这里我还想再说一句，一切想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开展经济贸易往来和互相间开展旅游事业的政府、民间人士和各种群众团体，都不要以北京部分地区是否取消戒严作为同中国继续往来的先决条件。

安莎社记者：我也有一个矛盾的问题，学生运动曾经提出过口号，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但他们没有提到要打倒赵紫阳。但是赵紫阳反而被打倒了，李鹏、邓小平却没有，这是一个矛盾。所以在我看来，这个矛盾实际是存在党内，存在在政

府内，而不是存在在人民群众中的矛盾。

袁木：赵紫阳同志在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当中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因此经过我们党的合法程序；民主的程序，撤销了他的职务，这和你所说的或一般人们所说的“打倒”不是一个概念。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被我们党撤销了他的职务。学生在闹学潮的过程中，被制造动乱以致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阴谋分子所利用，提出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以至于在动乱和暴乱的过程当中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和学生在学潮的初期提出希望党和政府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推进民主，推进法制建设，深化改革等等，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事实证明，广大的学生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被极少数人利用而走向了他们开始闹学潮时的愿望的反面。

越南通讯社记者：赵紫阳是否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目前已有多少“高自联”、“工自联”的头头被逮捕？

袁木：赵紫阳同志的问题，目前是按党内问题处理。他的问题还在继续审查。他现在犯的错误属于在党内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是党内问题，先在党内撤销了他的职务。继续审查以后，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要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进行处理。

策动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的一些头头，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跑掉了。对于有一些人、某些势力，包括某些外国人、某些外国势力，在帮助他们跑掉的事情上，做了一些我们不高兴他们做的事情，对此我表示遗憾。究竟有多少人被捕了，有多少人跑了出去，很抱歉，现在我还无法向你提供准确数字。

中国日报记者：美国、西欧等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

袁木：从短期的观点看问题，美国和西欧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上实行的所谓“制裁”，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暂时的麻烦的。但是中国人民不会由于这种麻烦而屈服于这种所谓的“制裁”。相反地，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他们这样做会更加激发起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我想这种精神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可能是更有利的。当然，在说了上面的话之后，还是要非常明确的说明一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不会因为某些国家对我们国家采取了一些短视的政策，而改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我们仍然要继续实行改革开放。这种开放，包括对西方世界，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包括对第三世界，总之是向世界一切国家开放。这个方针不会变。

美国记者：最近的惩治腐败和学生一开始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是不是为了响应他们的要求而这么做的。第二个问题，请你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内、共产党内会有那么多腐败现象？

袁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始终坚定不移地克服自身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这并不是因为学生提出来才这样做的。学生没有提出之前，党和政府就是这样主张的。当然学生和其他各界群众在学潮初期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我们更冷静地看到群众对党和政府存在的这种问题的确很不满意。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快惩治党和政府内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的进程，措施要更坚决，进程要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的政府也是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总体上说，说中国的党和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无法整治的程度，我不赞

成这个观点。但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如果说到这位记者先生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某些腐败现象，那不是在这个简短的会上可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愿趁这个机会说一说。我们前一段之所以惩治腐败的效果不那么显著，同一度放松了党的建设，放松了思想教育，放松了对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据新华社报道)

国

《本

答回

本

息平

界世

因策

游

国前

然四

义主

。前

前

。括暴

律曲

进国

出群

低恢

立法
政簡
政
黨
要員

答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问

(1989年8月)

(意)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8月1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日本《读卖新闻》访华记者组的采访，就中国对内对外的一些问题回答了日本记者的提问。

袁木说，尽管西方一些国家在中国发生动乱、暴乱过程中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但中国政府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基本估计没有改变，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而也不会改变。

他说，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基本估计仍然是：总的来看，当前国际局势正从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国为自己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仍然是可能的。

他说，前一段时间，外国确实有些敌对势力插手了北京的动乱和暴乱。在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后，有些西方国家在舆论导向上歪曲事实真相；在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指责和谴责，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刁难和制裁，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但是他指出，中国所指的外国干涉并不是针对整个西方世界，而是针对那些一贯采取反共反华立场的势力而言的。中国

仍然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同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他表示相信，一度出现的反华浪潮将随着中国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稳定而逐步趋缓，乃至最终逐步趋于消失。

他还表示，中国方面已经注意到，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和当权人物，已经和正在通过各种渠道，透露了愿意同中国方面逐步缓和关系的信息。

日本记者问到，中共十三大强调党政分开，而平息反革命暴乱后又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这是否意味着党政分开不提了或不再实行了？

袁木回答说，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领导，其目的是为了党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优良的作风，保持组织上的纯洁，这同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并不矛盾。

他强调说，从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动乱乃至暴乱中，我们所得到的—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被淡化了，被削弱了。

他说，我个人认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为了使党更好地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保持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使党和国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二是党在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三是广大共产党员在各个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

他解释说，所谓党政分开，准确地说应该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这样做，将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也有利于政府行使职权和提高行政工作效率。过去党过多地陷入具体的

行政事务，这不利于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也不利于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和加强政府工作。

在回答关于暴乱的性质以及有关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时，袁木说，两个多月前北京发生的风波，实质上是极少数人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和暴力行为，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合法政府，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一暴乱事件违反了中国的宪法，触犯了中国的刑律。采取果断措施平息这种暴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所不能不采取的正义行动。袁木还介绍说，根据联合国人权宣言精神于1950年签订的《欧洲人权公约》，其中第一章第二条就明确规定，“防卫任何人的非法暴力行为”，“为实行合法逮捕或防止合法拘留的人脱逃”，“为镇压暴力或者叛乱而合法采取的行动”，这些都属于保护人权之列，是正当的和合法的。这也就是说，中国平息暴乱，是符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的，也是符合国际法准则的。

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认为在北京发生的暴乱是反革命性质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犯有这种罪行的人，犯的就是反革命罪，中国的刑法对此有明确的界定。但是西方有些人总是把中国平息暴乱看成对所谓民主运动的“镇压”，这种观点当然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至于大多数青年学生和其他群众出于爱国热情或不明真相而参加游行示威等活动，被极少数制造动乱的人所利用，尽管我们并不赞成他们的一些行动方式，但在性质上同极少数人的罪行是完全不同的。他强调说，中国从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但我们一贯主张任何人特别是国际舆论都应当尊重事实，更不应该歪曲真相甚至造谣惑众。

他说，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执行宪法赋予的权

利，为了迅速恢复首都正常秩序，是合法的和正确的，是有利于中国局势的稳定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戒严肯定是有限期的，但目前还不能取消，因为这是继续稳定中国局势的需要。他还说，戒严只是在北京的8个城区实行，而且仅是在这些地区对党政要害部门加强警戒和协助公安干警维持好一些公共场所的秩序。戒严并不是由军方接管一个地区的管理，这与西方的概念和一些人的理解并不一样。有些西方国家仍在坚持一种主张，就是如果中国要恢复与它们的交往，就首先解除戒严令。这种主张实质上是以它们与中国交往，要以中国应按外国的意志干这干那为先决条件，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当然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它们这样做，当然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最终也将对它们自己不利，对那些对中国这个现实的和潜在的巨大市场有兴趣的人不利。

他说，其实，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其任务也包括对外国使馆区、外商驻京办事处和外国来华人士住处及其人身安全的保障。

在谈到如何解决方励之的避难问题时，袁木说，方励之现在由美国驻华使馆庇护。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最后解决，这要由美国当局真正按照尊重中国法律和执行国际法准则的原则来行事。美国方面对这个问题拖着不解决，据我看，这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包袱。

袁木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前不久采访我时，曾问到中国政府会不会用武力强行从美国驻华使馆将方励之逮捕归案？同不同意美国驻华使馆将方励之送到第三国或所谓的“中立国”？我当时的回答是，第一不会，我们还不需要那样做；第二不同意，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中立国”概念是不存在

的，这同战争期间对交战双方严守“中立”是根本不同的概念。我还对那位美国记者说过，如果美国方面强行将方励之送到第三国或所谓的“中立国”，愿意接受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就不“中立”了，也就陷入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泥潭了。是否有这样的国家，我还是表示怀疑的。

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组此次是为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而来中国作采访的。记者组一行9人将分路访问全国26个城市。

(据新华社报道)

关于提高客运票价的广播 电视讲话和答记者问

(1989年9月)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发言人袁木9月3日晚发表了关于提高铁路、水路和民航客运票价的广播电视讲话。

袁木在讲话中着重解释了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提高客运票价；一个是这次提价对整个物价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 这次提高客运票价，是解决客运票价长期偏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有利于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

我国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低运价政策，已影响到交通运输业处于难以为继的严重亏损局面。

比如现行的每人每公里2分钱的铁路客运票价，是1955年制定的。此后，除1985年对短途客运票价作过一些调整外，一直没有变动。但随着煤、电、石油等价格的上涨，铁路运输成本大幅度上升。当前铁路客运主要是靠超员收入维持经营。

如果减去超员收入，运营是亏损的。平均每人每公里亏损 2 分钱。假如一个旅客乘火车从北京到郑州单程旅行一次，国家要补贴 14.5 元。

又如民航国内旅客票价，从 1952 年到 1971 年四次降价，平均降价 70%，虽然 1984 年到 1987 年又两次提高，现在平均每人每公里仅为 0.11 元，比 50 年代低得多。造成国内航线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飞行里程越多，亏损越大。加上我国民航飞机绝大多数是进口的，资金靠贷款，部分飞机还是租赁的，不但要还本付息，支付租金，还要受外汇汇率变动的影 响，再加上燃用油价格上升，使民航亏损状态愈益严重。

再从水路客运看，我国中央直属沿海、内河水运客票价，建国以来曾作过几次调整，但由于舱位等级和设备条件逐步改善，运输成本增加，实际票价水平低于解放初期。目前，中央直属的沿海、内河客运企业处于全面亏损状态。

上述状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不对运输价格作适当的合理调整，势必加重铁路、水路和航空企业经营的困难，更加削弱交通运输行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严重制约和影响交通运输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由于交通运输行业长期亏损，发展缓慢，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人民群众的“行路难”日益加剧。我国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的客运，普遍处于超负荷运行的状态。以铁路为例，1955 年客运量为 3 亿人次，1988 年已达 12 亿人次，增加三倍。铁路旅客列车一般超员 30%，有的车次竟超员一倍左右。全国每天大约有 70 万旅客不是“坐”火车旅行，而是“站”火车旅行。民航客运供求矛盾也很突出，虽然运力每年都在增长，仍不能满足需求。买票难、乘车

难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尖锐问题。加上管理混乱，给不法分子倒买倒卖车、船票以可趁之机，使正常的旅行增添了困难。如北京到广州的硬卧（下铺）火车票每张 61.9 元，黑市卖到 120 多元；上海到温州的四等舱票每张 12.7 元，黑市卖到 140 元。对此，公安、交通等管理部门采取了种种措施，但仍屡禁不止。提高客运票价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客流、打击黑市、缓解“行路难”的作用。当然，“行路难”和黑市猖獗的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还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在打击黑市的问题上，尤其需要广大群众的协助和配合。

（二）这次客运票价的提价幅度比较大，对市场物价和广大群众的影响如何？

首先，这次提高客运票价，将增加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差旅费支出。但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他们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对于个人来说，自费探亲访友和自费旅游将会增加一些支出，但总的说来，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不大。从社会效益看，提高客运票价，对客流量将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减轻普遍存在的车、船和飞机乘客过于拥挤的现象，有利于抑制和打击高价倒卖客票的非法活动。这对群众无疑是有好处的。

其次，交通运价是市场物价的一部分。提高客运票价，会对市场物价有所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这是因为：第一，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增加的费用支出属于行政事业费开支，对商品价格的形成没有直接关系。第二，企业出差人员所增加的费用，虽然进入产品成本，但在成本中所占比重很小，企业能够自行消化。

一些群众担心，随着客运票价的提高，会牵动一些企业一哄而起，趁机涨价。对这一点，国务院已经作了明确规定：

“为了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严禁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乘提高客运票价之机，‘搭车’涨价或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违者，要从严查处，并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为了保证国务院这一规定的真正落实，一方面，执法部门要加强检查监督，对各类违法行为严肃查处，另一方面，广大群众也要积极行动起来，为保卫自身的利益，主动向执法部门、主管部门、新闻媒介检举、揭发“搭车”涨价等违法行为。

今年以来，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执行国务院一系列控制物价的重要规定，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总的看，物价涨势逐步趋缓，市场状况逐步趋稳，特别是“菜篮子”价格比较平稳。最近，国务院还作出决定，对名酒和纯毛毛毯适当降价，并指导企业适当降低电冰箱价格，电风扇实行季节差价，价格也适当下浮。今后，国家将继续从严控制物价，从各个方面努力保证市场物价的基本平稳。

总之，我们要正确认识这次提高客运票价的意义。各级人民政府和党的宣传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要做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使大家从多方面了解提高客运票价的基本内容及其必要性。各部门、各单位都要从大局出发，正确理解和支持国务院作出的决定，主动配合交通运输部门做好提高客运票价的各项工 作，并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严禁趁机“搭车”乱涨价，对违者必须严加惩处。交通运输部门应该切实做好提高客运票价的各项工 作，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千方百计扩大运输能力，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

在9月2日举行的关于提高铁路、水路和民航客运票价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交通部副部长林祖乙、民航副局长管德回答了记者的有关提问。

袁木等人在会上都强调，做好这次客运调价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要认真执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严格禁止任何地方、部门和单位趁机“搭车”涨价。这也是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呼吁新闻界，如果发现哪个部门、地方和单位“搭车”乱涨价，乱收费，就要公开揭露和批评；执法部门和管理部门要严肃查处，并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有记者问：这次客运调价，能否真正解决人民群众的“行路难”问题？

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行路难”的问题，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于黑市上倒卖客票的问题，也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行路难”和客票黑市猖獗的问题，还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

有记者问：地方管理的长途汽车这次提不提价？

答：这次客运票价提高不包括公路运输，地方管理的长途汽车不提价。

有记者问：这次客票提价的收入怎么分配？

答：这次客票提价，今年大约可以增加收入20多亿元，将基本上留给交通部门用于发展交通事业。

有记者问：外国旅客和港、澳、台及华侨旅客的客运票价如何提？

答：现行外国旅客铁路票价为国内旅客票价的 2.0125 倍，这次调整为国内旅客票价的 1.7 倍。港、澳、台及华侨旅客仍和国内旅客同价。民航国内航线对国内旅客、华侨及港、澳、台旅客的优惠折扣票价，这次上调 77%。对外国旅客的票价（即公布票价）已经作过两次调整，这次只作局部调整。现行公布票价人公里运价最低 0.24 元，最高 0.28 元，这次将人公里运价不足 0.28 元的航线调到 0.28 元，已达到 0.28 元的航线票价不动。平均提价幅度为 14.8%。行李，货物运价同时相应调整。

有记者问：这次客运票价提高对整个物价指数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影响中央确定的控制今年物价上涨目标的实现？

答：这次客运提价对整个物价指数会有一些影响，但不会影响太大。据预测，这次客运提价可能会影响整个物价指数上涨百分之零点几，最多不会超过 1%。因此，尽管实现今年控制物价上涨的目标，任务还很艰巨，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但这次客运提价不会过多地影响到今年控制物价任务的实现。

有记者问：这次提价后，铁路、交通、民航对改善交通运输设施和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将采取哪些措施？

答：这次客票提价后，铁路多收入的钱将主要用于加强铁路设施建设。调价后，铁路还要进一步开展安全、正点、优质服务活动，整顿站车秩序，更好地为旅客服务。

水路客运长期以来是亏损的。这次调价后，将使水路客运有一个新的变化。交通部门要下力气整顿客运秩序，采取措施，做好服务。

民航改善服务是需要长期坚持进行的一项工作。这次提价为进一步改善服务设施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增加运力的同时，民航将继续做好安全工作，确实让旅客感到安全、正点、服务优良。

有记者问：铁路客运票价提高后，站台票和餐车饭菜是否也同时提价？

答：站台票属于杂费，这次要提价，特等站和一、二等站的站台票由原来的5分一张调到0.20元，其他车站每张0.10元。餐车饭菜质次价高的问题群众反映较大，但由于饭菜原料的进货都是议价，价格确实偏高。这次客票提价后餐车饭菜价格不动，而且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饭菜质量，使质量和价格相符，这一点也请全社会予以监督。

有记者问：这次提价后，我国的客运票价与国外相比处于什么水平？

答：如果我国铁路客票是100的话，美国是220，联邦德国是400多，日本也是400多。这次调整后的民航国内客票仍然比国际平均水平低。在国外，2000公里以上航线的人公里票价19美分，500公里以内航线的人公里票价29美分。亚太地区平均人公里12美分左右。也就是说，这次提价后的民航国内票价仍然是国外航空票价的1/5至1/4。

有记者问：由于铁路客运提价，会不会出现客流大幅度下降，造成票价涨后又降的状况？

答：不会。铁路现在是超负荷运转，列车严重超员，不少旅客是“站”火车而不是“坐”火车。票价提高后，对客流量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下降幅度不会太大。铁路部门还将加开一些列车，改善乘车条件。

有记者问：这次客票提价后，国家对交通运输的倾斜政策是否还要执行？

答：目前交通运输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八五”期间将继续坚持对交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实行倾斜政策，增加一定比例的投资，把这方面的重点建设项目搞上去。至于投资究竟能增加多少，这还要取决于当前经济调整和治理整顿的成果，要根据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有记者问：这次客票提价，公路没有提，会不会增加公路的压力？

答：这次公路不提价，是会增加公路的压力的，但这对公路部门来说也是一个动力。目前的公路客运是亏损的，也有客源不足的问题。这次部分客流分到公路，公路部门增加班次，加强车辆维修，提高利用率，开展“双增双节”，以利于扭亏增盈。国家也将对公路运输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促使公路运输的发展。

(据新华社报道)

怎样认识动乱暴乱？

——答青年朋友问

(1989年9月)

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青年们在反思。在反思过程中，一些青年朋友来信，提出了思想上的一些问题。为了帮助大家总结教训，提高认识，《中国青年》月刊编辑部请袁木同志回答了这些问题。

问：我们反对腐败，反对官倒，去游行示威，是出于爱国，推进民主，为什么不能说是爱国民主运动，反而是动乱呢？

答：我完全能够理解年轻人的心情。就前个时期参加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等活动的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来说，他们怀着满腔热情，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主观愿望是好的。对于这一点，我想，党和政府过去是这样认为的，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当由学潮演变为动乱，由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至今还有一些青年朋友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在思想上、感情上还转不过弯来，这就不能不令人深切地感到：通过事实，动员和组织年轻朋友们进行自我教育，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这个任务的确还是繁重的。

我与你们相比，当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也可能有一点优势，这就是对我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会比你们多一些。记得1989年4月29日我们受国务院委托第一次与青年学生对话之前，曾经研究了许多材料，找了一些大学生谈话，做了充分的准备。当时，我们就感到事情的确很简单。大量的事实证明，这场风波从一开始，就有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制造事端，扩大事态，想从中达到他们在社会安定的条件下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这极少数人中，多是躲在背后出谋划策的“长胡子”的人，即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和搞政治阴谋的人，也有一些在前台指挥的有种种不同野心的学生头头。我们在对话中曾经一再提醒同学们警惕这种情况，并且诚恳地告诉同学们自觉地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划清界限，而划清界限的最好方法，就是立即停止违法的游行示威，迅速回校复课，有问题通过正常的民主和法制轨道来解决。我们的提醒和告诫，可能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觉，但当时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并不以为然。今天，事情的发展已经提供了充分的材料。我建议大家平心静气地、全面地看一看有关材料，相信你们在获得正确的、全面的信息以后，是会逐步转变观点的。无论如何，千万不要报纸不读，电视不看，只凭感情用事。这对国家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在这里，提出两个观点，供你们反思时参考。

第一，一个历史事件的性质，不是由参加者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而是由事件的政治纲领，它的客观发展进程，它的作用和它的结果来决定的。当年的“大跃进”，你们能说广大参加者的愿望不好吗？不能。想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发展我们的经济，超英赶美，好得很嘛！但是，历史的实践证明，客观效果并不好，它违反了客观规律，“大跃进”导致了

“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再说“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当年参加运动的动机是什么？最后运动的性质和他们的动机是否一致？恐怕不一致吧！十年“文革”成为十年“动乱”，难道不是领导者错误发动，以错误的理论为指导，再加上反革命集团加以利用的结果吗！

第二，大多数人的良好愿望被极少数用心险恶的人引入歧途不是不可能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其例。德国人民历来是以理性著称的，但他们的爱国热情当年照样曾经为希特勒所利用，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以致酿成了世界范围的悲剧。这次的事件从不同的方面重演了历史的悲剧：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被极少数人利用，引发了动乱和暴乱。大多数青年学生，并没有能够使事情按照他们的良好愿望发展，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使事情发展到了他们愿望的反面。

从根本上说，要正确认识这场政治风波，需要树立辩证唯物史观，需要确立忠诚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生观，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对青年人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立场的教育太少了，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训吧！

问：极少数人能操纵那么多大学生参加学潮，进而挑起动乱和暴乱，这说明了什么？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在平息暴乱以后，我们要冷静地回顾过去，思考未来，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酿成新的动乱，就要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在5月3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我曾经说过：“极少数人能够挑起动乱，的确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原因，情况是复杂的。”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应该看到，在过去 10 年的改革开放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举世公认的深刻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绩，但工作中也的确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失误。比如：经济过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尚未建立健全，产生了某些官倒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被淡化了，削弱了，在一些党员和干部中滋生了腐败现象；等等。这些缺点和失误引起了群众的普遍不满。但是，群众中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满情绪，而从根本上说，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客观事实。与此相反，极少数反革命阴谋分子制造动乱乃至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目的，往往把真实的企图掩盖起来，而把作为陪衬的反官倒、反腐败等口号叫得震天价响，这就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起到了很大的欺骗作用。在这次动乱乃至暴乱中，有那么多的人被卷入，许多人甚至明明已被坏人利用而长期不能觉悟，这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原因。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次从动乱到反革命暴乱，自始至终都有国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我展开了猖狂的联合进攻。他们为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策动我国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利用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机会，处心积虑，不惜工本，进行了长期的思想、政治渗透。国内极少数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奴颜婢膝，卖国求荣，同这种国际气候相适应、内外联手，相互勾结，进行了长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学潮一开始，极少数人精心策划，先后成立了“高自联”、“工自联”等

非法组织。他们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利用人民中产生的某些不满情绪，利用我们在经济上遇到的暂时困难，再加上党内个别领导人的包庇和支持，制造谣言，煽动群众，蛊惑人心，终于越闹越大，越闹越凶，使局势发展到了益发难以收拾的地步。

痛定思痛，要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风波，党和政府与青年朋友们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概括起来说，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点教训是我们长期应该吸取的：一、在总的世界形势由紧张趋于缓和的条件下，国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根本战略并没有改变，对此我们决不能丧失警惕；二、在国内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经消灭的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还会很激烈，这次动乱和暴乱就是阶级斗争激化的集中表现。对此，我们也不能忘记；三、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两者要相互结合，长期不懈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决不能一手软一手硬，决不能有所偏废；四、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加强；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加强，而且一定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总之，一方面要端正我们的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长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维护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方面要大大改进我们的工作，消除腐败，消除官倒，解决好社会分配不分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长期奋斗。

问：学生绝食是自愿的，怎么能成为少数人的“人质”呢？

答：据我所知，学生参加绝食的情况并不都是一样的。从

形式上看，某些同学参加绝食是“自愿”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思想上受到了某些坏人的利用和受到了某些谣言蛊惑的结果；有些同学参加绝食，是在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下，在错误舆论导向的影响下，觉得不去不好才硬着头皮去参加的；还有一些参加绝食同学，一开始是情愿的，中途后悔了，但又受到所谓种种错误“声援”的迷惑，被逼向绝路，欲罢而不能。当然，在绝食学生看来，如果说有人直接强迫他们绝食，说他们已被别人利用来作为“人质”，他们是难以接受的。对这一点，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从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丑恶行径来看，问题就是非常清楚的了。“高自联”的头头王丹就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选在5月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他在这里所说的“他们”，指的就是我们的党，就是我们的人民政府。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们策动同学们绝食，目的就是以党为敌，以人民政府为敌，以对抗斗争的手段，以同学们的生命作赌注，甚至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国际声誉，以此来要挟党和政府接受他们挑起动乱的政治条件。这种情况，当时已经暴露无遗，难道现在还能不认识清楚吗？在绝食开始后，他们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制造种种谣言，煽动群众，大造舆论，妄图迫使党和政府就范。他们置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危于度外，为了取得国际组织的所谓干预，竟然将我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赶出天安门广场。他们还曾经组织起所谓的“纠察队”，设立“纠察线”，在绝食学生周围巡逻放哨，严禁任何绝食学生甚至生命已经垂危的学生退出绝食。所有这些，除了证明他们是把绝食学生当成“人质”，以死相逼，以同学们的生命来要挟党和政府以外，再也不能得出别的解释了。

问：假如党和政府领导人早一点与学生对话，是否不会导致后来这样的恶果？

答：这个问题，早就由事实作出了回答。党和政府为了平息学潮，制止动乱，曾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长期采取了极其宽容、极其克制的态度。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所采取的宽容、克制态度，可以说是仁至义尽，达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难以做到、难以采取的程度。关于这一点，相当一个时期的国际舆论也是这样评价的。在学潮到动乱的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曾经同学生进行多次对话，我本人和其他许多部门负责人也曾经多次参加过同学生的对话。甚至直到暴乱发生的前夕，我们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信访局都还与“高自联”保持着联系渠道。但是，事情仍然一步步地发展到了暴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场风波，是国际大气候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相结合的结果，是必然要来的，迟早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再给青年朋友们指出两点事实。

首先，“高自联”头头们是从来没有对话诚意的，大量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4月18日那一天，王丹等人首次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对话，后来他们又表示人大常委委员出来对话也可以。而当全国人大办公厅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之后，他们又提出不对话了，转而要求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当众接受他们的请愿书，并且说只要接了请愿书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接了他们的请愿书才3个小时，马上就发生了2000多人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的事件。5月13日的情况也是这样。党中央、国务院

和人大办公厅的信访局在上午接受了“高自联”一些头头提出的对话要求，并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对话。“高自联”的头头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指责政府没有对话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后的几个小时就发表了早就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开始了绝食。这些都充分表明，“高自联”的头头并不是要真正的对话，他们只不过是要求对话为由头，以此来不断地扩大事态而已。

第二，“高自联”的头头为对话提出的先决条件和要求，注定了对话不会有什么结果，更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在5月2日递交的请愿书就明确提出，政府与学生对话，要把合法的学生组织排除在外，只能与他们的代表对话，并且必须有党中央常委以上、国务院副总理以上、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参加，每次对话还必须由双方轮流指定时间、地点，直接进行现场电视转播，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这哪里是什么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沟通情况、增进理解、平等协商的“对话”，完全是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当时就有许多同志指出，非法学生组织向党和政府提出的所谓“对话”实际是谈判的条件，甚至比战胜国向战败国提出的条件还要苛刻。其目的就是要强迫政府不仅承认他们是唯一合法的学生组织，而且承认他们是同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这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如果接受了，他们就一定会在中国进一步公开组织反对派，组织反对党，要求实行多党轮流执政。那样的话，事态就不仅不能平息，而且肯定将进一步扩大，那就真正的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了。

问：戒严部队不进城，是否不会发展成暴乱？

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发生，是国际

上的敌对势力长期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我们党内一些人甚至个别领导人同情和支持自由化思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不得力的必然结果。极少数反革命阴谋分子妄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是他们策动动乱乃至暴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解放军不进城，他们就会长期占据全国人民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没完没了地制造事端，不断地把动乱扩大到全国，直到阴谋推翻我们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人民政府。他们要挟学生坚持绝食、静坐，一会儿在天安门广场竖立所谓“自由女神”像，一会儿又搞知识界的所谓有限绝食。他们还拼凑北京的和各地流窜来的极少数地痞流氓，组织所谓的“义勇军”、“敢死队”、“飞虎队”等等，妄图用暴力推翻人民政府，组织他们的所谓新政府，疯狂镇压忠实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偶然的车祸，他们也要用来制造谣言，蛊惑群众，妄想组织所谓的“抬棺大游行”，燃起暴乱之火。如果不是早就实行了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形成为解放军大兵压境的威慑力量，恐怕反革命暴乱早就由冲击新华门等事件演变为现实了。事实证明，只有人民解放军一举粉碎了北京的反革命暴乱，全国的局势才稳定下来，各地也才没有出现新的骚乱。有些青年朋友还提出，如果北京不动用解放军，绝对避免流血，也像上海、天津那样依靠广大工人等各界群众组织起制止动乱、维护秩序的社会力量，这样做是不是比动用解放军更好一些呢？应该说，这样的愿望是善良的，但也是完全脱离当时实际情况的天真的幻想。如果北京部分地区不戒严，解放军不进城，不采取断然措施，北京的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根本平息不了，全国局势无法迅速稳定，上

海、天津等地采取的措施也难以奏效，这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和事件发展的必然逻辑。

问：政府曾表示过对学生不秋后算账，现在为什么又抓学生？

答：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对那些在幕前幕后煽动、策划和指挥动乱的人，对那些违反宪法、法律勾结国外反华势力蓄谋打倒共产党、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对那些肆意打砸抢烧杀、严重触犯刑律的人，其中也包括极少数犯有种种罪行的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我们的确抓了一批。这是彻底平息暴乱，稳定全国局势，巩固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需要，是捍卫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进行审理和处置。这同所谓的“抓学生”，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也就是说，“抓学生”这个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

至于对那些参加过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的学生，甚至对有过过激的和错误言行的学生，党和政府曾经多次讲过，我们的政策是宽容的，是不会追究的。当然，同学们也应该通过自觉的学习，进行深刻的反思，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同学们在学潮乃至动乱中的许多违反法制的做法，我们是不赞成的，有时候为了维护大局我们也是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以制止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所犯的错误，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以外，也是同我们忽视了对青年的教育和其它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不开的。我们今后应该做的事情，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和广大同学们一道，共同努力，提高认识，进一步解决好前进中存在的问题，把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问：伟大的“四五”运动，当年也曾被定为反革命活动，这次事件以后是否也可能要平反？

答：1976年的“四五”运动，同这次动乱乃至暴乱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四五”运动的性质是反对“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次风波反对的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反对的是四项基本原则，搞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妄想建立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太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四五”运动的结果为粉碎“四人帮”及其以后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这次风波却造成了流血事件，带来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阻碍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四五”运动作为爱国运动很快得到平反，而这次风波绝对不可能平反，也就是说任何妄想“翻案”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除非中国共产党真的被打倒，除非社会主义制度真的在中国被颠覆，极少数反革命之心不死的人才有可能实现他们妄想“翻案”的阴谋目的。我想，这对于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关于动乱和暴乱的反思

(1989年9月)

观察我们国家的当前形势，离不开对3个月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看法。因此，我就以对动乱和暴乱的反思作为题目来讲一讲。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决不代表任何其他人。反思这个词再加上再认识等等，一个时期以来很时髦，但它往往同对过去的一切的彻底否定连在一起，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希望我的反思不要犯这样的毛病，希望能够实事求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从反思中真正得出一些确实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我想先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就是，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在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发生新的动乱的危险？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做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的工作还要不要立足于防止新的动乱？

我的看法是两点论：第一，我们制止了动乱，平息了反革命暴乱，这以后3个月来的形势发展说明，全国总的情况越来越好。当然还不能说一片大好，莺歌燕舞，但是总是比以前好得多了。社会秩序在恢复，人心逐步稳定，政治局面稳住了，经济也在治理整顿中平稳发展。回想一下3个月前北京那样惊心动魄的局面，再对比一下这短短3个月的进展，我认为是很

不容易的。它说明了一点，就是经过建国以来 40 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毕竟在我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谁要想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得人心的。否则，只靠解放军实行戒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局势不可能迅速稳定。当然，在关键时刻解放军不出手，很难设想中国会怎么样。尽管人民群众中对党和政府还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无论如何总是觉得中国还是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解放军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根本点上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第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动乱、暴乱的组织者、指挥者、策划者、惨无人道的极少数暴徒，是不是已经甘心失败，就此罢休了？我看还不会。从一般人们的认识来说，是不是对发生动乱、暴乱的原因都弄清楚了？对党和政府平息暴乱的措施是不是都觉得对？我看也不见得，不能估计过高。当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想不通，也不奇怪。从更深一点的层次来讲，动乱、暴乱长时间难以平息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平暴胜利的意义如何评价？从这场风波中应该吸取哪些必要的经验教训？解决这样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正是从这点出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警惕和防止新的动乱。

也许有同志说，你这是危言耸听。动乱制止了，暴乱平息了，问题解决了，形势好转了，怎么还提出警惕和防止新的动乱的问题呢？下面，我再把提出这个问题的根据展开来讲一讲。

第一，国际大气候还没有大的变化，国际敌对势力仍然是亡我之心不死，现在它们还在采取种种措施对我们进行制裁。

当然这方面的情况近来也有些变化，制裁有缓和的趋势，但还远没有过去。对此，我们中国人决不怕，坚决顶住，同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第二，就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而言，可以说这方面的气候有了较大的变化。过去那一段有那么一些人成天鼓噪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全盘西化。现在气氛为之一转，很少有人再公开讲了，错误的舆论导向转过来了。但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在人们思想上所造成的恶果，以至于种种不正确的认识，是不是都解决了？我看也决不能过高估计。它给人们思想造成的混乱，它在实际工作中带来的种种干扰，还远远没有肃清。而且有些问题深入讨论下去，分歧还会不少。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

第三，反革命暴乱分子并没有全部缉拿归案，还有些被通缉的罪犯没有抓到，有些逃跑到国外去了。这些人还在国外进行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鼓噪，拼凑反动组织，拼凑所谓的反对派、反对党。我不相信他们搞的那些叛国活动会在国内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但也不能说一点影响也不会发生。还有通过种种渠道传播的种种反动谣言，种种流言蜚语，有的见诸文字，有的不见诸文字，在人们思想上会毫无影响？恐怕也不会的。对于犯有种种罪行的反革命暴乱分子，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必须除恶务尽，不留隐患。

第四，广大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如何，他们对这场动乱、暴乱是不是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很重要。听说有的领导干部卷入进去，陷得比较深，至今，尚未认真作自我批评。有些领导干部当时含含糊糊，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本单位下面的同志要去游行，他也不制

止，不劝阻，或者担心不说学生搞的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支持会成了保守派，怕站错队将来领导不好当，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去就去，反正我不管。这样的领导如果不首先作检查，不作自我批评，现在往台上一坐，只强调一般干部要深刻反思，要提高认识，明辨是非，这怎么能够使人心服呢？我认为各级领导同志要首先提高认识，旗帜鲜明地引导大家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对极少数坏人，不应手软，除恶务尽。对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要由领导带头，大家来共同提高认识，我看这样问题就好解决。否则，就会带来一大堆后遗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做到家了呢？当然还没有，现在刚过去3个月，要求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把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也不切合实际。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有太平观念，好像一切问题都已经过去了。否则，说得不客气一点，或者把问题提得尖锐一点，在平息暴乱当中牺牲了的人民解放军烈士的血就会白流！我们当然不能让烈士的鲜血白流，一定要千方百计巩固平暴斗争的胜利成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告慰解放军烈士的在天之灵！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首先必须彻底查清一切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决不心慈手软。要做到彻底查清，一要决心大，二要方法对，做大量艰苦的工作。其次，还要认真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和统一人们的认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难度还要大一些。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宣传和解释动乱、暴乱产生的根源，使大家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这次发生的风波，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结合的产物。对这个结论，是不是大家都接受了？据我看，还没有。对极少数顽固的反革命阴谋分子来讲，当然是不用说

的了；即使在人民内部，在干部、群众包括在学生当中，恐怕模糊认识还不少。前不久，我就听说还有人把动乱、暴乱的原因概括为三句话，即所谓“腐败引起学潮；社论引起动乱；戒严引起暴乱”。这恰恰和我们党的结论是完全相对立的。对坏人宣扬这种论调，必须坚决批驳，对好人受骗上当，必须作深入细致的解释。国际上有人要对我们进行颠覆，国内又有人适应这种颠覆，同他们勾结，想搞垮社会主义，这是动乱的根源。极少数坏人，极少数搞反革命阴谋的人，极少数在背后摇羽毛扇出谋划策挑动学生进行种种动乱活动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坚强支柱的人民解放军怀有刻骨的仇恨，否则怎么会把人民解放军战士打死了还浇上汽油烧，还挑肠破肚，还要暴尸示众呢？这难道是什么帮助克服腐败吗？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党，颠覆社会主义，但他们的阴谋手法在群众中起了很大的欺骗作用。从学潮一开始，就有人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从而使学潮与动乱伴随而生。打砸抢烧种种违法活动早就发生了，几千人冲击新华门的严重事件早已经出现了，在几万人面前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的所谓的递请愿书，明显地是一种用心恶毒的斗争策略，是坏人在后边出的主意。连这样的阴谋活动都明目张胆地搞出来了。一开头悼念胡耀邦，许多人就公开喊出了“悼念胡耀邦，打倒邓小平”的反动口号，咒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封建专制”，是“独裁统治”，甚至公然叫嚷要“把国民党从台湾请回到大陆执政”这一套极其反动、极其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一类的大小字报，早就在许多高等学校当中广为散布和张贴。冲击新华门，几千人在那里起哄，连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严重事件。学生们被动员离开以后，又有人制造出所谓

的“四·二〇”血案，污蔑军警镇压他们，死了多少多少人，进行造谣煽动。一个大学生去看戏，散场回校，自己骑车不慎，被无轨公共电车撞死，又造出了一个什么“血案”，造谣说是被军车压死的。这一套都是有人蓄意制造的！这一切的一切，这些严重的动乱，早在《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怎么能说是“社论引起动乱”呢！社论只不过是揭露了真相，指出了问题的实质。至于说到解放军奉命实行戒严，这是在动乱已经越来越扩大，越来越严重，反革命暴乱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被迫不得不采取的必要的正确措施。部队进城，极少数暴徒裹胁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大打出手，以惨无人道的手段残害解放军，大量焚烧军车，抢夺枪支弹药，人民战士伤亡惨重，这才被迫采取断然措施，怎么能说是戒严引起暴乱呢！希望我们一切有良心的、正直的同志们，都能采取最起码地实事求是的态度。否则，怎么统一认识呢？首先把这场斗争所以产生的原因弄清楚，其他认识问题才好解决，否则什么也说不清。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说明这场斗争的性质。第一，它是国际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长期矛盾斗争在中国的尖锐反映。西方帝国主义的意图很清楚，它们总是想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把我们的国家拉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去。这种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过去一直存在，今后还将长期存在。人家一直都没有死心，我们却和平麻痹了。第二，它是国内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尖锐对立的反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坚持这四条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过去不坚持这

四条，就没有我们国家的独立、富强，没有我们祖国的尊严，没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就没有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1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今天不坚持这四条，中国就要重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重新沦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双重奴隶。有些年轻同志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以为一搞资本主义，明天的中国就会成为今天的美国。他们就不知道，人家那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经过几百年发展起来的。我们11亿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几百美元，在全世界处于很低的水平。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不是贫富悬殊，这才能够做到全国人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如果在人均收入几百美元，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这必然意味着全国大多数人重新回到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绝对贫困线以下，要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来统治自己。中国搞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进行原始的资本积累，必然是最野蛮、最落后、最残酷的资本主义。中国人能够像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因为生产力高度发达，蛋糕做得比较大了，可以切一小块来缓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搞相当多的社会福利吗？我们认为完全不可能做到。从国际条件来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可能让出那么多的市场，来让中国发展自由资本主义。中国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就只能重新沦落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深入宣传这场斗争胜利的意义。第一，它保卫了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人民解放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成果；第二，它保卫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第三，它保卫了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特别是这1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不是我们取得了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场斗争的胜利，这一切都将统统化为乌有，中国将重新陷入四分五裂，陷入严重内乱，导致历史的大倒退，劳动人民会重新受奴役、受压迫。国家会重新陷入长期分裂，或者打内战。打内战大概是可能性最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他们会容许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推翻共产党、颠覆几千万烈士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吗？我看决不会答应。他们同那些硬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变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们之间，必然要打一场内战。内战的结果，我肯定胜利的只能是前者而决不是后者。但是，由于重开内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因此而倒退许多年。

在这次动乱暴乱之前，我曾给北京市一部分大学生作过一次报告，跟他们讲过这样几点：第一，我们进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究竟是中国人民的幸福还是祸害？他们当然无法说这是祸害，只能承认是人民的幸福。第二，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过不少挫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无论是纵比还是横比，我们毕竟取得了在过去剥削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期的发展情况相比也并不逊色。在40年巨大变化面前，他们的亲身感受虽然要比上了年纪的人差得多，但怎么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第三，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如果像有人主张的那样，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会有什么状况？对中国国情和

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了解不多的年轻同志，可能很难想象。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不会是幸福。最后，如果认为这些是僵化观点，我相信会有广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愿为这种僵化观点而奋斗一辈子。当时我还说，你们要是不赞成，就把我轰下台，结果呢？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可见年轻人有很大的可塑性，他们也并不那么迷信资本主义。而且那次讲话还有个背景，在我去给他们作报告之前，听说有人跑到北大发表了一篇演讲，胡说什么 20 世纪最大的遗产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尝试和实践的破产。另外还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她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经过多少年的实践体会到，上述观点还不是说得很尖锐，而是说得很客气。都宣布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彻底破产了，还认为客气，再不客气，该说到什么程度呢！真是骇人听闻。我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所以我对大学生们说，今天我讲的同他们讲的完全相对立，如果你们不想听，不要听，就把我轰下台。但他们不仅让我讲完了，而且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所以说，讲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讲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应该理直气壮。

我们党内的同志们，一切热爱祖国的公民们，尤其是党员干部，都要有防止新的动乱的思想准备。而要防止新的动乱，巩固和发展平暴斗争的胜利成果，让人民解放军烈士的血不白流，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对这次动乱、暴乱，进行正确的反思，并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反思什么？我想讲若干意见，供同志们思考。

一、要在正确认识当前国际总形势、总格局的前提下，充分估计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总的看来，当前国际形势正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趋向对话。超级大国任意摆布世界

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霸权主义到处碰壁，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经过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努力，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有可能争取到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有利于我国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对这种国际总趋势、总格局的估计，并没有因为中国发生动乱、暴乱以及西方国家掀起反共、反华浪潮而改变。这是观察国际问题的总前提。不要一下子神经紧张，一说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共处也不敢讲了，对外开放也不敢讲了，和平国际环境也认为争取不到了，又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天天讲阶级斗争，天天讲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了。同外国人还要打交道，还要做买卖，外国商人来了还要笑脸相迎，只要平等互利就干，这是前提。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必须看到，从社会主义诞生那天开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当中一贯坚持反共立场的最反动的那一部分，从来没有放弃过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尽管他们嘴上讲要帮助你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他们有他们的用心。他们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希望你搞经济私有化，搞政治多元化，完全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如果走到了私有化的路子上去，就必然要搞政治多元化，要搞多党制，乃至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不是你想不想搞的问题。经济既然已经以私有化为基础了，当然会有代表私有制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可能先是要求同共产党轮流执政，或者联合执政，分庭抗礼，接着就要把共产党挤下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世界所期望我们走的“改革”的路就是这条路。他们总是表示支持我们搞“改革”，

恐怕看到了我们的改革中确有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倾向，这不能不是一条重要原因。以前有人写文章，总喜欢引用西方某个政治家、某个大公司、某个董事长等等之类的人怎么怎么赞扬我们的“改革”，由此来论证我们的“改革”如何对，成就如何巨大。我认为这种引证往往混淆了人们的是非观念。当着我们强调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时候，西方有些人，西方的舆论界，马上就说这不是改革而是后退，是保守倾向抬头，是保守派的主张。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他们这种图谋从来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只是他们要实现这种战略的策略和手段。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把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武装挑衅转成以和平演变的策略为重点。什么叫和平演变？就是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思想的、文化的种种渠道，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渗透，从我们的内部进行种种颠覆活动。他们支持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宣扬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推销西方的一套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思想模式、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以此来培植为他们所用的一批人，乃至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大量制造谣言，挑起事端，扩大事态，激化我们国内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难道还不是很明显的吗？据说当时占领天安门广场一天要花10多万元人民币。钱从哪里来的？还有那么漂亮的帐篷，还有种种电台，还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和联络工具，都是从哪来的？无非是美国的，英国的，还有香港的，台湾的。美国从反共老手杜勒斯一直到历届当权者，从来没有改变过要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特别是

七、八十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一方面我们存在一些失误，碰到一些暂时困难，另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他们认为时机对他们更为有利，于是更加紧了在这个战略的实施。我们这次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胜利，也是他们实行这种战略所遭到的一次严重失败。

为什么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如此顽固地坚持要对我国进行制裁？最近西方一个主要国家的总理曾在议会发表过一篇讲话，公然宣称他们之所以非对中国进行制裁不可，就是因为他们“从中国的改革”中再也看不到他们所希望的经济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倾向了。这种材料，很可以从反面使我们大家变得更加清醒一点。西方国家认为现在是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西方模式的最有利时机。他们认为公开侵略代价太昂贵，也搞不起来，因此要借助于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实现他们和平演变的意图。他们大肆宣传资本主义世界的非凡“活力”，公开鼓吹现在已经可以目睹共产主义的自我埋葬，胡说什么21世纪是共产主义自我死亡的时代。最近他们又提出要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掀起一起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仗是要打的，但它是没有硝烟的，是不流血的，目的是“不战而胜”，手段就是和平演变，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在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尖锐斗争的问题上，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家们，包括为垄断资产阶级出谋划策的一些反共专家们，他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反动立场是坚定的，从来没有糊涂过。而我们无产阶级的有些政治家，包括我们党内有的负责干部，却是不清醒的，滋生了盲目的和平观念和麻痹思想，眼前看到的国际世界一片歌舞升平，到处和平友好，对外交往就是喝酒碰杯。我们一定要坚持两点论，不能只讲经济，不讲政

治；只讲和平友好，不讲斗争；只讲策略，不讲原则。在警惕和平演变这一点上，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注意不够，确实是吃了大亏。起码是我们在对动乱、暴乱进行反思时，必须从大量的事实中引出必要的教训，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警觉性。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决不改变。争取一个较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努力决不改变。我们要使自己成为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模范，同时又要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坚决维护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严。

二、我们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恰当地认识在国内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很少讲或者根本不讲了的问题。

本来，对这个问题我们党是有过正确论述的。同志们可以把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看一看。基本的观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战略转移，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这个中心决不动摇。在我国现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仍然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因素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场动乱和暴乱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路线必须彻底否定。同时又必须看到现阶段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还会激化，这次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仅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还要认

真研究新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和特点，这样才能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不久前，策划过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四通公司经理，已被我们通缉的罪犯万润南，在逃到法国以后，曾经发表过一篇讲话，中心思想就是说，这次中国之所以发生动乱，是由于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中产阶级；而这次动乱之所以没有搞成功，是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他的这篇自白再也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他很明确地说出了这次动乱、暴乱的阶级根源。他的这种分析究竟对不对，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它，起码他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他是有很鲜明的阶级观点的。他自己是以中产阶级的代表自居的。这就暴露了他的目的。他们就是要在我国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来统治我们的国家。这也就从反面告诉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决不能太天真了。经过 10 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认真地研究这个课题，对于我们深入地观察和解决现在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是很必要和很重要的。最近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我国农村阶层变化状况的一个分析材料，他们认为现在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八个阶层：第一，农业劳动者阶层。这主要是指承包集体耕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劳动的一批人。第二，农民工业劳动者。这些人常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厂矿、商店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他们的户口仍在农村，身份还是农民。第三，雇工阶层。就是现阶段农村的工人阶级，他们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这是过去没有的。过去有个别的零散的雇工，但作为一个阶层出现，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第四，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

药、文化、艺术等等从事智力型职业的知识分子。第五，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其中有的从事种植业，也有从事二、三产业，从事工业、商业的。第六，私营企业主阶层。这是和雇工相对应相对立的一个阶层。第七，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这算不算一个阶层，大家可以研究。不过现在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利益虽然不能说完全对立，但不完全一致，有矛盾，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作为一个阶层来研究也未尝不可。第八，农村管理者阶层。这是属于政权范围的。他们认为起码有这么八个阶层。他们的分析和判断，对不对，是否准确，或者说哪些对哪些不对，当然还需要和可以研究。那么城市的居民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现在恐怕还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说现在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决不是说像过去那样强调用阶级观点去观察一切和分析一切。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很少甚至不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恐怕也不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如何调动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以及怎样看待和处理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范围产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毕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三、要充分认识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将在我国长期存在。是不是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是不是真心实意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充分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要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意义，要把它当作一个重大任务抓下去。第一要长期不懈，第二要始终一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抓一阵子，放一阵子；紧一阵子，松一阵子；硬一阵子，软一阵子。多年来，邓小平同志一直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直在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几乎年年讲，有时一

年讲几次，但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不认真贯彻执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绝不是一个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套话、空话，而是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坚持得好，重视了，我们就可以保持社会主义方向，搞不好，社会主义就会被颠覆，党的领导就会被推翻。因此，这也是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在反自由化的问题上，主要是防止两条。一条是防止像过去那样一阵风。小平同志指出反精神污染，只反了28天，就中途夭折了。1986年重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过一阵子，但很快又销声匿迹了，甚至还变本加厉地纵容、支持自由化。这是很大的教训。再也不能搞一阵风了。第二，要切实防止简单化、扩大化。简单化就是把这些东西只当作口号，讲起来和思想实际、工作实际、当前形势、各项工作挂不上钩。讲得不生动，不深刻，讲得苍白无力，人家不愿听或听起来不信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清政治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的界限，绝不能因为反对自由化，而禁锢人们的思想，禁锢对理论和学术问题的探索，要把政治行为和学术行为分开。对政治行为，就要按一定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我们就赞成；不符合的，就反对。学术上应大力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但是，决不能容许公开宣传反动的政治观点。触犯了刑律，以颠覆人民共和国为目的的行为，就要以法惩处。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一句，反自由化决不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不是整知识分子，相反地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历史任务和根本利益所在，应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才能把反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四、要明确划清两种不同改革开放思路的界限。这是件大事，关系到我们改革开放将被引向何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1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体上是好的。这些都应该首先在我们的思想上明确起来。但是，回顾10年的改革开放，的确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路，或者在实际上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就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也就是我们党经常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改进、自我发展。这是我们党所一贯主张和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另一种就是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主张中国全盘西化的人，这种人党内党外都有，他们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是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化。是要通过所谓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甘愿充当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回顾一下10年来，是不是在有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偏离我们党的正确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情况？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比如讲，决定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正确的原则应该是实行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结合。一个时期以来，是不是有把中国经济引导到彻底否定计划调节、完全由市场盲目调节的轨道上去的倾向？我看是有的。再比如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应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结构。这是我们党的正确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实行这样

的方针上，在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或存在着某些损害公有制经济的现象？有没有或是否存在着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扶持和帮助不够，使它们难以发展，不给它们提供和创造必要的发展条件的状况？类似的问题还有没有，表现是什么，请同志们考虑考虑。就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的关系来讲，应该使两者有机地结合，不讲宏观调控的完全的市场化行不通，必将导致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严重混乱，这一点必须明确。就所有制结构而言，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一定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它不能损害公有制经济，不能忽视甚至削弱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骨干作用。与此相适应，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其它分配形式同时存在的方针。既然主体是公有制，就应以按劳分配为主，既然存在其他经济成分，当然就要有多种分配形式，允许非劳动收入存在。但是收入要是合法的，不合法的要取缔，对过高收入要通过税收加以调节，这是我们早就讲过的原则。可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国家的分配领域中存在很多问题，企业内部不公，社会分配不公，既有平均主义，又有新的不公。这种状况已经严重挫伤我国基本劳动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助长了超前消费和消费基金的恶性膨胀，助长了盲目攀比和种种不正之风，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同改革偏离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有关系，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过认真的思索，采取某些措施纠正偏差，调整具体政策，是必要的。当然没有必要在报刊上去公开争论，否则对稳定局势的全局不利。

五、必须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进一步坚定治理整顿的决心和信念。对我们面临的**经济困难**，估计得足一点，比估计不足好，要主动得多。实事求是地讲，现在的困难是很严重的，短期是缓解不过来的。讲清这种情况，才有利于统一全党的认识，做好过几年紧日子的准备。没有这种准备，而企求在任何既得利益都不触动**的情况下治理整顿**，搞好经济调整，是办不到的。拖下去，不治理整顿，不调整，那也不行，再拖就要垮了。现在的困难，不是这一两年内发生的问题，而是过去几年，起码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积累起来的。比如加工工业发展过多过快，基础产业跟不上，农业被严重忽视，用相当多的外汇进口化妆品、饮料、香烟，豪华的小汽车进口那么多，宝贵的外汇没有用到基础产业的建设上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很多，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财政赤字现在越来越多，银行货币控制不住，这类问题不花很大气力，全党思想不统一，怎么能调整过来呢！要解决这类问题，就要吸取过去的教训。进一步巩固平息暴乱的胜利成果，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最终还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因此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的方针。同时要认识到，治理整顿不是不要改革，是为了给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治理整顿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措施。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各方面关系紧张，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混乱，许多改革措施难以推进，硬行推进只能更增加困难。经济环境治理了，秩序整顿了，就能更好地加快改革。因此，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这两者不应该对立起来。我们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把这个思想认识统一起来，千方百计地争取用3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实现治理整

顿的目标，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从根本上巩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胜利成果的极为重要的一条。

六、要充分认识当前我们党脱离群众的严重性。这个问题不能不高度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要重建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从这次动乱、反革命暴乱中看，主要是知识界卷入的人多一点，总体上说工人农民没有动，人民解放军是捍卫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坚强力量，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但是，有那么多人卷入，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一些学校的党组织，一些舆论单位、文化单位、教育单位的党组织，对群众的脉搏摸清楚的程度究竟怎样呢？有的机关也有成百上千的人卷进去了，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去了。有些单位在那样做的时候，有多少人曾经事先向党组织透了气，通了信，报告了情况？有些行动群众已经采取，我们的党组织还被蒙在鼓里。为什么？从思想影响来讲，这几年我们有些党领导的舆论阵地可以说拱手让给了别人，或者是名为党员、党组织领导的，实际上思想变了，成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盟者。前一时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国内一些鼓吹自由化的所谓“精英”，在这样那样的场合，包括一些大学，包括一些什么协会搞的讲座，找机会发表种种最尖锐的话，把共产党骂得越臭，把社会主义否定得越彻底，过不久就会从香港或美国等西方国家发来邀请信，请他去讲学，实际上就是去骂我们，回来以后就成了“名人”，成了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成了所谓“民主斗士”。这样的人“名利双收”，越来越自我恶性膨胀，他们在部分群众首先是一些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也在扩大。而我们的党组织在群众中尤其是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和凝聚力，也相应地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种情况，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反映得很明显。动乱暴

乱的发生和发展，制止动乱暴乱的斗争，巩固这场斗争的胜利成果，从实质上看，也可以说是党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同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争夺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一场斗争。所以我觉得，上述的情况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能不认真地考虑，如何通过自己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恢复和发展党同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党的思想工作很深入人心，不是像前段时期那样软弱无力，干部深入群众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基本上能够摸住群众思想的脉搏，针对他们的思想，解决他们的问题，恐怕前不久的那场风波不至于搞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因此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党从这次动乱暴乱的反思中，一定要非常深切地考虑一下如何恢复和发展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以及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以新的有效的方式和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重建党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我们的党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天也不能存在。这个真理应该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

七、一定要把反对党和政府机构中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和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某些分配不公问题，当做两件十分突出的大事抓紧解决好。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我们要有非常鲜明的态度。第一，以讲反腐败为名，全盘否定我们党，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容许。学潮开始，我跟学生对话时，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你们说反腐败，有腐败我们跟你们一起反，但借口全盘否定我们党，这不可能，也办不到。第二，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的确滋长和蔓延了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腐化堕落等等脱离群众的现象。尤其在这几年，由于党的个别领导人主张淡化党的领导，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扬腐败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

错误论调，更加重了我们党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对这一点，在肯定我们党总体很好的前提下，对我们存在的问题估计重一点比估计轻一点对我们有利。估计得重一点，才能下狠心，下决心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应该说情况正在好转。就拿中央宣布的当前要抓好的七件事来说吧，清理整顿公司，党政干部不经商，领导干部子女不经商，主要领导干部坐国产车，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等这些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确实有了一些进展。当然还不尽如人意，不能估计过高。不反腐败，共产党是站不住的。从外部推翻共产党，看来现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政治力量，也不会得人心。但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导致党的蜕化变质，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当前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严重不满。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哪里？在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内部靠工资收入的职工之间，平均主义的现象还是主要的，同时也出现了某种分配不公，这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某些企业事业单位承包之后，少数负责人、管理人员同广大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比较好解决。另外，在社会范围内，广大职工、干部和知识分子同少数兼有第二职业者之间，同某些领域的公司职工之间，同某些“三资”企业职工之间，特别是同一部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之间，发生了收入上的过分悬殊。这个情况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重视。这种情况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的政治问题，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如果不高度重视并且逐步加以解决，会使广大劳动群众，使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使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产生严重的不满情

绪，挫伤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现在已经引起了这样的后果。解决的原则应当是合法收入要保护，非法收入必须取缔，同时必须通过税收，调节和控制过高收入。这个问题现在中央正在逐步研究解决。需要把这个问题提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不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发挥，社会也难以安定。

八、我们党还要高举民主的旗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论断还是对的。共产党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以及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怎么能拒绝甚至害怕民主呢？不民主怎么能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呢？因此，我们还是要致力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建设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长期奋斗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要划清几个界限。第一，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民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资本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但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种种具体做法和形式乃至某些具体制度，是具体的制度而不是它的根本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因为民主也是人类有继承性的财富。比如说，我们实行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开会表决，这并不是无产阶级发明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有的。封建社会大概不举手表决，你看过什么文献上记载过，皇帝召见大臣议事，举手民主表决过？大概没有，皇帝是金口玉言。但是到了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表决制的运用就很普遍了。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同志说过这样的话，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民主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并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是虚假的，但资产阶级民主往往搞得认认真真。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可以吸

收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代表执政的政治制度，但社会主义民主在许多具体做法上往往搞得马马虎虎。对这个说法，仔细琢磨一下，可能对我们会有启发，值得深思。第二，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相联系的那一套西方民主制度我们不能照搬。我们不能搞多党执政，不能搞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现在有人鼓吹所谓的“精英”政治，鼓吹政治多元化，鼓吹多党制，其实质就是要把广大劳动人民排除在外，否定乃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大破坏，导致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我们决不能容许这样做。第三，我们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绝对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的界限。闹绝对民主化，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一套绝对不行，其结果是既破坏民主，又破坏法制。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我们多次吃过它们的亏。为此，要向人民群众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一方面要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方面要使人民自觉地不要采取那种破坏民主法制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最后一点，要把民主建设同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民主没有法制的保证，不可能真正体现人民的民主。要做到行使个人的民主权利而不妨碍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民主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是不可能的。没有法制，就会既没有民主又没有必要的集中，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只能导致一片混乱。我们共产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举得高高的，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九、要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有一篇讲话，其中专门讲到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这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广大工人

非常高兴。这里我想讲几个基本观点。第一，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三支最基本的力量，因此，要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这三支力量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且同心协力，团结奋斗，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第二，我们这个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特别是依靠产业工人。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大生产紧密联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这次动乱、暴乱再次证明他们是完全可以依赖的，是国家的中流砥柱，不愧为我国的领导阶级。第三，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因此，过去的革命依靠工农联盟，工人派了自己最优秀的队伍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变成人民的武装力量，先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后来是人民解放军，打下了天下。解放后依靠工农联盟，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今后，我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实行工人支援农民，城市支援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来支援农村，帮助农民，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工农联盟的巩固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巩固的基础。第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下来的。这个基本观念不应当也决不会改变。绝不能因为动乱中知识界卷入的人稍多一点，就动摇了这个基本观念。说什么知识分子不可靠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不能像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当中最先进的最优秀的一部分，什么都要首先依靠知识分子，这个观念不正确。这样的结果并不利于知识分子本

身，而是使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脱离，乃至相对立，这不利于我们的国家，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们还要坚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基本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能变，对他们的基本估计不能变，对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的想法不能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能变。党和政府还应当想方设法，尽可能地逐步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同时，也应该作为一种希望、作为一种要求向知识分子提出，特别是对青年知识分子，要强调他们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和工农相结合，希望他们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性的历史实践中吸取营养，以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才能站稳脚跟。这次动乱、暴乱也暴露了有些知识分子立场不那么坚定，在风浪当中动摇了。这是事实。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由于知识分子本身劳动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往往同社会实践的结合不那么紧密，同工人农民的结合不那么紧密。采取和执行正确的政策，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三支基本力量的积极性都能发挥出来，而不要使哪一个方面在我们的社会中感到受压抑，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就一定能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十、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在于把我们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凝聚力、感召力、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党，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党。这样我们就有希望了。前面所说的一切都 and 这一点相联系。应该看到，40年的实践乃至中国近代10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的开始，是人民从长期

的历史实践中作出的正确选择。这4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我们党可以说是在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步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这次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所以酿成一场大祸，主要问题也出在党内。我们党正是纠正了个别领导人所犯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之后，才取得了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这场斗争的胜利的。问题的发生主要在党内，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主要的力量也在党内。因此，党的状况如何，决定着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途，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党担负着不可推卸的极其重大的历史责任。对这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应该不是由此而产生任何自满，而是应该感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重大，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望我们党内的所有同志，在当前巩固平息动乱胜利成果的斗争当中，在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当中，在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当中，都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自觉性，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答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问

(1989年9月)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9月16日接受应《经济日报》邀请来华采访的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组的访问，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国外舆论界感兴趣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一些问题。

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来到中国采访，我们感到中国40年来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挫折。“6·4事件”以后中国将向何处发展？这是日本人民很关心的问题。

我们的基本政策不会变

答：我国领导人在不久前发生的风波之后曾多次讲过，我国既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政策不会变。总的方向还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要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西方有些国家总是说我国平暴以后政策变了，这是他们的误解，或者说他们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本来就理解得不那么正确，误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就是要搞私有化，在政治上要搞多元化，文化上要完全西化。我们决不会走这条路。我们既定的方针不会变，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方向不会变。

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还是分三步走。第一步从1980年算起，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现在我们正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虽然还会遇到不少困难，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是有把握的。第三步是再花50年左右的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外交方面，我们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将立足于维护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关系和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决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我们还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而继续努力。我们将坚持两条：一条是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条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问：去年9月我曾来过中国，现在又来到中国，在经过天安门时看到了戒严部队的战士。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戒严何时能解除？

戒严还要维持一段时期

答：我先要向你解释一下中国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含义。我不知道“戒严”这个词在日文是如何翻译的，它在英文中被翻译成为“martial law”，这个翻译不能准确地反映我们实行的戒严的含义。martial law 一般有军管的含义。军管

往往是政府失去了控制政局的能力，因此由军队来控制局势。我们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在北京市的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人民解放军根据政府的命令执行戒严任务，即对某些重要机关和交通要道实行警戒。它并不干预任何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生活等，只是起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实行戒严以后，结束了三个月前的混乱局面，现在首都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首都的稳定促进了全国的稳定。首都部分地区继续实行戒严一段时间，是保证首都和全国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戒严尚未取消，主要原因一是极少数暴乱分子尚未全部缉拿归案并依法得到应有的处置，一是前个时期被暴乱分子抢去的枪支还有少部分散失在社会上，还没有全部收缴回来。现在戒严已经逐步放宽，岗哨在减少，广大群众已经可以有组织地到天安门广场参观、活动。首都人民各方面生活是正常的。当然，戒严肯定是有限期的，但目前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附带说一句，有的西方国家以中国取消戒严为先决条件，提出什么不取消戒严就不同中国交往，这是对我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这种主张是我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实际上，继续实行一段时间的戒严，并不影响我们同国外的交往，你们来我国采访不是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问：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现在做些什么？今后将对他如何处理？

答：赵紫阳同志犯了在党内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他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党内问题。在今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根据党章，根据民主程序，经过全体中央委员讨论并一致通过决议，撤销了他的总书记、政治

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对他的问题，我们党还在继续审查。今后如何处理，将以他的错误事实为依据。

问：现在赵紫阳先生在什么地方居住？他的日常生活是否自由？

答：他的日常生活是自由的，而且原来的生活待遇并没有变。他还住在北京。

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先生身体是否健康？现在西方有些报道是关于邓小平先生健康的，国庆节邓小平先生是否会露面？

邓小平同志身体非常好

答：我可以告诉你，邓小平同志身体非常好，很健康。今天（16日）晚上你们就可以从电视中看到他的风采。如果我们的会见改在明天，这个问题你们肯定就不会提了。西方和港、台的某些新闻媒介老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健康问题上做文章，制造谣言，实在很卑劣和令人厌恶。

问：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沿海和内地发展不平衡，对此你有何看法？

沿海要支持内地发展经济

答：中国国家很大，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个客观事实。中国经过这10年来的努力，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从总体上已基本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有几千万人口的地区，温

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地区我们通常叫“老、少、边”地区，即自然条件比较差的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这些地区比起沿海和内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差距很大。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对沿海地区还是要继续支持它们发展，并尽量鼓励它们根据实际可能把原料和市场放到国外，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鼓励沿海和内地进行经济协作，用沿海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内地发展，争取把差距逐步缩小。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短时期内还难以做到。实行这样的政策，有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内地，情况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比如山西，由于同沿海地区实行经济协作，煤炭资源的开发比过去加快，省里的经济情况比过去好得多了。对于一部分条件很差的贫困地区，资源又很贫乏，国家还拨了专项的扶贫资金，用于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问：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对这一点我们已经充分理解。现在中国正在进行治理整顿，这对中国农业、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前景将产生什么影响？

治理整顿的中心是抑制通货膨胀

答：治理整顿的中心问题是抑制通货膨胀，逐步缓解由于前几年经济过热造成的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目前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和制定治理整顿的总体计划，进一步明确经济调整的目标、时间、步骤和政策措施。调整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逐步解决农业徘徊问题，努力把农业搞上去。我们还要在努力保持总量大体平衡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实行倾斜政策，向农业和基础工业、基础设施

倾斜，对加工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加以适当控制。物价结构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要进一步适当提高农产品主要是粮食、棉花等的价格，适当提高能源和某些重要原材料的价格，以支持农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我们的方针可以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发展速度要适当降低，产业结构要合理调整，技术水平要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和经营作风要认真改进。总的还是要发展，但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对个体经济，我们将在继续鼓励它们适当发展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宏观管理，以便更好地发挥它们对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作用。

问：中国的交通费用为什么作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农产品目前还有两种价格，调整价格的重点是不是国家价格，国家价格将放到何种程度？

两种价格状况短期内不可能取消

答：前不久我们提高了铁路、水路和航空的客运票价，货运价格没有动，预计这对整个物价水平的影响不会太大。我国交通运输业长期实行的是低运价政策，许多客运票价从5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调整过，这同其他物价水平已不成比例，造成了交通运输业严重亏损，价格再不调整已难以为继。这次提高客运票价，将会有利于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此我国人民是能够理解的。

农产品价格的调整主要是逐步适当提高国家向农民实行合同订购的价格，当然这方面的价格仍将低于市场议价。中国农民有向国家积极交售粮食等农产品的义务，他们在完成合同订

购任务之后，多余的粮食等还可以到市场上出售。两种价格的状况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取消。

问：现在苏联的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中国对少数民族问题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西藏独立”的阴谋注定要失败

答：我们一贯坚持民族平等互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根据宪法和法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决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权力。我们一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保障他们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字和语言，还提倡和鼓励多数民族主要是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大量培养了本民族的干部。总的来看，我们实行的各民族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政策是成功的。目前我国虽然也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些麻烦，但绝大多数民族地区政局是稳定的，经济文化是持续发展的，有些地区的发展还相当快。当然，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各民族间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西藏在今年初一度出现骚乱，主要是因为达赖一伙在国外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西藏内部也有极少数主张所谓“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分子。任何妄想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的图谋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同胞所不能容许的，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西藏局势不是恶化，而是逐渐趋于平静，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

问：在香港，自“6·4”事件后对中国政府有一种不信任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使香

港恢复对中国的信赖？

不允许把香港作为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

答：我们早已经注意到了你刚才说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当然同港、台和国外对我国动乱、暴乱的错误报道，乃至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是分不开的。我相信，随着我国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随着中国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香港同胞的心态终将逐步趋于平衡，对祖国政府的信赖终将逐步恢复。对此，我充满了信心。在香港问题上，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方针决不变，也不容许以任何借口不执行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我们决不会强行改变香港的现行社会制度，同时我们也决不容许某些人妄图把香港变成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井水不犯河水”应该是我们都遵循的原则。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间和回归之后，我们都将不断努力保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想，香港人也应当理解这一点，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内地繁荣稳定，没有内地作为依靠，香港也无法繁荣。所以，香港人也应该支持祖国政府保持政局的稳定。内地的任何动乱，归根到底也是不符合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的。

问：现在，东欧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一些政治变动，在波兰存在着团结工会，中国今后是否会允许工人自发地组织一些工会组织？

中国不许出现反对派和反对党

答：我们对波兰和匈牙利最近的情况很关注，但我们在处理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将始终遵循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我们相信，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终究会从自己国家的情况出发，找到符合各自国情的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我们中国，将不允许出现摆脱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派和反对党。我们国家的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职工的群众组织，它们在党的领导下活动，同时维护职工群众的利益，独立地进行工作。在这次动乱和暴乱过程中，北京和其他个别城市出现过“工自联”等非法的工人组织，其主要成员是极少数策动动乱乃至暴乱的非法分子，因而很快被取缔，并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拥护。在前不久的风波中，我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的队伍是稳定的，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问：今后，在日中关系问题上，在经济、贸易、技术、资金合作等方面，中国对日本有些什么样的期待？

注意到日本与美国态度有所不同

答：中日两国自从邦交恢复以来，根据两国联合声明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关系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正常的和顺利的。中国一贯重视同日本的关系。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希望能够世代友好下去。在不久前发生的风波期间，日本方面也做了一些有损于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当然，我们还注意到，日

本官方同西方有的大国比如美国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个人希望这只是中日长期友好关系当中的一个短暂的插曲。要是说到期待，我还希望日方在两国贸易中为进一步缩小中方的逆差而努力，能够更多地进口一些适合日本市场需要的中国商品，并且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同时使已经达成的有关资金合作方面的协议能够得到继续执行。

注意到逃亡分子在国外活动已逐步受到限制

当谈到有的外国政府目前还在支持与纵容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暴乱分子在其国土上进行种种反对中国政府活动的问题时，袁木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这样做。他希望所有收容被我国通缉的暴乱分子的所在政府，尊重中国法律，恪守国际法准则，妥善地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同时他还说，我们也已经注意到，这些逃亡在国外的暴乱分子的种种活动，现在也逐步受到某些方面的限制。譬如他们最近在所谓天安门事件“百日祭”的活动中，就因为种种原因而远未能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和规模。这里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拥有 11 亿人民的中国是稳定的，中国政府是能够控制局势的。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他们还是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打交道，任何孤立中国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对企图这样做的人很不利的。

最后，日本记者表示衷心祝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取得更大成绩，袁木向他们表示感谢，并请他们代向日本读者致意。

(据新华社报道)

答日本共同社记者问

(1989年10月)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 10 月 15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由共同社驻北京分社社长伊藤正率领的日本共同社记者组采访，回答了一些国内国外关心的问题。

问：听说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能否就此作进一步的透露？

答：据我所知，十三届五中全会有可能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经济问题，将就进一步治理整顿和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重要决策。经济稳定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次会议，肯定将为全国人民和国外朋友所普遍关注。

问：中国目前面临一些经济严重问题，能否对经济形势作点展望？

答：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近一年多来，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 1 至 9 月，我国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 8.9%，农业方面夏粮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早稻获得丰收，两者合计比去年增产 351 万吨。物价上涨幅度逐月回落，通货膨胀势头得到初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所控制，货币回笼情况比较

好。总的来看，国民经济在治理整顿中平稳发展，情况比原来预想的要好一些。

但是，目前我国经济还面临比较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不是这一两年才出现的，而是几年来积累下来的。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国情国力的经济过热现象。主要的问题是：1. 建设规模过大，发展速度过快；2. 经济结构不合理，某些方面比例失调；3. 经济效益低，各方面铺张浪费严重。强调微观搞活是对的，但忽视了加强宏观控制和管理；简政放权是对的，但忽视了必要的集中，这就导致了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的混乱。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这种情况，决定用3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治理整顿，重点是继续控制总量，合理调整结构，同时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只要工作做得好，我国经济可望逐步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

问：《人民日报》最近发表文章强调安定团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在还有不安定团结的因素？或者说赵紫阳一派还有较大的影响？

答：我的看法是，中国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才短短几个月，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人心稳定，政局稳定，经济也在治理整顿中平稳发展，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党和政府是信任的和拥护的。这是因为，他们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这十年来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使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取得了过去剥削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取得的成就，所以大家拥护共产党的

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那种目的在于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和暴乱，是不得人心的。现在强调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是要大家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局面，珍惜和保卫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这决不意味着赵紫阳同志或者你们所谓的“赵紫阳一派”还有多么大的影响。当然，赵紫阳同志在任职期间支持、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这种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此外，有些动乱、暴乱分子还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有些罪犯尚未缉拿归案。这些不安定因素还是存在的，但也不应夸大它们。有一个事实可能很足以支持我所说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党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职务时，到会同志全体一致通过。而且，各级党的组织直至基层组织，社会各个方面和各界人士，都通过各种渠道表示拥护这一决定。

问：你对中国目前同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关系，及其改善的前景有何评论？

答：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中虽然也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最近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問題，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过程中所采取的纯属解决一个国家内政问题的措施，西方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不仅不予理解，而且还采取了诸如对我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立场。美国方面已表示这里头有受错误舆论导向的因素。因此，继续改善两国关系，克服目前存在的一些障碍或麻烦，美国方面应采取主动。只要美国放弃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我们方面对改善两国关系不存在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也要争取

外援，包括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和技术合作。但是，这种事情不能一厢情愿，只能在双方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我个人认为，中国同西方国家包括同美国的关系，以及同它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迟早总是要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巩固的，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共产党领导的拥有 11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国际上谁也无法否定这个事实，想孤立中国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到对中国的所谓“经济制裁”，我们已注意到近来有所缓和，但远未取消，尚未恢复正常。对此，中国政府已多次表明过自己的态度：第一，我们不怕，中国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干涉我国内政的压力；第二，中国将坚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然，所谓“制裁”会对中国带来一些暂时困难，但也会激发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而且“制裁”对“制裁者”也会带来损害。

问：关于日中关系，你有什么希望？

答：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希望，我们两国能够世代友好下去，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亚洲、世界人民的利益。我们两国恢复邦交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现在也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而出现了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也注意到了日本的一些做法同西方有的大国还是有所不同，并表示了逐步改变的愿望。我希望，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在两国的友好关系中，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只是一段插曲。说到希望，从政治上讲，希望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长期友好相处。从经济上讲，希望两国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中国方面的贸易逆差进一步缩

小；希望双方的资金合作协议继续得到执行；希望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少一些障碍，多一些开放。我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也是乐观的。

问：关于台湾当局的“弹性外交”有何评论？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原则立场决不容许有任何改变，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导致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最近同格林纳达、利比里亚中止外交关系，再次表明了我们的这个庄严立场。台湾当局推行所谓的“弹性外交”，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是不会有前途的，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希望台湾当局顺乎历史的潮流，采取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明智决策。

问：中国最近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否意味着又要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答：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前个时期，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得力，不一贯，思想政治工作遭到削弱，是不久前发生动乱、暴乱的主要国内原因。我们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为了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更好、更健康地向前推进，这同回到“文革”时期是根本不相干的两个概念。中国人民吃够了“文革”的苦头，决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宣言

(1989年10月)

在取得了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

这个领导集体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国内人民，国际友人，都对她翘首相望，满怀着殷切的期待，细心地观察着她的动向。

就在这样的時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前夕，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了庆祝新中国诞生的长篇讲话。

这篇讲话，发表前经过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经过几千名同志的深入讨论和参加修改，使它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这篇讲话，无疑是在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之后，我国新的领导集体对内对外的一篇重要政治宣言。

人们从讲话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坚定的原则立场和鲜明的性格特征：

——它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己的路，回

答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人们普遍关心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剖析历史和现实，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前进的方向；

——它充满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顶住国际上反共反华的逆流，庄严地昭告天下：中国人民过去从来没有、今后也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决不会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立场的问题上后退半步；

——它立足于充分相信中国人民的创造伟力，弘扬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强调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同时，郑重地宣告了古老的中国将以更勇敢的姿态打开大门，以更博大的胸怀吸收世界上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以便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好更快地推向前进。

.....

这篇对内对外的政治宣言，无疑也是当前指导我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以这篇重要讲话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目标一致，同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发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成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社会主义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一定是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的，就一定是任何国内外敌对势力都动摇和改变不了的。

因此，我们学习讲话，最重要的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增强辨别历史经验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更好地掌

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右，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年，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取得了在过去剥削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取得的成就。这是新中国历史的主流。但是，我们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前30年不断反右，结果主要犯了“左”的错误。后10年主要反“左”，忽视了右的倾向的滋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了导致前不久动乱和暴乱发生和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因。教训是深刻的。联系到革命战争时期，最初主要犯了右的错误，后来又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到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又经过了党的七大，由于有了克服右的和“左”的两方面的宝贵经验，这才逐步开拓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现在，我们又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比较全面的经验和比较成熟的认识，只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时刻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就一定能开拓出引导我们夺取社会主义事业更大胜利的正确道路。

——自始至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紧密地、有机地统一起来，时刻也不要忘记明确划清两种截然对立的改革开放思路的界限，这不仅对于推动我国已经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潮流向前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有着现实的和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如果不进行改革开放，必然将窒息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吸引力，不能最终得到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如果不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和基础，这种改革开放必然导致于

资本主义化，导致于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导致于劳动人民重新沦为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国际反动势力，国内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相互联手，恰恰是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不久前我国发生的动乱和暴乱，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逆流，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切忠诚于社会主义的人们，都不能不从中提高警惕，从血与火的考验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我们一定要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将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长期存在，从而更加自觉地、始终一贯地、长期不懈地把反对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自由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质，就会走向自我灭亡的深渊。不反对自由化，四项基本原则也就不可能坚持。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切的认识和切身的体验。但是，制止了动乱，平息了暴乱，自由化思潮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是否就完全消除了呢？当然没有。在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尚未充分发挥、充分展示之前，自由化思潮总会有它的市场。对这一点，我们也决不能解除思想武装，不能丧失警惕。为了把反对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长期坚持下去，第一不能一阵风，不能紧一阵松一阵，不能硬一阵软一阵，否则就会重蹈过去的覆辙；第二不能简单化、扩大化，不能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不能不继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否则就会弄得草木皆兵，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引起严重的反效应，甚至会重新导向十分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万马齐喑的僵化局面；第三必须立足于

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决不能自觉不自觉地吧知识分子看成是反对自由化的对象，而只有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反对自由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自觉地担负起这项历史使命，才能真正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而不至于半途而废。

——在充分肯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前提下，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决不能忘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不能忘记我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阶级斗争。当前，总的来看，国际形势正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经过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世界持久和平有可能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可能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这种国际形势的总格局和总趋势，并没有因为我国发生的动乱、暴乱和国际反动势力掀起的反共反华浪潮而改变。但是，当今的世界还很不太平，还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斗争。在诸多的矛盾和斗争中，西方帝国主义世界妄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打一场以消灭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没有硝烟的”“不流血的”战争，夺回社会主义已经占领的阵地，重新使它们纳入国际资本主义的体系，是这诸多矛盾和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而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尤其是它的初级阶段，国内还存在着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分子，还存在着种种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斗争不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发展到相当激烈的程度。国内敌对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总是要向国外反动势力寻找支持和依靠，国际反动势力又

从这里得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依据。这种情况，无疑在前不久我国的动乱和暴乱中已充分暴露出来。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很少讲甚至根本不讲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不强调甚至根本不强调用这样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国际和国内问题（这里指的当然是应该讲而不讲、应该用而不用的一些方面，决不是主张盲目地胡乱讲和胡乱用，重新又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上去），因而使我们对动乱和暴乱的发生与发展未能很好地防患于未然，这难道还不是又一条很深刻的教训吗！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应该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作为忠实代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绝对没有拒绝和害怕民主的任何根据和理由。民主是人类进步历史中具有继承性的重要遗产之一。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完全应该和可能借鉴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一些民主的做法、形式和一些具体制度，但决不能照搬同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相联系的那一套。这是因为，体现广大人民当家作主权力和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同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民主，有着不可混淆的原则区别。我们必须从本质上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有人鼓吹所谓的“精英”政治，鼓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轮流执政，其实质是把广大劳动人民排除在享受民主权利之外，否定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大破坏，是我们所决不能容许的。社会主义民主又是同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绝对不相容的。极端民主化盛行，无政府主义泛滥，如

同“文化大革命”和这次动乱、暴乱期间已经出现过的那样，其结果只能彻底违反宪法和法律，严重破坏法制，使一切真正的民主秩序和制度荡然无存，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总之，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并且把它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造福于人民和真正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齐抓，两手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战略方针。坚决克服一个时期以来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前一手硬后一手软的偏向，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也是需要长期重视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特征。当然，离开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离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侈谈精神文明建设，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以为生产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文明建设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这同样也是错误的。特别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只抓物质文明建设，只注意发展生产，严重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不仅难以获得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且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走向畸形发展的危险，甚至有走向蜕化变质的危险。大体说来，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包含着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思想、道德建设。任何文明的国家和社会都需要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尤其需要扩大这方面的发展规模和提高这方面的发展

速度，尽快改变这方面的落后状态。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思想、道德建设，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更容不得对它有丝毫的忽视。前些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放松和削弱，导致新中国早已绝迹的许多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动乱、暴乱期间许多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行为的发生和发展，这也是我们由此而不能不吞食的一个苦果。

——恢复、发展乃至在一定的意义上重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克服严重脱离群众的种种腐败现象，极大地增强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党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对于这个真理，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上，一个时期以来令人遗憾地越来越淡漠了。党自从执政以后，某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腐化堕落等脱离群众的现象滋长了。特别是这些年来由于削弱了党的建设，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淡化了党的领导作用，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当然，这次动乱、暴乱的严峻考验证明，我们党在总体上还是好的，是坚强有力的。极少数阴谋分子以反腐败为名，妄图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决不会答应，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决不可能得逞。但是，如果党对自身的确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不惩治，不坚决克服，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走向自我毁灭，这是最危险的。动乱、暴乱中有那么多人卷入，酿成大祸，造成重大损失，群众对腐败现象不满，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党从十

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一是强调从领导做起，带头作出表率，一是强调狠抓实事，不说空话，已经把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的工作，更加坚定不移地开展起来，并已开始取得成效。对这一点，人民群众是欢迎和拥护的。对此，一方面希望各级党组织特别是领导机构要坚持不懈，一抓到底，决不手软；另一方面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要从爱护自己的党和政府出发，积极检举，加强监督，帮助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真正做到清正廉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群众心连心。这样，我们的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率领群众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图大业。

.....

江泽民同志在结束他的国庆讲话时郑重宣称：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决定性阶段。”

“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对人类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

这是真理，是中国人民首先是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我们应该坚决相信这样的真理和牢固确立这样的信念。这样，我们就不会只看到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旋涡和逆流而看不到历史长河的奔腾，从而不犯政治上的短视病；我们就一定能够百倍增强排除万难、不折不挠的勇气和信心，坚定地把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正确认识形势和把握 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

(1989年11月)

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是深刻领会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五个多月前，当我们取得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斗争的胜利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曾经预言，中国将爆发全面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的未来将是动荡不安的。也有一些同志在经过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对中国局势的演变存在着种种疑虑，忧心忡忡。五个多月过去了，那种预言不攻自破，有些疑虑和担忧也越来越显得是多余的了。现在，无论在政治形势方面还是在经济形势方面，都要比五个多月前的情况好得多，社会是稳定的，政治是稳定的，经济总的来看也是稳定的。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为五中全会的召开和作出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准备了政治前提，也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我们应当把握全局，从这样的高度来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五中全会的精神。

一、形势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政治局面

从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月，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瞬。但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好多人曾经彻夜难眠，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不知道我们的党会不会被毁灭，几千万革命行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会不会被颠覆。这种危险在五个多月前确实存在着。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妥善地处理了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仅仅过了几个月就出现了全国秩序迅速恢复正常，政策稳定、政局稳定、人心稳定，经济也在治理整顿中继续发展的局面。形势的发展大大地出乎我们许多人的预料。

五个多月来形势发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尽管现在还有那么一些人说道三道四，攻击四项基本原则，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从几十年的亲身实践中认识到了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通过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通过1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没有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谁要想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同时还必须长期不懈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这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经过这场血与火的考验总结出来的一条根本经验教训。不坚持改革开放，社会

主义就不能前进；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就会从中国这块土地上消失。改革开放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相辅相成的，对建设社会主义都是必不可少的。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统一了人民的思想，我国社会在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之后，才能如此迅速地稳定下来，齐心协力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局面，我们才能制定和部署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五个多月的形势发展还反衬出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党和政府平息暴乱、巩固和发展平暴斗争胜利成果的各项措施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形势，更不可能一心一意去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二、党经受住了考验，比过去更加成熟了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党的状况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无需讳言，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党一度放松了自身的建设，工作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是，在党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是有战斗力的，没有在这场斗争面前垮下去；绝大多数的基层党组织紧密团结广大群众，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支持和收买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并且在他们认为已经逐步得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和 11 亿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没有屈从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力，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充分表明我们的党是团结的，是有坚强战斗力的，在总体上仍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们说，经过这场风波的锻炼和考验，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了，这是因为我们党不仅领导人民坚决地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而且还清醒地看到了自身的种种不足和弊病，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革除。中央明确提出，中国过去发生的多次失误，问题主要出在党内，解决问题也必须主要依靠党内的力量，首先从党内抓起。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充分表现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胆略和勇气。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经过对动乱、暴乱的深刻反思，把发展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决克服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种种腐败，极大地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作为一项根本性任务提到了全党的面前。所以，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不久，党就及时加强了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注意抓了两条：一是强调从领导做起，带头作出表率；二是强调狠抓实事，不说空话，坚决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和党内建设。五个多月的实践表明，我们党在这方面当然还远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毕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因此，中国不但没有发生什么政治危机，政治局面反而更加稳固，人民进一步增强了对党的信任。这样，也就为党领导人民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政治条件。

三、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得到了人民的拥戴

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几个月来，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及时作出正确决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这个

新的领导集体刚刚诞生时，国内人民和国际友人都对它翘首相望，既有殷切的期待，也有抱着复杂心情的细心观察。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人们疑虑的心情逐步消除，满意的心情逐步增加，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人民当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它正在树立起坚持改革开放的形象。在新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在正确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得更稳、更好乃至更快；

——它正在树立起保持清正廉洁、与人民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形象。正因为这样，它正在越来越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它正在树立起重大决策坚持走群众路线，集中全党智慧，进行民主决策的形象。这样做，正是建设、改革和治理整顿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它正在树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形象。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抓住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总的看来是深得人心的。我们不用去一个一个地列举，但起码有这么几件事值得特别提一下。比如：在政治方面，全面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确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里那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在宣传工作和舆论导向方面，大力端正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前一个时期那种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并充斥于舆论阵地的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在党的工作和党

风建设方面，认真纠正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忽视党风建设的错误，使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比之过去来说的确得到了初步的加强；在廉政建设上，党中央提出要办好的七件实事，有的已经做了，有的正在做，有的还准备采取新的措施。过去多年形成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动乱当中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攻击党和政府的一些问题，现在已开始得到解决或正在解决。总之，过去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在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带领下，我们既然有能力有办法平息动乱和暴乱，克服由于动乱和暴乱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困难，我们也就一定有能力有办法取得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胜利。

四、一年来的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成效， 为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积累了经验

过去一年来的治理整顿工作，尽管受到了动乱、暴乱的严重干扰，但还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为五中全会确定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过高或过低估计治理整顿已经取得的成效，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年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成效的主要表现是：第一，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降了下来，由于经济过热带来的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国民收入超分配、总量不平衡等问题开始得到控制。第二，通货膨胀率得到了一定的抑制。虽然今年的物价还是上涨了，但是从年初到现在，全社会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是逐月下降的。与去年同期相比，年初的时候上涨26%，现在已降到上涨12%左右。在这个总指数中，一是新涨价的因素比较少，

二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幅度比总的涨价幅度小得多，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对待市场物价的心情是平稳的。第三，货币回笼情况比较好，储蓄大幅度增加，到年底可以增加1200亿元左右。第四，今年农业生产情况还是不错的，继夏粮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后，秋粮也比去年有所增产。治理整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还有许多措施尚未得到有力贯彻，有些工业的效益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增强了人们进一步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信心，也为争取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增添了新的可能性。这恐怕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的。

还必须指出，一年来治理整顿所取得的成绩，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成绩本身。其一，平息动乱、暴乱之后，国外敌对势力，一小批动乱“精英”如严家其、陈一谔之流，曾多次预言中国经济将会在治理整顿中走向崩溃，最终只有靠私有化才能走出困境，历史并没有而且可以断言永远也不会证实他们这种预言。其二，它有力地证明了治理整顿决不是改革的倒退，相反地正在为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创造更好的宏观环境，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这是使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其三，一年来的治理整顿以及经过对这一年治理整顿经验的认真总结，使全党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五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只要我们团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专心致志地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够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一定能够更有把握地实现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五、保持基本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从平暴以来，中央作出的一切决策都从有利于稳定中国局势这个大局出发，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得人心的。我们的国家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当前的关键就在于保持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稳定，建设、改革和治理整顿都将一事无成。尤其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如果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发展，这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重大的意义。因此，五个多月来，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在各种重要会议上，一再重申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不变，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还要办，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不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政策不变，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不变等等。对于前一段各方面执行的某些具体政策和某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只有在发现它们确实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或者严重地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才以十分谨慎的态度，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来加以解决。五个多月的实践充分证明，这样做有利于全局的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幅员广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又极不平衡。稳定，才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一心一意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也才有利于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当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经济稳定发展为中心。所以，无论治理整顿还是改革开放都要为稳定这个

大局服务，都要成为促进全局稳定的有力手段。

保持各项基本方针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然并不意味着不调整、不改革。在过去的五个多月中，在保持基本方针政策稳定的前提下，按照稳定、充实、调整、改善的方针，对前几年已经出台的有些改革措施，进行了局部性的调整、补充和改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里，有必要纠正一种错误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这几个月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完全不对的。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首先，它把治理整顿同改革开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似乎治理整顿就是不要改革了。实际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相辅相成的，治理整顿的某些措施本身就需要改革的配合，而深化改革离开了治理整顿也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其次，改革是否深化决不能只以是否有新措施出台作为标志，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扩充和完善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也是深化改革。判断深化改革是否取得应有的成效，只能以改革措施是否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标准，以是否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标准，而不是其他。

保持各项基本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是因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我们党的基本和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人心的。因此，我们考虑一切问题，制定和执行各项具体政策，每个同志自己的行动，都要从这点出发，才能有利于全局的稳定。最要紧的就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样，建设、改革和治理整顿就必定能够平稳地向前发展。

六、顶住外来压力，坚持原则，多做工作

在我国动乱、暴乱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西方一些国家肆意插手，深深地卷入；在制止动乱、平息暴乱之后，他们更是蛮横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对我们进行所谓的经济制裁。西方一些国家为什么如此急不可耐，气急败坏，说到底就是因为它们从来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和发展。我们制止了动乱，平息了暴乱，使得他们要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不甘心失败，就用所谓经济制裁的办法，妄图迫使中国就范。经济制裁的实质是政治制裁。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原则、多做工作的方针。西方的所谓制裁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几个月来的情况表明，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关系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还在发展，外商来华投资还有所增加。

任何事情总有两面性。一方面，制裁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另一方面，也会提高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激起人民发愤图强的精神。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更具有本质的意义。从总体上讲，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内市场广阔，人民具有艰苦创业的传统，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外来压力变成动力。我们从来就不曾企求过依靠别人的施舍来实现我国的现代化，而是一贯主张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当然，这也决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搞建设，我们仍然要坚持对外开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借助国际上一切可以借助的因素，加快

我国的经济发展。只要我们在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再扎扎实实地干它几年，社会主义中国就一定能够拥有更强大、更坚定的经济实力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通过对五个多月形势发展的观察，我认为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短短五个多月的历史进程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第二，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需要有政治的稳定，需要有经济的稳定。政治稳定是前提，经济稳定是基础，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促进。在努力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同时，争取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

第三，政治和经济的稳定需要通过保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来加以实现，不论是进一步治理整顿，还是继续深化改革，都要稳步前进，决不能急于求成。

4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获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比较全面的经验和比较成熟的认识。只要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时刻不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时刻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的党就会充满活力，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率领人民努力奋斗，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胜利引向新的胜利！

关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问题

——答《瞭望》周刊记者问

(1989年11月)

在举国上下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就如何学习和落实五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回答了《瞭望》周刊记者的提问。

中国局势稳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卓有成效，深得人心

问：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是深入领会五中全会精神的思想基础，你对当前中国形势有何看法？

答：从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到现在，只有五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妥善地处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严重政治斗争，很快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解决了紧迫的政治、组织问题，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做了大量工作，从总体上看是深得人心的。在西方帝国主义继续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陆续出现一些严重波折的情况下，中国局势稳定，政策稳定，人心稳定，顶住了国际

上的反共逆流，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这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意义都是巨大的、深远的。这是我国形势的主流，也是我们观察形势的基本立足点。

五个多月的实践表明，我们的党是团结的、坚强的、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的人民是团结的、坚强的、经得起考验的。党和政府采取的制止动乱和平息暴乱的措施，越来越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这充分说明，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大地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深入人心。这是中国最基本的事实。没有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形势不可能在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就发生了现在这样顺乎党心民心的变化。

五个多月的实践还表明，四中全会确立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比如：全面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变了过去那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在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方面，相继召开了全国宣传、组织工作会议，纠正了过去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忽视党风建设的错误。当然不能说这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党中央已经下定决心，逐步解决这方面大家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状况好坏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中央明确提出，中国过去发生的多次失误，问题主要出在党内，解决问题也必须首先从党内抓起。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胆略和勇气。宣传工作端正了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前个时期那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并充斥于舆论阵地的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关系到纯洁社会环境和净化人们心灵的扫黄斗争更是大得人心。在廉政建设上，党中央提出的办好七件事，体现

出了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从领导做起；二是狠抓实事，不说空话。当然也决不能说现在做的已经很够了，在廉政建设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毕竟有了个好的开端。过去多年形成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动乱当中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攻击党和政府的一些问题，现在已开始得到解决或正在解决。广大人民反映，现在大家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逐步地增强了。这恐怕应该说是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在努力保持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同时，整个国民经济还是在治理整顿中得到了继续发展。从外交工作来讲，应该说我们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中央提出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多做工作，坚决顶住干涉我国内政的各种外来压力。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任何人想在国际范围内孤立中国是办不到的，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事业必将继续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总之，五个多月的实践表明，拥有 11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它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的仍然是一个改革开放、蓬勃向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既要 充分肯定成绩，又要如实估计困难

问：当前经济形势是每个人都关心的，现在众说不一。请你谈谈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答：在谈到经济形势之前，我之所以首先和你讲了当前我国总的局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观察我国的经济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情况，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五中全会着重讨论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意义。

至于说到经济情况本身，首先应该看到的是，10年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巨大，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10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51倍，平均每年增长9.6%；城市居民平均每人生活费收入由316元增加到1119元，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45元，10年内增加411元。而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90元。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村贫困户大大减少。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迅速扩大，外贸总额大幅度增长，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可以列举的事实和数字还很多，它们都说明10年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确实发生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过的历史性变化。这是客观事实，是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带来的成果。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应当如实估计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不是这一两年突然出现的，是1984年下半年以来逐年积累下来的。产生问题和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上急于求成，脱离国情，超越国力，建设规模过大，发展速度过快。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经济过热，财政连年有较大赤字，货币发行过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徘徊，加工工业发展过快，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紧张。同时，这些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前几年强调搞活微观经济是对的，应当充分肯定，但宏观调控能力削弱了，这对经济全局很不利。在治理整顿中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必要的适当的集中统一。

目前，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对困难估计不足，因而认识不到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二是，对困难估计过重，因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丧失信心。对困难要作具体分析。就目前困难的严重程度来说，它同我们历史上曾经碰到过的困难相比，例如同60年代初和“文革”时期的困难相比，无疑要小得多。就克服困难的条件来说，有比过去好的一面，也有差的一面，总的来看还是好的一面多一些。其一，经过10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克服困难的回旋余地比过去大得多了；其二，经过一年来的治理整顿，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其三，经过前不久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大家头脑更清醒了，对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看得更清楚了，人们对党中央的信心增强了。因此，我们完全有条件克服目前出现的前进中的暂时困难，没有任何理由丧失信心。

问：治理整顿一年多，也取得了成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首先是通货膨胀率得到了一定的抑制。虽然今年的物价还是上涨了，但是从年初到现在，全社会零售物价的上涨幅度是逐月下降的。与去年同期相比，年初的时候上涨26%，现在已降到上涨12%左右。在这个总指数中，国务院确定的40几种人民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幅度，比总的涨价幅度还要小得多。据观察，老百姓对市场情况的心情基本稳定。其次是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了下来，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减少500亿元左右；消费基金的增长虽然还没有降到预期的程度，但也有所控制。第三是今年农业生产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夏粮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秋粮总的来讲也比去年有所增产。第四是货币

回笼情况比较好，储蓄大幅度增加，到现在为止已增加 1000 亿元，到年底预计可能增加 1200 亿元左右。当然，大家都热衷于保值储蓄，持币选购甚至储币不购，这也就成为某种程度的市场疲软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看，治理整顿的效果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同样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治理整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市场销售疲软，某些企业产品滞销，工业增长速度下滑过猛。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首先应该看到，总的来说这是治理整顿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决不能因此而动摇治理整顿的决心，不能在整体上放松紧缩财政和金融的方针。与此同时，也要在宏观上采取必要的灵活的疏导措施，缓解某些企业和某些方面的资金困难。国务院已经决定陆续增加贷款的发放，10 月份已开始做了，11、12 月将继续增加。对企业来说，过去需求过旺，什么样的产品都能销出去，无论是提高产品质量，产品更新换代，还是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都缺乏压力和动力。现在情况不同了，市场疲软，许多产品滞销，企业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大力调整结构，提高科技水平，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从长远的根本的观点看问题，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决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分析和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应采取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决不要因为出现了某些新问题而匆匆忙忙地放弃紧缩政策；另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必要的疏导措施。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沉着应付，措施有力，目前的暂时困难是可以渡过的，治理整顿是一定能够搞好的。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辩证的统一， 把二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问：现在有些人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有些模糊认识，认为治理整顿是改革的停滞甚至是倒退。可否请你谈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答：这种认识是对中央关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的误解。前一段经济工作中某些做法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带来了总量失衡，结构失调，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稳定增长是不可能的。治理整顿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国经济摆脱困境，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治理整顿非搞不可，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治理整顿怎么搞？五中全会总结了一年来的治理整顿的经验，基本上把握了规律，据此确定了治理整顿工作的主要环节，概括来讲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压缩需求，调整结构，整顿秩序，提高效益。

深化改革也非进行不可。中国将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而社会主义要发展，就一定要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活力，它本来具有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就不会有吸引力，相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会有市场。我们一定要立足于这个基本点来考虑一切问题。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力，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们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断深化改革。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办法，都应当继续实行，并不断完善。

在具体处理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上，有三个观点必须明确：第一，治理整顿决不是不要改革，而且它的许多措施决不能只靠行政命令来推进，必须依靠改革措施的配合；第二，治理整顿取得了成效，就会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搞好治理整顿是深化改革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总量失衡、结构失调、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许多改革措施无法实行。经济秩序混乱，公司又多又滥，不清理，不整顿，搞活经济的改革措施不仅难以达到目的，甚至会造成反效应；第三，治理整顿也好，深化改革也好，它们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不能为治理整顿而治理整顿，也不能为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它们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因此，在治理整顿期间，必须克服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和行为。

在这三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里，主要的任务是治理整顿，改革应该围绕着治理整顿这个中心来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措施，都要在每年的国家计划中具体加以落实。今年12月初就要召开的计划会议，将具体落实明年的治理整顿任务和各项改革措施。

在治理整顿期间，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各个机关团体，特别是企业，一定要努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无论在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
整顿任务完成以后，都不能再提倡脱离
国情国力的所谓“大干快上”，必须坚持
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问：建国以后，我国经济进行过几次大的调整。每次的问题几乎都由经济过热引起，那么造成经济过热的根子究竟在哪里？

答：这次中央全会深刻地总结了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经济发展决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大起大落。如果片面追求高速度，一时热热闹闹，似乎发展很快，表面上很繁荣，最终还得掉下来，并非人民的福音。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逐步积累过程，只有在稳定的基础上，平衡地按比例协调发展，才能取得突出的进步。总量失衡，比例失调，大上大下，不但不能有效地积累生产力，而且往往造成巨大损失。过去的“过热——调整——再过热——再调整”，这种恶性循环必然形成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五中全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建设、改革、治理整顿都不能急于求成，无论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完成之后，都不能搞脱离国情国力的所谓“大干快上”，必须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持续，就是要长时间保持适当的合理发展速度；稳定，就是不要大起大落；协调，就是有计划按比例。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平稳发展，就谈不上稳定；大起大落，就谈不上持续发展；比例破坏了，持续、稳定发展都不可能。这是四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全党全

国都要按这个方针办，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个方针，保持适当的速度，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提倡过几年紧日子，主要是把
现在的高消费、超前消费遏制住，
坚决纠正铺张浪费、奢侈豪华的不正之风**

问：中央提出在治理整顿期间要过几年紧日子，对此应当怎样理解？

答：提倡过几年紧日子，当然各个方面都必须紧缩财政开支，大力开源节流。但是，这也决不是说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都要普遍下降。前几年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连续多年超过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引发了高消费和超前消费，也引发了在国民收入分配上过分地向企业和个人倾斜。1984年到1988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70%（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实际上出现了“寅吃卯粮”的现象。这种情况也败坏了社会风气，把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开支抬上去了，铺张浪费奢侈之风滋长了。这决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决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提倡过几年紧日子，就是要抑制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抑制高消费和超前消费，煞住铺张浪费、奢侈豪华的不正之风，纠正在某些生活设施上脱离实际可能盲目追求所谓“现代化”的现象，而不是要普遍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

过几年紧日子，不光是老百姓的事，首先要从各个机关团

体、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做起。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几个月的实际情况看，吃喝风、请客送礼风已经受到遏制。当然，各地情况不大一样，有的好一些，有的差一些。但总的来讲正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

中国对外开放的总方针不会变，也决不会 屈服于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的经济制裁， 暂时的曲折和困难是完全能够克服的

问：目前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我国经济在前进中又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前进的信心不足，对此，你怎么看？

答：西方有些国家对我国实行所谓的经济制裁，实质上是政治制裁。我们制止了动乱，平息了暴乱，使得他们要对我们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不甘心失败，就用所谓经济制裁的办法，妄图使中国屈服。这种制裁会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困难，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西方有些国家的政府，各国的企业界，广大的商人，还有许多有识之士，对这种制裁也并不完全赞同。从几个月来的情况看，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关系还在发展，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影响并不太大，外商来华投资还有所增加。任何事情总有两面性。一方面，制裁给我们增加了一些困难；另一方面，也会提高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激发人民发愤图强的精神。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更具有本质的意义。从总体上讲，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内市场广阔，人民具有艰苦创业的传统，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外来压力变成动力。另外，这种制裁也会给制裁者本

身带来损失。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现实。中国有着现实的和潜力巨大的市场，是有吸引力的。据我看，所谓的制裁终究会取消，不可能长期搞下去，当然我们也决不幻想这种情况短期内会结束。我们从来就不曾企求依靠别人的施舍来实现我国的现代化，而是一贯主张把立足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这也决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建设，我们还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广交朋友，利用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打开的大门决不会再关上，因为这样做不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符合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目前我国外债余额是 400 亿美元。其中，有短期债务，也有长期债务，长期的居多；有中央借的，也有地方和企业借的，地方和企业借的居多。大概 1990 年将进入还债高峰，每年大体上要偿还七、八十亿美元。按国际惯例，这种情况虽已接近但还不到偿还外债的警戒线。中国一贯恪守国际信誉，我们是一定会也完全有能力偿还外债的。

继续保持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政治要稳定，经济要稳定，整个社会要稳定

最后，袁木同志对记者说：我们的国家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当前关键的一条是保持整个国家的稳定。政治稳定是前提，经济稳定是基础，两者缺一不可，相互促进。为此，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前提。没有国家的稳定，建设、改革、治理整顿都将一事无成。只要保持国家政治、经济、社会

的稳定，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以上就是我学习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些体会。我们坚信，只要全国上下同心协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实现五中全会提出的治理整顿目标，巩固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达到经济上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当前经济形势和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决策

(1989年12月)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重点是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次全会是在十三届四中全会解决了紧迫的政治、组织问题，平暴胜利后大局稳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逐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当然还有不安定因素）的背景下召开的。我们只有对我国这五个月来形势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一个比较确切的了解，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央重点解决经济问题的意义所在。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为经过进一步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而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整个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奠定基础。应该说，这两者是不可或缺的，是相辅相成的。

据了解，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时或召开之后不久，党中央就决定五中全会要集中讨论经济问题。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部门特别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集中力量做了好几个月的准备工作。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不是仓促作出的。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文件经过多次修改，几易其稿，党中央和国务院反复讨论，专门邀集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来京开会讨论，同时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党外各方面专家人士的意见，然后又经过中央工作会议集中研究和讨论，最后才提请中央全会审议通过。所以说，《决定》的确是党内外集体智慧的产物。

一、平息动乱暴乱以来中国形势发展的回顾

在谈到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问题之前，我想和同志们一起，先回顾一下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五个多月来中国形势的发展状况。现在，从主流上看，我国总的形势是：国家稳定，政策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各项建设和改革事业正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当然，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但是，同五个月前那样政局严重动荡、斗争惊心动魄、国家濒临被颠覆危险的情况相比较，形势的发展是迅速的，很不容易的，也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的。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看法呢？

第一，从总体上看，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是团结的、经得起考验的，仍然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在那样严重的动乱之中挺立得住，也不可能动乱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迅速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不可能在当前西方帝国主义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一再出现严重政治波折的情况下，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依旧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点，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其意义都是巨大的、深远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我们的

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当前相当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现在是不是还要加上这么一句：只有中国才能挽救社会主义。当然，说这样的话，决不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什么中心，争什么领导，而是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就我们所应该自觉承担的历史责任来讲的。

历史的实践已经多次证明，我们的党是能够顶住形形色色的逆流的。前不久的政治风波，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我们的党丧失信心。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次动乱的发生和发展，有那么多人被卷入，从相当本质的原因上看，是由于党在一段时间以来，严重忽视自身建设，工作上有失误，腐败现象滋长蔓延，有些事做得不符合社会主义规律，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在群众中引发了相当强烈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动乱“精英”们猖狂活动，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并充斥于舆论阵地，扩大了它们的市场，迷惑和俘虏了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国际敌对势力乘机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拉拢、收买和支持国内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并逐步得手。因此，我们在总结动乱、暴乱的经验教训时，对此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党毕竟是坚强有力的，是值得人民信赖的。这是从五个多月来的形势发展中，完全应该和必须得出的一个结论。每个真正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共产党员，每个热爱祖国的公民，都应当确立这样的观念。

第二，我们有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共和

国的人民军队，这是我们的幸福。制止动乱，平息暴乱，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令，慷慨赴死，从容就义，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在最紧急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真正经得起严峻的政治考验，成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钢铁长城，迅速平息暴乱是不可能的。暴乱平息之后，如果没有人民子弟兵风餐露宿，日夜执勤，守卫着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中国形势也不可能这样迅速地稳定下来。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对党和政府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措施不那么理解。至今，这个问题恐怕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前个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腐败引起学潮；社论（指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引起动乱；戒严引起暴乱”。这完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由学潮到动乱，动乱到暴乱，完全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经过长时期的精心策划，蓄意制造和挑动起来的。为什么耀邦同志一逝世，在当时的游行队伍中，就有许多人狂呼乱喊什么“悼念胡耀邦，打倒邓小平”？悼念耀邦当然可以，为什么要打倒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吗？这10年来，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对外开放，哪一件大事不是小平同志首先倡导的？要打倒邓小平同志，究竟有哪一丁点理由呢！什么叫腐败引起动乱？所谓反腐败，无非是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陪衬口号而已。我们党从来没有说过腐败不要反，不仅让反，而且我们党一直在反。共产党如果不反对腐败，就会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大量的事实证

明，学潮和动乱是伴随而生的，是不可分割的，从学潮发生那天起就是动乱之始。只不过对被卷入学潮和动乱的广大青年学生来说，应该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并把他们同动乱的制造者和策划者们严格区别开来。《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只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情况下，向广大人民指明了问题的性质。社论发表以后，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局势逐步缓和，学校纷纷复课。后来，由于党的个别领导人公开发表支持动乱的讲话，这样才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动乱策划者们越发肆无忌惮，越闹越凶。我们今天重新提起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为了说明，人民军队服从党和政府的命令，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动乱，平息暴乱，从根本上保卫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人民的愿望。因此，从人民的角度看，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都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个国家有一支不管出现多大的风浪，都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人民的幸福和根本利益所系，也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第三，我国局势能如此迅速地稳定下来，还从根本上说明了我们国家的人民是好的，也是团结的、坚强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在中国11亿人民当中，已经深深地扎下根子，谁反对这一点，最终都是要失败的。五个多月来的形势发展说明，如果只是依靠军队维持秩序，稳定局势，而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国的大局也不会迅速稳定下来。党和政府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措施包括军队进城实行戒严，迅速稳定局势，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符合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的。尽管动乱中卷入的人不少，一段时间里也有不少人 against 党和政府制止动乱、平息

暴乱的措施不那么理解，但当他们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之后，立场和态度很快就转变了过来。政府的措施，人民解放军镇压暴乱的正义行动，越来越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随着极少数动乱、暴乱策划者们反党反社会主义面貌的暴露，随着他们的罪恶行径的被揭发，他们在群众中就越来越孤立了。最近这一段的清查清理情况的进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清查清理不能扩大化，该解脱的大多数应尽快解脱，这方面中央已经有了明确的要求和政策规定。但对那些顽固不化的敌对分子，阴谋策划动乱的极少数人，不坚决清查出来，就是极大的隐患，广大人民也是不放心的。在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决不容许我们国家的历史倒退，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存在。

第四，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集体，正在以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人民当中逐步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信任。新的领导集体团结合作，大力协同，正在以他们自己的实践，在人民当中逐步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当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之后，这个领导集体究竟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当时广大群众都在翘首相望，既有热烈的期待，也有这样那样的疑虑，大家都在细心地观察着他们的行动。到了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表了国庆讲话时，大家比较地放心了，比较地相信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是能够领导我们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了。这恐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最近有的同志反映说，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所作所为都和人民想到一块去了，因此人民的怨气消了，牢骚少了，笑脸多了，干劲足了。我想作点修正，是否可以这样

说：人民的怨气消了一点；牢骚少了一点；笑脸多了一点；干劲增长了一点，但还很不足。这样讲是留有余地的。比如说怨气，群众中还是有，当然这不是冲着新的领导集体的，而是过去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我看这是符合实际的。只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中国就有希望。总之，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清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把社会主义事业坚定地推向前进。

二、稳定局势的几点基本经验

五个多月来在保持国家稳定和促进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基本的经验呢？根据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我认为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全面地一以贯之地，而不是片面地或者不一以贯之地，坚决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10年来，我们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党的基本路线。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主要反映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手软了，没有能够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充分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使我们能更全面地、坚决地、正确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加以落实。

第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

向。实践告诉我们，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缺乏活力，陷入僵化停滞，就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优越性，不能具有吸引力，这就会从另一个侧面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扩大它的市场。但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就会导致全盘西化，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形成历史的大倒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来，有些人怀疑改革开放是不是要收了。特别是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以后，有些人更加重了这种怀疑。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至少是一种误解。我们党及其领导人一再宣布，我们绝不会因为发生了动乱和暴乱，就动摇和改变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仅如此，而且要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把我们的改革开放进行得更深入更广阔。

第三，领导带头，狠抓实事，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做起，切实促进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改变我们党在某些方面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几个月来，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努力抓好思想工作，端正宣传工作的方向；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抓党的建设。一个时期以来广大群众强烈反映的淡化、削弱乃至否定党的领导，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忽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大力加强廉政建设，特别是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应当着重抓好的七件事，是很得人心的，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党的工作有了好的开端。就坚决改变党严重脱离群众这种倾向来说，党中央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江泽民同志在国庆讲话中，把党的建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问题。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为了保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顺利进

行，江泽民同志又深刻地指出了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论述了加强党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央在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严肃指出，对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必须依法严厉惩处，决不能姑息迁就。不这样做，党不仅无法树立起崇高的威望，还会严重脱离群众，甚至会走向自我毁灭。诚然，总的来看我们的党是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坚强的、经得起考验的，但是如果不注意克服自身腐败，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危险也还是存在的。党中央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总结动乱、暴乱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狠抓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现在当然还远不能说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但毕竟比之过去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我在动乱、暴乱期间乃至平暴之后多次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动乱、暴乱的发生发展和平息暴乱的斗争，是我们党同“持不同政见者”，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极少数人争夺群众的一场斗争。我认为，现在动乱、暴乱虽然平息了，但并不等于这场斗争已经结束了，它还将持续进行下去，而且这样的斗争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第四，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必须自始至终把稳定全局作为头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因此，要采取稳妥的方针，而不是挑起争论的办法，逐步调整政策，稳定局势。我们党从平息暴乱以来一直是这样做的。这也是吸取了过去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之后，往往采取比较过激的办法，以至难免带来许多后遗症的经验教训。这次没有搞什么大批判开路，没有搞什么上挂下联。这也是我们党更加成熟的重要表现。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面临的情况来看，第一位的

任务是稳定全局。政治要稳定，经济要稳定，全社会要稳定。政治稳定是前提，经济稳定是基础。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整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中央最近处理许多重大问题，比如改革开放中的许多政策问题，都是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正面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经过人们反思，提高了觉悟，逐步加以调整、补充、充实和完善。这也就是按小平同志讲的，认真地思考过去，也认真地思考未来，做得对的坚持，做得不对的纠正，不足的地方加把劲。我认为，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在这一段时间内正是本着上述精神，驾驭全国局势，审时度势一项一项地处理问题的。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力地保证了局势的稳定，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没有引起过大社会震动的情况下，积极而又稳妥地逐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项复杂问题，也一步一步地把人们的思想逐渐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三、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五中全会的决策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重点是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我们只有对我国这五个月来形势发展的基本脉络有一个比较确切的了解，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央重点解决经济问题的意义所在。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为经过进一步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而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整个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奠定基础。应该说，这两者是不可或缺的，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中央这次全会的《决定》主要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根据个人的学习体会，我想概括起来讲以下几点。

第一，统一了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认识。对当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怎么看，首先既要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0 年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又要如实估计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和困难。我们既不能看不到 10 年改革开放的成绩，对现在出现的困难估计过重，因而对前途产生消极畏难、丧失信心的情绪；又必须充分估计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上，不能对困难掉以轻心，盲目乐观，否则就会看不到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我们尤其要注意防止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即把眼下治理整顿中出现的某些新情况如市场销售疲软、部分工业企业产品滞销、工业增长速度回落过猛等看得过于严重，以至从整体上动摇治理整顿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是治理整顿当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应该在坚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前提下，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宏观上采取必要的疏导措施。

对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应该明确这样几点：第一，10 年改革开放成就巨大，必须充分肯定；第二，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也很严峻，必须充分认识；第三，当前的困难决不是这一两年才出现的，而是从 1984 年下半年开始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第四，对困难既不能估计过轻，从而认识不到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又不能估计过重，丧失克服困难的信心；第五，现在治理整顿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既不能因此动摇紧缩政策，又不能不充分注意到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下滑过多，下滑的时间过长，就会出现经济滞胀甚至严重滑坡，那样对治理整顿的进一

步深入也是不利的。在对广大群众的宣传中，既要把现在面临的困难如实地讲清楚，又要充分说明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和光明前景，鼓舞大家克服困难的斗志。

我们说困难决不是这一两年造成的，而是多年来一些深层次经济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反映，主要有些什么样的事实根据呢？

首先，社会总需求多年来过多地超过社会总供给，现有的国力和社会生产能力已经无法支撑现在这样过大的建设规模和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近些年来固定资产的投资和消费基金的增长，都远远地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从1984年至1988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是200%。由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双膨胀，造成了这些年财政连年有较多赤字，货币超量发行。货币每年发行多少，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我们现在却被迫超经济发行。投资规模、建设规模过大，这是人们都能感受到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问题，但由于当时对问题的严重性和形成困难的原因没有进行深入的揭露和分析，所以从相当一部分地方来讲，就一定意义上说，治理整顿的方针在相当的程度还没有被大家所自觉接受。

其次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工农业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突出。农业连续多年徘徊，粮食产量停滞不前，棉花产量减少。今年情况好一些，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以上。农业发展缓慢，再加上人口的增长，人均粮食产量已经由800斤降到了730斤，形势很严峻。相应地工业发展速度过快，这就造成了工农业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乡镇企业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

定，今后还要继续引导它们健康发展，但前几年这方面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盲目性。从指导思想上来看，注意“无工不富”是对的，但严重地忽视了“无农不稳”和“无粮则乱”。五中全会决定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上，得到了全党的拥护。今冬以来农田基本建设出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高潮，今后农业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前几年问题相当突出，农业每年增长3%~4%，工业增长17%~18%，差距越拉越大。在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发展过快，基础工业虽然也有发展，但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比例失调和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国到处缺水、缺电、缺油、缺煤、缺钢、缺能源和原材料。许多工业项目建设起来了，但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在那里，造成了很大浪费。交通运输不论是客运还是货运都非常紧张。

再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前几年在改革过程中强调放权让利（这是完全对的），但没有相应地加强宏观管理与宏观控制。由于这方面存在的片面性，造成了资金、物资、外汇过度分散，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削弱了。现在人们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认为这既是一个政治思想、组织纪律的问题，也是涉及到利益分配体制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问题。国家财力物力分散过多，中央也就没有能力实现有效的宏观控制。中央不掌握必要的财力物力，宏观失控，计划的严肃性难以维持，也就很难建立健全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句俗话说得很形象：“手里没有米，叫鸡鸡不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国家财力的过于分散，集中表现在“两个比重”不断下降，一个是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原来占26.7%，现

在只占 22%；另一个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原来占 56%，现在下降到 48%，连一半都不到。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如上所述，由于总量失衡，结构失调，宏观失控，国民收入长期超额分配，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助长了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领域秩序的混乱。还有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由于长期实行粗放经营，主要靠扩大外延来扩大再生产，而没有真正走上主要靠发展内涵，更新改造，提高技术水平的路子，因此生产、建设、流通领域里存在相当严重的消耗高、效益低；投入多、产出少；高消费、低效率的状况，各个环节都存在较为严重的浪费和秩序混乱的问题。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经济很难真正实现长期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当前面临的困难，又要看到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对此，五中全会的决定也作了正确的分析。首先，目前困难的严重程度与我们历史上遇到过的困难相比，还是要小得多。60年代初，我们的国家的确饿死了许多人，而现在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同“文化大革命”期间遇到的情况也大不一样。当时是在错误理论、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把国家搞乱了，而现在的问题，是在总体上执行正确的路线和建设方针，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条件下，主要由于经济过热和急于求成而造成的困难。无论是从困难的性质，还是从错误的程度看，都是大不相同的。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从克服困难的条件来说，客观地分析，现在既有比历史上差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总的来看好的一面多一些。具体来说，一是经过近 10 年来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国家显著增强了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克服困难的

回旋余地比过去大得多了，克服困难的能力增强了。中央提出“过几年紧日子”，现在大家都在议论。我觉得这主要的是要求我们把前一段在错误导向下产生的超前消费、高消费加以抑制，把那种超越国家生产实际水平的那些盲目追求所谓生活现代化、设施现代化的现象加以抑制，克服奢侈豪华、铺张浪费的不正之风，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传统，而决不意味着要大家都过苦日子，要大量地普遍地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一年来的治理整顿还是很有成效的。尽管受到了动乱、暴乱的干扰，再加上一部分地方和单位对治理整顿的方针还理解不深，但治理整顿还是有成绩的，并且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已经在这次中央的《决定》中体现出来了。这也是我们对治理整顿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条件。三是，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这场斗争本身使得我们的人民更清醒了，知道了怎样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如此，几个月来的工作更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我们党出现了认识统一、团结增强的政治局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

第二，明确了在当前实行治理整顿的方针是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如果说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的认识还不那么坚定，经过这次五中全会，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治理整顿是当前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不是愿意不愿意这样做的问题，而是不能不这样做的问题。《决定》指出了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六项目标，我认为当前应着力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应努力达到的目标主要是三个。一个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社会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降到10%以下。当前许多深层次经济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物价上涨过猛，通货膨胀率过高，不

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其他许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一个是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逐步做到当年货币发行量与经济成长的合理需要相适应。我们只有控制住经济发展的总量，逐步消除需求过度膨胀，才有可能做到货币不超量发行，也才有可能降低通货膨胀率。另一个是逐步实现财政基本平衡，逐步消除财政赤字。有了前面的两条也才能做到这一条。总量失衡，需求过旺，国家财政支大于收，就只能用较大的赤字来支撑过大的建设规模。前一段有人宣传“通货膨胀有益”、“财政赤字无害”，这是非常错误的。事实告诉人们，通货膨胀有可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的表面繁荣，但最终是难以为继的。

五中全会经过对一年来治理整顿经验的认真总结，概括出了在治理整顿期间必须紧紧把握住的基本规律，即《决定》中指出的治理整顿工作的四个重要环节，这就是：1. 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解决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2.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3. 整顿经济秩序，克服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里的严重混乱现象。4. 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大力提高各个方面的经济效益。简而言之，就是4句话，16个字：控制需求，调整结构，整顿秩序，提高效率。这是从中国目前经济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来的基本措施，是实事求是和切实可行的。社会总需求那么大，超过了社会总供给，国民收入超额分配，造成了总量上的严重的失衡。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总量失衡，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又严重地掩盖着经济结构的恶化。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就是总量失衡、结构失调的一种反映。

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我们已经看到，在盲目追求高速度

的条件下，在国民收入长期超额分配的条件下，尽管各种经济关系中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问题，想调整和改善经济关系也是很难做到的。这里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也是体制上的制约。国家财力物力过度分散，各方面都盲目照顾地方利益、局部利益，不从全局出发，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思想上的问题，也有体制上的原因。什么东西有利、利大，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干；什么东西利小、微利，大家就都不去干。这样，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也就很难进行。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各种经济问题的综合反应。在国务院以及各部门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已经有不少同志讲过我国存在着至少 10 多种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的生产线，而且已经超过了社会需求，像电冰箱、电视机、空调器、西装、化妆品、饮料等等。盲目引进的问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提了出来，谁也都听进去了，但就是解决不了。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是这么搞的。这么搞形不成批量生产，形不成规模经济效益，也不可能集中力量去提高技术和实行国产化。这样分散地引进，大量的外汇让别人赚了去，大量的零部件从国外进口，严重地推迟了国产化的进程。只有合理布局，认真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才能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出现的市场销售疲软，部分工业产品积压，既是治理整顿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也是前几年经济过热、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进一步暴露。我们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时机，坚决调整结构，狠抓经营管理的改善，狠抓技术进步，真正集中力量办好一大批既能适应国内市场需求，又能打入国际市场，具有高度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企业，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益。总的规模不控制住，盲目追求速度，什么东西赚钱搞什么，什么东西热搞什么，不看市场需求，继续盲目地重复建

设和盲目引进，经济结构没有明显的改善，经济效益没有显著的提高，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好转。

现在还要对已经相当混乱的经济秩序进行坚决的整顿。首先是对流通领域，若不加以整顿，我们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种种措施的效应就发挥不出来，甚至可能被抵消掉。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整顿秩序，这一切最终又都要落在提高企业和各行各业的经济效益上。这样，整个经济水平和经济素质才能有所提高，也才能逐步向现代化前进。必须千方百计调整结构，努力理顺经济关系。必须下大力量改进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必须大力加强技术改造，向技术进步要效益。在总量失衡，结构失调，总需求过多地超过总供给，什么商品都只存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企业就没有调整结构，改造经营管理，追求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实行产品更新换代的压力和动力。现在市场疲软，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买方市场，企业再不能墨守成规，安于现状，心安理得了，这对于企业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良好的机遇。目前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企业要真正下大力量，下大决心，改进经营管理，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素质、职工素质和经济效益，这样中国的经济水平就有可能大大提高一步，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也就更有希望了。

第三，全会要求全党必须长期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经济的指导方针。不论是在治理整顿期间，也不论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都不能再搞脱离国情的所谓“大干快上”了。不要再大起大落，不要再走“过热——调整——再过热——再调整”的恶性循环的老路了。就建国40年来就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来讲，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超越国力，

急于求成，大起大落。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逐步的积累过程。企求找到一副灵丹妙药，企求以什么为纲就能把什么都带上去，不讲综合平衡，不作长期的艰苦努力，就奢望经济能够凭空腾飞，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经济发展必须按比例，这是经济本身的规律。至于能不能做到有计划，这决定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我们有可能比较自觉地掌握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则。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对这一点认识得很不深刻。经济建设要遵循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也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过去也都讲过，但一直未被许多同志所真正接受。所以，这次五中全会坚决地要求大家把这个思想牢固地确立起来，真正为全党所认识，真正为全党所身体力行，并把我们的方针落实到政府的宏观经济指导、经济管理和各项政策措施中去，从而带动和影响广大的干部和职工都能真正按这个方针去办事。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更加具有长远的、本质的巨大意义。

为了实现长期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总结过去的经验，可能至少需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 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注重效益，稳定发展，坚决纠正过去几年那种不顾国情国力，急功近利，盲目追求超高速，乃至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表面繁荣的错误做法。要把稳定经济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稳定中求发展，在稳定中促进改革。2. 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方针，坚决纠正近几年来那种只热衷于搞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而忽视和削弱农业的偏差。一定要坚决压缩工业

的过快发展速度，消除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的过热现象，充实和加强农业战线。要在全党全国迅速形成一个高度重视农业、支持农业和发展农业的热潮。3. 要坚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纠正近几年那种过分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乃至企图全盘否定计划调节的倾向。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经济领域的活动，采取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不同办法，并在不同时期适当调整它们各自作用的范围和力度。4. 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的方针，纠正近几年来那种淡化乃至企图否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忽视和贬低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的错误倾向。强调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当然并不是否定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关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决定》提出的方针是，按照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一要立足于本地农副产品和原材料的加工，不同大企业争能源、原材料。二要立足于发挥它们劳动密集型和传统手工艺的优势，多搞出口创汇。三要立足于更好地为大工业服务和配套。要在加强农业的前提下，引导乡镇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科技水平，改进产品质量，同时注意克服自身的盲目性和某些不良倾向，继续健康发展。5. 坚持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原则，纠正近几年片面强调物质利益，一切向钱看，助长分配不公的现象。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还要努力保持和发扬。6. 真正正确地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利用国际的有利条件，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我国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按这几条去做了，就一定有可能保证我们真正实现党中央提出的长期持

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

第四，五中全会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前一个时期，极少数制造动乱的“精英”分子，曾经广为散布一种观点，胡说什么治理整顿就是倒退，就是走老路，就是不要改革，就是旧体制复旧，甚至联系到人，胡说什么主张和坚持治理整顿的人就是保守派。他们制造这种舆论，严重地混淆了人们的视听。这也是治理整顿方针在某些地方、部门之所以一度贯彻不力的原因之一。这些动乱的策划者们制造这样的舆论，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心险恶，对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治理整顿决不是不要改革，更不是要走老路，而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关系况不得不采取的摆脱中国经济困难的根本途径。治理整顿不仅将为改革的深入和健康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和宏观经济环境，而且治理整顿本身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需要改革的配合。例如，在治理整顿中要把农业搞上去，这是一个大问题。农业稳定发展是保证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把农业搞上去靠什么？主要靠三条，其一，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动员中央和地方以至各个部门都来支援农业，特别是要动员农民增加对农业的积累，不能把收入都消费掉，要把一部分收入投入到扩大农业生产之中去。其二，要发展农业科技，搞生物工程，改良品种等等。农业科技上不去，农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其三，实行稳定的农村政策，深化农村改革。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符合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还要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在有条件的地方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新的集体经济，真正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科技服

务体系，把农民联合起来，该统的统，该分的分，把农民引导到新的合作经济的道路上去。治理整顿必须借助和通过改革的办法来实行，农业是如此，企业也是这样。在治理整顿中，缓解企业面临的困难，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都离不开继续推行和完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承包责任制，并解决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的承包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承包基数也应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同时，在企业内部还要坚持厂长负责制，不能因为批评前一段时间削弱了党的领导，又回到原来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上去。但必须强调密切党政关系，书记和厂长要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同心协力地把企业搞好。

在集中力量进行治理整顿期间，改革要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并且要为它服务。我国经济要摆脱困境，当前最重要的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改革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当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坚持以治理整顿为中心，因为当前经济建设的中心就是治理整顿，改革开放也就要为治理整顿服务，不能脱离治理整顿另搞一套。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都不是目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无论治理整顿还是深化改革，都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对治理整顿不积极，就是对改革不积极；对改革不积极，也就是对治理整顿不积极。在端正了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要在全党强调充分地、坚定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明确现在改革的重点。一定要弄清中国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改革。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必须明确中国决不能搞私有化。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后逐步实践的全民所有制一种具体形式，全民所有制采取什么具体形式更好还可以探索，决不是不能研究，禁锢人们的思想。但是，以探索公有制的形式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鼓吹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把以公有制为主的中国经济引向私有化，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这条路走不通。中国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 300 多美元，在这么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能够解决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原因就在于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是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这就意味着要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重新养肥一个资产阶级来统治和奴役自己。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再加上大部分国际市场已经被国际垄断资本所占领，它们不会心甘情愿地让出一部分市场让中国去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通过资本主义道路，真正把生产力发展起来，必然会经过一个残酷的、原始的资本积累阶段，而且必定要实行买办式的资本主义。这样，劳动人民就会重新沦为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双重奴隶。

所以，第一，在中国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第二，中国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形式，同时允许多种分配形式存在。第三，在中国必须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在中国不能否定计划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应当在正确发挥计划管理和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继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继续完善各种决策的民主程序和制度，继续在基层单位发扬民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时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同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只有发挥这些特点和优势，才能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在这些原则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在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当前治理整顿期间的改革要特别注意抓好以下几点。一是，对前几年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要按照中央提出的方针，回顾历史的经验，接受动乱暴乱的教训，在稳定的大前提下，需要补充的就加以补充，需要改进的就加以改进，需要调整的就加以调整，以达到逐步完善的目的。二是，在治理整顿期间，要多一点计划，多一点集中。由于财力物力过于分散，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削弱了。在前几年的改革中注意微观搞活，这是对的，但在微观搞活的同时却忽视了宏观调控；注意给地方、企业放权让利是对的，但忽视了必要的集中。因此，在治理整顿期间，改革措施要有助于适当集中，而且这也是我们克服困难的一条经验。不适当集中，中央的号令没人听，权威树立不起来，都从局部利益出发，各行其是，那就没有办法把治理整顿搞好。三是，要特别注意逐步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微观搞活还是要坚持。针对前几年对宏观调控注意不够，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计划、财政、银行等重要的经济综合职能部门要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们要真正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还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把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搞一阵风，也不能搞简单化、扩大化。其次，一定要把加强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党中央在抓这个问题时，再三强调一要从领导做起；二要抓实事，不说空话。这样做很得人心，要更好地坚持下去。再次，必须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因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涉及到一个相当深度和范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如果没有这种思想的确立，如果没有组织纪律的加强，治理整顿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同北大学生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

(1989年12月)

—

1989年12月27日，应北京大学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约请，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镠，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袁立本，到北京大学与部分学生交流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并回答了学生们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

在热烈的气氛中，袁木首先发表了1小时的即席讲话。

袁木说，我今天不是以政府发言人的身份来的，是以同学们的朋友的身份来的，是来和同学们交流一下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先讲一讲对平息反革命暴乱后中国形势的回顾。动乱和暴乱发生期间，中国的确曾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当时党内党外许多同志忧心忡忡，夜不能眠。平暴之后，这6个多月来，从主流上看，总的情况是国家稳定，政策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当然，也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不安定因素。但总的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拥有11亿人口的中国仍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我们的国家仍然以改革开放、蓬勃向上的姿态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我认为6个月来形势

的发展说明了以下几点：第一，我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人民的支持，我国局势不可能稳定。第二，我们的党是经得起考验的，在那样大的风浪面前，在那样惊心动魄的斗争当中，党没有丧失原则。我们党在平暴以后是深刻反思的，是从反思中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的，是以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来纠正自己的失误的。我们的党是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党，而不是一个一冲就垮的党。第三，我们的军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民军队。尽管在一段时间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军队执行党和政府的命令断然平息暴乱不那么理解，但是随着事实真象的披露，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应该说，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军民团结进一步加强了。第四，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以他们的实际行动逐步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和信任。他们正在努力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在采取重大决策时多走群众路线和广泛征求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第五，我们取得了稳定局势的初步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1. 努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使两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2. 由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实实在在地不说空话，多做实事，努力解决人民迫切希望解决的一些问题，如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改进党风，稳定发展经济等。3. 保持党的基本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许多改革开放措施要在保持政策稳定和连续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充实和完善。政策稳定，人心就稳定。

袁木接着向同学们讲了我国的经济情况。他说，事实证明改革开放 10 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 10 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接近 10% 的速度向前发展，增长了 1.51 倍。和同一期间世界各国的情况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居于世界前列。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同时如实估计面临的经济困难。现在的困难不是这一两年来才出现的，是从 1984 年下半年开始就出现经济过热等问题而逐步积累起来的。为此，要进行较长时间的治理整顿。一年来的治理整顿已初见成效，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 总量控制取得初步效果，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双膨胀得以抑制。2. 今年农业情况比较好，全国粮食产量预计接近或略微超过 1984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3. 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控制得比较好，城乡居民储蓄增长较多，金融形势好转。4. 今年物价上涨幅度略低于去年，新涨价的因素比去年少，涨势逐月下降，广大群众对物价上涨的紧张心理逐步缓解。但是，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又出现了市场销售疲软、企业资金紧张、待业人员增加等新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出现新矛盾而动摇治理整顿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动员和组织企业努力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大力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积极提高技术，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要千方百计搞活流通，增加出口，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明年是稳定发展经济的很关键的一年，国务院最近已相继召开全国计划、财政等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了部署。

袁木还讲了学生们关心的国际形势和东欧局势问题。他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和不干涉别党内部事务的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继续

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决不会变。

袁木强调说，我们的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成熟的党，我们的国家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洗礼、用几千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人民是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的伟大的人民。我国人民必将坚定地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有志气、有信心把社会主义的旗帜一代一代地扛下去。他还说，在座的同学们不论在这样那样的观点上有什么不同，但我相信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你们都热爱自己的祖国，决不愿意受外人的欺负。卖国主义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的！这时，会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接着，袁木等又用了一个小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坦诚的态度，根据他们个人的认识，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许多有关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问题。

会场气氛是活跃的、融洽的。结束时，许多同学高兴地簇拥着袁木、汪家镠、袁立本等同志，热情地把他们送出会场。

二

1990年1月2日和3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受国务院和李鹏总理的委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院看望了正在这里接受军政训练的北大新生、学院的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

袁木首先代表李鹏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向学生们祝贺新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学习好，身体好，祝愿大家在

90年代茁壮成长，并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艰苦奋斗，在社会实践和工农群众结合中，把自己锻炼成为国家的优秀人才。

袁木以学生的朋友的身份，在融洽的气氛中与学生们无拘无束地交流了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他在回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以来的国内形势后说，六个多月来，中国国家稳定，政策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这说明，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拥有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军队是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以其实际行动博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只要全面、准确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实实在在解决人民迫切希望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只要保持党的基本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的局势就可以持续稳定，逐步克服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不安定因素，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不断前进。

袁木接着和学生们共同研究分析了我国的经济情况。他说，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瞩目。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近10%，累计增长1.51倍，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期的发展情况相比也并不逊色。当然，我们面临的困难也相当严重，对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所造成的总量失衡、结构失调、通货膨胀等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中央确定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已经初见成效，开始找到克服困难的经验和规律，只要坚持下去，我国经济就可以走出困境，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

目标，就有保证。

袁木还就学生们所关心的国际形势和东欧局势与大家交流了看法。他说，虽然东欧局势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总的看，国际形势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战争因素固然存在，和平因素也在增长，维持较长时间的世界和平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国努力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便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当然，包括东欧局势在内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东西方的冲击是严重的，对中国也会有一定影响。袁木强调说，中国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吸取国内国际的经验教训，中国将会坚定不移地、长期不懈地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团结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袁木还到教室、学生宿舍、俱乐部、食堂与学生广泛交谈，问寒问暖。他摸摸学生的棉被薄厚，看看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用品，时而拿起食堂为学生过生日装食品用的“生日盆”，时而驻足于学生办的题为“学习前辈革命史，写好自己青春史”的墙报专栏前，翻看学生写的《读书心得》、《青春理想》等文章。面对一张张笑脸，听着一阵阵嘹亮歌声，袁木一再问大家“在这里过得好不好？”同时嘱咐大家：在学习科学文化、军事政治的过程中，努力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21中队计算机系学生马晓卫深受感动，他说：“我们非常

感谢袁木同志代表李鹏总理在百忙中来看望我们。我们懂得，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也是对全国青年一代在政治上的关怀和期望。我们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在今后的学习中，一定把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放在首位，将来接好社会主义的班，把社会主义的旗帜一代一代扛下去。”

20 中队英语系女学生曾洪伟说：“军政训练近 3 个月来，我随时随地都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爱护和关怀。父母的来信，老师的教诲，国务院的同志来和我们交流思想，使我们从心里感到温暖。请领导放心，请老师放心，也请家长放心，我们的思想正在一天天成熟起来，我们是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据新华社报道)

同《经济参考》报编辑记者的座谈对话

(1989年12月)

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1989年2月联合发文，确定《经济参考》报的宣传报道业务由国务院研究室归口指导。1989年12月4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来到新华社，与本报编辑记者就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座谈和对话。下面是这次座谈对话的纪要。

周建英（《经济参考》报副总编辑）：《经济参考》报是国务院直接联系和指导的报纸。袁木同志既是新华社的老同志，又是国务院直接联系和指导我们这张报纸的联系人。为了全面、深入、正确地宣传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我们召集18个分社的20多位记者来座谈。今天一是请记者们把下面的一些新情况通过袁木同志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一下，但更多的是我们在基层活动的记者要就当前经济工作和经济宣传中的一些问题向袁木同志请教。现在就请诸位发言。

既讲进步的方面也讲落后的方面

马常青（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规定，《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业务直接归口国务院联系和指导，我们

记者和基层单位的通讯员为此都很振奋。这样一来,《经济参考》报就更具权威性。安徽省政府得知《经济参考》由国务院指导并由您直接联系后,指定安徽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刘玉年具体联系和指导我们在安徽的报道。我们在安徽工作的记者和通讯员很想了解一下,中央、国务院对我们这张报纸有什么评价和要求,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间,对我们这些记者、对我们《经济参考》报又有些什么具体的要求?

袁木:我认为,《经济参考》报办得还是比较活泼的,信息量比较大,宣传中央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比较得力,而且并不是板起面孔来说话。它很有特点,比较灵活,遵循了中央总的政策的轨道,在这个前提下又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据我所知,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这张报纸是比较重视的。现在报刊很多,而《经济参考》报是一些领导同志特别是管经济的领导同志必看的报纸之一。

我们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联系,要形成一种加强联系的制度。报刊有自己的工作规律,我是从新华社出来的,知道对新闻单位来讲,希望上面有人联系,但干预多了束缚了手脚也不好。说联系,更多的是要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提供一点宏观的情况。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做了一点,但还很不理想。我们也搞了一点东西(《经济参考》报副总编辑陈谈强插话:本报“国情纵横”这个专栏的稿件均由国务院研究室提供),《十年改革的进步和差距》的文章,就是我们针对当时《世界经济导报》宣传的一些观点写的。我们那里的一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当时不大同意他们的观点。增加一些忧患感我们是赞成的,但把我们说成是这十年什么也没干,说从总体上我们同一些国家“差距越来越大”,把社会主义说得毫无前途、毫无希望,这在

方向上是不对的，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也是不合乎事实的。我们那个材料是从两方面讲的，既讲我们的进步方面，也讲我们的落后方面。

这几年我有一条很深的体会，就是对老百姓讲话要实事求是。我现在是国务院发言人，我感到，不管是内部作报告也好，公开发言也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怎样能够实事求是地把情况给大家说清楚。凡是实事求是的，效果就好。说得片面了，不管你是偏到哪一面，把事实说颠倒了，一时可能会哗众取宠，讨好一些人，但最终会站不住。好的东西说得过头了人家也不听。你们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最近登了一些好文章，动乱期间和平息暴乱之后有几篇东西，如《对当今流言的批判》等很受大家欢迎，好多报纸都转载了。（周建英插话：当时也有不同意见，说你们经济报纸怎么写起政治来了，但是我们认为政治不稳定，经济建设无从谈起。）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很难，没有政治的稳定，经济也很难稳定。政治稳定是前提，经济稳定是基础。现在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稳定了才能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现在国内外形势很复杂，因此，我很赞成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宣传报道要帮忙不要添乱，帮忙还要帮到点子上。什么是帮忙，什么不是帮忙，这有许多学问，很值得研究。

过紧日子，老百姓生活会下降吗？

吴复民（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现在上上下下对中央提出要过几年紧日子的问题都很关心，议论纷纷，理解各异，猜测也很多。有人认为现在就是紧日子了；有人认为紧日子还没

开始，明年后年才紧呢；有的甚至联想到 60 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过几年紧日子”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是谁过紧日子？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会不会下降？对此人们心中没底。请袁木同志谈谈看法。

袁木：过紧日子主要是控制机关消费、团体消费。像用公款请客送礼呀，追求豪华呀，对这些东西要严加控制。当然现在情况比前一段好多了，但并不是这些现象都没有了。这几年许多地方大规模兴建、更新、装修招待所和宾馆，而且房间大都配有彩电。有些地方也不是很富，甚至还比较穷，可是县一级的宾馆、招待所也盖得相当好。这就是脱离中国现实的超前建设。还有，不少地方搞了些装点门面的工程。过紧日子得从这些方面紧起，首先把这些压下来，而不是要叫老百姓普遍降低生活水平。

整个来说，这次过紧日子跟 60 年代初困难时期不一样，不可能再叫多数人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过几年紧日子”，把集团消费开支压下来，把像到处盖楼堂馆所那样的“超前”压下来，正是为了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能够逐步地有所改善。当然，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过去一些单位把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投入不适当地转化为消费基金，一些单位工资性支出的增长幅度过大地超过了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那样的事当然不能再干了。同时，我们还要认真解决目前存在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这里要提到的是，在目前的治理整顿中，有一些企业停产或半停产，影响了一些职工的收入，一些人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出现困难。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党和政府非常关心这

一部分职工的处境，正在努力作出安排，各地也要为此而进行艰苦的工作。

从全社会来讲，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们的国情需要我们艰苦奋斗，我们的传统也是艰苦奋斗。这是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怎样为农民鼓劲，又为农民顺气？

熊小立（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我们下去采访，好多基层干部希望我们在报上反映他们的情况。我刚到川北走了一圈，和詹仲德（湖北分社记者）碰了一下头，情况大体相似。一是带来了农民的喜悦，一是带来了农民的忧愁。喜就是农民的确感觉到治理整顿好。农民不会说个一二三，但会编顺口溜：“喇叭上面在叫，大官出面了，化肥农药都买得到，产量还上去了。”四川今年遭了些灾，但是各方面比较重视，生产资料市场整治了，另外科技干部下去，搞科技承包，生产还可以。四川、湖北今年粮食都增产，农民比较高兴。但他们感觉到，一是虽然农副产品提了价，但生产资料也涨了价。二是农民负担比较重，气不太顺。因此我向袁木同志提两个问题，一是对减轻农民负担，国务院有什么考虑没有？二是我们这张报纸怎样既为农民鼓劲，又为农民顺顺气？

袁木：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中央和国务院很关心。不光是农民的负担，包括企业的负担，也应当清理一下。

农民负担加重原因很多，我不知道你们做过详细调查没有。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不管农民也好，企业也好，干脆认真总结一下，哪些是企业必须拿钱的，要确定一个比例，农民

和企业交完了以后，任何人来要钱一律都不交。比如说企业盈利一百，拿出百分之几，这个钱就是交各种负担的钱。农村也是这样。这是个问题，你们能不能想出个办法，真正调查一下，提出个可行性建议来。

范向群（新华社吉林分社记者）：吉林正在搞这方面的试验。

袁木：好。能不能搞个制度化的东西？税也好，什么也好，一次性的，就告诉农民，除了我这次收的，任何人再收，都可以拒绝。我们也讲了，凡是违反国家规定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有权拒绝。问题是被收的人哪里知道哪个是乱的，他怎么拒绝？再加上有个很现实的问题，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来的都是上级，无论得罪了哪一方面，给你一个小鞋穿，你都很难办。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们要集中力量宣传农村政策的稳定性。最近国务院领导同志不是在农村开发会上讲了六个稳定吗？我觉得无论如何要给农民吃这颗定心丸。

对农村的改革措施，首先强调稳定，强调连续，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充实和完善。我的看法，宣传上要让农民觉得你的完善对他有利。不要勉强，不要让他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比如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在这个前提下，多搞些对农民有利的集体事业。农民不好卖的，你帮他销，农民缺的东西，你帮助他弄来。

多提倡搞一些服务体系，包括供销性的、科技性的、流通领域的、生产领域的、产前产后的。特别是科技领域的，因为一家一户的农民自己搞不起来，要多组织一些科技人员下乡搞培训班，普及科学知识，在不知不觉之中使农民提高集体意

识。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农民没感觉到你给了他什么好处，只是强迫他“归堆儿”，他的积极性就受到压抑。（周建英：我们要循循善诱。）要从利益分配上让农民感觉到合理，从思想等各方面一步步引导他们。

马常青：在这方面，安徽省委省政府已反复强调几个“不变”，农村的有关政策，归纳为五个“不变”、“两个完善”，发展集体经济，健全服务体系。

袁木：有条件的可以那么干。有些很清楚，比如现在搞一定规模的开发性农业，新开发这一片，就没有必要再分到一家一户去搞，可以按照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合理配置劳动力和使用财力物力。我们的宣传报道上不要老抽象地作报道，你可以报道他开发时采取的是什么办法，效果如何。多从这种角度做些宣传，不要老是想在政策上一下子提一个全国性的典型，想只从一个点的经验，就得出一个带全国性的、带指导性的结论，一下子让农民感觉现在整个地又是在往哪方面倾斜了。这种气候一造成，农民的心就慌了。中央现在强调要稳定，各方面都要贯彻、落实这个方针，当然包括我们的宣传工作。

农副产品丰收后怎么找销路？

杨善清（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今年农业丰收，特别是南方。粮食丰收了，很多地方露天堆放；水果丰收了，又堆到马路旁；鲜鱼丰收了，也卖不出去。湖南很多地方又出现了各种卖难的问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对农村的“卖难”，我们认为并不是产品太多了，请问国务院有什么措施没有？

袁木：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光是湖南，我刚到武汉去，那里也有些粮食想卖而卖不出去，原来广东要，现在广东也不要了。有两个因素，一是广东今年本省粮食增产；二是它前一段进口了一部分粮食，现在不紧张。粮价虽然现在看低，但广东也不大愿意买，不愿积压资金。这又涉及到各地的实际利益。一些负责农产品收购的部门也怕亏损，也不愿积压，还有个仓储设备的问题。另外，原来机关企业都直接去农村买东西，为职工谋福利或“以物换物”，而现在这种情况少多了。以上种种原因，造成农产品积压。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东西稍微多一点，就显得多得不得了；而稍微少一点呢，又紧张得不得了。总体上还是缺的。从国务院的角度讲，只要能把东西卖出去，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影响，各种措施都行，只要不搞不正之风。可以这样宣传，因为这对农民有好处。农民的东西卖不出去，利益受打击之后，明年他就不大愿意干了。当然，这里也有个说服农民要有点商品意识的问题，东西多时，卖得便宜点；东西少时，价钱可以高点。现在市场疲软，饱和了，你的价格就下来一点。

要充分认识治理整顿的艰巨性

夏林（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在治理整顿中，需要有局部服从全局的全国一盘棋思想。可是我在天津采访时感到，实际上现在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得更明显了。例如天津碱厂，多年来一直用邻省的石灰石做原料。可最近邻省把石灰石矿划归本省碱厂所有，停止向天津供应。结果天津碱厂10月份开始产量下跌。而天津红三角牌纯碱，恰好是得国家金奖的出口产

品，这就非常可惜。再举个例，前两年电梯厂一拥而上，大小电梯厂多达 300 家，现在产大于销。这样，有些小电梯厂只能靠地方财政补贴来生存。据说有的厂销售中还有不正之风，但产品照样卖得出去。而天津奥迪斯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却订货不足。我们担心，如果地方财政包干的现行体制不改变，生产力的优化配置就难以实现。如果由于地方的利益，调整中最后保留下来的反而是产品低劣的企业，治理整顿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我们想听听袁木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杨继绳（《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编）：有一点想法向您请教。治理整顿实际是一次经济调整。要认识这次调整和过去历次调整不同之处，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才能取得调整的成功。但是，当前舆论上讲过去调整的经验多，讲这次调整的新特点少。我觉得和过去的调整比，这次调整至少有以下特点：第一，过去调整前的经济背景在工业中一般是基础产业超前，加工产业滞后，而这次需要扶持的是花钱多、见效慢的基础产业；第二，这次调整中国家的直接调控能力大大削弱，中央政府手中缺乏足够的物质力量；第三，中央直接调控能力的着力点一般在国营企业、预算内资金这样的范围，而需要调控的主要是预算外资金和国营企业以外的部分，二者出现错位；第四，这次调整面对的是过去所没有的刚性的地区利益和企业利益，各地区不愿意承担调整的代价，刚性的地区利益可能成为调整的重大阻力；第五，产业结构的调整困难不少，因为不能像过去一样用行政手段实现存量（即现有的生产力）调整，而增量（即新增的生产力）调整不是三两年能够产生效果的；第六，这次调整面临内外债的还债高峰，资金回旋余地小了点；第七，这次调整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比过去要复杂。当然，这次

调整也有很多过去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如社会财富比过去多，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比较丰富等。不知国务院对这些新情况是否有相应的对策？

袁木：你们的见解里肯定有许多闪光的思想、正确的观点，起码如你们所说，这几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一些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东西，或者说当时并不知道是在违反而实际上是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的东西，以致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后果。当然，你的分析里也有一些可能不那么准确，这难免。不过，调整的任务确实是艰巨的，对此我们从未盲目乐观，或者只是泛泛地说现在比过去好得多。同60年代相比，我看现在无非是困难程度比那时轻一点。说到克服困难的条件，有比过去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一般来说，好的条件要多一些，但是也可能有些困难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这次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的决定里都讲到了。

上次调整也好，60年代的调整也好，现在也是这样，农业总是问题，是难点。在工业内部，是调整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关系。类似这种问题，报纸要做点分析，让大家都能认识到。

这次调整的最大困难，我看还是个机制问题，就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这是贯彻一些调整措施时遇到的难点。如刚才讲的天津奥迪斯电梯厂所碰到的情况。本来电梯这个行业应该有个合理的产业布局，几个大企业搞什么，其他厂为大厂搞配套服务，但现在就有点乱。不光是电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西装生产线都有这个问题。这就像中央的决定中所讲，地方财政包干，一方面有好处，可以提高地方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坏处在于加剧了地区

封锁、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搞小而全、大而全。在这次调整中，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包干体制不变，但也要兴利除弊，有补充、调整和完善措施，将来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如果强化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小而全、大而全的机制不逐步有所改观，将来可能在经济结构恶化的情况缓解以后，又重复老毛病。这个问题中央已经看到了，已经在这次通过的决定里把问题提了出来。首先要控制总量，在这个前提下，调整结构，整顿秩序，提高效益。出路有了，原则也已讲清楚了。产业政策，前一段已搞出国家产业政策的要点，这总是前进了一步。当然，具体落实，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要采取经济调节的办法，要有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综合对策，最终还要靠机制的转变。

我很赞成你们去研究一点问题，从某一个产业、某一种产品着手，如从奥迪斯电梯着手，立足于天津，把全国电梯生产的不合理布局揭露出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假如还能提出一点建设性的意见来，如怎样布局才好，那就更好，即使提不出更好的意见，把问题说清楚了也很有用处。

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周建英：时间不早了，但有的年轻同志还想提一些问题。我们最近联系实际学了江泽民同志和李瑞环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很有收获。小叶，你不是有个问题要问袁木同志吗？

叶建平（《经济参考》报农村部编辑）：据我所知，现在新华社许多年轻人都在思考如何使自己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能早点成熟起来。袁木同志曾经是个出色的记者（袁木：不，不称

职的记者，而且犯过不少错误)，在这方面会有不少体会和感受。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要做好新闻工作，您最深刻的体会和感受是什么？

袁木：我几十年的工作经历还是以在新华社搞新闻工作的时间为最长。我是从1948年开始搞新闻工作的，1950年到新华社，1972年离开新华社。我觉得新闻工作对锻炼年轻人来说是个合适的岗位，是个相当吸引人的工作。搞新闻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从学校出来，书本知识相对多一些，但社会实践等各方面的知识可能少一点。新闻工作恰恰是个很好的岗位。我不敢说我在这方面做得好，但是我确实有两点最深的体会。

一点是新闻工作为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可以每天每时地学到新鲜知识。有了这么一个条件，应把自己的求知欲望搞得越强烈越好，把跟任何一个人谈话都作为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不是说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意见，有自己的看法是必要的，不然就容易随风倒。但是，真正抱着一种求知的欲望，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回过头来想，20多年来我确实丢掉了好多学习的机会，至今懊悔不已。要是天天都能注意积累自己的知识，进步就会相当可观。但是这种学习机会也是稍纵即逝，如果没有这种自觉性，机会就会丢掉。做实际工作的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各级干部也好，他既然从事他那一行，总有比我们知道得多的地方，应当向他们真正请教。

再一点是，我觉得知识分子要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我们发表新闻、发表意见，实际上是一种改造客观世界的形式。因为发表新闻主要是为了影响更多的人，影响的结果无非是为了把我们的客观世界改造得更美好。但如果自己本身的观点不正

确，不能经常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之符合客观世界的实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不能很好地改造客观世界。

我不是说我这一点做得好，而是说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就是要加强自我改造，要把自我改造看作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我感觉到在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尚能差强人意的時候，往往都是自己比较虚心一点、能自觉改造自己的时候。若不是这样，就容易犯毛病。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搞学生运动的，当时也算是个头头脑脑的人物，大会上讲一通，好像还挺有鼓动性。但跑到解放区，到农村里，我说的什么人家都不懂。毛主席讲知识分子的弱点，我觉得他说得非常亲切在理。

我有两条希望：一条，希望大家强烈地追求各种知识，不要有满足的时候；一条，就是希望自觉地改造。假如再加上一条的话，那就是不停地写，拼命地写。这一点我在新华社工作的时候，不管怎样大的小的事情，叫我去我无论如何都拼命地跑，跑了以后就写，该今天写出来的决不拖到明天。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干一点。希望我们都有这种精神。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